 全球化译丛

[埃及] 萨米尔·阿明 著  
任友谅 金燕 王新霞 韩进草 等译

#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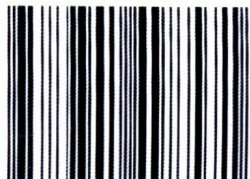
*Les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



social sciences documentation publishing hous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全球化，世界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如果说它以往的形式加快了历史的进步，为落后赶上先进提供了机会，那么它的现代形式只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扩展，从体制上制造不平等。战后其成员国的计划，曾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屈从于重要的社会妥协，国家也从中得到了合法性，并且为此设立了世界一体化的调控机制。本书重点研究了世界面临挑战的多样性和各个不同地区（欧洲、俄国、中国、第三世界）对这些挑战做出的反应。这些直至今日仍然相抵触的反应，会使欧洲建设、东欧国家的重建工作以及第三世界加入世界体系受到不利影响。能否走出这些死胡同，并设想一些新的加盟国计划，把现代深化的世界一体化和人类进步与解放的渴望重新结合在一起呢？作者从理论上为我们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ISBN 7-80149-857-7



9 787801 498571 >

ISBN 7-80149-857-7/D · 1  
定价： 18.00



全球化译丛

---

#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

[埃及]萨米尔·阿明 著  
任友谅 金 燕 等译  
王新霞 韩进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埃及]萨米尔·阿明著;任友谅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  
(全球化译丛)  
ISBN 7-80149-857-7

I. 世 II. ①萨… ②任… III. 一体化—研究—世界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338 号

·全球化译丛·

世界一体化的挑战



著 者:[埃及]萨米尔·阿明  
译 者:任友谅 金 燕 王新霞 韩进草等  
责任编辑:严 波 许春山  
责任校对:闫晓琦 张景秋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电话 65137751 邮编 100005)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9  
字 数:211 千字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857-7/D·148 定价:18.00 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1714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Les défis de la mondialisation

© Éditions l'Harmattan

---

本书由法国阿尔马唐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

## 《全球化译丛》总序

亚洲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即将加入 WTO 之际，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迅速成了热点。从 1998 年我们主编国内学术界第一套《全球化论丛》后，在不到 2 年时间内，国内出版的关于全球化的编著和译著不下数十种之多。这不仅表明人们更加关心全球化问题，也表明对全球化的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不仅表明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在深化，也说明国外学者对全球化的研究仍在向前推进。

薛晓源同志主编的这套《全球化译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90 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这套译丛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的多学科性。译丛第 1 辑由 5 本著作组成，它们分别从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角度，对全球化问题做了广泛的探讨，这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全球化进程所做的多学科反思。然而在这个共同表征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细心的读者在研读完这 5 本译著后将会发现，这套译丛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目前在全球化理论研究方面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点。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超国理论（supernational theory）。

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

过程，但是归根结蒂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也或多或少开始出现了。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

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于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如新左派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更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

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着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做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

全球化理论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全球化研究将是 21 世纪很长一个时期内各国学者的共同课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不仅意味着努力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也意味着更多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问题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宏亮声音。希望这套译丛的出版，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全球化研究，我想，这也是丛书的编辑者和出版者推出这套丛书的基本宗旨。

俞可平

2000 年 8 月 19 日于北京新风南里

#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的地区体系 .....	1
第二章	亚洲在古代世界氏族体系中的地位 .....	38
第三章	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 .....	60
第四章	当今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开放的还是控制的自由化？ .....	101
第五章	世界一体化和金融化 .....	118
第六章	面临挑战的欧洲 .....	150
第七章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模式 .....	180
第八章	世界体系中的俄罗斯：地理还是历史？ .....	191
第九章	阿拉伯世界的新买办化 .....	202
第十章	非洲经济灾难的根源 .....	213
第十一章	获得自由的战略 .....	229
结论	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回顾 .....	250



# 第一章 古代的地区体系

现代世界绘出了一幅世界历史图，根据这幅图，资本主义（欧洲）是第一个统一全球的社会体系。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惯常的说法过分地简化了现实情况。在我看来，它是欧洲中心论的典型产物。实际上，16世纪以前的社会绝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在若干地区性体系内部互相竞争（甚至可能是在一个全球体系内部）。低估了这个事实，就无法理解这些社会内部变革的动力。同时，我坚决认为资本主义代表了世界历史上一个质的飞跃，它开始于将近公元1500年时。我也要强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前社会中的原始资本主义因素（有的出现于很久之前）相比，是有区别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要强调，那种全球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中心—周边力量对比的结构极为特殊，与此前的力量集中式的结构有着本质的区别。

## 1. 资本主义社会与过去的社会之间存在的特殊矛盾

我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马克思的）的决定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此，后人对于这一理论的诠释（当然，这在眼下可是风行一时）并不能说明问题。边际生产成本包含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概念，这些生产资料本身也是劳动产品。前提条件则是：生产力发展到足够高的水平（与手工生产

及其工具设备相比)；在此基础上，社会分为两个基本阶级，这就要求社会劳动具有自由雇佣劳动的性质。这样，普及了的资本主义市场就形成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经济规律，作为不受主观意愿束缚的力量，起着作用：经济剥削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体现了这一点。

在现代社会之前，没有任何社会建立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相反，16世纪以前的所有发达文明的社会，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我将其定性为氏族性社会。我要着重指出一个本质的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中，剩余财富是通过与权力等级制度紧密结合的透明手段而向农民阶层直接抽取的（权力是财富之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规则恰好反了过来）。体系的再生产要求有一种主导意识形态——国家宗教掩盖权力的组织形式并赋予其合法性（而资本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则掩盖了经济剥削，赋予其合法性，作为补偿，它的政治关系相对透明，这也是现代民主诞生的一个条件）。

我曾在几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论中表明过立场，我认为有必要在此重复一下我的主要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指导着我关于前一现代体系本质这一问题的观点。

我不同意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五个阶段”的说法，更具体些说，就是不同意（i）把奴隶制看做是所有社会的必经阶段；（ii）把封建制看做是奴隶制之后的必经阶段。我也不同意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两条道路”的说法，更具体些说，就是不同意：只有“欧洲”道路（奴隶制—封建制）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而“亚洲”道路（所谓的亚洲生产方式）只会形成一条死胡同，无法自行发展。我把这两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說法称为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至于我的观点，我已经在《阶级和民族》中阐述过了。

就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两个“生产方式家族”必然相继

出现：集体式家族和氏族式家族。原因是：在一般性的发展中，我着重强调两次质的飞跃：(i) 后一次是：氏族式社会阶段是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国家+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资本主义阶段是经济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普及市场+经济意识形态）。(ii) 前一次是：集体社会阶段的无国家和姻亲意识形态；氏族社会阶段的国家权力和形而上学意识形态。我的这种说法指出了这两次飞跃的多种形式，尤其定义了氏族社会阶段的“中心/周边”形式，这是周边氏族式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

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一些人认为，我所称的“氏族式”并不能构成一种生产方式。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讨论）。如果这个词不合适的话，我就把“氏族式生产方式”换成一个更泛泛的词“氏族式社会”。

当然，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找“普遍规律”。其中，我提出的那些基本概念，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也打上了“原始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的印记。但是，当然有一股思潮存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正是一帆风顺——它拒绝寻找任何普遍规律，相反，只致力于强调不同发展道路各有各“不可克服”的特殊性。我把这种认识论取向看成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这种理论最关心的就是如何证明西方“优越性”的合理。

## 2.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特殊性

我使用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个词，想指的是：体系的变化发展划出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地区性“调整”起着作用。换句话说，这种体系观点使得“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的区别相对化，因为在全球体系范围内，所有的因素都是内部因素。很明显，这种方法论观点把我们与那些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资产

阶级甚至马克思主义)分离了开来。这些思潮的观点是：内部因素是决定性的，因为每种国家形式（“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都主要源于它的“内部”因素，比如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说的“有利”或“不利”因素。

此外，我的分析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和先前的社会有质的不同，前者的主导是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规律），后者的主导是政治意识形态。

现代全球体系（资本主义）和先前的所有体系（地区性和氏族性的）都有着本质区别，这个本质区别要求我们就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做出评价。通过“全球化价值规律”这个词，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一般说来，价值规律的前提条件是：融合了社会劳动产品（然后就成为了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市场。这样，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空间内，这个规律就会使同类商品价格、资本利得和劳动报酬（形式为工资或小生产者生产所得）趋同。在中心资本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内，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这个市场融合了商品交换和资本运作，但却不包括劳动力。全球化价值规律倾向于统一商品价格而不是统一劳动报酬，但是，实际上，劳动报酬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方式比生产率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方式要多得多。

通过全球化价值规律表现出来的力量集中，无论在质上、量上还是作用空间（整个星球）上，与先前的氏族性（地区性）体系内部的力量集中都不可同日而语。

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质的飞跃绝对有效；它表现为根本的颠覆：经济意识形态代替政治意识形态占了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所有先前的体系在本质上不同，那些体系，无论它们彼此之间关系多紧密，它们也

必然只是地区性体系。只要这种根本颠覆没有发生，我们就只能用原始资本主义因素这个词，如果这些因素存在的话，也是受占主导地位的氏族式意识形态控制的。因此，我不能同意下面这种说法，它抹杀了质的飞跃，而认为这种飞跃只是一个号称永恒的、由来已久的“全球体系”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不能低估资本主义这个质的飞跃的重要性。但是，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当我们剥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它披上的神圣外衣时，我们也发现了它的历史局限性。我们无法再写出简单的、安抚人心的方程式，比如说：资本主义（如今是“市场”）= 自由和民主，等等。我和卡尔·波朗依（Karl Polanyi 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剥削的理论是很重要的。我和他有相同的结论：从本质上，资本主义并不是自由的同义词，相反，却是压迫的同义词。我们要重新承认社会主义理想具有伟大意义，它的目的在于解脱奴役，而过去人们常常想否认它的意义。

欧洲中心论并不否认资本主义所代表的质的飞跃和它开辟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是相对的、有历史局限性的），它也不是一份“忏悔书”，宣布不再把这一进步定性为欧洲的独创。换个角度来说，这种观点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时代所造成的矛盾：这个体系征服了世界，但却没有使这个世界整齐划一，相反，它造成了所能造成的惊人的力量集中。因此，如果我们不再继续追求这一体系的世界性，资本主义就不会被超越。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在《欧洲中心论》中的观点，那就是：应该用必要、可能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世界性来代替极度欧洲中心论的、资本主义的断章取义的世界性。换句话说，欧洲中心论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厚古薄今，那样的“颂扬不同”。

### 3. 1500~1800 年欧洲的商业化过渡

全球体系不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形成于 19 世纪后 30 年，那时“帝国主义”（意指列宁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得以确立，与之相关的世界殖民地的划分也已完成。相反，我们说这个全球体系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规模，这规模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中一直是一个常数。我们承认，从文艺复兴开始，资本主义的主要因素就在欧洲形成了。1492 年——征服美洲的开始——是资本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同时诞生的日子，这两个现象是不可分的。

1500~1800 年间“过渡”的本质是什么？以那个时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旧制度”或“君主专制”）或是经济本质（商业化）为基础，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因为，对于如何定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西欧、中欧以及东欧的商业化社会都产生了疑问。在此，我们只是把形成边际生产成本的一些先决因素集中在了在一起：(i) 商业交易范围的显著扩张，这类交易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产品的交易；(ii) 对私有财产的现代形式的肯定及通过法律表明对这些形式的尊重；(iii) 自由雇佣劳力的显著扩张（在农业中和手工业中）。但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把“工厂”确立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经济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倒不如说是商业化经济（受“贸易”、“交换”控制）。

所以，很明显，关键在于过渡形式。针对上面这个结论，我还有两点要补充：

第一，我们所提到的形式——有人将之定性为原始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呢）——并不是 1492 年起就奇迹般地突然出现的。在先前的若干世纪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种原始资本主义。比如说很久以前，在地中海周围的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城市以

及海对岸的阿拉伯—穆斯林地区，或者很久以前的印度、中国等等。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开始于1492年，而不是1350年，900年，或者更早呢？为什么我们只谈到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而不把其他社会（阿拉伯—伊斯兰，中国，等等）也看做正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呢？这些社会中也有原始资本主义啊。在这些条件下，为什么我们不放弃过渡这种说法，转而把它当做是一个存在已久，资本主义因素也出现良久的体系的持续变化发展呢？接下来，我的第二点就会部分解释我为什么不接受以上这些说法。

第二，美洲的殖民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加速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扩张。以至于理论上，我们所涉及的这三个世纪的社会体系都应该受这些因素支配。但是直到那时，事实还并非如此；相反，那些原始资本主义因素还被束缚在一个氏族式社会关系（在中世纪欧洲，是封建关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

在地中海——欧洲地区，那些意大利城市形成的紧密网络难道没有构成一个“原始资本主义体系”吗？毫无疑问，就这些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组织而言，原始资本主义形式占有主导地位。但是我们怎么能把这些意大利城市（甚至其他国家：德国南部，汉萨同盟，等等）从中世纪的基督教国家总体中分离出来？这个总体是受封建乡村生活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习惯势力，政权分散，教会的文化垄断，等等。

因此，我认为，要足够重视16世纪到18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欧洲的政治体系的变化。从中世纪的政权的封建式分散到君主专制式的权力集中，这个变化是与原始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相伴产生的。欧洲的这个特殊性很值得注意，因为在其他地方——比如中国或者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封建式的权力分散：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是在原始资本主义之前就产生了。我把这个特性归结为“周边式”封建社会的

特征——地中海的氏族式社会嫁接到了一个还大大落后于集体社会阶段的主体（野蛮欧洲）上的产物。

但是君主专制国家的形成（较晚）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和氏族式国家与其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有所不同。在中心氏族式国家中，国家和占主导地位的氏族式阶级混同了起来，这个阶级只存在于这个国家内部。相反，君主专制式国家是建立在氏族式阶级的权力的废墟上的，因此，它相当依赖城市的原始资本主义（新生的资产阶级）和乡村的原始资本主义（开始从事商业活动的农民阶级）。专制主义来源于这两者的平衡：迅速发展的原始资本主义和封建剥削的残余。

这种特性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得到了反映，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从旧制度，文艺复兴到 17 世纪的启蒙运动这一时期的国家的形成，二者是同步的。我要强调的是，这种与氏族式意识形态决裂的意识形态有着特殊性，我认为这种特殊性很是先进。氏族式意识形态，在形而上学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了政治机构的主导地位。为了避免误会，我要明确指出，形而上学并不是“无理”的同义词（就像启蒙运动的激进思潮所描绘的那样），而是试图调和理智和信仰（参照《欧洲中心论》中我就此主题的阐述）。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意识形态革命并没有摒弃形而上学主义，但是它把科学从形而上学主义的束缚下解脱了出来，借此也为一块新的科学领域，即社会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同时，新的国家（旧制度）的实践当然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同步进行（这绝非偶然），这也刺激了原始资本主义的扩张。因此，我们也看到了欧洲社会迅速走向了“资产阶级革命”（1688 年在英国，1776 年在新英国，1789 年在法国），同时，资产阶级对原始资本主义发展的基座——专制制度也提出了疑问，目的在于通过民主实现他们的权力合法化的新



设想。我坚持认为欧洲人是普遍清楚这一特殊性的。在文艺复兴之前，即使欧洲人（中世纪基督教国家）认为自己的宗教更为“优越”（别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也是以牙还牙！），他们也知道自己并不比东方的先进社会“优越”（就潜在的力量而言）。从文艺复兴开始，他们就知道了自己比其他所有社会都优越（至少是在潜力上），并且今后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征服全球（他们也这样做了）。

#### 4. 从前的阿拉伯—伊斯兰体系和地中海体系

人人都知道，早在意大利城市的繁荣之前，地中海和中东的阿拉伯—伊斯兰地区就经历了若干个世纪的辉煌和文明。

这个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是不是一个原始资本主义体系？在这里，原始资本主义已经出现，并且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区，它也推动了辉煌文明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所阐述的看法（参照《阿拉伯民族》，《欧洲中心论》）与弗滋·芒瑟（Fawzy Mansour）（《阿拉伯世界的绝境》）的观点不谋而合，从某些方面，也接近已故的阿马德·萨代克·萨德（Ahmad Sadek Saad）的看法。抛开可能存在的分歧—或小的区别—不谈，我们都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政治体系并不受原始资本主义（商业化）力量控制，相反，是原始资本主义受占主导地位的氏族式政权的控制。

因此，我认为，阿拉伯—伊斯兰区域构成了我所谓的地中海“体系”的一个子集。

我主张（在《欧洲中心论》中）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东方（公元前3世纪）作为“地中海体系”诞生的标志。从这个时候到文艺复兴，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体系缓慢形成，首先是古老的东方（地中海东部盆地周围），然后是整个地中海以及它在阿拉伯—伊斯兰区域和欧洲区域的延伸。关于这个主题，

我认为，我们这里所接触的，只是一个从公元前 300 年（亚历山大统一东方）到 1492 年的氏族式体系。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圈”，它的统一首先是通过一种集体的形而上学思想表达出来的（区域的氏族式意识形态），具体则借助了这种形而上学的连续若干表达形式（希腊宗教，东方基督教，伊斯兰教，西方基督教）。在这个文化圈内，我认为有必要把中心区域（地中海东岸）和周边区域（西欧）区别开来。在这个整体内部，各种性质的交流是（几乎一直是）很紧密的。和这些交流紧密相连的原始资本主义是极其先进的，尤其在中心区域尤为明显（特别是伊斯兰文化最强盛的时期：8 到 12 世纪，以及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在意大利）。这些交流是社会剩余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但是主要说来，这种剩余财富的集中是和政权的集中紧密相连的。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文化圈整体从未构成一个“统一帝国”（除了两个短暂的阶段：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它们覆盖了体系的全部中心区域）。一般说来，西欧这一周边区域是极端分散的封建制（这也是周边特征的表现之一）。中心区域则被东方基督教国家——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倭马亚以及初期的阿拔斯）分割，受内部离心力的控制。只有迟些时候，奥托曼帝国才将其再次统一。奥托曼帝国的形成恰恰赶在这个阶段末，此时，原来的中心区域总体周边化，而中心移向了西欧这块从前“周边”的区域。

这个地中海“体系”可否被称为原始资本主义？正面论据是：我们看到了无可争议的原始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私有财产，商业公司，雇佣劳动）。这些因素贯穿了整个时代，在一些地点和时间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伊斯兰区域和意大利），在另一些地点和时间萎缩衰退（尤其第一个千年时在野蛮欧洲）。但我认为，这种存在不足以定义整个体系。因为，在意识形态这个决定性的方面，相反，我看到，这个阶段（公元前 300 年到这

个时代的最初几个世纪)，希腊化时代出现的，然后以基督教（东方然后西方）和伊斯兰教形式蓬勃发展的，完全是氏族式意识形态，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形而上学思想占主导地位。

因此，我认为是存在着一个体系，但不是“原始资本主义体系”（氏族式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形式），而是“氏族式体系”。我说的是一个体系，而不是独立的氏族式社会的简单并列，尽管它们有许多共同点（例如宗教方面，或是一个帝国内的融合方面——比如罗马，拜占庭，倭马亚和阿拔斯——尽管时间很短暂）。

我认为，差别导致了某种程度的剩余财富的集中。但是，我在这里要明确指出的是，这种剩余财富的本质是氏族式的，而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资本利得。氏族式社会剩余财富集中的正常手段是政权集中。政权一般从帝国首都（罗马，拜占庭，大马士革，巴格达）的利益出发。当然，这种财富集中与政权集中同样脆弱。拜占庭，大马士革，巴格达无法避免接班人常常自治（亚历山大，加莱，费斯，开卢昂，热内亚，威尼斯，皮斯，等等）。但是，所有未开化的基督教国家（西方第一个千年）都没有这种集中。同时，政权集中刺激了原始资本主义关系。以至于在这个区域，剩余财富部分商业化的现象从未消失过。我要着重指出，它在一些空间和时间上非常重要：伊斯兰教盛行的几个世纪，十字军东征起的意大利城市。在此基础上，我把阿拉伯区域称之为氏族式——商业化区域。

事实上，我阐述的这个观点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可以”在这里诞生。在这一点上，我又涉及了我参与过的那些激烈的讨论。资本主义没有在这里产生，是因为它诞生在了西欧。于是，别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就在发展中突然停止了。至于为什么西欧向资本主义过渡突然加速（使体系重心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殖民

化（先是美洲，然后是整个星球），其次是因为西方封建主义的周边特征。

### 5. 我们能否说“全球氏族体系”？

我的假设使得我把其他“文化圈”看做了独立的氏族式体系。特别是，在我看来，中国儒教的氏族式体系自我形成了一个区域，有自己的中心（中国），高度中央集权（即使这个国家经常都因内部离心力而崩溃，却总是会被重新统一）。中国的周边区域（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极其类似中世纪欧洲与文明东方的关系。至于佛教文化圈是不是一个氏族式体系，这个问题我就省略不谈了。

这里的问题是：地中海体系是孤立的，还是和其他亚非体系有着紧密联系呢？

在地中海区域之外，和它形成之前，我们是否可以肯定：一个持久的，一直不断发展的全球体系是存在的？由于原始资本主义的地中海区域，东方中国与印度，以及非洲的下撒哈拉沙漠地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交流，甚至此前，古老世界的不同地区之间也有着重要交流，所以，某些人（尤其是富兰克（A.G.Frank）就做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我认为，以目前的认知水平，我们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提出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我们可以就从认识中推出的结论，这些认识所启发的假设，以及为了验证这些假设所要求的研究方向，加强各种思想体系间的交流。

我并不想用我的直觉来代替可能的讨论结果。我在这只是把我的直觉以临时意见的形式提出来，以便开始讨论。因此，我提出以下观点（临时性的）：

第一，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整体。我们已经开始掌握了地球上的移民路线：人种首先出现在东非，沿尼罗河而下，遍

布非洲，穿过地中海和苏伊土地峡，到达欧亚两洲，再经过白令海峡，可能还穿过了太平洋，定居美洲（在近几个时代）。我们开始为这些不断的领土征服划定日期。人们极可能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人类的分散是否引起了不同人群进化轨迹的多样性？这些人群因为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面对的自然挑战也迥然不同。或者说，除了这种多样化之外，平行的发展轨迹是否引出了一个结论：人类，从整体上来说，是受一般性的发展规律控制的？作为这个问题的补充，我们要自问的是：分散人群之间的关系和由此引起的知识、经验、思想的紧密快捷的交流到底有多重要？

直观地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些人群相对孤立，自然条件相当艰苦，因此，他们以特殊的适应方式迎接了挑战。这种适应方式自身很难变化，所以，这些人群就被困在了死胡同里。只好不断复制自身结构，除非这种结构显示出自我发展的迹象。这些人群其中，可能有北极的、赤道森林的、小岛和海岸的渔猎/采摘社会（这些社会都很分散）。

然而，其他人群所面临的自然条件相对优越，因此，他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然（开始农业定居，发明了更有效的工具，同时组织起更为密集的社会，等等）。针对这些人群，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是否有一般性的社会发展规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同人群之间的外部关系如何？

第二，对于那些明显“进步”的社会，我们是否能假设，所有这些社会不管速度是快是慢，都经历过类似的阶段？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就建立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这个假设是必要的。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吗？或是为了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的价值体系？这个“必然发展”的表达形式在19世纪接踵而来，都建立在一系列连续的土地耕种方式或生产工具的基础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时代，等等），或是建立在一系列连续的

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原始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等等）。这些特殊范围内的多种变化被引入到了基础的一般趋势中，比如，母系——父系氏族体系，连续的哲学思想时代（原始万物有灵论时代，形而上学时代，奥古斯特·孔特（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时代），等等。在这里，我不想质疑这些理论，日后的研究中，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被摒弃了一部分。我在此指出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人们一直都想在多样的表面下找到普遍的规律，这种需要也是科学活动的特性。

在我看来，在所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中，最精细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它把重点放在了生产方式这个综合概念上。这个概念建立在一系列经济结构基本因素的概念的基础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并且，因为把一些特殊理论引入了生产方式理论，这些概念又得到了丰富（比如说“家族”理论，国家理论，等等）。这里，我不会讨论这个问题：即这些理论结构是马克思自己的理论，还是后人的演绎，它们是否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我也不会探讨，在我们对过去社会的实际情况有了更多认识后，这些理论是否还有效。再重复一次，我着重指出这些理论，只是把它们当做追寻普遍规律这一需要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极有可能得到普及推广。

第三，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分辨出：一些氏族式社会或多或少地都进入了同一个发展阶段：生产技术，工具，产品系列，权力组织形式，知识思想体系，等等。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社会间存在着一系列相对紧密的各种性质的交流：产品，知识，技术和思想交流。既然交流如此紧密，我们可否将之定性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全球体系（尽管是氏族式的）？富兰克提出了一个明确标准：只有当相互作用是“决定性”的时候（即如果A不再和B维持联系，A就不再是A了），

这个体系才是一个融合体系。很好，但问题仍然存在：这种关系是否是“决定性”的？

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无论如何不代表全球化。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前者是指不同的社会——所处空间或时间不同——都会因同样的深层原因，以相似的方式前进发展，而后者指的是这些社会并非彼此分离，而是同一个全球性社会的构成因素。在这个全球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规律与全球社会不同构成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是不可分的。

就这方面，我要在开篇先发表两个看法：(i) 经济交换并不是一个对生产方式及经济发展水平毫无影响的装饰性因素。交换是剩余财富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对相互联系的社会中的某一领域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原则上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事实上，交换有如此重要吗？何地？何时？在这个问题上，我不相信任何一种普遍结论，它们都定论过早。它们的结论，要么是：交换一直这么重要（或者说通常情况下），要么就是，交换从未如此重要过（除了几个特例）。举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为例，这个地区的交换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赋予了这个区域一个主要的特征：氏族式——商业化。要想理解它的历史，尤其是从辉煌繁荣到没落衰退这一阶段（螺旋式的），或是财富和权力的中心是如何转移的，如何理解交换是非常重要的。我曾说过，商业化欧洲（17~18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很快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就是借助了这种社会形式控制下的交换。但在中国、印度、罗马帝国等地，交换是否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我个人对此一无所知。(ii) 我们所提到的交换不应只总结为经济交换。远不止如此。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历史文献强调更多是文化交流（尤其是宗教传播）和军事——政治交流（帝国的建立和崩溃，外族入侵，等等），可对于现代全

球体系，历史文献重点强调的是经济交换。有错误吗？我认为没有。相反，我认为，历史文献很好地抓住了主要的变化——尽管只是凭直觉——从政治意识形态到经济意识形态。这个变化是我论述的中心。但是，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说存在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氏族式全球体系？我认为不可以。我更倾向用氏族式“文化圈”这个说法。这些文化圈各有不同，都建立在一定的参照体系基础上——最常见的参照体系就是宗教——各种各样：儒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当然，这些不同的形而上学思想之间都有着一些联系，因为它们都表现了社会的同一类基本需要，反过来说，这种联系也方便了彼此之间的相互借鉴。

为了进一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一个还是多个体系？），我们应该把以下三个因素结合起来：经济交换和剩余财富转移的紧密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意识形态体系的相对多样性/特殊性以及因此产生的自主性。

不同氏族式体系的自主并不排除彼此之间的交流，甚至这些交流还极其重要。这些交流包括：各种工艺的转移（指南针、火药、纸、丝绸——它命名了丝绸之路、印刷术、还有成了意大利特色菜的中国面食），宗教思想的传播（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和日本，伊斯兰教一直传到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基督教则传到埃塞俄比亚、南印度和中亚，等等）。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些交流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许多的历史事实和变化。

这些交流在各处（从中国、印度到伊斯兰地区，非洲撒哈拉地区和中世纪欧洲）都建立起了相互紧密联系的原始资本主义，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剩余财富的转移——在交换网络的主要枢纽中，这些转移可能是决定性的——但是，除了这些交换之外，并没有一个可以和现代世界相比的全球体系内的剩余财富的集中。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剩余财富的集中主要



和权力的集中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却没有什麼“世界性的帝国”或“世界性的政权”可以和日后 19 世纪时英国的霸权或现代美国的霸权相比。

所以，就全球范围内的力量集中而言，古老时代（氏族式）和现代资本主义是没有可比性的。从前的体系，尽管彼此间的交换极其重要，也不是全球范围内力量集中的体系，至多在地区范围内，这些地区性体系的中心是力量集中的（比如罗马、君士坦丁堡、巴格达、意大利城市、中国、印度、等等）。相反，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是力量集中的，因此，只有它才称得上是完全意义上的全球体系。

对于如何分析氏族式体系间的相互作用，我所提出的方法论可能要修正历史文献的传统判断了。文献认为，著名的“野蛮人”占领了中间区域，把庞大的氏族式文化圈分隔了开来。这些“野蛮人”的角色真是我们所评定的那样吗？是纯粹的破坏者？或者说，他们在社会间交流的积极作用使他们立志要做出几项决定性的创举。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成功统一（不仅仅是军事）了广阔领土（成吉思汗帝国），也解释了他们为什么能够迅速占据一个氏族式体系的中心位置。

关于假设历史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体系存在，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三世纪，是否存在氏族式体系，并且它们之间有着重要的交流网？我不这样认为。至少因为以下三个原因：(i) 当时的大部分人类社会体系都还落后于我所说的集体社会阶段。(ii) 那些文明“小岛”，虽然国家已经成为了政权形式，但还未找到一种完善的氏族式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参照《欧洲中心论》中，关于古代意识形态的章节，我就这一点的论述）(iii) 这些小岛间的交流还不够紧密（但这并不排除某些借鉴——比如说工艺——这些借鉴跨越了难以想象的距离）。

## 6. 进化论观点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资本主义不算是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质的飞跃，那么所有的人类社会就一直是个不断变化的融合的世界体系。这种观点涉及了一种人类社会的历史哲学，这种哲学建立在“竞争”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当然，这种哲学来自于对事实的观察。要知道，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社会，在所有的时代，都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竞争的。它们是否清楚这一点，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们之间可能有关系，也可能没有。我们只知道强者占上风，树立自己的威望。在这个抽象水平上，只存在一个世界，因为只存在一个人类。我们甚至可以再补充几句，比较开放的、和其他社会维系着紧密关系的社会可能会利用这种竞争，更加有效地面对竞争。相反，那些拒绝竞争，自我封闭，试图永保自己存在方式的社会很可能被别处的进步赶超，之后就成为了周边地区。

这种说法并没有错，但它过于抽象，并且剥离了实质的问题，即这种竞争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两位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也是历史哲学家——断然把自己定位在了更一般的抽象程度上（为了反驳马克思）。出于此目的，阿诺德·托比（Arnold Toynbee）提出了一个简化为两个词的操作模型：“挑战”和“应战”。这个模型对于任何时间地点都有效，但却没告诉我们什么实际内容。因为托比没有提出任何规律来解释为何应战或不应战。它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地了解一个事实。这就自然出现了一种对比，把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与生产方式的历史观点对立了起来。新古典主义的各种定义是想对任何时候都有效（稀缺、效用，等等），而连续的不同质的生产方式，则决定了特殊的制度框架，在这框架中，“人类的永恒理性”得以体现。我认为雅克·比海纳（Jacques Pirenne）要比托比高明

的多，他更精细地提出了一个永恒存在的矛盾：开放社会（沿海的）和封闭社会（内陆的）之间的矛盾，并且他毫不犹豫地前者称为资本主义（苏美尔、腓尼基、希腊、初期的伊斯兰教、意大利城市、现代西方），而把后者称为封建主义（从古波斯到中世纪欧洲）。他坚持认为我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因素”对开放社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也从不掩饰自己对于苏联封闭经济的贬低和对大西洋沿岸活力的高度评价。因此，比海纳才华横溢地用人类社会中资本主义趋势和封建主义趋势间的永恒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

我总是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更好，因为它的抽象程度刚好。生产方式这一观点还给了历史一个真正具体的空间。在这一抽象程度上，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质的飞跃的重要性和本质。这个质的飞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认为无法同等看待过去社会中的竞争和现代全球体系内部的竞争。在过去的社会中，首先，因为很难知道这种竞争的存在，并且每个社会都认为自己“受诸神庇佑”，所以，即使邻近的一古势力威胁了它，使它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例如穆斯林和十字军之间），它也会认为自己更优越。此外，资本主义之前的氏族式社会之间差距不大，一个对另一个的优势并不明显：这种优势总是暂时的和相对的，不能同后来资本主义社会对其他社会的决定性优势相比。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把握这种优越性很重要，和为什么把资本主义的开端追溯到了1492年。因为从那时起，欧洲人就知道了日后他们能够征服世界，他们也将这样做（参照《欧洲中心论》中我对这一点的阐述）。由果溯因，我们可以知道——但时代的主角们却忽视了这一点——最强大的是已经进入另一种更优越的生产方式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我还要说，在以前的竞争中，距离起了作用，减轻了竞争的剧烈程度。不管罗马和中国之间的交流有多紧密，我还是很难相信，这个“外部”因素会和今

天的生产力差距一样重要。我认为这种距离使内部因素更加具有决定性。此外，距离也使这些社会很难认清真正的力量关系。而现代全球体系内部的竞争完全是另一回事。人们是如此清楚竞争的存在，以至于在当局的日常言论中，这种说法已经成了烦人的陈词滥调。

### 7. 氏族式全球体系示意图

图 3-1 说明了我对于“古老世界体系”的看法（简化为东半球：欧亚非），总计 18 个世纪，也就是公元前 300 年到 1500 年，其中包括中东的希腊化体系（公元前 300 年）、中国的汉朝（公元前 200 年）、中亚及印度的贵霜帝国和孔雀王朝（公元前 200 年）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下文中我将总结这一体系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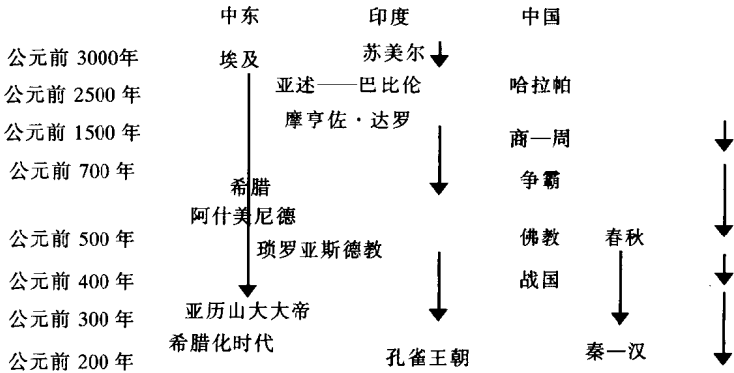


图 3-1 孵化期(公元前 200 年开始)

第一，就像我说过的那样，这个时代的所有社会都是氏族式的。但是，在所有这些社会中，我们可以分辨出“氏族式中心”社会和“氏族式周边”社会。前者的特征是：国家范围内相对较强的剩余财富的集中和国家控制下的剩余财富再分配，

然而，在周边社会中，因为国家雏形刚刚出现（甚至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剩余财富分配极度分散，被“地区封建势力”独占。这里的中心/周边对比与资本主义世界（现代的）的对比并不相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中心对周边的经济主导地位（和经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有关）。但在古老世界中，关系并非如此，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一个地区政权集中的完善程度和它的表达方式——国家宗教决定了它是中心氏族式地区还是周边氏族式地区。在中心氏族式地区中，政权集中的表达方式宗教或带有宗教色彩的国家哲学，它与先前的“集体”时代的地区性宗教相决裂（参照《阶级与民族》）。氏族式社会的完善形成与重要的宗教哲学思想的诞生惊人地同步。在接下来的2000年中，这些宗教哲学思潮支配着文明的发展：希腊宗教（公元前200年）、东方基督教、伊斯兰教（公元600年）、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儒教（这三个都在公元前500年）。这种同步性决不排除这些社会间的相互借鉴，我们可以通过所有氏族式文明间的关系看出这一点。我认为，这种同步性并非偶然，相反，与我关于氏族式方式的观点不谋而合。

重要的哲学和宗教运动的形成是与氏族式体系的形成相联系的。它代表了世界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革命浪潮，表现为超越了以往时代的地域观念的，体现普遍理想的一种观点。这次革命形成了氏族式体系，它成为了2000~2500年间的，全人类范围内，或几乎是全人类范围内的普遍体系。第二次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浪潮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阶段。标志先是文艺复兴（和与之相联的基督教革命），然后是三次现代大革命：法国的、俄国的、中国的（参照《欧洲中心论》）。我认为，氏族式体系的原型并不是由中国提供的，中国并没有太长的孵化期（只是从商周到汉朝的1000年），从汉朝到1911年革命这2000年中，中国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发展变化，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方面，意识形态方面（儒教——道教并行，一度曾被佛教代替），还是权力概念方面。在这个庞大的社会中，剩余财富高度集中，不仅是在伟大的王朝（汉、唐、宋、元、明、清）实现了全国政治统一的辉煌时代，甚至在王朝之间，国家被分割成若干王国的战乱时代中也是如此。在当时来说，这些王国也相当庞大。在中国的边界，在这个时代的第一个千年里，朝鲜和越南也同样形成了类似的氏族式体系。尽管它们在政治上独立于中国，这些国家还是借鉴了中国的组织形式和儒家思想。

在中东，自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氏族式体系就形成了。我认为，应该从这几句话中体会出哲学和宗教思想的连续创立：希腊宗教、东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在这个地区，孵化期很长，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用了3000年，波斯、腓尼基用了1000年，希腊则用了500年。希腊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从每一个组成部分那都借鉴了一些决定性的因素，然后综合了起来。在接下来的2000年中，剩余财富高度集中。当然，在亚历山大时代的短暂政治统一后，这个地区又被分割，但就当时来说，那些王国依然规模庞大。然后这个地区又被更加庞大的帝国——拜占庭帝国（公元300~1400年）和萨桑王朝（公元200~600年）分割。然后，7世纪形成的穆斯林哈里发逐步扩张，又统一了这个地区。哈里发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代末期——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这几个时代里，在哈里发的最初3个世纪中，剩余财富极为集中；在哈里发垮台后，公元1000年起，北非的阿拉伯——柏柏尔王朝，马格里布和中西亚的土耳其——波斯王朝时，剩余财富也相当集中。在这段历史中，西罗马帝国是一个向地中海西岸扩张的氏族式社会的典型。而且，罗马帝国将氏族式意识形态以西方基督教的形式传到了周边欧洲地区。因此说，历史的欧洲中心论歪曲了罗马帝国的成就，除了意大利半岛外，罗马帝国并没有抵制野蛮的封建制

度（即分散的氏族式体系）。

第三个完善的氏族式中心于公元前 200 年在印度大陆形成。从孔雀王朝起，然后是贵霜王朝（中南亚的骑射民族）和笈多王朝。在此之前，是一段漫长的孵化期。这段孵化期开始于印度河文明（公元前 2500 年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在一段分裂时期（公元 8、9 世纪）后，从 11 世纪起，穆斯林和伽色尼一起建立了德里苏丹国（公元 1200~1500 年），然后是莫卧尔帝国（公元 1500~1800 年），形成了一个庞大范围内的氏族式集中。而此时，那些同是氏族式性质的德坎印度教国家，还仍是庞大的王国。

我们的图 3-2 上出现了三个地区，在所提到的整个时代（公元前 300~1500 年），或者说几乎整个时代，这些地区的周边性都是很惊人的。

欧洲（除了拜占庭和意大利），也就是说“野蛮”欧洲，是把氏族式体系嫁接（通过罗马帝国的雄心和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播）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落后的集体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体上的产物。我又要提到我以前的分析（参照《阶级和民族》），就是既要考虑剩余财富控制的分散——这是封建主义（氏族式体系的不完善的、周边的形式）的特性，也要考虑到国家体系的崩溃，后来国家部分被教会代替。欧洲缓慢走向了氏族式体系，君主专制的建立（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在基督教徒收复之后，在英法两国，是在百年战争开始后）就是证明。但在我看来，这种缓慢成为了一种决定性的优势，简化了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两次质的飞跃。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日本形成了一种周边氏族式体系。这种周边性与欧洲周边性的相似使我惊讶。日式儒教的落后形式，以及德川王朝（公元 1000 年）这一君主专制建立前的封建分散都证明了它的周边性（参照《欧洲中心论》）。这种周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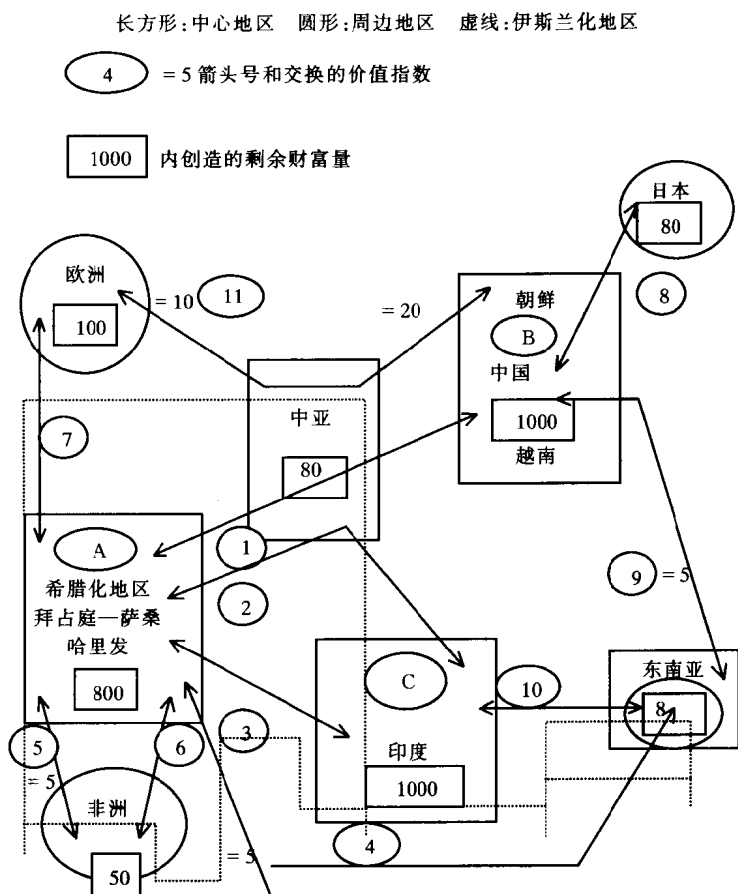


图 3-2 全球氏族式体系公元前 300 年~1500 年

使得日本在 19 世纪很容易地过渡到了资本主义。

南撒哈拉非洲形成了第三个周边地区。这个地区还远远落后于集体社会阶段。在这一阶段，剩余财富的氏族式集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分散仍是规律。



东南亚的位置具有双重性。我认为，这里有氏族式中心（尽管比其他形式范围要小得多）和周边地区（由剩余财富的分散而定义）。凯末尔帝国属于第一种，6世纪起的泰国、缅甸和柬埔寨也是，13世纪起的印度尼西亚的麻诺巴歇王国可能也是。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那些受佛教（从5世纪）然后受伊斯兰教影响而形成的国家，则属于周边地区。这些国家规模小，数目多，比较脆弱，内部的剩余财富很分散。

中亚地区的位置比较特殊。它的边界本身就不太明确。很早时，庞大的国家就形成了，比如说贵霜帝国，接连的中东的希腊化国家，萨桑王朝，然后是印度和中国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地区自己也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重心——成吉思汗时代（公元1300年）。在这个王朝之前和之后，它都是伊斯兰国家。它的组织方式是氏族式的，有时很先进（如果较大范围内的中央集权形式允许的话），有时又陷入了“封建”分散状态。但这个地区的重要特殊性在于，不仅地理位置上是东西的必经之路，实际上也是东西交流的必经地区（中国、印度、中东和体系的周边地区）。这个地区的陆路交通和海路的竞争由来已久，但陆路直至16世纪才最终丧失了它的优势地位。

在图3-2中，中心用长方形表示，周边则用圆形表示。

第二，在所提到的18个世纪中，图中的所有社会不仅知道彼此的存在，并且彼此之间还维系着各种性质的交换关系（贸易和战争、技术和文化借鉴）。这些交换比我们通常想象的更为紧密。在这个广义上，我们可以说“全球体系”是存在的，不过当然不能把它与现代全球体系（资本主义）混同起来。

在图3-2中，我用11个箭头表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每个箭头所代表的流量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有很大变化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一我强调这一点——它们所连接的不同氏族体系所特有的内部活力和外部联系之间的关系，不仅与现代全球体

系中的“国际关系”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且在不同的氏族式体系中，起作用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建议先分清以下四个关系总体。

(i) 三个重要中心（A——罗马和拜占庭——萨桑——哈里发，B——中国，C——印度）间的关系分别用箭头 1（中东穿过中亚北部到中国）、2（中东穿过中亚南部到印度）、3（中东从海路到印度）标出。毫无疑问，这些关系是所有关系中最紧密的。只要看看这几个中心的富足和实力就足够了，至少在它们历史上的辉煌时代是这样的。

(ii) 伊斯兰的阿拉伯——波斯中心和三个周边地区（欧、非、东南亚）的关系用箭头 4（中东从水路到马来西亚、印度）、5（北非穿过撒哈拉到非洲萨阿尔地区）、6（中东从海路到非洲东岸斯瓦以里地区）、7（哈里发和拜占庭到欧洲）。这些交流不如上面提到的那些那么紧密（因为周边地区相对贫困），但却是不对称的（这个概念我不会同现代中心—周边关系中特殊的不平等混淆），也就是说交流对中心的作用是相对中性的，但对周边地区的发展却是决定性的。这些交流极大地加速了非洲萨阿尔地区、东非国家以及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国家的建立（参照《阶级与民族》），同时，也促成了这些地区的伊斯兰化（出于氏族式社会自身的需要，伊斯兰教代替了从前的地区宗教）。并且，这些交流推动了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复兴，借此加速了全封建欧洲范围内的商业渗透。

(iii) 中国中心和日本（箭头 8）以及和东南亚（箭头 9）之间的关系与 (ii) 中本质相同。这里我要着重指出，箭头 11 表明中欧之间的直接交流关系，借助了中亚的道路却没有通过伊斯兰——哈里发中心的运河。这一直接联系只局限于一个短暂的时代，即蒙古和平时（13 世纪的成吉思汗帝国），但它对于后来的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欧洲借此从中国引进了许多重

要的工艺技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等）。当时欧洲已经成熟，可以应用这些技术，并且实现了从氏族式周边地区（封建制度的）到资本主义的质的飞跃。此外，不久以后，欧洲用控制在手中的海路替代了从前的所有远程运输方式，通过这一手段建立起了它与世界各地（非洲、印度、中国、东南亚）的直接联系，发现并借机征服了美洲。

(iv) 印度中心（佛教和印度教）和东南亚周边地区的关系（箭头 10）与中日关系本质相同。

很明显，对所提到的不同地区群体来说，外部交流的紧密程度是不同的。在经济重要性方面，三个关键的中心区域 A、B 和 C（中东、中国和印度）是其他任何地区的若干倍。因此，如果说每个中心区域的剩余财富集中用指数 1000 来计算的话，则其他地区（欧洲、非洲、日本、中亚、东南亚）的指数都不会超过 100。而且，这剩余财富中只有一部分，很可能是很少的一部分（可能为 10~20%）才用于远距离交换。

比如说，和中国相关的四个箭头（最重要的是 1，其次是 8、9，最次的是 11）可能代表了约为 100 的价值指数（即中国创造的剩余财富的 10%）。和印度相关的三个箭头（重要的是 2、3，次要的是 10）代表的价值指数不会超过 50 或 70。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指出了——一个事实，即相对于它们的产量来说，这两个大陆群的外部交换都不怎么重要。

相反，对于惟一一个和其他所有地区都有联系的 A 地区来说，外部交换则非常重要。主要的箭头 1、2、3 代表了 A 与 B 和 C 的交流（总价值指数按我们的假设标准为 115），再加上和欧洲周边地区（箭头 7）以及非洲（箭头 5、6）、东南亚地区（箭头 4）的交换——这些加起来共有 25，总计这一地区的外部交换价值指数为 140（剩余财富的 20%?）。

对于周边地区来说，外部交换的贡献相对重要一些：欧洲

的指数为 20，非洲为 10，东南亚为 20，日本为 20，也就是本地产值的 20~30%。同时，通过中亚转口的价值指数（箭头 1、2、11）约为 100，甚至可能超过了当地创造的剩余财富。

当然，这些用来表明各地区剩余财富量以及箭头代表的交换量的价值指数只是我们设计出来的，只是为了表达大概的数量级。要想设计更完善的指数，就要交给历史学家去做了。我在这里所用的数量级，在我看来，还说的过去。我们可以用下表加以总结：

	本地创造的 剩余财富 (1)	外部交换 (2)	(2) / (1) 的百分比
中东	800	140	20%
中国	1000	100	10%
印度	1000	60	6%
欧洲	100	20	20%
非洲	50	10	20%
日本	60	20	30%
东南亚	60	20	30%
中亚	60	100	150%

地理位置赋予了 A 这一关键的中心地区一个特殊的角色。它一直无与匹敌。直到现代，欧洲通过控制海域，才束缚了 A。这一地区实际上和其他所有地区（中国、印度、欧洲、非洲）都有直接联系，并且它也是惟一个和其他所有地区都有直接联系的地区。在两千年中，它一直是欧洲到中国、印度或非洲的必经之地。而且，这个地区并没有像中国或印度那样整齐划一，不管是地理方面（从大西洋摩洛哥沿岸延伸到威海、帕米尔和阿明海，它并不像中国或印度那样有坚实的整块大陆），还是在构成的民族方面，这些民族是古老文明（埃及、苏美尔、

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伊朗、赫梯、腓尼基和希腊)的众多后裔,他们的语言属于各种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印欧语系)。亚历山大征服东方和综合希腊文化的胜利开启了一种集体意识,后来东方基督教(受萨桑王朝边界的限制)的传播又加强了这一点,然后伊斯兰教加深了这种意识。我认为,伊斯兰教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此,在伊斯兰教教历前三个世纪的短短时间内,这一地区最终定型。它由叠放的三层伊斯兰化民族构成:大西洋海湾地区的阿拉伯人,从扎可洛斯到巴基斯坦的波斯人,阿那多里、整个土尔库斯坦以及从里海到中国本土的土耳其人。于是,伊斯兰教不仅统一了古老东方的民族,同时也兼并了中亚地区——通向中国和北印度的必经之地。我认为这一成功还应与另一个事实有关,即尽管历史上屡屡因政治利益而引发政治冲突,但伊斯兰教还是使民族团结起来,加强了面对他族时的一种特有的身份感,这里的他族,确切地说,是穆斯林地区毗邻的中国人、印度人、欧洲人以及非洲人。在中亚,伊斯兰教的成功第一次统一了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转口的价值可能比地区本身创造的剩余财富还高,所以这个地区的文明程度主要看将传递的一部分财富引入地区内部的能力。

对于整个A中心地区及附属的中亚地区,外部关系的重要性赋予了它的社会体系一个独特的特征,我将其称之为商业化氏族式,也借此指出,在伊斯兰——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地区的氏族式社会中,原始资本主义因素(商业交换、雇佣劳动、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此外,伊斯兰教在这个地区外的扩张,即它对非洲和东南亚周边地区的逐渐征服,也和它的商业化活力有着密切关系(参照《阿拉伯民族》、《阶级与民族》)。

第三,这里所提到的,文艺复兴前的18个世纪中的全球体系与后来的现代体系并不相似。如果把这整个的古老体系,甚至只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古老体系当做现代体系的始祖,

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连续只是很平常的事情——只是时间上的连续，别无其他——，但是如果我们要说这并非质的飞跃而只是量变和体系中心的转移——从地中海南岸到北岸（意大利城市）再到大西洋沿岸的话，那又抹杀了要点——这实际上是体系本质的改变：价值规律引起了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独一无二的矛盾（一个中心和经济上依赖于这个中心的周边地区间的矛盾，即使这个中心是由原来的国家中心构成的）。在资本主义的5个世纪中，在内在规律看得到或想象得出的范围内，随着时代前进，中心和周边的分化越来越大。这种氏族时代中心地区间的持续的（200年）相对的平衡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质的区别使我们无法用现代社会的词去谈论古老体系的不同构成部分间的相互依赖——即使也是不平等的。当然，A、B、C三个中心地区彼此有联系（和其他地区也有联系）。要说明的是，这种相互依赖是很重要的。各个地区发展过程中的类似并不能说明它们关系的本质，只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特征（把特殊性先放到一边）。过去国家的前进与后退，繁荣与衰落可能是同步的，但并不能作为证据。让我们看一下图3-3，它描述了三个中心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平行的历史，并指出这种同步性只是纯偶然。比海纳已经注意到了——富兰克又再次指出——罗马帝国和汉朝的衰退同时发生，但是，罗马衰退后，便是拜占庭、萨桑、贵霜的繁荣，可汉朝衰退后，直到600年（西方的野蛮时代）才出现唐的繁荣，再往前3个世纪，是笈多王朝的繁荣，它的衰退又与伊斯兰教的繁荣同时发生（同样只是巧合）。任何事物都脱离不了繁荣衰退这个循环。甚至这里也不该用“衰退”这个词，它只是指一种政体的衰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生产力发展方面，没什么衰退可言。使我震惊的是这些平行的漫长的历史间的连续性。从罗马——拜占庭——萨桑——伊斯兰到奥托曼和塞非德，从孔雀王朝到莫卧

第一章 古代的地区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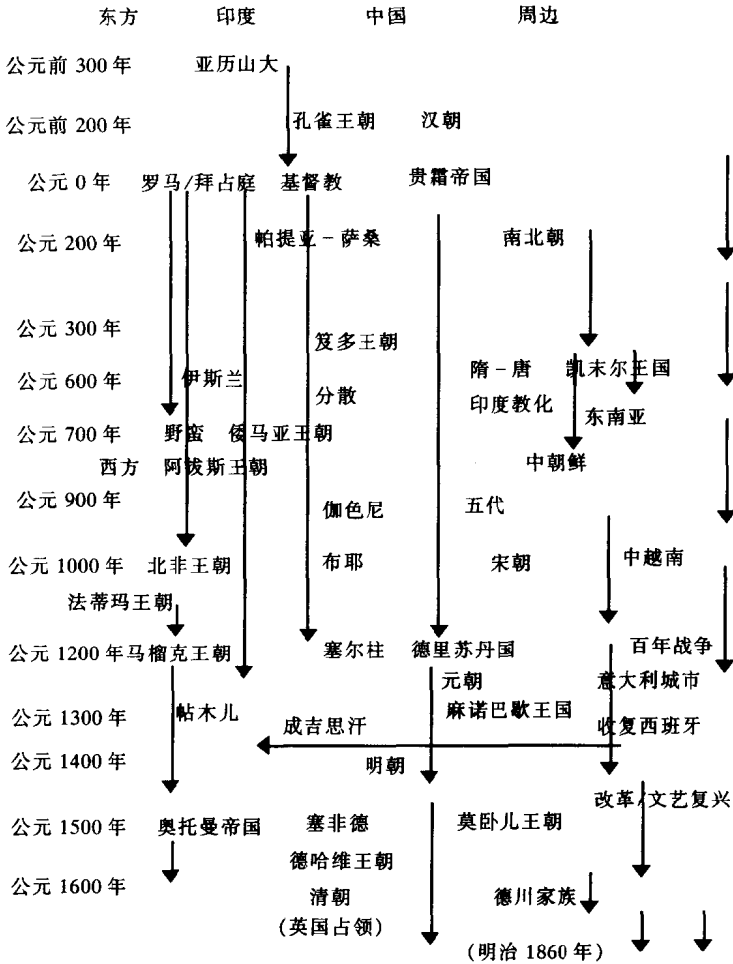


图 3-3 氏族体系(公元前 300~1500 年)

儿王朝，从汉朝到明清，很少有质变，只是在同样的组织基础（氏族式）上的量变。这并不排斥，在研究地区发展时，我们用环境因素来解释某个政权的相对发展（或衰退）。在环境因素中，外

部关系有时会起作用。我要再声明一次，没有什么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相似的。资本主义绝对是全球范围内的体系，因为价值规律，这个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依据，已经世界化了。

欧洲的新的现代化在短期内（从意大利城市的繁荣到文艺复兴只有3或4个世纪）形成了。它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的重复。我们常把这些普遍现象归为一类，这一类中胡乱地集中了各种文明（埃及、苏美尔、哈拉帕、商朝）和各个帝国的形成（阿什美尼德，亚历山大、罗马、拜占庭、萨桑、倭马亚、阿拔斯、奥托曼、塞非德、孔雀、笈多、莫卧儿、汉、唐、宋、明、清、成吉思汗）。

我这样解释这个事实（参照《阶级和民族》）。要知道，质的飞跃首先是在周边地区（欧洲）发生的，而不是在中心地区（A、B或C），然后又在其他周边地区重复。我的解释建立在周边灵活性/中心僵硬性这一矛盾基础上，也就是限制在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范围内。我认为这个解释比那些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更让人满意（参照《欧洲中心论》），我也认为它比比海纳的观点更令人满意。他的观点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开放的同义词，尤其指海上开放）和封建主义（封闭的同义词，尤其指大陆封闭）间永存的矛盾。这一观点是欧洲中心论的变形（它认为海上开放创造了欧洲奇迹），就如同富兰克的观点（和前一观点极度接近），它们都建立在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基础上。

当然，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这一段历史（可不是哪一年魔棒一点就完成的，比如说1493年）对日后其他地区的发展产生了特殊后果。当然，意大利城市的繁荣源于这一形成，反过来，这一繁荣也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氏族式——商业化发展的产物。但是，是在一个周边地区（封建欧洲），这种意大利式繁荣才成了燎原之势，加快了发展速度，以至于欧洲出现了比以前那些先进的氏族式社会在本质上更为优越的体系。关于这种



活力，我曾具体说明过自己的观点。这种活力与国家的软弱有关——这种软弱为一个真正的崭新阶级——资产阶级开辟了独立空间——国家与这个阶级联盟，目的是为了跨越封建分散，建立一个新型的商业化专制国家，等等（参照《阶级和民族》）。欧洲这一形成（资本主义的，不是氏族式的）的一般后果是很明显的：它阻止了世界上其他社会的发展。在新的体系中，这些社会逐步周边化。但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引起了一种对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敌视。我们又要提到上面我对伊斯兰地区在古老体系中的特殊位置的评论。欧洲，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和世界各地建立直接联系，因此，就要粉碎伊斯兰地区这一必要中介的垄断地位。从早期十字军的企图，接下来是欧——中之路的开辟，这条路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和平时期开辟。这种敌意一直延续到现在，表现为对待穆斯林的特别态度——几乎都有点神经质了。穆斯林也以牙还牙。就是为了粉碎这个必经中介地区的垄断地位，欧洲人才转向了海路。这一选择并不像比海纳所认为的那样，“在地理学上有重要意义”。

第四，对于2000年的氏族式社会所做的评价不能用于更早的时代。一方面，这些时代的文明社会——更不用说野蛮社会——和氏族式社会的组织形式不同，另一方面，古老社会间的关系也和我们在图表中介绍过的关系不同。

毫无疑问，我们回溯的历史越早，当时掌握的科学知识就越薄弱。但是，在我看来，在前氏族时代，有两条思想轨迹（历史哲学）。

比海纳的观点——在这个根本上与富兰克的观点相似——不承认公元前300年、基督时代或者罗马帝国末（课本把它做为古代的终结），存在质的飞跃。它也不承认现代和先前的时代间有质的不同。在比海纳看来，同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的海上开放社会和封建主义的陆地封闭社会的矛盾）是人类历史

上所有时代的共同特征。比如说苏美尔、腓尼基、古希腊属于前一种，埃及、波斯则属于后一种。而且，比海纳坚持说——又和富兰克一样——不管相距多远，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间都存在交换关系（比如苏美尔——印度河文明，埃及——凯尔特——腓尼基——希腊间的交换）。比海纳的观点与富兰克的观点都建立在线状历史哲学的基础上，他们认为进步只是持续的量变，而非质变，用富兰克的话说，就是“堆积的合并”。

相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区别了三个不同质的文明阶段：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我在此不想讨论这个观点真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有多大程度上是，或者只是后人的演绎。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图 II 中的社会都是封建社会：罗马帝国后的欧洲，拜占庭和伊斯兰建立后的中东，孔雀王朝起的印度，汉朝起的中国。相反，更早一些，它们应该都经历了奴隶制阶段。奴隶制阶段明显的、无可争议的证据就是希腊和罗马。这样，如果类比的话，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历了奴隶制阶段（从商到汉），印度也是（印度河和雅利安文明），中东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更晚一些，别处也出现了奴隶制，非洲一些地区奴隶制的出现和集体社会的解体是同步发生的。这些都证明了经历奴隶制是一个一般性的需求。

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参照《阶级和民族》），我要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i) 集体社会之后，阶级社会的一般形式是氏族式。(ii) 封建社会不是一般规律，而只是氏族式社会的周边形式。(iii) 氏族式社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等级、封建时代的欧洲国家、国家官僚统治下的农民集体，等等）。(iv) 奴隶制不满足任何一般要求。在大部分历史（埃及、印度、中国）轨迹中，都没有奴隶制的出现。只有当它与商业相连时，奴隶制才会迅速发展。因此，各个奴隶制所处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不同（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和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的美洲的奴隶制）。

图 3-3 所标出的质的飞跃之前的时代与前资本主义有所不同吗？以埃及为例，它是氏族式社会的典型。它没有经历奴隶制。它的历史从希腊文化形成 3000 年前开始。亚述、巴比伦、伊朗和孔雀王朝以前的印度、汉朝以前的中国，偶尔经历了奴隶制，但奴隶制并没有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方式。我认为，一个氏族式体系，只有当它在伦理价值基础上，创立了统一思想和宗教，超越了先前的集体社会所特有的姻亲意识和地域宗教时，它才真正完善形成了。根据这种观点，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和儒教宣布了氏族式社会的形成。我一直喜欢讨论孵化期或者从集体式社会到氏族式社会的过渡。在中国，这种过渡可能相对简单快捷，而在印度，由于雅利安人入侵，摧毁了印度河的文明，这一过渡就更为复杂。在中东，由于民族众多，路程各异，以及彼此间存在影响，我们不得不把这个地区看做一个“体系”。我认为早熟的氏族式的埃及，商业化的奴隶制的希腊都是这种体系，同时我还认为综合希腊文化的位置极其重要。它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革命的前奏，而这几次革命有效地统一了这个地区。

是否因为古代社会间的交流频繁，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形成了“体系”？我持怀疑态度。因为文明社会，也就是向氏族式社会过渡的先进社会，还只是集体式社会这片汪洋中的寥寥孤岛。这些社会的发展轨迹，即使它们平行，也不能证明这些社会形成了一个体系，而只能说，它们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

## 参考书目

—Samir AMIN, 《阿拉伯民族, 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la nation arabe, nationanlisme et luttes de classe*, Minuit, 1976; *en arabe Al Umma al Arabia*, le Caire, 1988.

—Samir AMIN, 《历史和现代危机中的阶级和民族》 *classe et Nation dans l'histoire et la crise contemporaine*, Minuit, 1979。

—Samir AMIN. 《分离》 *la deconnexion*, la decouverte, 1985。

—Samir AMIN. 《欧洲中心主义》 *l' Eurocentrisme*, Economica, 1988。

—Samir AMIN. 《非洲和第三世界发展的失败》 *la failite du developpement en Afrique et dans le tiers - monde*, l' Harmattan, 1989。

—Samir AMIN. *Nahw nazariya lil thakafa*, Beyouth, 1989。

—Samir AMIN. 《国家与发展》 *l' Etat et developpement*, Socialism in the world n58, 1987。

—Samir AMIN, 《革命和第三世界》 *La revolution et le tiers monde*, sociologie et societes, montreal, 1990。

—Samir AMIN. 《欧洲和南北关系》 *l' Europ et les rapports Nord - Sud*, l' evenement europeen, n' 7, aout 1989。

—Samir AMIN. 《现今第三世界的民主问题》 *La question democratique dans le tiers monde contemporain*, Africa Development, n' 2, 1989。

—Samir AMIN. 《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 *On Blaut, Colonialism and Capitalism*, Science and Society, n' 54, 1, 1990。

—Samir AMIN. 《关于埃及的资本》 *Hawl al rasmalia fi Misr*, Qadaia Fikria, n' 2, 1987。

—Samir AMIN. 《阿拉伯社会史》 *Tarikh al Arab al Ijtimai*, Al Wihda, n' 42, 1988。

—Samir AMIN. 《社会主义危机, 阿拉伯的未来》 *Azma al Istiraqia*, Al Moustaqbal al arabi, n' 114~1988 et 126~1989。

—Samir AMIN et Faycal YACHIR, 《当代世界中的地中海沿岸国家》 *la Mediterranee dans le monde moderne*, la Decouverte, 1988。

—Mansour FAWZI, 《埃及资本》 *Al Rasmalia fi Misr*, Qadaia Fikria, 1986。

—Sadek Saad AHMAD, 《埃及社会史》 *Tarikh Misr, al Ijtimai, le Caire*, 1985。

—Andre Gunder FRANK, 《世界 500 年的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 *Towards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of our 500 year world system*, mimeog, 1989。

—Fanet Abu LUGHOD, 《欧洲霸权主义之前, 公元 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 Oxf.U.Press, 1947。

—Martin BERNAL, 《黑色雅典娜》 *Black Athena*, London, 1987。

—Christopher Chase Dunn, 《崛起和消亡: 世界生产体制和模式》 *Rise and demise: world systems and modes of producton*, inedit。

—Kajsa EKHOLM, 《文明的局限性, 全球体系的结构和动态》 *On the limitation of civilisation: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global systems*, Dialectical Anthropolog。

—William Mac NEILL, 《西方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U.Press, 1964。

—David WILKINSON, 《文明中心, 文明的比较》 *Central Civilisation,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1987。

—Marshall HODGSON, 《伊斯兰的冒险》 *the Venture of Islam*, Chicago U.Press, 1974。

—Arnold TOYNBEE, 《历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 Londres, 1974。

—Jacques PIRENNE, 《世界历史的大趋势》 *Les grands courants de l' histoire universelle*, Albin Michel, 1974。

—ETIEMBLE, 《中国人的欧洲》 *L' Europe chinoise*, Galimard, 1988。

—Fawzy MANSONR, 《阿拉伯世界的绝境, 历史的根源》 *L' impasse du monde arabe, les racines histotiques*, L' Harmattan, 1990。

## 第二章 亚洲在古代世界氏族 体系中的地位

在一章里，我曾经提议，从相关二十个世纪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古代世界的社会。这二十个世纪是各种社会的许多共同特性的集合，即纳贡生产方式下的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形式的集合；两类地区借助多种形态的频繁交易相互链接，融入同一体系。我向读者重申上述内容，是为了提出若干概念性的世界体系，从而满足分析这种纳贡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将其与现代资本主义特殊性相对比的需要，同时达到对地区间贸易的职能功用进行研究的目的。最终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张示意图和两张表格：我们将中心地区与示意图里的周边地区之间的贸易总额以及通过中亚（“丝绸之路”）转口的交易总量，依照商贸活动的各条主要线路分别估算出来；这些主要线路由图 3-2 中的一条箭头来表示。

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时期前后绵延共二十个世纪。在此期间，很显然，我们所定义的各地区（中心地区 A、B、C 以及周边地区）之间的相对力量发生了演变，因此，他们的对外贸易同样也会有所改变。随着时间的进展，无论是地区内产品剩余总量和地区间贸易总额指数、还是图中箭头所示的分布情况指

数都产生了变动。在后文中，我将给出各项的平均数作为证明，进而描绘出这段漫长历史时期的整体特征。

在这二十个世纪里，中国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一处中心地区。这一中心不仅毋庸置疑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尽管在其朝代更迭期间时常出现混乱，她的发展还是最为连贯的。

公元元年，中国人口 7000 万（占当时全球 25000 万人口的 28%）。这一数字有规律地增长着，到 1700 年时达到了两亿（仍占约 68000 万世界人口的 28%）。1700~1800 年间，中国人口变动加速，居民数增至 33000 万，占大约 95000 万世界人口的 35%。

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在所有的领域中都一直位居前茅：平均起来，她拥有最强大的农业人均生产力；她的城市最为繁多，那里庇护着受过教育的行政人员以及合格的手工业者。所有的人都把这一地区评价得几乎如“模范”一般：欧洲人在 18 世纪发现了中国，那时正是她辉煌至极的时代。从此，欧洲居民纷纷开始试图借鉴她，并且从中汲取了众多灵感（参见：埃迪安布勒（Etiemble）的《中国式的欧洲》）。而中东地区的居民则是在更早之前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富饶和强大（参见：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去中国寻找科学吧。”）。

出于上述原因，我选择 100 作为指数来代表中国在整个这一时期中的对外贸易总额，并假设它们占据中国产品剩余的 10%，即后者的指数约为 1000（针对从 5000 万稳步增长至 33000 千万的人口总额）。

这段时期里，中国与中东一带的中心地区（希腊，随后的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阿拉伯国家，波斯帝国以及土耳其帝国）始终保持着紧密、持续、频繁的关系往来。因此，我认为，在中国该时期的外贸总额里，与中东的这部分贸易额应该占据三分之二（65%），并且，与日本的贸易额应占 20%，与东南亚的

占5%，而与欧洲的则占10%。做出这样的估算，我以哪些数据为依据呢？

中东所代表的中心地区经历过一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变迁。公元前200年，他拥有可以和中国等量齐观的人口（5000万），还可能拥有至少与中国平起平坐的发展总水平。然而，到了公元元年，假如保留对该地区的狭义定义（希腊—安纳托里亚，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话，其人口总数仅为3500万（中国7000万）；如果再算上罗马帝国建设期间该地区向西延展的意大利和马格里布两部分，其人口总数则为5000万。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中东这一中心地区（拜占庭帝国以及哈里发政权）的人口数量总是相对停滞不前。自1500年开始，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们——波斯帝国，中亚土耳其一带的众多酋长国以及可汗国——的人口总数几乎从未曾多于5000万，而中国和印度各自的人口总数则在1700年一齐超过了两亿。实际上，中东地区相对状况的衰落从公元元年起就一直持续着，尽管在某些杰出然而短暂的时刻，那里曾经出现过复兴的尝试（阿巴斯德王朝最初两个世纪的朱斯蒂尼安王时代）。

与上述情况恰恰相反，在更古老的时代里，中东是居于世界范围内的相对支配地位的。公元元年之前的两个千年中，那里的人口可能占世界总人口（此间极为缓慢地由一亿增至两亿五千万）的30%；而到了公元元年，则仅占18%；至于1700年的时候，更是只有7%了。古代埃及曾经拥有过突破1000万的人口；但是，1800年时这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却跌到了200万；直到二十世纪的当代，才重新恢复到她在法老时代的水平。本文并非讨论这种过早并且顽固的相对衰落的可能原因的场所，但是，我们不能不提的是：当土耳其—蒙古的侵略在中亚、伊朗和伊拉克造成了巨大破坏的时候，这一



衰落尤为加剧。那场侵略迫使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世界文明的摇篮之一——流落到了沙漠荒原之中。俄国和东伊斯兰国家也曾经沦为上述侵略的主要牺牲品。然而，中国却始终比其他地区更有能力与之抗衡。总之，无论怎样，从公元元年开始，中东这一中心地区就从未展现出过可以和中国相媲美的生机与活力。

因此，比较而言，中国与中东之间的商贸往来古时候要更加频繁，后来才相对衰退。在中国方面，代替这部分贸易的，是她和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以及欧洲关系的日益密切：最初通过蒙古线路（十三世纪），然后借助于海上通道（现代）。

中东的相对萧条具有如下的意味：倘若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段（始于公元前50年）初期，该地区的产品剩余和中国的大致相等的话，那么，在1300年到1500年左右，考虑到两地人口数额关系的演变，它几乎连中国产品剩余的三分之一都不足。这两个端值指数——1000和350——的中位数大约是700，略微低于我们在描述整段时期的示意图中的指数数值（800）。

然而，中东日趋衰落的状况却从他的地理位置那里获得了部分补偿。做为处于中心地带的十字路口，在近现代之前的时期里，几乎所有横贯大陆的贸易往来都必须途经此处。这一点通过其经济商业化的程度和其相对突出的外贸总额两个方面表现了出来：20%左右，中国只有10%。如此翻了一番的比例关系是将中东地区的贸易额与近现代之前时期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贸易额进行估算比较从而得出的。

中国与中东之间的贸易往来尽管处于相对衰落的趋势，却依然是构成近现代之前时期里世界上地区间关系体系特点的重要史实。以中东为中介，商品、技术、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的迁

移使得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播开来，尤其传向了欧洲。迁徙之路众所周知，即永恒的“丝绸之路”。这条道路起自中国甘肃河西走廊，经天山山脉以南，由北部（哈密—阿克苏—喀什噶尔）或者南部（科康〈译者注：今乌兹别克斯坦城市〉—喀什噶尔）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穿越前苏联中亚地区南部（撒马尔罕〈译者注：前苏联城市〉—布哈拉〈译者注：前苏联城市〉—基瓦），通往波斯。

这条极其重要的道路经久不衰，许多别的方式无法解释的现象因此得到了阐明。例如：景教、拜火教、摩尼教（人们经常忘记，在日耳曼部落之前，中亚地区就曾经信仰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该教立即在科莱兹姆地区扎下了牢固的根基）这些源于中亚或者印度（佛教）的宗教对沿途地区很早以前就开始的、深入的渗透。伴随着这一渗透的，是当地居民历史悠久的定居生活：早在公元九世纪时，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地区）人就已经完全定居了。从中国到波斯，丝绸之路上遍布着繁荣的商业城市和文化活动的中心，它们的四周则是集中灌溉的农业区域。

于是，不言而喻，近现代之前的时期里，地理战略方面争端的焦点就在于这条通道的控制权。对此，我们震惊地观察到，在中国和中东（哈里发政权以及波斯帝国）统治地区之间的军事边界保持了引人注目的稳定性，几乎正是中国当前的国境。东土耳其斯坦地区尽管逐渐伊斯兰教化，却始终处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统治下；而西土耳其斯坦被俄国征服之前，则保持在中东的控制之中（当该地区不发生政变的时候），这一事实同样令人震惊。

虽然迟到，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地区间的关系往来却获得了十分强劲的突飞猛进，这取代了她与中东之间贸易额的相对衰退。在公元纪年初的时候，上述地区还依然人

烟稀少（朝鲜和日本人口之和 100 万，东南亚 600 万，总计起来也不足当时中国人口的 10%）；直到公元六世纪之后，那里才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当然，还是中国模式的。然而，尽管人口增长速度不及中国，他们的进展却是飞快。如果假设贸易额与相关人口数平行增长的话，那么到我们所考察时段的末期（在上述地区大约从 1500 年持续至 1850 年），这部分贸易总额指数将与中国—中东之间的贸易总额指数达到相等水平。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后者的数据涵盖了我们所研究的整个二十个世纪（并且相对来说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而前者的发展则集中在纳贡时代的最后六个世纪里。因此，前者的贸易额平均指数大致应该是后者的三分之一，即 25（后者 65），其中以来自日本的收益额为主（20），来自东南亚的为辅（5）。

中国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额指数（不以中东为中介进行的），即 10，将在后文中得到说明。

印度是继中国之后人口聚居和人类文明的第二个中心地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印度起步很早，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也就是说，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时代相同。不仅如此，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或许还能够与后者相提并论。

像中国一样，印度和中东恰好相反，从诞生一直到大约 1700 年，她始终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公元纪年之初，那里拥有居民 4500 百万；1700 年两亿（与当时的中国人口数相同）。然而，从那个时代开始，危机降临了。到 1800 年，印度人口依旧在两亿附近徘徊；仅仅在十九世纪期间才略有起色，可是毕竟为时已晚。直到今天，印度大陆仍然是世界上除去中国之外的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所以，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期里（始自佛教出现的公元前 500 年，终于欧洲开始控制印度洋的十六世纪），鉴于印度农业生产

力的发达和其城市的繁荣昌盛，我们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假设：该地区的产品剩余量与中国的产品剩余量大致相等（采用相同的指数 1000）。

只有印度那段混乱无章的历史才是与中国不同的：频繁地遭到入侵（总是来自西方），难以统一（几乎只是在我们所研究的时期之初、毛利亚的古老时代里，那里才实现过统一）。在所有历史学家的眼里，她对待与外国通商的态度似乎并不像中国的态度那样开放。其贸易往来的主要对象是中东，一部分经伊朗—阿富汗—线陆路，一部分走海路。至于她与东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仅仅是在公元 600 至 1000 年间，东南亚地区逐渐印度教化的时期里，才稍为可观。然而随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开始伊斯兰教化，来自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这一切很快便取代了上述短暂的繁荣时期。

假如，像下文中将要证明的那样，在我们所考察的时段里，印度与中东之间的贸易总额指数可以衡量为 50（陆路、海路各占一半），而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则记做 10，那么，其产品剩余外部商业化的比率总共将是 6%，低于前文说明过的中国的该项比率——10%。这一结果与上文中历史学家的观察结果不谋而合。

欧洲对古代世界体系发展全局的参与姗姗来迟，大概在公元 1000 年之后。此前，她始终只是一处落后并且荒蛮的周边地区而已。

公元纪年初期，包括意大利人口在内的欧洲人口大约 2000 万（占世界总人口的 8%，不足中国人口的 30%，是中东人口的二分之一），其中一半居住在意大利和高卢地区。欧洲列车的开动十分缓慢，直至公元 1000 年，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地区才只有 3000 万居民。不过，她真正的启航集中在 1000~1350 年间，其人口那时达到了 8000 万（占 4.4 亿世界总人口的

18%)；后来，在1400年，由于黑死病，人口降至6000万；不过到了1700年，又再次回升到了1.2亿（占6.8亿世界总人口的18%），并且在1800年增至1.8亿（占9.5亿世界总人口的19%）。欧洲人口起飞了，在19世纪里，她甚至还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膨胀。

公元1000年以前，欧洲农业的生产力依然远远落后于中国、印度以及中东的开化地区，欧洲大陆上几乎空无一城。尽管如此，1000年开始，那里迅速腾飞。就在两个世纪之后，欧洲的土地上已经遍布兴隆的城市和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它们充分展现了那里农业产品剩余的迅猛增长。1492年，现代资本主义欧洲开始掌握世界霸权，我们所考察的时代因而结束。其末期的两三个世纪里，欧洲代表着正在孕育中的一处新兴中心地区。如果农业生产力与城市化程度相等价这一假设确实成立的话——它似乎很有道理，欧洲的实力相对而言抵得上中国的一半，已经达到了中东的两倍甚至三倍。然而，此前的大约十五个世纪里，欧洲在同期的世界体系中几乎毫无立足之地。那里弱小的劳动生产力限制了她产品剩余的数量，该项指数可能在零附近，几乎不存在。不过，到了1200至1500年间，这一指数飞快地上升到了350（中国的三分之一）。因此，像对待日本和东南亚那样，示意图中以中位数（或者说加权平均数）100表示欧洲在整个这段漫长时期中的相关指数。这一指数同日本以及东南亚的指数一样神秘，甚至更加具有迷惑性，原因在于它试图说明的是一次迅疾但却迟到的飞跃。

据估算，欧洲对外贸易总额指数为20。而事实上，该数据仅仅包括1100至1500年间四个世纪的贸易往来，因为在此之前的那些时期里的交易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四个世纪里，欧洲人口大约占中国人口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因此，

如果只研究上述一段时间的话，这一指数很可能有些被低估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从公元前 300 年到公元后 1500 年整个这段漫长的时期都考虑在内，它毫无疑问又被过分高估了。

欧洲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是中东。但是，她进口的商品中，相当多是来源于更为遥远的中国和印度的，中东只是充任了一个中转站而已。然而，到十三世纪的时候，欧洲与中国之间的直接接触第一次建立起来了，这一接触借助于蒙古的陆上通道而避开了中东。成吉思汗的南征北战突如其来地开辟了蒙古通道，而欧洲的崛起恰在此时，她迅速地迎头赶上了东方的三个中心地区所构成的先进区域。尽管蒙古通道的使用时间极为短暂，还不足一个世纪，但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却因为它而日趋密切和频繁。不过，1500 年以后，海路取代了古老的陆路。因此，如果想确立一个贸易总额指数来概括我们所考察的整个漫长时期的话，10 必然有些过高了。所以说，欧洲人对成吉思汗扩张的评价存在着歪曲和走样，其中原因仅仅在于他们是借此机会才得以发现了中国的存在。基于上述原因，在东西方联系的建立方面，那些始终以欧洲为中心的主导论调赋予了蒙古帝国一个正面的角色。而实际上，哪怕欧洲人坚持视而不见，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也是久已存在的。与上述论调相反，土耳其—蒙古攻城掠地，在中国北部、中亚西南、伊朗、伊拉克以及俄国等地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进而导致了相关地区古代主要的贸易伙伴们的贫穷和匮乏，这些负面后果，在欧洲中心论的观点里，则始终被弱化了。归根结蒂，从东西方贸易关系的全局来看，蒙古的扩张绝非是积极的，它反倒肯定是消极的。

即使在我们所研究的漫长时期的最后几个世纪里，欧洲作为古代世界体系中的周边地区，依旧是落后和迟滞的。其进出

口贸易的结余始终为巨额赤字，这便足以为证。整块大陆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提供，却需要进口东方的奢侈品以及生产技术，无奈，她只好依靠出口金属来弥补亏空。

对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南亚这些周边地区，衡量他们的产品剩余总量指数，是以估算上述地区的人口总数为基础的：公元纪年之初，其人口约为欧洲人口的二分之一，毫无生机；农业生产力薄弱；没有一处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地方，与公元 1000 年之前的欧洲颇为相似。

同研究欧洲的时候相仿，我们认为，与先进地区相比较，薄弱的生产力代表着那里的产品剩余量也一样偏低，与其人口总数不成正比。然而，确切地说，虽然产品剩余比较微薄，但由于交易是在外国奢侈品和本地产品之间进行的，这部分剩余商品化的极值程度却要高得多。其理由在于：远距离的交易与近距离的相比，更加具有重要性。因此，欧洲（剩余：100，对外贸易：20）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剩余：50，对外贸易：10）的产品剩余商业化程度大约为 20%（中国 10%，印度 6%），而东南亚地区（剩余：60，对外贸易：20）甚至达到了 30%。

11 世纪之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并非像阿拉伯文献里所描述的那样是一处比欧洲还要贫瘠的周边地区。只是在后来，欧洲开始了起飞的时候，非洲的相对落后才显露出来。接着，大西洋上贩运黑奴的活动造成了大规模的破坏，这又迅速加剧了非洲的落后。贩奴行为不仅给这块大陆上的人口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更有甚者，它还严重地削弱了当地的政治组织（破坏了正在形成中的大国，代之以寄生掠夺性的军事政权）。

在我们漫长的研究时段初期，东南亚作为周边地区的状况与欧洲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大致相似。从公元七世纪开始，在其印度教化（伊斯兰教化紧随其后）的过程中，她

早于欧洲切实迈出了前进的第一步。在此期间，她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紧密而且频繁，与中国和中东的却相对较少。直到16世纪，当欧洲的海上霸权打破了古代世界关系布局的时候，这次跃进才被猛然中断。然而，或许由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像非洲地区那样，曾经遭受到奴隶制度的蹂躏摧残，她的状况也没有如黑色大陆的一般，沦落到了卑微的境地。

现在，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中东这个近现代之前时期里贸易往来的十字路口，扼要回顾一番和他相关的交易流量，这些指数分别如下：与中国（65），与印度（50），与非洲（10），与欧洲（10）以及与东南亚（5）。

假如把中东的产品剩余总量指数记为800的话，上述交易流量的总和——140——约占该总量的20%。如果考虑到这一地区的相对停滞，并且将他的情况与中国和印度的持久生机进行比较，或者同欧洲的迟到却引人注目的突飞猛进两相对照的话，有人会认为这一产品剩余总量指数过于夸张了。倘若果然如此，那么，中东地区对外贸易中的剩余产品商业化的比率还要更高。而事实上，这样的数据有些勉强。因为其中一部分交易仅仅是在中东过境而已。古时候，当中东还代表着一处与中国和印度分量相当的中心地区的时候，那里的主要贸易（也就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贸易）并不具有转口的性质。然而，从公元1000年欧洲启航开始，不可避免地，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商品只是把中东作为中转站罢了。

如果对“中亚”地区——该地区既非中心，也不是周边——也考察一番的话，我们刚才所说的有关中东的一切则更为真实了。

中亚地区是连接近现代之前时期里的各主要中心地区、尤其是中国与中东的必经区域，那里自古以来少人居住，因



此其自身的产品剩余量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即使在某些时代，锡尔和阿姆达利亚河航线沿岸的南部西土耳其斯坦地区曾经经历过蓬勃的发展，我们这个纯粹象征性的产品剩余指数 60 可能也还是高估来的。然而，正如与中亚有关的各项指数的总和（100）所显示出来的那样，经由该地区转口的贸易流量相当可观。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地区，能够像中亚这样大规模地从此类过境贸易中汲取利润，这部分利润或许无法衡量，但却绝对不可以忽视，因为，它是构成中亚地区自身价值的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中亚始终是一片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地区，她从未摆脱过游牧和流浪的生活。研究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应该避免过分概括化。实际上，中亚地区大体来说可以以天山山脉为界，划分为两个部分：南部即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路；而北部地区，在至少从公元前六世纪起就日益频繁和密切的东西方联系往来中，则始终处于边缘地位。

显而易见，南部的地区是由三片分界清晰的区域所构成：东土耳其斯坦（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土耳其斯坦（今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地区）以及阿富汗地区。

通过中亚过境的贸易流量中，有三分之二——相当于中国与中东之间交易的总量——始终取道于新疆至锡尔和阿姆达利亚河河谷一线。这条线路时常发生变动，为了从北部或者从南部绕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人们会在准噶尔盆地或通往费加纳（译者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地区）的山口之间做出选择。不过，所有的这些支线都是处于南部地区之内的。

南部中亚的东部地区（新疆）格外干旱，仅仅散布着几处绿洲，这限制了那里人口的数量。然而，城市除外。绿洲上的城市可以同时从多种渠道获得给养，其中包括它们附近唾手可及的小型灌溉区域，以及那些远道而来的过境贸易者。因此，

在该地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游牧和流浪从来就没有可能登上过支配地位。这一地位始终被城市和商业占据着。然而，不言而喻，该地区的社会是嫁接于东西方间的联系往来之上的，离开后者，就算是城市和商业的社会也将无法生存。不论在历史上，那里的政权曾经享有过怎样近似于“独立”的自治权；或者在某个朝代，它如何紧密地臣服于中国政府的统治之下，一个事实永远无法更改：当地社会的形成，仅仅是中国和中东之间纳贡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起链接作用的子系统罢了。然而，这种从属关系并不能削弱该地区的重要性或者否认其文明的耀眼和杰出，那里历史悠久的完全定居生活领先于世界（最迟可以上溯到公元九世纪），开放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在开放中轻松自如地采纳了立志于普救众生的先进的宗教形式，例如：景教、摩尼教、佛教或者伊斯兰教）里的文化生活绚烂多彩，因而，当地的文明备受世人瞩目。

在分隔新疆和西土耳其斯坦的群山以西，地理条件决定了那里要么生活着更为庞大的草原游牧人群，要么依靠锡尔和阿姆达利亚河发展灌溉农业。这片地区几乎可以说是伊朗高原和阿富汗高地的延伸，它尤其充当着定居生活（农业和城市）与游牧生活之间的枢纽地带。因此，随着历史时机的变化，在当地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或者是城市和商业（以灌溉农业为后盾），或者是游牧和流浪。显然，第一种情况的发生会对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加以促进，而第二种情况则会对它有所阻挠。而且，与广泛流传着的偏见正好相反，土耳其—蒙古的侵略从来未曾给这方面的贸易带来过有利的因素。

阿富汗在这个区域性体系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印度与中东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关系。而除了海路以外，他们的交易往来还经常取道阿富汗高地的北部，与中国—中东一线在

阿姆达利亚河处汇合。因此，阿富汗成为了三方（中东—印度—中国）之间的连接地带，别具特色的综合性文明（例如库夏纳国文明）在此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为了避开喜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这两处难以逾越的屏障，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被迫从西边绕道而行，这同样需要途经阿富汗。

内陆亚洲的北半部分，大致对应着今天的蒙古（天山以北）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大草原（咸海和锡尔达利亚河以北）。他们经由里海北部、黑海北部，畅通无阻地一直延伸到欧洲中部。这些地区在东西方关系的领域里仅仅充当着次要角色，究其缘由至少有两点：一方面是因为公元 1000 年以前欧洲的落后，另一方面则在于躁动的草原游牧民族占据了当地的支配地位。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谈到过的那样，北部这条通道的应用时间非常短暂：从十二世纪欧洲崛起开始，到十六世纪之后她夺取了海上霸权为止，而这段时期，则与成吉思汗攻占整个上述地区的时间恰好吻合。

北部的这片区域里，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也自成一家。那些在南半部地区处于优势地位的各种形式在此并不拥有支配力量。这里，游牧民族占据着数量方面的上风。他们与贫穷的商人互相往来，但是，这一类的交易同真正的“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比较起来，简直具有天壤之别。蒙古上下，我们始终见不到重要城市的踪迹。即使是在成吉思汗统治的时代里，其首都喀喇昆仑依旧也只能称得上是一方乡镇而已（居民 5000 人？）。这座小镇与南部中亚的那些城市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东西方之间主要的贸易往来全与它毫不相干。况且，中国与天山以北的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之间的交易有限到了极点，事实上只剩下了中国对于马匹和皮毛制品的进口。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崩塌之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对这方面的贸易开始加以控制，在游牧体制、佛教封建制度

和中国重商主义之间建立起了新型的连接关系，从16世纪到20世纪，这种关系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俄国向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把自己同中国对立了起来，这导致了双方在地理政治方面争夺控制权的新冲突。尽管如此，当时的俄国却并非资本主义欧洲的心脏地带——那是到了现代才有的事，她只是一处贫瘠的半周边地区罢了。因此，那里的对外贸易仅仅居于附属的次要位置。

在讨论蒙古社会的组织构成问题的时候，上文对佛教的地位略有牵涉，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却给我们提出了另一个课题，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进行研究。事实上，佛教在亚洲文明的中心地区屡遭挫败，这相当令人不可思议。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可是，在那里和在中国，佛教却分别被印度教和儒家学派飞速超越；而在沿丝绸之路一线的广大地区，伊斯兰教则称霸一方。不过，与此相反，在中亚体系的两处边缘地区——西藏和蒙古，佛教却稳如泰山地扎下了根。

正像我们曾经提起过的那样，蒙古以西的内陆亚洲北部地区并没有明确的边界线，它包含了哈萨克斯坦以及俄国的南部地区。这里，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们逐渐全部地、或者说几乎全部地、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这份迟到的信仰却并没有给那里的文化带来过什么深远的影响）。他们劫掠成性，是名副其实的侵略者。在北部这片广袤的区域里，当地居民与毫不逊色于他们的俄国入侵者之间，时常会爆发直接的对抗。

在我们所研究的二十个世纪里，纳贡体系的总体结构表现出了极为显著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使得运用示意图来阐说该体系的稳固性成为了合理的选择。

相对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每个地区在整体上（人口以及财富）都是时刻演变着的，这种演变不仅会逐渐打破和推翻上述各整体之间的关系；甚至还会创造出的一套具有现代资

本主义特征的崭新的世界性结构体系。因此，尽管有重复之嫌，我仍然要提醒大家：我用以分类说明贸易流量的那些数据和指数，都代表着我们所考察的漫长时段中的平均值。所以，严谨地说，它们与构成该时段的每个时期中的具体数据并不相符。基于这一原因，针对每个组成时期，我们应该建立起该时期独有的指数体系，从而来阐明当期各个地区之间的相对地位。

现在，我将对在上述演变过程中出现过的、最具有说明意义的特点加以概述总结，如下。

①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二十个世纪里，中国的发展始终是突出而且连贯的。因此，这块大陆国家在古代世界的纳贡体系中，保持有一席卓越（但并不是支配性的，请见下文）而且稳固的地位。印度的情况与其相似，尽管略为逊色，但仍是该体系中占据了第二把交椅的大陆国家。

②相反地，中东在这段时期中停滞不前。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在上述体系中地位的大幅度下滑。

③最为杰出的演变发生在欧洲大陆。那里十五个世纪以来都只能算得上是边缘性的周边地区。但是，到了资本主义革命之前的五个世纪里，她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突飞猛进。在我们所研究时段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欧洲凭借着她对美洲新大陆的征服和塑造，将自身的巨变推上了新一轮高潮，更为世界体系由区域性向全球性的转变揭开了序幕，要知道，那时以前的世界体系仅仅涉及古代社会而已。

④同样，其他地区（日本、东南亚、非洲）的演变也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为全球性资本主义新体系的构建作下了准备。

⑤公元1500年开始运作的资本主义体系，从质量上看不同于以往。它颠覆了有关地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关系，这一切并非是不经意间的举措，而完全是以欧洲利益为出发点和目标的。

欧洲开始成为全球范围内居高临下的中心。而且，借助于她在美洲的扩张以及另一个国家日本的崭露头角，欧洲的这一中心地位还会获得进一步的加强和提升，从此以后，“控制和支配”这个概念代表了新兴世界体系的主要特点，可它在过去世界的纳贡体系中却是根本不存在的。另一方面，还有一种质的变化与这一转变息息相关，我在前文中曾经强调过它的重要性：经济领域的需要取代了政治思想上的需要，从而上升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支配性因素。

⑥中亚作为古代最发达的几个地区（中国、印度、中东，后来欧洲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之间的必经区域，在古代的世界体系中，曾经是一处关键性的地区。通过这一要害地区转口的商品、科学和技术频繁地相互影响，对于该地区的研究结果，突出地表明了上述交流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在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中亚逐渐丧失了上述职能。因此，她最终还是落后到了社会的边缘。

## 参考书目

1. 珍妮特·阿布-路格赫德 (Abu-Lughod, Janet), 《在欧洲霸权之前——公元1250到1350年间的世界体系》，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

2. 萨米尔·阿明 (Amin, Samir), 《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评论》，巴黎，安托波 (Anthropos) 出版社，1988。

3. 乔瓦尼·阿里吉 (Arrighi, Giovanni), 《漫长的二十世纪》，伦敦-纽约，韦尔索 (Verso) 出版社，1994。

4. E. A. 阿什特 (Ashtor, E. A.), 《中世纪近东的社会和经济史》，伦敦，柯林斯 (Collins) 出版社，1976。

5. 克里斯托弗·贝克维斯 (Beckwith, Christopher), 《中亚

的西藏帝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

6. W. 巴尔特约德 (Bartjold, W.)，《中亚土耳其史》，巴黎，梅松纳夫 (Maisonneuve) 出版社，1947。

7. 马丁·贝尔纳 (Bernal, Martin)，《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新布伦斯维克，拉特奇斯 (Rutgers) 大学出版社，1987。

8. J.M. 布劳特 (Blaut, J.M.)，《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科学和社会出版社，1990。

9. J.M. 布劳特 (Blaut, J.M.)，《1492年》，1991。

10. 费尔南·布劳德尔 (Braudel, Fernand)，《十五至十七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以及资本主义》，巴黎，阿尔芒·科兰 (Armand Colin) 出版社，三卷本，1979。

11. G. 塞沃德 (Ceodes, G.)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教国家》，巴黎，布罗卡德 (Brocard) 出版社，1948。

12. 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 (Chase Dunn, Christopher) 和托马斯·D. 霍尔 (Thomas D. Hall) (编辑)，《资本主义之前世界里核心与周边地区的关系》，韦斯特维尔 (Westview) 出版社，1991。

13. 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 (Chase Dunn, Christopher) 和托马斯·D. 霍尔 (Thomas D. Hall) (编辑)，《世界体系与生产模式》，ISA，范库弗 (Vancouver) 出版社，1991。

14. K.N. 乔德哈里 (Chaudhuri, K.N.)，《印度洋上的贸易和文化——从伊斯兰教兴起到1750年间的经济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

15. 卡伊萨·埃克赫姆 (Ekholm, Kajsa)，《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古代世界体系的开发》，《回顾》，第六卷，第一号，1982。

16. 埃迪安布勒 (Etiemble)，《中国式的欧洲》，巴黎，加利马尔 (Gallimard) 出版社，1988。

17.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Fitzpatrick, John)，《公元800~1400年亚洲东北部的战争、政权和市场》，ISA，范库弗 (Van-

couver) 出版社, 1991。

18.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Frank, André Gunder), 《1492~1789 年间的历史积累》, 《回顾》月刊出版社, 1978。

19.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Frank, André Gunder), 《过渡时期的思想模式: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人类学评论》, 贝弗利山, 塞奇 (Sage) 出版社, 1978。

20.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Frank, André Gunder), 《世界体系五千年历史理论导言》, 《回顾》, 第十三卷, 第二号, 1990。

21. 爱德华·弗里德曼 (Friedman, Edward) (编辑), 《世界体系中的起与伏》, 贝弗利山, 塞奇 (Sage) 出版社, 1982。

22. 雅克·热尔内 (Gernet, Jacques), 《中国历史》,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5。

23. R. 古而斯曼 (Ghushman, R.), 《伊朗》, 鹈鹕企鵝丛书出版社, 1954。

24. B.K. 吉尔斯 (Gills, B.K.) 和 A.G. 弗兰克 (A.G. Frank), 《积累的累积: 关于五千年世界体系史的论文与研究日程》, 《辩证人类学》, 第十五卷, 第一号, 1990年6月刊, 19~42页, 同时参见: 《资本主义之前世界核心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C. 蔡斯·邓恩 (C. Chase Dunn) 和 T. 霍尔 (T. Hall) (编), 布勒德, 韦斯特维尔 (Westview) 出版社, 1991。

25. 约舒亚 S. 格德斯登 (Goldstein, Joshua S.), 《漫长的周期——现代世界的繁荣与战争》, 新港,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8。

26. 勒内·格鲁赛特 (Grousset, René), 《草原帝国》, 佩约特 (Payot) 出版社, 1947。

27. 马歇尔 G.S. 霍格森 (Hodgson, Marshall G.S.), 《伊斯兰教的冒险》, 三卷本, 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4。

28. S.C. 汉弗莱斯 (Humphreys, S.C.), 《历史学、经济学和人类学: 卡尔·波兰伊 (Karl Polanyi) 的工作》, 伦敦, 鲁特里奇和科肯·保罗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出版社, 1978。



29. 菲利普 L. 科尔, (Kohl, Philip L.), 《第三个千年中期亚洲西南部的贸易结余》, 《当代人类学》19: 3, 1978。

30. 《古代经济, 可转移技术以及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 从古代近东的东北边境望出去》, 出自迈克尔·罗兰斯 (Michael Rowlands)、摩根斯·拉尔森 (Mogens Larsen) 和克里斯蒂安·克里斯丹森 (Kristian Kristansen) 三人编辑的《古代世界的中心和周边地区》,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7。

31. 《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和滥用: 早期西亚国家案例》, 出自 C.C. 兰博格 - 卡尔洛甫斯基 (C.C. Lamberg - Karlovsky) 编辑的《美洲的考古学思潮》,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0。

32. 吕克·科韦顿 (Kwanten, Luc.), 《游牧帝国》, 勒塞斯特 (Leicester) 大学出版社, 1979。

33. 刘心儒 (音), 《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 公元 1600 年的贸易往来和宗教交流》, 德里,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8。

34. 马里奥·利夫拉尼 (Liverani, Mario), 《青铜时代末期近东体系的坍塌: 叙利亚案例》, 出自迈克尔·罗兰斯 (Michael Rowlands)、摩根斯·拉尔森 (Mogens Larsen) 和克里斯蒂安·克里斯丹森 (Kristian Kristansen) 三人编辑的《古代世界的中心和周边地区》,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7。

35. 莫里斯·隆巴尔 (Lombard, Maurice), 《鼎盛时期的伊斯兰教》, 巴黎, 弗拉马里翁 (Flammarion) 出版社, 1971。

36. 威廉·麦克尼尔 (Mc Neill, William), 《西方的振兴——人类社会史》,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3。

37. 《对权力的追求: 公元 1000 年之后的科技, 武装和社会》, 牛津, 布莱克维尔 (Blackwell) 出版社。

38. 莱昂·玛尔弗 (Marfoe, Léon), 《从雪松林到白银山: 近东社会的转变与远距离贸易的发展》, 出自迈克尔·罗兰斯 (Michael Rowlands)、摩根斯·拉尔森 (Mogens Larsen) 和克里斯蒂安·克里斯丹森 (Kristian Kristansen) 三人编辑的《古代世界的中心和周边地区》,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7。

39. 马修·梅尔科 (Melko, Matthew), 《和谐斗争中的国家体系》, 在关于“文明间的比较研究”问题的日本社会年会上发表的论文, 东京, Kokugakuin 大学, 1990 年 12 月。

40. 乔治·摩德斯基 (Modelska, George), 《世界政治的长周期》, 伦敦, 麦克米伦 (Macmillan) 出版社, 1987。

41. 琼·奥茨 (Oates, Joan), (菲利普·科尔 (Philip Kohl) 注释评论), 《第三个千年中期亚洲西南部的贸易结余》, 《当代人类学》19: 3, 1978 年 9 月。

42. A. 利奥·奥本海姆 (Oppenheim, A. Leo) 和埃里卡·雷纳尔 (Erica Reiner),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77。

43. 雷利·阿维德·帕拉特 (Palat, Ravi Arvind) 和以玛利·沃勒斯顿 (Immanuel Wallerstein), 《公元 1500 年之前的“印度”属于何种世界体系?》, 在关于“商人、商号以及贸易”问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巴黎, 人类科学院, 1990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

44. 雅克·皮莱纳 (Pirenne, Jacques), 《全球历史大趋势》, 巴黎, 阿尔班·米歇尔 (Albin Michel) 出版社, 1947。

45. 卡尔·波兰伊 (Polanyi, Karl), 《早期帝国的贸易及市场》, 格兰科 (Glencoe), 弗利 (Free) 出版社, 1957。

46. 莫里斯·罗萨比 (Rossabi, Morris), 《匹敌者之间的中国: 十到十四世纪期间的中部王国和她的邻居们》, 伯克利,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82。

47. M. 罗斯托沃柴夫 (Rostovtzeff, M.), 《希腊化世界的经济社会史》,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41。

48. 乔治·鲁 (Roux, Georges), 《古代伊拉克》, 哈蒙斯沃斯 (Harmondsworth), 鹈鹕丛书。

49. 迈克尔·罗兰斯 (Michael Rowlands)、摩根斯·拉尔森 (Mogens Larsen) 和克里斯蒂安·克里斯丹森 (Kristian Kristansen), 《古代世界的中心和周边地区》,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66。

50. 莫里斯·希尔维 (Silver, Morris), 《古代近东的经济结

构》，伦敦，克卢姆·海尔姆（Croom Helm）出版社，1985。

51. G.E.M. 德圣克鲁瓦（De Ste.Croix, G.E.M.），《古希腊世界里的阶级斗争》，达克沃斯（Duckworth）出版社，1981。

52. 楚塞·苏兹奇（Suziki, Chusei），《中国与内陆亚洲间的关系：匈奴和西藏》，出自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编辑的《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

53. 弗雷德里克·特戈尔特（Teggart, Frederick），《罗马和中国——关于历史事件相互关系的研究》，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39。

54. 罗米拉·萨帕尔（Tharpar, Romila），《印度史一》，哈蒙斯沃斯（Harmondsworth），企鹅丛书，1966。

55. 阿诺德·托因比（Toynbee, Arnold），《历史研究》，六卷本，牛津出版社，1947。

56. B. 弗拉迪米斯托夫（Vladimirstov, B.），《蒙古的社会体制——游牧的封建主义》，梅松纳夫（Maisonneuve）出版社，1948。

57. 乔治·弗尔纳德斯基（Vernardsky, Georges），《俄国史》，梅尔沃（Malev.）出版社，1952。

同样，我还要指出，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有关人口的那些数据主要来自以下三处：

1. 简·克洛德·切斯内（Jean Claude Chesnais），《世界人口——从远古到公元 2050 年》，巴黎，博尔达斯（Bordas）出版社，1991。

2. 雅克·瓦林（Jacques Vallin），《世界人口》，巴黎，发现（La Découverte）出版社，1989。

3. 特希尔思·钱德勒（Tertius Chandler）和杰拉尔德·福克斯（Gérald Fox），《三千年城市的成长》，纽约，学院出版社，1974。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

### 1.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特殊性

有关这一主题，我再补充三个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之前的体系来说是一次质的飞跃。这体现在：价值规律影响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活，而且是现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体系，也就是说影响新体系（“经济主义”或者不如说是“经济剥削”）特有的意识形态内涵，就像它影响体系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政治是压缩过的经济”或“财富决定权力”，而在此之前一直是“权力决定财富”）之间的新型特定关系一样。这种体系之所以高级，不仅仅表现在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层面（现代民主观念）。同时，体现这种体系特点的增长指数是整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体系在无法改变的积聚规律作用下的必然产物。但是，如同沃勒斯坦（Wallerstein）观察到的那样，增长指数是一种癌症，它必然导致死亡。马克思凭借天才的本能认识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将要走到尽头，并被一种与其有着本质区别的新体系所代替。这

种新体系将把生产力的增长纳入受控制的社会机制中，而不是听凭其仅仅由经济剥削的机制来决定。

第二，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是一个世界体系，而且是第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通过参与世界劳动分工而成为世界性的。这种分工是大众的基本消费品和它的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且伴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商品化程度。在这一点上，这个体系是一个由世界化价值规律统治的世界经济体系。

第三，世界化的价值规律必然引起两极化，即贫困化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财富的积累，这是一种在以前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的新现象。它引起了所有占据着人们视线的主要冲突：边缘人民的暴乱和各中心之间为争夺世界体系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就像它影响战略的有效性一样，而这些战略将导致潜在的对体系的超越。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剥削劳动的方式的批判以及控制体系（商业剥削成为最高价值标准）的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的批判。这种批判逐渐由道德上的拒绝上升到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和规律的更科学的理解，而且这些批判都是从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法出发的，在马克思社会主义批判的表述中达到顶峰。我认为，这是一种本质的、重要的和不可回避的批判。然而，社会主义批判——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内——在有关资本主义的另一方面，即资本主义成为建立在两极化基础上的世界体系方面，相对较为不力。

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弥补了社会主义历史观的不足，因为这种分析准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世界性特点及其在此范围内的两极化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

在对资本主义体系最直接的表述中，它是一个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治体系中运作的“经济世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经济世界”与“帝国世界”之间的对立反映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经济不仅仅最终决定社会关系，而且是统治机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变迁要按资本积累的独立要求进行调整）与以前的生产模式（在这些生产模式中，经济规律并不是必然性的独立体现，而是相反，做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的表现；由于这种特点是以前所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所共有的，我觉得有必要赋予它们一个共同的名称——从属模式，以显示它们与资本主义模式之间质的区别）之间的质的对立。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并不通过帝国的征服来扩展它们的政治权力，因为它们能很有效地通过经济方法来实行它们的统治。以前时代的国家，如果它们的边缘不在其政治统治范围之内，它们就无法从边缘对它们潜在的经济依赖中获利。我坚持对这个质的差别进行分析，如果没有这个分析，那么对做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感知就仍然是描述性的和停留在表面上的。

对该体系的社会主义批判构成了挑战，做为回应，尤其是做为“对马克思的回应”，一些理论和意识形态都没有提及这个质的差别，它们试图在尽可能多的层面上对现代性的特点进行直观的理解。麦克斯·韦伯（Max Weber）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韦伯将“承袭性的”古代世界与“客观的、条文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对立起来。这个所谓的对比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从属模式在它的高级阶段是具有“条文主义和官僚主义”特点的（如天朝的官僚主义），而只是在边缘地区才具有明显的承袭性特点（例如中世纪前期的欧洲）；资本主义模式在内容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在表面形式上是官僚主义的，尽管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相比占了上风

(相对于英国和法国激进的革命,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就是这样)。在我看来,韦伯的理论是对德国特点的过度推论。有关“传统/现代”对比的见解也同样浅薄。对“个人/公众”的对比的强调是自以为如此(即“个人”战胜“国家”)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强调民主是现代观念则以同样的方式混淆了是非。根据我的理论构建,既然现代民主观念实际上是为了经济而推翻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必然产物,由此推论出两边可互换的等式“资本主义=民主”是绝对错误的。一方面,这里所提到的民主与对经济的管理是分离的,经济是受表面上看来“自然”的规律支配的;另一方面,由于两极化的现象,这种民主在地理上是封闭在世界体系的几个中心里的。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每次一种与众不同的形态在断绝了与资本主义模式的关系后,都不可避免地成为误解的对象。一方面,它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难以推广,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导致向前推论。对现象的分析压缩了历史的空间,将争论提高到一个非常抽象的水平,并由此使人们推论出的观点平庸化,反过来,这些观点又变得总是半对半错。

如果,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根据马克思主义传统——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其特殊的生产模式,那么必须等到“工业革命”,也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工资制基础上的“大工业”确立统治地位后,才可以说资本主义模式确定了它的最终形态。现在看来,欧洲“重商主义”的三个世纪(从文艺复兴到1800年)仅仅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三个世纪。人们还根据经验认识到使这一时期成为过渡期的几次飞跃:对从属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的摒弃,对建立在原来的封建社会力量和资产阶级力量平衡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英国和法国革命的民主体现等等。

因此,组成古代从属世界的各个“地区”(大的帝国或者

是小的领地)彼此之间并不是必然相互孤立的;相反,所有的历史研究都表明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出乎人们的意料。然而这种关系的性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关系是不同的,后者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涉及商业关系,“交换”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对有关“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这意味着交换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上)之间的必然区别的批评仍然是有意义的。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确定的交换的频繁性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它们只能表明,很久以来,对从属体系的超越——也就是说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各地都早已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欧洲重商主义的过渡并不是发展的特有规律的产物,而是所有人类社会普遍进化规律的体现。

对有关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有关世界体系的分析的反对意见还没有形成;相反,这两个分析方向是补充性的。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表达,对有关世界体系的分析可能会导致真正的偏差,包括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分析结论进行的推理。

有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如果这有意义的话——过去的世界体系的性质和定义的争论充满了误解。这种误解产生的最终原因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不能仅仅是三种现象的简单罗列:私有财产,雇用劳动和商品交换的扩展。这种经验论的方法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即,资本主义的存在仅仅是在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现代工厂的水平之后,这种工厂使用的是重机械设备,而不再是手工设备。实际上,私有财产—雇用劳动—商业化生产的组合不仅在重商主义的甚至封建时代的欧洲比资本主义出现得早,而且在其他地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世纪,甚至数千年。这个组合构成了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史前史。

只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完善形式之后,现代世界的两



个基本特点才表现出来。一是大规模的城市化导致质的变化，因为它意味着与农业革命（机械和化学）密切相关，条件是生产率较之几千年前成倍增长，如果没有工业为其提供设备将是难以想象的。二是生产呈指数式增长，这不仅意味着对利润的追逐成了经济决策的原动力，而且意味着这种追逐是建立在超越了手工业工具阶段的物质基础上的。

现代世界体系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为它是建立在我刚才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回顾现代性的每一个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赋予它们一个准确的和可理解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注释，上面所提到的这些现象仍然是重复误解的对象。如果不参考价值规律（也就是说，不参考商业关系的拓展——过于模糊的术语——而是在刚才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之上参考这一拓展）和以下事实：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不仅影响经济生活，而且实际上将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都置于无可替代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控制之下，那么沃勒斯坦所引证的“无休止”的积累以及指数式的增长仍然是不可理解的。从资本主义开始，市场包含了财富和服务的基本生产以及劳动和土地。同样地，只有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架中探讨市场的拓展和推广时，它们才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即它们是为资本积累服务的，因为，虽然包含了生产、劳动和土地的市场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了（例如中国），但当时的市场运作并不是资本积累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财富只有在用于扩大再生产时才是资本，这已经得到了完美的证明。财富的积累与资本的积累并不是同义词。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那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世界经济在整体上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支配的。与沃勒斯坦和查斯·邓恩（Chase Dunn）一样，我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世界化的，因为在其基础之上组织基本生产的劳动分

工是一种世界性的劳动分工。在以前的时代，“远距离”交换的对象往往是一些享有盛誉的产品。这些产品当然是理解上述社会中再生产的重要因素，但它们并不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因为在这些社会中，再生产是受不同的逻辑支配的。现代资本主义之前的这些交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会涉及“基本”产品（大量消费的建筑材料、金属和纺织品等），但并不包括准确意义下的资本主义工业（更加高级）的产品，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差别。

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概念进行的向前推论——到1800年之前——总是拒绝承认向资本主义工业的过渡作为一个质的飞跃的重要性，这种拒绝使真实的历史扁平化了。拒绝承认这一点是仅仅从各个不同的生产模式的内在逻辑上来分析世界体系所得出的结论。因为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我认为脱离实际的解释中，一个教条主义的观点认为每种生产模式的不同点构成了事实的全部，而且这种观点长期为人们所接受。根据这种教条主义观点，每种社会都必须分开来进行研究，而对可能存在一个更大体系的想法都加以拒绝。其中，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被降格为相互并列的各个地方性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且仅仅按照社会内部结构来定义各个社会。在研究领域中，甚至关于这个世界体系内部的两极化的观点都被事先排除了。然而对世界体系的分析首先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化呢？

但是，我们不应该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出去，也就是说，为了否定世界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现代的和资本主义的）而贬低生产模式（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观点是不对的。相反，应该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特殊性的基础上加强对现代世界的分析，同时认识到它具有世界体系的特征。有时，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定义也受到了反对生产模式概念的

偏见的干扰。于是，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定义必然显得很模糊；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将资本主义经济世界定义为为国家间政治体系的联系和超越国家之上的经济（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呢？）。这显然过了头，对世界体系理论向前进行推论是行得通的，而且这一点已经做到了。

## 2.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两极化

有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两极化，我提出了以下论点：

第一，两极化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内在规律。现在的资本主义做为一种世界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方面是不可减少的，也不会减少，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运行的基础是结合了商品、资本和劳动的三维市场。然而，这种在主要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西欧和中欧，美国和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结合并没有扩展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世界市场是一个例外，它在扩张过程中是二维的，只逐渐结合了产品的交换和资本的流通，并没有劳动，劳动市场是被分隔的。

我认为这种现象本身就足以引起不可避免的两极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世界化的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辅以对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基本分析）也好，甚至通过新古典主义经济的方法也好，我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展示这种两极化的积累机制。这种观点与描述普遍价值规律、在每一“维”中的市场和符合生产模式逻辑的基本社会阶级等的观点一样，具有很高的抽象性。我的论点抽象地说明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特征，就像价值规律的论点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特征一样。当然，抽象在这里或是别处再也不是对具体的否定，相反是具体的多样性的表达。形成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做为了一极，未形成资产

阶级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做为另一极，证明了具体的多样性。我所说的与中心相对的边缘——总是复数形式——就具有这种多样性。至于中心地区，它可以是复数形式，例如当我们希望重现它形成的历史的时候；它也可以是单数形式，例如当我们强调构成它的民族社会的同一化倾向时，或者当我们强调它与边缘关系的特点时。

第二，对中心和边缘这两个概念的定义的主要内容本质上都是经济的。这不是一个武断的选择，而是经济在资本主义模式中的统治地位，以及资本积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体现。因此，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本质上是经济的。相反，如果在以前的时代有通常意义上的两极化现象，那么这种两极化的本质和原动力是不同的，因为它们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下起作用。

第三，现代形式的两极化表现为世界分化为工业化国家和与之相对的非工业化国家。这种情况出现于19世纪，相对来说历史不长。工业化与非工业化的对立并不是资本主义两极化的永久和最终模式。这种现象在1800年到1945年间占主导地位，在二战后随着边缘地区的工业化逐渐变得模糊了，同时两极化的标准又转移到了新的领域。

当然，资本主义两极化概念的出现有其自己的历史。随着那个时代各种具体而特殊的观点的出现，争论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一些观点强调工业与非工业的对比，因为两极化确实通过这个对比表现出来。此后，工业化成为发展的手段，其历史目标是消除两极化（“落后状态”）。与这个对比直接相关的有关分析都在国际交换领域和国际分工领域进行。当我们解读在辩论中提出的有关不平等交换的观点时，脑子里不应该忘记它与两极化历史形式的具体实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争论的模糊性来自于这一方或那一方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或者是没有对观点进行抽象的概念表述。实际上，在这些观点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少表述或表述不佳的理论划分。一些人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两极化的。但是，为了建立这一理论，必须上升到更加抽象的高度，以了解世界市场较之资本主义模式的三维结合而言所存在的局限性。另一些人则认为，没有具体的历史依据可以证明世界资本主义必然是两极化的。同样，这种两极化是表象的而非本质的，它是具体的历史的产物而非资本积累规律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特定的经济分析、有关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在此过程中遇到的阻碍的见解或者文化的观点（由不同“文化”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潜在作用）就不能结合起来。

在其文集《大混乱》中，G. 阿里奇（G. Arrighi）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他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带来了两种相互补充的/相互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是就业大军（组织起来的工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的加强，另一方面是产业后备军的贫困化（失业，边缘化，一些低效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等等）。我认为这种细致的观察是正确的，因为不仅马克思是这样说的，而且 G. 阿里奇也指出，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由于没有认识到世界两极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就业大军和产业后备军的定位——中心和边缘地区，这种定位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主观地认为同一群无产者在上述两种阶层之间不断的来回摆动保证了反资本主义阵线的团结，并会在全球范围内很快取得成功。相反，两极化现象表明，这个联盟被打破之后，两种不同的反资本主义战略逐渐形成了对比：中心地区工人阶级的民主社会战略和边缘地区人民（即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后备军）的列宁主义（后来是毛泽东主义）革命战略。

边缘地区近来逐渐的工业化——当然也是不均衡的——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两极化现象，以抛却它那种过时的历史表现形式。当然，资本主义市场的非三维结合仍会不断产生两极化，但是资本主义市场本身不能用常规的“竞争”来分析。在我看来，巴朗（Baran）、斯韦西（Sweezy）和麦格道夫（Magdoff）已经证明，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确切地说，我是指两个市场：一方面是三维的国家市场，另一方面是不完整的世界市场）与19世纪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这个分析虽然被许多同样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所否定，但它恰恰是揭示本质的，因为它指出了对剩余价值而不是对利润的追求。我只是认为，今天我们应该走得更远，就世界范围内的积累对走向全球工业化的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一些观点。

有关这一点，G. 阿里奇指出，不平等交换只是展现了冰山的一角：在凝结着劳动的产品的交换当中，报酬的不平等超过了生产力的差异所体现的不平等。阿里奇强调指出，有三种与所有交换无关的两极化机制在起作用：（1）资本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失；（2）劳动者同一方向的选择性流动（尽管根据流动的选择性的自身定义，这种流动难以形成世界劳动力市场）；（3）位于中心的公司在世界劳动分工中所占的垄断地位。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中心控制着全球的自然资源。

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前两个机制融入本人关于两极化的一般抽象概念中去：它们是这种概念的显而易见的体现。同样，我所强调的第四要素也一样。相反，在我看来，此处所暗示的垄断的概念仍然是模糊的，界定得很不明确。就此，阿里奇引用了阿罗（Harrod）不久前提出的把建立在排他基础上的“寡头财富”与原则上“面向所有人”的“民主财富”区别开来的主张。就算是这样，那么排他的确切机制又是什

么呢？对现代形势的具体分析表明，我们可以研究排他的两个方向：技术垄断和世界化的金融垄断。在这个范围内，边缘工业化可以成为金融与技术中心控制下的一种现代生产体系。还有，只要这些构成整体的要素没有彼此联系起来，垄断概念本身就仍然会是直觉的，这一体系的活力就难以释放出来。

如果我们规定，不提及中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就不能讨论中心的优势，那么从这种具体的意义上来讲，两极化的概念就是主要的。由此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一般来说，边缘的劳动剥削要比中心的劳动剥削厉害得多（劳动报酬——雇佣劳动者及其他——的差别大于生产力的差距）。这种超剥削的产物对于支配整个体系的资本来说是有利的，通过交换，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中心，而资本和劳力的流动又使交换得到了加强。主流学说试图否认或最大限度地弱化这种转移的影响，因而只不过是為了掩盖资本主义与两极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将其在意识形态内进行合法化而已；（2）牺牲边缘利益的价值转移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它能够通过对边缘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重新导致和加深两极化，尽管从统计学上讲，这种力量较之中心本身所造成的过剩而言，有时似乎没有那么大；（3）处于中心的公司所拥有的优势地位的得来不是排他性的，甚至也不是主要通过劳动组织的更加高效来完成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它还是中心对世界劳动分工所施加的垄断影响的产物。

对于最近的变化应当参考上述范畴来分析。比如，中心的（相对）“非工业化”——与之并行的是边缘的工业化——若不与中心从纯粹的工业活动向控制技术、金融和自然资源的垄断转移联系起来，就没有了意义。

如果说边缘总是做为复数形式出现，那么根据我所提出的

观点，是因为这个词只有一种负面定义：（边缘是）世界体系中没有形成中心的所有地区。因此，边缘在世界体系中所担负的职责的多样化也就不言而喻了。

这种多样化的特点使人们总是特别想对边缘加以分类。于是最近有人提出了一种说法——“第四世界”，以区别工业化过程中的第三世界。在发明这种说法的人的脑海里，这个说法的使用并不是无害的：它暗示，第三世界新工业化发展中国家正在“赶超”（或者能够“赶超”），而第四世界则“前景暗淡”。他们忘记了一点：工业化已不再是两极化的基础。所以，我宁可这样说：明天，边缘的核心——正在形成之中——是由那些在提供工业产品方面承担主要职责的国家组成的；而“第四世界”表明了资本主义扩张的破坏性的特点，这种特点不是新出现的，它贯穿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真实历史。至于纯粹的量的划分（即世界银行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金字塔的划分），那只是一种最浅显的分类。这种分类可能会把某石油酋长国排在瑞典的前面，甚至希望利用这一点把国际劳动分工和所谓的相对优势合法化。

就此，阿里奇分析道，世界体系就像由三个整体（中心、半边缘、边缘）组成的稳定的联合体，它促成了三者的存在，同时又得出了各组（由金字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位前、中、后三个层次的国家组成）的中位数。我立即注意到，这种构造是人为的：比如说，如果首先只确定两组（中心或边缘）或四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两组或四组中位数，其对比变化就会得出相似的结果。因此这种手法回避不了对各组进行质的定义困难，因为所谓“半边缘”只能是顾名思义而已，介于第一组和第三组之间，只是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而言，就工业化水平或几乎任何其他量化标准而言。此外，对于边缘（根据阿里奇的定义）的描述本身就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像一个具有



中心的典型特点和“其他”特点的混合物：它具有典型特点（这些特点在质的方面甚至很弱）仅仅表明所有的公司都被纳入了世界体系，无一例外。从最发达的中心到最古老的边缘地区，这些特点——现代企业、雇佣劳动者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广泛的商业网、各地相似的金融机构（银行）、通过预算和一定数量的机构实施管理的现代国家，等等，它们的最低限度的存在——是自始至终都具有的。

在强调各组令人惊讶的长期稳定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彼此隔开的距离时，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然而，分成两组或四组的划分办法可能会再一次体现出同样的稳定性，那么这种稳定性就意味着，两极化是永远无法克服的，因为它是体系的最主要内容的组成部分。

相反，在选择把半边缘与边缘区别开来的时候，阿里奇有一些无益的武断：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分类（这是他的依据）成了必然。在我看来，他认为加纳同意大利和日本一样属于半边缘的看法是没有道理的，除非加纳的位置下降，而意大利和日本上升到中心伙伴的行列。如果采用我所提出的社会政治标准——无论一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有无凝聚力——我们认为，根据外在因素，不管加纳的情况好转还是恶化，它都一直属于边缘国家，至于意大利和日本，则一直存在一个使它们能够在国际排行中获得更好位置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起作用的是内在因素（它与外界因素共同起作用），只有在本地的构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时候，这个空间才会存在。

此外，阿里奇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种三段式分类所带来的不便，但他所受的局限使之无法作进一步的区分，因而也就无法理解当时被他称之为“中心的四周”与“边缘的四周”的特殊状况。我们再一次接近了连续的金字塔结构。因此，我看不到

阿里奇提出的分成三类的主张有什么特别的好处。我宁愿在两极化的单义项中去分析世界体系，它表明，中心从总体上产生了上述体系，同时制造了边缘的次现代性，因为这种世界性的扩张不仅是现代性等级化发展的同义词，它同时还是一个在整体逻辑中功能失常或功能丧失的各部分走向毁灭的过程。所以，边缘化和毁灭是同时存在的，这使我们明白了在不断变化的形式中再度出现的各个边缘的永恒区别。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这一整体理论化相联系，对具体情况（而不是人为分组）的具体分析提供了建立抽象的一般理论的基础。

G. 阿里奇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各等级的非同寻常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明，“赶超”的目标是虚幻的。阿里奇甚至还指出，这一规律既适用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适用于资本主义边缘的社会制度。我同意这一观点。我只是要让大家看到，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混乱不堪地既要“赶超”，同时又要另辟蹊径（“建设社会主义”），而实际上——从我赋予这一概念的意义出发，也就是说，它们的对外关系要服从内部发展的逻辑——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分离了。它们所取得成就的积极方面（也许包括一种家长统治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但仍然是社会主义，保障就业安全和最低限度的社会服务，与资本主义边缘的野蛮资本主义截然不同）来自它们的根源（反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和分离；而它们陷入的僵局则反映出“赶超”的不现实，因为“赶超”意味着要在很大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的标准。这种对比反映了我在上面提到过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局限：其根源在于低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两极化特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东方国家重新联合并回到资本主义，它们“赶超”的步伐并不会加快，恰恰相反，它们将会像所有的边缘国家一样，遭受野蛮资本主义的倒退的影响。阿里奇的另一个结论——任何边缘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都无法赶超——与本人的观点显然是

一致的。

### 3. 资本主义扩张中的长周期问题

没有一个社会现象——甚至可能还包括自然现象——的发展过程是规律的、连续的和不确定的，资本主义扩张当然也不例外，迅速增长的阶段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艰难的调整时期，给各历史阶段的读者一种很长的周期变化的印象。一旦承认了这一事实，我们立刻就面临两类问题。

①连续的发展阶段相互联系，彼此诠释：当飞跃发展阶段所积累的矛盾遇到危机，限制了新的飞跃所需要的调整时；这些矛盾就会爆发出来。

②资本主义扩张不应只限于那些经济量值（产品，价格，收益，利润，对外贸易，等等）通常所描述的内容。社会冲突、战争、革新浪潮构成了体系的同样内在的内容。当我们立志要把所有这些内容纳入惟一的理论中去时，我们不应该因为遇到了真正的困难而放弃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应该被简化为一种政治经济学。

因此，承认我刚才所界定的那些阶段的连续性并不一定就是承认周期理论，因为，如果这种说法有意义，那么只有当确定的机制通过它以一种单调的方式重现这一运动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谈论周期。此外，现实中不同内容（经济的兴衰、技术革新、社会和政治冲突，等等）的接合应该是以同样的方式对不同的周期发生作用的。赞同应当把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来分析的原则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扩张就会遵循周期发展规律。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经济内容放在社会的总体发展中去分析是有其特殊理由的，因为确切地说，这种制度从整体上来讲是直接受其经济发展规律支配的，所以应当准确地确定这些

规律作用的性质、机制、时间（长或短）。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抓住经济独立的相对性，即两种东西的相互作用对经济独立所产生的制约——一方面是其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是规律在它发生作用的社会范畴所引起的反应。

关于这一点，我提出以下两个论点。

①不必花费很大力气，我们就可以利用乘数的两个已知机制（分散的附加收入产生一系列的感应收入）和加速数的两个已知机制（分散收入所引起的需求产生超比例的投资），建立一个单调周期的自动生成程序模式。

我们可以通过引进一个信用响应周期和实际收入与利润的相对变动周期来改进这一模式。我们可以在一种封闭或开放的国民经济或者世界经济中来体现这种模式，要么用传统经济的纯粹的经验主义说法来表述它，要么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来表述它。所有这些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行为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极为抽象的范围内进行的，这是保证它们有效的充要条件。必须指出的是，通过这种方式所得出的结果很好地描述了短周期的真实构架（平均为7年），它实际上是1815~1945年那个漫长时期开始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局面的控制似乎更明显了：更加活跃的国家干预、信贷管制、收入的重新分配、政府支出等等。同时，我们还可以不怎么费力地以股票运动为轴心，建立一些波动周期更短的模式，因为股票运动也同样符合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实际变化。

②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较为深刻的趋势的思索更是一场论战，有关“长周期”（孔德拉提夫〈Kondratieff〉语）的各种理论就是如此。然而在这一点上，我赞同其他几个人（巴朗、斯韦西、麦格道夫）的论点，尽管我知道，这种论点绝对是一种少数派的意见，是为整个传统经济、世界体系分析（我认为，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承认“长周期”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所不容(或忽视)的。我所维护的论点的基础是这样一种思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现在一种固有的社会矛盾当中,这一矛盾反过来又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趋势——“生产大于消费”:收入的压力促使利润的产生,利润又在竞争的驱使下被用来投资,而收入的压力总是大于满足最终需求所需要的投资。从这种观点来看,相对停滞的威胁是资本主义的慢性病。“危机”并不需要用特殊的理由来解释,相反,扩张才是危机各个阶段的特殊环境下的产物。

我认为,上述矛盾是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通过现代工业所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当然,我既不是要把这种特殊规律拉回到原始阶段,甚至也不想把它拉回到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过渡时期(1500年~1800年)。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之前的任何社会都未出现过生产过剩的倾向。另外,我还赞同巴朗、斯韦西和麦格道夫的观点: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倾向迫使人们引进了过剩以及吸收过剩的方式(经济模型的第三部门,在这个结构中,第一部门考虑制造生产方式,第二部门制造消费资料)这两个特定的概念。我要补充的是,有必要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来研究这种矛盾:全球收入重新分配的不平等(这里指的是劳动报酬的重新分配较之生产力的分布更加不平等)导致利润的永久性潜在过剩,过剩的利润必然被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浪费掉;劳动剥削(以及边缘的超剥削)最终将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障碍。

在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理论方面,关于视周期的讨论进展情况完全不同于世界体系派创始人所发起的讨论。

在由传统经济严格限定的范围(生产、投资、价格、收入)

内，我们的确发现了“长期波动”。价格指数实际上显示了1815年到1850年的下降趋势、1850年到1865年的上升趋势、1865年到1900年的下降趋势和1900年到1914年的上升趋势。然而，在这方面，我提出了一种与周期自身概念毫不相干的解释。其实，从1850年到1900年的这些变化是与先后在北美和南非新开发的丰富的金矿相辅相成的。但是我认为，在以可兑换的黄金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1815年到1914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内，绝对价格的变化是受走低的长期趋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支配的。这种趋势受到了黄金生产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阻碍，在1850年和1900年两次突然爆发出来：由于其他新矿藏的开发，价格攀升的潜力在十五年之内枯竭了，从此走低的长期趋势重又占了上风。

长周期影响着生产增长率，而投资变动又与生产增长率息息相关，因此对长周期的研究不要求过多地拘泥于“周期”的任意一种理论。在此，根据乔舒亚·哥德斯泰因（Joshua Goldstein）提出的工程合成法，我们发现了以下四个浪潮，每个浪潮都持续了半个世纪。

- ①1790~1814年 飞跃发展 1814~1848年 危机
- ②1848~1872年 飞跃发展 1872~1893年 危机
- ③1893~1914年 飞跃发展 1914~1945年 危机
- ④1945~1968年 飞跃发展 1968年…… 危机

由此，我们怎么会不立即发现，所有这些连续的飞跃发展期恰恰都与重大革新的出现以及足以扩大市场的政治变化相一致呢？按顺序分别是：（1）第一次工业革命，革命战争和帝国战争；（2）铁路，德国和意大利的联合；（3）电，殖民帝国主义；（4）欧洲与日本的重建和现代化，汽车文明。

由于上述原因，在特罗特斯基（Trotsky）与孔德拉提夫的论战中，我不站在特罗特斯基一边。特罗特斯基认为，革新、

新资源的开发、对外扩张战争甚至阶级斗争的结果，都属于经济周期理论的因果关系的范畴，因此他人为地把政治经济学从范围更广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分离出来。在我看来，孔德拉提夫有着强烈的直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应当把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现实中其他领域的变化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我赞同孔德拉提夫的观点，所以我认为，现实中的这些方方面面也是资本积累的体现。不过，它们的关系不会使人想到任何周期理论。

这样说的证据是，根据哥德斯泰因提出的合题，当各绝对的经济大国的发展出现同步的时候，社会现实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致：位于周期相位 A 或相位 B 的技术革新的集中是值得怀疑的，实际收入等方面的趋势也同样值得怀疑。世界贸易的动力（竞争中心的对外扩张是其表现之一）不会更多地遵循严格的规则。

技术革新在社会关系方面当然不是中性的，因为它的实现要符合利润逻辑。技术革新的经常性也一样真实，因为推动它的是（被分割的）资本的竞争，而竞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律。技术革新的重大突破能够带动一个很长的飞跃发展时期，但不是“必然”如此。例如，铁路或围绕汽车出现的城市化意味着大规模的投资和工业地域安排的改造，但这并不能说明当前以信息为中心的革新浪潮就有着相似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我还是赞同斯韦西和麦格道夫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现代技术革命不会给过剩问题带来解决办法，金融投机的逐渐消失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危机时期，技术革新在降低成本的激烈竞争的推动下仍然继续进行，这就是为什么视周期的相位 B 同样拥有正增长率特点的原因，尽管这一增长率低于相位 A 的增长率。

社会斗争结果的不确定性，不仅反映在周期相位的状态上，而且还反映在更基本的规定性（雇佣劳动者为争取更多的社会产品而进行的永久性的斗争，主流资本的各种历史性联合，如与农民的联合，响应社会主义的挑战，等等）上，这种不确定性使周期的理论化变得虚幻起来，而周期理论通过其必然机制在基本经济主义方面压倒了历史唯物主义。至于处在竞争中的中心的对抗影响及其在对外扩张中的成败，也同样不能把它们贬为某种机器。

最后我补充一点，往前追溯周期理论——1800年以前，更不必说1500年以前了——会发现那时是一些更糟糕的大杂烩，是对经济基础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关系概念的更庸俗的简化。

#### 4. 资本主义扩张中强国的对抗和世界霸权问题

我们最不能评论的是政治组织——国家的（其内容是民族的或皇家的），种族的或部族的，等等——之间的对抗，在历史上，这种对抗与这些组织内部的社会冲突一样，也是永远存在的现实。于是，与马克思的论断（即历史首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形成对比的是，一些人宣称，历史首先是人民和国家斗争的历史。有没有可能在这两种表面上相互排斥的论断中间架起一座桥梁呢？

世界体系派的一些创始人认为，应当把资本主义的历史——一些人认为应当从1500年算起，另一些人则认为可能应从1350年算起——做为某一特定强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连续施加霸权影响的历史来重新阅读。

就此，哥德斯泰因本着这一精神提出的工程合题得出结论：“霸权主义政治周期”的寿命约为150年（而孔德拉提夫提出的长经济周期为50年）。完全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已持续



了一个半世纪还多，就强国对立所导致的问题的讨论必然使我们涉及长周期领域，至少是资本主义历史的五个世纪（从1500年算起）。

在上述理论范围内提出的四个霸权周期如下。

①从1350年到1648年，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中达到巅峰的威尼斯霸权（遭到哈普斯堡皇室的反对），此次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宣告结束，该条约加强了欧洲的各大中心及其向美洲的扩张。

②从1648年到1815年，在革命战争与帝国战争（1793～1815年）中达到巅峰的荷兰霸权（遭到法国的反对），这两次战争以维也纳大会（1815年）告终，欧洲平衡和英国的制海权得到认可。

③从1815年到1945年，英国霸权（遭到德国反对）在两次世界大战（1914～1945年）中达到巅峰，《雅尔塔协定》结束了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苏两极世界。

④1945年至今，美国霸权。

布劳戴尔（Braudel）对经济视周期的分析导致了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这些周期实际上要短得多，全都在50年左右，分布如下。

- a. 1509～1529年 飞跃发展……1529～1539年 衰退
- b. 1539～1559年 飞跃发展……1559～1575年 衰退
- c. 1575～1595年 飞跃发展……1595～1621年 衰退
- d. 1621～1650年 飞跃发展……1650～1689年 衰退
- e. 1689～1720年 飞跃发展……1720～1747年 衰退
- f. 1747～1762年 飞跃发展……1762～1790年 衰退

布劳戴尔认为，这显然只是一种以生产增长率为基础的划分（应当指出的是，这是在以农业为主的年代）。这种划分会有什么意义呢？我承认我没有被这种划分方法所说服，原因是那

个时代的条件：气候的偶然因素，地方的社会斗争，战争，等等，而这一切都与资本积累机制毫无关系。

然而，由这些划分方法而产生的理论却不无明显的吸引力。在这些理论当中，我举两种做为例子，一种是艾伯特·伯杰森（Albert Bergesen）提出的将霸权周期与非殖民化相结合的理论（1820~1870年；从1945年开始），一种是殖民扩张的竞争理论（1500~1815年；1870~1945年）。

不过，我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历史哲学的重要主张都不能使我信服，即使只涉及现代这个时期也是一样，更不必说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从前了。这些理论对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具体分析没有任何帮助，比如布劳戴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在我看来，他们准确地认识到了主要事实：新生资本主义的重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欧洲大陆的冲突（法国—哈普斯堡皇室），法国和英国的海上冲突，新的中心（普鲁士、俄国）的崛起以及其他中心（奥地利，西班牙……）的衰落。

总体上来讲，世界体系的论点使天平向着其原则选择的方向——即全部（世界经济）对各部分（各国）的规定性——大大地倾斜了。我宁愿——这一点与斯赞特斯（Szentes）的观点相同——强调内部（国家的）/外部（世界体系）矛盾的辩证法。

这种态度立即引起对于霸权问题答案的细微差别的辨别，这些答案纷至沓来却互不类似。首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当然不是世界霸权。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世界并没有缩小到欧洲及其美洲附庸。说威尼斯或荷兰是“霸权”在当时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迅速做出这种论断无疑会产生偏差，从而把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以及东印度和中国的其他商业都市，甚至还有以前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希腊都说成它们各自时代的“霸权”。那么这个词也就失去了确切的含

义。

但即使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我强调过它在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的三个世纪中形成的特点）的范围内，我也弄不明白，怎么能够把威尼斯或荷兰称为“霸权国家”。不错，这两个国家是有一些著名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但它们或多或少都受到限制，应该考虑到从各个方向包围着它们的乡村封建世界以及大君主国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政治平衡。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没有导致荷兰霸权，而是建立了一个废除霸权的欧洲平衡。

我甚至反对十八世纪英国霸权的说法。当时英国战胜其对手法国，占据了海上的有利位置，但它既不能在欧洲大陆的事务中确立其特殊大国的地位，甚至也不能真正统治海外的潜在边缘。它的霸权只是在很久以后——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开放”（从1840年开始）以及印度兵暴动被镇压（1857年）之后——才获得的。在当时，英国的确拥有先进的工业和金融垄断地位，但这并没有使它得到真正的霸权，因为这种所谓的世界霸权受到欧洲均衡的制约，而英国并没有在欧洲均衡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看来，英国的霸权刚刚建立（1850~1860年），从1880年开始，就受到了日渐强大的对手——德国和美国——在工业和军事领域的挑战，尽管伦敦在金融领域的优势地位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

由此我得出结论，在世界资本主义扩张史中，还远未建立起霸权规则，霸权的出现只是例外，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也很脆弱。更确切地说，当时体系的法则是持续的对抗。

那么此后的事态有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说，是否即将发生真正的变化？在某些方面，1945年以后的美国霸权的确呈现出新的特点。美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全球性的军事干预手段（这是通过毁灭和种族灭绝来实现的）。从1945年到1990

年，美国还受到两极之一的苏联的军事制约，现在，它也许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世界的（军事）主宰，而在此之前，除了希特勒曾幻想过之外，还从未有人做到过这一点——问题是，这样的主宰将持续多长时间？

如今，有关霸权的学说很时髦，仿佛人们一直在期待它似的。美国的自由主义者罗伯特·科奥哈恩（Robert Keohane）认为，霸权通过它所强加的“游戏规则”来维持稳定。我对“世界新秩序”的分析与海湾战争的预示不同，海湾战争是在苏联刚刚解体之后紧接着发生的——这可不是巧合。我是在处于极度动荡的混乱的新帝国（激烈的矛盾注定要贯穿始终）当中来分析这一新秩序的：各中心之间的再度对抗，南部边缘的再度扩张，还有明天东部边缘的再度扩张。

### 5. 资本主义之前各种制度下的两极化、周期与霸权

我将在本节中就 1500 年以前的制度提出下列问题，而把重商的资本主义过渡期（1500~1800 年）的特点放到下一节去讨论：

在世界经济思想中，对于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有一些模糊，这些模糊之处可能会由于实际情况的存在而导致现代世界的特点向以前发生偏移。最极端主义者（如 A.G. 弗兰克）甚至认为，有关不同生产方式自身特点的见解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与此前的所谓制度没有任何区别（在一切制度下，资本主义要素和其他要素同样被混为一谈），全球的所有公司一直是在同一个世界体系之内，这种世界体系一直可以追溯到有相关记载的时期。关于这一点，他们的观点与历史上资产阶级哲学的悠久传统不谋而合，那就是想确立体系的永久性，并把试图改变它的努力说成是自负的表现。

也许，从高度抽象的角度出发，我们总是可以在漫长的年

代中确定一些明显或不明显的相似之处，不管怎样，这是人类的历史，在人类学的某些基本方面，它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之后仍然保持了与自身的一致。社会思想所使用的一些共同说法更使这些相似的感觉趋于巩固。就连我自己，在对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的时代进行分析时也使用了“中心”、“边缘”之类的字眼。不过，我认为有必要详细说明这些概念的不同内容，因为它们所依附的社会制度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因此我认为，时代的混乱源于概念的匮乏：把资本主义与商业关系混为一谈，对经济基础—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解释则用的是永远不变的、片面的经济主义用语，如此等等。从根本上讲，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机械的和经济主义的，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而后者却反被指责为机械的和经济主义的！

一些人支持以各种生产方式的独特性为基础的理论，另一些人则提出了以重商主义结构和超越生产方式的社会力量结构的永恒结合为基础的理论，在我看来，他们之间争论的根源在于问题的错误，因为这些用词的定义本身就是错误的。

历史唯物主义，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正确地——我甚至认为是最终地——回答了一类问题，而另外三类问题则依旧悬而未决。我认为，马克思弄清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自此人们再也不能只把它看做私有制、雇佣劳动和商业关系的结合体了。但是，对于其他三类同样重要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给出答案。第一类问题涉及“以前的生产方式”。我曾经批评过把以前的生产方式多样化的诠释办法，相反我主张只有一种方式——从属方式，因为这种诠释的重点是对以前所有方式中（生产）过剩的抽取动力关系的确定，而相比之下，在资本主义中，却正式把过剩与抽取动力分割开来，使之让位于价值规律。第二类问题是关于做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我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没有真正回答过这类问题。第三类问

题是关于在以前的时代中地区之间互相依赖——甚至全球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形式。

“实质论者”认为，商业关系是融于社会结构中的；“形式主义者”则认为，市场是说明同类经济的永恒的逻辑，上面我已经对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发表了一些看法。卡尔·波兰伊（Karl Polanyi）当然不需要对此负责，因为他所说的是古代的商业关系（他并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混同起来），实际上，古代商业关系是受经济以外的力量逻辑支配的。“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人类学家挑起了上述争论，但与波兰伊一样，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并非总是有着深刻的认识。

我认为，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与商业关系的混淆，甚至把前者说成后者，才使人们对现代世界的看法出现了滞后的偏差。

我不准备再回到对以前制度的分析上去，我认为自从革命使这些制度得以建立（公元前 500～前 300 年），它们就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它们是由各大从属地区的意识形态——希腊的、印度的、儒家的——所确定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制度中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这也就是我在这里为什么提到三个地区，而不是那些把近东（已成为阿拉伯）从伊朗中亚（直至土耳其的入侵）区分出去的人所主张的四个地区。因为阅读历史需要回顾从前：在资本主义出现的前夕，恰好有一个伊斯兰地区统一了阿拉伯世界、伊朗和土耳其，从希腊文化开始，这里先后受到了几种浪潮的影响，我认为，伊斯兰教构成了本地区从属意识形态的最后形式。这也是我为什么把欧洲——基督教世界——看做上述同一地区的边缘的原因，同样的从属意识形态（此处是基督教）影响着权力分散的（封建）基础。不过，在亚历山大之前当然没有“近东—中亚”地区，而更多的是从属的各极（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阿夏梅尼德王朝）。

亚历山大开始了地区统一的进程，但他没有真正实现统一；罗马倒退得更多，伊朗萨桑王朝（及其在中亚的延伸）一直没有在它的征服之下。伊斯兰教成了真正统一该地区的第三个浪潮。总的来说，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历史，所看到的起源的从属各极就越多。

这种论点可能在某些方面与大卫·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的论点比较接近，威尔金森提出了“中心文明”的征服与统一事业，这项事业是通过合并来完成的（先是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然后是近东—希腊，再然后是亚历山大帝国的继承者—罗马—欧洲，等等）。除此之外，全球的文化征服只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事业，而这项事业一直没有完成，而且还在不断地引起新的差别（因为资本主义遇到了极化扩张的受害者的抵抗——文化抵抗）。但这种论点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指出了被资本主义断章取义的普遍主义所特有的矛盾，这种矛盾欧洲也同样存在，我曾试图把它放在欧洲中间路线当中进行分析。

主要从属地区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它们被统一在了同一个国家制度之下，相反，正如迈克尔·马恩（Michael Mann）所说的那样，一般来说，通过政治和军事力量、经济交流、意识形态和宗教的传播而形成的各地区并不相互往来。它们的联合——这种联合或多或少是巧合的——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其中有的得以持续和发展，甚至对外开放和征服，而其他的则陷入了致命的死胡同。在这方面，“中心”、“边缘”以及霸权的概念显得非常丰富，当然，前提是不要用经济剥削这样的说法去定义它们——类似于现代对比。关于这一点，如果考虑到交换网络和相互作用网络——它远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广泛——的因素，我们就可以讨论“地区体系”了，不过前提还是不要把交换的作用（它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和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强得多的作用混同起来（正因如此，只有

现代世界体系才能配得上这个定语)。与“世界体系”极端主义者的论断相反，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古代世界各极之间的平衡有着超乎寻常的持久性。

持续并不是静态的同义词，相反，在同一个根本矛盾的推动下，古代的所有制度都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这个矛盾也正是它们的特点。这个矛盾造成了从属权力的主导逻辑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之间的对立，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倾向于商业关系的自主作用。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 (Janet Abu Lughod)、K.N. 乔德胡里 (K.N. Chaudhuri)、约翰·菲茨帕特里克 (John Fitzpatrick)、G. 考代斯 (G. Coedes) 的杰出成就之一，就是在伊斯兰东方诸国、印度和中国找出了这种矛盾的证据，从各方面来看，它与影响欧洲中世纪以及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持续数个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的矛盾都十分相似。“丝绸之路”、法国、德国、意大利、伊斯兰东方诸国、中亚、马六甲海峡、撒哈拉、东非海岸、中国海和日本海的沿海和内陆商业城市的作用处处都那么相似：生产大量产品用于出口（但要么是在制造领域，要么是在生产体系内），这些并不总是“享有盛名”的产品，有时只是些日用品，尽管它们仅供有闲阶级享用。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商业资本主义。马克思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其中的冲突、摆脱从属权力实行自治的愿望以及由此引起的海外扩张并非欧洲历史所独有，在中国，我们也同样可以找到例证，那里的国家经济重心从“封建的”北方向南方“沿海”的转移正要把这个儒教帝国分裂成若干个国家，其中在中国海和太平洋地区建立起的国家中，就有一些在组织机构方面属于典型的重商主义国家，这正是重商主义后来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地区所完成的使命。这一发展在明朝时期的突然中断——就像土耳其-蒙古对近东的入侵一样——可能因而显得像是历史的偶



然事件，但欧洲却因此得到了机会。资本主义得以在这里诞生，并不像以欧洲为中心的思想所认为的那样，它在欧洲的诞生是规则的例外，恰恰相反，这是一切从属制度根本矛盾的自然结果。

但是，承认这一事实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那时已经存在了，也决不意味着由于资本主义恰恰出现在从属世界的这个边缘地区——欧洲，我们就不必对这一事实进行详细的分析，再者，这也决不意味着欧洲的重商主义时期因此就没有带来我们以前或在别处没有见到过的新鲜东西。同样，不能因为从属时代世界网络中的商业城市的密切联系，就说当时的世界体系已像现代资本主义一样实现了一体化。当时，这些城市仍是以制造业和商业为主的城市而非工业城市，它们的周围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农业世界，因而极易受到从属权力的侵害，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就无异于简化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原则之下，重新回到有关不均衡发展的问题、两极化及其相关的霸权问题、以前时代可能出现的周期问题。

卡吉萨·埃克霍姆 (Kajsa Ekholm) 在一个涉及多方面的著名分析中得出了如下结论：(1) 即使在最远古的时代（如美索不达米亚时期），我们也可以区分以控制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国家和控制着更广泛的市场网络的国家；(2) 如果地方政权得不到必要的原材料，那么即使农业生产出现（粮食）过剩，也不能将其转化为铜、纺织品、宫殿、珠宝和武器，因此只好到其政治边界之外去寻找；(3)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交换看做是“名产”的交换，但可以马马虎虎地把它看做基本财产的交流。由此出发，卡吉萨·埃克霍姆对中心的领导阶级和边缘的领导阶级进行了区分，中心的领导阶级分裂成相互冲突的各派（地主、官僚、商人），对各种平民阶级（从属国、奴隶、雇佣劳

动者) 实行剥削; 边缘的领导阶级只是些在出口原材料和管理进口方面起调解作用的杰出“封建”酋长。我丝毫没有批评这些观点的意思, 只不过, 这还不是资本主义以前社会中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此外, 卡吉萨·埃克霍姆承认, 中心-边缘的上述关系非常脆弱, 总是被政治与军事力量变化中的偶然因素所左右。

迈克尔·罗兰兹 (Michael Rowlands) 发表的研究文集意在讨论古代世界里的中心和边缘的概念。这里我注意到菲尔·科尔 (Phil Kohl) 提出的绝对根本性的看法: (1) 最先进的地区 (如中亚的商业城市) 往往不掌握基本技术 (金属加工、饲养马匹), 在中心-边缘的关系中去掉了经济剥削的特点; (2) 这些技术通常过于简单, 不可能像现代技术那样被霸权中心所垄断。我还注意到里弗拉尼 (Liverani) 的观点, 他坚持认为, 意识形态体系的共性连接着同一地区的中心和边缘, 这一点与本人关于意识形态在从属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不谋而合。最后我注意到, 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玛福 (Marfoe)、莫雷 (Moorey) 和拉森 (Larsen) 统治下的全部近东地区, 从属逻辑与社会商业要素的自治企图之间的冲突——确切地说, 是从属模式的根本矛盾——是造成扩张周期与政治危机周期的根源。事实上, 在这本研究文集中, 古代世界只有一个大规模“对外”经济剥削的例证: 在罗马 (由达夫妮·纳什 (Daphné Nash) 签署的条约, 元老院的寡头势力与税吏骑士等级联合起来, 通过征税和垄断商业关系对各省进行掠夺。但是, 与奥斯曼帝国一样, 罗马帝国也是一个掠夺性的国家,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它的鼎盛时期极其短暂, 紧随其后的便是漫长的衰落过程。所以我认为, 中心-边缘关系在这里是颠倒的: 经济上被掠夺的省份却是主流文化的中心 (在罗马和阿拉伯是希腊文化, 在土耳其帝国是波斯文化)。

## 6. 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

在欧洲征服美洲之初，所有先进的从属体系（伊斯兰东方诸国、印度、中国）都受到了同一种根本矛盾的困扰，这个根本矛盾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才能得到解决。此外，至于这一答案为什么会出现在欧洲，我们应当做出具体的解释，就像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中断了它在世界其他地区可能会有有的发展，甚至使这些地区发生了倒退的问题，我们同样应该给出具体的解释一样。

对我来说，这些并不是新问题，因为这是我自1957年以来所思所写的主要内容。不过，我的回答从一开始就触及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学派所接近的这一领域。因此我很高兴简要地回顾一下我的结论。

①与其他地方和以前的时代相比，欧洲的重商主义过渡是独特的。这个独特之处在于，欧洲重商主义时代的专制国家不是此前分散的封建从属权力（正因如此，它是从属国的边缘形式）的延伸，而是对它的否定，而在其他地方和以前的时代（在伊斯兰东方诸国、印度、中国），从属国具有完善的形式（我称之为中心形式）并把它保存了下来。

②从1150年到1300年这个时期，欧洲封建制度经历了一次通过开垦新土地来完成的扩张，凭借的完全是它的力量逻辑。这次扩张在随后的时期（1300~1450年）走了下坡路，因为这时利润下降了；但权力体系（封建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因此，这两个时期的性质与此后的资本主义扩张和危机时期的性质完全不同，后者自身的机制被认为具有更高的层次，而在这个阶段并不存在。正是这个时候，欧洲从属形式的边缘特点出现了灵活性，这与先进的中心从属形式的相对刻板截然不同。专制主义国家的出现通过征服美洲克服了封建制度的危机，建立了

一种重商主义的世界经济并为之服务。

③根据其概念，专制主义国家仍是封建性质，因为从其实质来讲，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是自由的，但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畸形产物。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制造了其他一些同样具有欺骗性的产物。例如，英国相对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来说，其优势似乎得益于它的政治制度（自由主义于十八世纪的启动），或它的意识形态（新教），或技术上的先进。事实上，这种优势源于英国在对美洲的边缘剥削体系中所处的有利地位。

④欧洲大西洋与美洲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新体系的建立并不是此前时代中上述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平等与否——的重复，在那些时代，这种关系是以商业交换的地理延伸为基础的。美洲并没有与欧洲进行“贸易”；对它开发的目的在于使它成为遭受欧洲重商主义经济剥削的边缘。在世界体系派的创始人当中，J.M. 布劳特（J.M. Blaut）曾恰当地强调了这种剥削的极端重要性，它体现在：（i）黄金白银的大量流入：加强了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在欧洲社会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拥有了对付所有竞争对手的决定性优势（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报出最优惠的价格）；（ii）从美洲庄园获得的巨大利润：例如1600年，单是从巴西出口的蔗糖就是英国出口总额的两倍。

⑤正因如此，重商主义世界经济的两个周期（1450～1600年的扩张周期和1600～1750年的调整周期）还具有了自身的性质，这些性质从本质上不同于后来的完全资本主义在各个周期的性质。

⑥所以，在欧洲资本主义诞生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封建边缘从属模式的灵活性；重商主义世界经济的建立以及由此产生的美洲边缘）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我把这种分析称之为“对不平等发展的分析”（从此前的体系边缘出发，产生了

质的飞跃)，并将它与“欧洲奇迹”的文化主义论据进行了对比，“欧洲奇迹”通过西方意识形态中以欧洲为中心的畸形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曾对这种思想提出过批评，因为它求助的是虚构的希腊鼻祖、基督教崇拜和种族主义。

⑦重商主义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特点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断裂上，它是伴随着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这是对形而上学的支配权的摒弃。

### 7. 资本主义的未来

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断然忽视世界资本主义内在的两极化，也使它的观点失去了一切意义。因此，世界体系的一体化实际上在资本扩张的逻辑中制造了一个无法消除的矛盾，因为它使边缘的一切“赶超”的企图（即，使边缘人民的生活达到中心的少数特权阶层的水平）都成了幻想——而边缘的人口至少占了整个人类的四分之三。

自由主义思想没有意义，除非它敢于宣布废除一切限制，也就是说向劳动者的迁移敞开一切边界，正如它呼吁打开交换和资本流通的一切边界一样。那么实际上，它就是用自己的逻辑，提出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社会条件的同一化。这样的开放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仅仅是因为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允许这种前景的出现。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是否可以接受并不是问题。事实就在于此。那么为自由主义思想辩护的人会说，对交换和资本流通实行开放是次佳选择。这没有多少意义，因为在这种受限条件下的开放是导致两极化的原因，而两极化是让人无法接受的。难道可以说，死亡是生命的次佳选择吗！所以，自由主义思想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欺骗。因为真正的次佳选择应当以能否减少两极化为标准来确定。本着这一精神，

我们要考虑，移民潮是否应该得到控制，对交换和资本流通实行开放是否应该同时得到控制。这就是“脱节”之所以不可避免的原因了，它要确定的主要条件之一既要超越资本主义，又要逐步缩小两极化。

有一种论点认为，任何社会都无法逃脱（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永久挑战，“发展”仅仅是在这一制度下的发展，在此之外不可能有“自主的发展”，这种论点符合惟一的真实——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如此——但它一开始就放弃了有可能“改变世界”的思想。

由于必须分清这两个方面，我认为不要混淆资本主义扩张和发展这两个概念，尽管在平常使用时，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淆。资本主义从本质来说就是极化的，而从定义本身来看，发展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可以战胜这种极化。我认为，发展的概念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概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舞台上，发展的思想唱了主角，但它没有对上述两个概念做出明确的区分。对一些国家——万隆时代（1955～1975年）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发展”的目标是留在世界体系内，通过适当的国家政策（国有化、工业化，等等）去“赶超”；对另一些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同样的目标（“赶超”，其意义显然差不多）却被混同为建设“另一种社会”的自相矛盾的目标的一部分。

此外，正如生态学家再度发现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所产生的不可控制的指数增长是自杀性的。因此，资本主义同时做为生产方式和世界体系既是自杀性的，也是罪恶的，它可能意味着在被逼造反的边缘发生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 参考书目

①研究中提到的著作和文章：

—珍妮特·阿布·卢格 (Janet Abu Lughod) 《欧洲霸权之前，公元 1250 ~ 1350 年的世界体系》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 ~ 1350*, Oxf. Univ. Press 1989 年出版。

—乔丹尼·阿里奇 (Giovanni Arrighi) 著《发展的幻想：半边缘的重新概念：在世界经济的半边缘国家中》，Sage, 1985 年出版。

《大混乱》 *Le grand tumulte*, 发现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第 2 章。

《世界收入的不平衡和社会主义的未来》 *World Income Inequalities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宾厄姆顿 Binghamton, 未出版)。

《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三个霸权》 *The Three hegemonies of Historical capitalism*, 七卷回顾丛书第三本，1990 年出版。

—艾伯特·伯杰森 (Elbert Bergesen) 编《现代世界体系研究》 *Studia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学术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世界体系走向哪里?》 *Where is the World system headed?* 社会学展望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J.M. 布劳特著《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崛起》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Capitalism*, 科学与社会出版社 1990 年出版。

—弗尔南德·布劳戴尔 (Fernand Braudel) 著，《十五十七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civilisation maerielle, Economie et capitalisme XV - XVII*, 共三卷，阿尔芒·科林出版社 1979 年出版。

—克里斯托弗·查斯·邓恩和托马斯·D. 霍尔 (Christopher

Chase Dunn, Thomas D Hall) 合编《资本主义之前世界的核心—边缘关系》*Core /Periphery Relations in Precapitalist Worlds*, 西方观点出版社1991年出版, A.G. 弗兰克的稿件;《世界体系与生产方式》*World System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高级研究院, 1991年, 温哥华, 未出版。

—考代斯(G.Coedes)著《印度化国家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Les Etats hindouises d' Indochine et d' Indonesie*, 布罗卡尔出版社1948年巴黎出版。

—K.N. 乔德胡里著《印度洋的贸易与文明》*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从伊斯兰教兴起到1750年的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of Islamto 1750*,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卡吉萨·埃克霍姆(Kajsa Ekholm)著《古代世界体系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剥削》*capitalism Imperialism and Exploitation in ancient World Systems*, 六卷回顾丛书第一本, 1982年出版。

—约翰·菲茨帕特里克(John Fitzpatrick)著《800~1400年东北亚的战争、国家与市场》*Wars States and Markets in North East Asia 800~1400* (高级研究院, 1991年, 温哥华, 未出版)。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1492~1789年的世界积累》*World accunulaton 1492~1789*, 每月回顾出版社1978年出版。

《意识形态的过渡模式: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人类学批评》*Transitional Ideological Modes : Feudalism , Capitalism , socialism ,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萨日出版社1991年出版。

《5000年世界体系史的理论导言》*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5000 years of World System History*, 八卷回顾丛书第二本, 1990年出版。

—乔舒亚·哥德斯泰因(Joshua Goldstein)著《当今时代的长周期、繁荣与战争》*Long Cycles , 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 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 罗伯特·科奥哈恩 (Robert Keohane) 著《霸权稳定理论和 1967~1977 年国际经济制度的变化》*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选自奥雷·霍尔斯蒂的编著;《国际体系的变化》*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西方观点出版社 1980 年出版。

— 威廉·马克·奈尔 (William Mac Neil) 著《西方的崛起》*The West*,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 迈克尔·马恩 (Michael Mann) 著《社会力量的源泉》*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第一卷, 至 1760 年,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

— 卡尔·波兰伊 (Karl Polanyi) 著《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s in Early Empires*, 自由出版社 1957 年格伦科出版。

— 迈克尔·罗兰斯 (Michael Rowlands) 编《古代世界的中心与边缘》*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Ancient World*,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下列人士的稿件: 菲尔·科尔 (中亚), 马尔弗·莫利、拉尔森、扎卡格尼尼、里弗拉尼 (近东), 纳什 (罗马), C. 哈斯克哥罗夫、赫迪杰 (日耳曼)。

— 塔马斯·斯赞特斯 (Tanas Szentes) 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Theories of World Capitalist Economy*, 布达佩斯学院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 伊马利·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著《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 第一、二、三卷, 学术书籍出版社 1974 年、1981 年、1989 年出版。

《西方、资本主义与现代世界体系》*L' occident, le Capitalisme et le systeme monde moderne Sociologie et Societes*, 二十二卷社会科学与社会丛书第一本, 1990 年出版。

《世界体系与体系世界, A.G. 弗兰克的理论偏差》*Systeme mondial contre Systeme monde, le derapage conceptuel de A.G. Frank, Sociologie et Societes*, 二十二卷社会科学与社会

丛书第二本，1990年出版。

《1917~1989年的民族发展概念，挽歌与安魂曲》*The Concep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1917~1989*，（未出版）。

— 大卫·威尔金森（David Wilkinson）著《中心文明》*central Civilization*，《比较文明评论》*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Review*，1987年第17期；《城市、文明与Oikumnes》（高级研究院，1991年，温哥华，未出版）。

— 此外，文章还明确提到或隐含了《评论》（美国宾厄姆顿的弗尔南德·布劳戴尔中心）14年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前8年由萨日出版社出版，后来由格林沃德出版社出版）和中心出版的14册年鉴：巴巴拉·霍肯·卡普兰（Barbara Hockey Kaplan）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社会转变》*Social Change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 economy*。

沃尔特·L·哥德弗兰克（Walter L. Goldfrank）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去和现在》*The World System of Capitalism : Past and Present*；特伦斯·K·霍普金斯和伊马利·沃勒斯坦（Terence K.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合编《世界体系进程》*Processes of the world System*。

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编《世界体系的上升与衰落》*Ascent and Decline the World System*。

艾伯特·伯杰森（Albert Bergesent）编《世界体系的危险期》*Crise in World System*。

查尔斯·伯格奎斯特（Charles Berguist）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劳动力》*Labor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彼得·伊万斯、迪特里奇·卢舍梅耶和伊夫琳·胡伯·斯蒂芬斯（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meyer and Evelyne Huber Stephens）合编《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与市场》*States versus Mrkets in the World System*。

里查德·塔达尼科（Richard Tardanico）编《加勒比海盆地的危险：过去与现在》*Crises in the Caribbean Basin: Past and Present*。

弗兰西斯科·O. 拉米雷 (Francisco O. Ramirez) 编《对十九世纪的再思索：矛盾与运动》*Ret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ntraditions and Movements*。

约翰·史密斯、简·科林斯、特伦斯·K. 霍普金斯和阿克巴·穆罕默德 (Joan Smith, Jane Collins, Terence K. Hopkins and akbar Muhammad) 合编《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世界体系》*Racism Sexism and the world System*。

特里·博斯韦尔 (Terry Boswell) 编《世界体系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the World System*。

罗伯特·K. 斯查弗 (Robert K. Schaeffer) 编《世界体系中的战争》*War in the World System*。

威廉·G. 马丁 (William G. Martin) 编《世界经济中的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a in the World Economy*。

② 作者的观点：

《历史上的阶级、国家与现代危机》*Classe eet Nation dans l'histoire et la crise contemporaine*，午夜出版社 1979 年版，特别是第三章（从属形成 les formations tributaires）和第四章（资本主义过渡 la transition capitaliste）。

《非洲的帝国主义与发展落后》*Imperialisme et sous developpement en Afrique*，经济出版社 1988 年新版，第一部分第二章和第三章（沃勒斯坦对前两卷的介绍）第 63~75 页。

在我们的《论点》中还将看到有关经济周期与长期流动的论述（参见《积累……，不平等发展》第 77 页及以后内容）。

关于经济转让、价值规律等的基本观点，我们还将参照《价值规律与历史唯物主义》*La loi de valeur et le materialisme historique*，（午夜出版社 1977 年出版）和《欧洲中心论》*L' eurocentrisme*，（经济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混乱帝国》*L' Empire du Chaos*，哈麦丹风出版社 1991 年出版，特别是第二章（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 La mondialisation capitaliste）、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危机 La crise du socialisme）和第四章（民主的挑战 Le defi democratique）。

《生产方式：历史和不均衡发展》 *Modes of production : History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 49卷科学与社会丛书第2本, 1985年出版。

《关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崛起》 *A propos of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 54卷科学与社会丛书第1本, 1990年出版。

此外, 为了更好地介绍巴朗、斯韦西和麦格道夫的观点, 请参见《垄断资本主义理论》 *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 , M.R. 出版社1986年纽约出版。

## 第四章 当今全球化带来的问题： 开放的还是控制的自由化？

我之所以把 1945 年（或 1950 年）当做一个转折点，是因为恰恰在那时，全球化开始在战后发展起来，这对 1880 年以来（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从 1800 年）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构成了一个质的断裂。

我对 1945~1990 时期的特性已经详细阐述过，在此就不再重复。我只再提一点，那就是我把这一时期全球所有地区都经历的相对经济快速增长归功于三个社会化的方案，战后的发展正是依靠了它们，这三个方案是：（1）历史上的劳资妥协，在国家的范围内由凯因斯学派的实践发展起来（2）苏维埃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以自我为中心，和世界其他体系没有联系（我在一个叫“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方案中分析过）（3）第三世界现代的、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方案（对亚洲和非洲来说，我称之为“万隆”模式，对拉丁美洲来说，就是 DESARROL-LISMO），把相关国家的工业化放在协商后的世界化的相互依赖中。

对战后的世界体系三支柱来说，除了这些明显的固有特征外，我还要提及他们共同指出的两个特点。首先是此三方案为

了吸收有效的经济任务和目标，都和极端经济自由化划清了界限（在或多或少的全球相互依赖中），确保划出社会框架，以占领市场。由社会霸权确定的这一点，只是对三组国家而言，它否认了市场可以自动调节，重申了继马克思和凯因斯之后伯朗夷的观点，矛头指向乌托邦的市场理论。其次是在此框架中确立起来的有效而合适的政策和策略，被认为首先应向民族、国家和社会负责，即使这些策略是对外开放的。

前面我提到的美国霸权，就是在此框架中并受它限制。美国的经济实力，也就是说它的先进的技术，很快便被它取得的成功本身所侵蚀，即被为在欧洲和日本扩张而建立的“跨国公司”侵蚀。所以逐渐地，和霸权相连的其他三个方面——对世界金融货币体系的控制，军事上的优势，美国文化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扩张——便增加了相对重要性。

全球化的第一个方面在这些矛盾中被消耗殆尽，导致自198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削弱和金融的停滞（又一个转折点）。全球化中决定性的因素和前面提到的国家政策是重叠的，前者最初是由固定汇率制和美元本位制提出的。欧洲建设的成就和日本经济的腾飞不能不对美国的霸权提出质疑，即使像我在别篇文章中写的那样，在美元本位制下没有其他的选择，对付危及的办法从1980年以来就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之后给了矛盾一个答复。

第二点，制度的军事化，没有什么外来的评价，因为这是如此的明显。我仅仅指出军事化的凯因斯主义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美国的经济还是全球的经济。而打败苏维埃是它却不是美国霸权最有效的武器，也就是说那段时期自行结束了。新的霸权在历史上也就没有了对手：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强国的军事和力量能够允许它实行有效的军事干预，更何况是全球范围内破坏能力。

新全球化的第三点涉及文化方面，以新的形式提出了一些很老的问题。世界体系被一些保留自己特色的文化分割；我们还不能谈论这个时代的普救论，即便有重要的宗教和哲学为它们奠定基础。普救说出现在 1500 年，伴随其后是文艺复兴，尽管这是在不完全而且变形的欧洲中心主义下进行的，而且还伴随着欧洲中心论体制的不平等。而此普救说——被招来奠定现代世界的价值观，或像民主自由一样积极，或像经济桎梏一样消极——并不能欧洲内部的多样性。英国霸权由于要屈从于欧洲的平衡，而并没有使英语得到迅速的推广。二战后，尽管有美国的霸权，决定时代特征的强国战略却调和了普救说（可在这一时期的三个社会方案中看到）和政治文化的多样性。资本主义固有的文化矛盾只是在最近才被发现。通常把此归功于使世界变为“地球村”的现代化的媒体。这一事实不能和全球化混为一谈。它只是揭示出了存在很久了的事实：那些古老的文化（包括欧洲中世纪的文明）已经消失，被资本主义文明溶解和界定——经济的桎梏——而并不是被它的起源和存在形式——欧洲。然而普遍的资本主义文明却没能建立起普遍的合法性，因为它伴随而且意味着一个极端化的世界体制。这一点的确定——由于现代媒体——在战后社会方案穷尽其力后加重了极端化的趋势——挑起了“文化问题”和在第三世界对身份寻找的失望。资本主义文化中由美国霸权而产生的占统治地位的表达方式，在欧洲，尤其是在法国，碰到了阻力。

在我推荐的对二战的体制的分析中，无论是上升期还是危机期——总是在波动——无论体制结构，其组成部分的结构，还是可能的霸权，都不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完全或主要由市场上的公司竞争来决定的。这些结构不涉及中间水平；我认为马克思、波拉尼、波代乐和其他人都是中间和偏上水平的产物。竞争是反国家和企业的，因为资本主义和现代国

家体制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变的很坚实，同时得到了发展，而且要求积累的整体结构。从这点来说，正像阿合日写的，如果领土主义坚持要扩大资本主义的统治范围（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就同时要求能够在有限地区内加强积累的行动方式（对贸易、技术革新的控制，军事优先，文化的影响以及金融化都是行动的方式）。这两种积累方式可变化的合并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国家（意大利的城市，荷兰）可以在世界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看来从来没称为霸权），为什么却不能做到，甚至崩溃，而霸权主义是有效连接这两种方式的例外。正如万高波罗写到，公司间的竞争也是国家体系间的竞争，由此公司获得发展（这些体制创造了一些工人培训水平所要求的生产能力和其他东西，没有这些，商品竞争力就不会存在）。

经济和政治是分不开的。日常的事件都很明显的证实着这一点。比如我们很难想象日本称霸，虽然日本的企业效率很高，但它的军事脆弱，缺乏文化底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过剩资本流向美国，服务用美元结算，美元自1985年来开始贬值，操作过程就是使日本的过剩资源转向它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外财政赤字，却还在国际上吸收过剩资本而使第三世界的国家没有办法吸收资金来发展自身的建设。甚至还可以看到海湾的石油富商被迫资助美国的军队！几乎没有什么希望看到这些国家收回流动在国际市场的资金。相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却使自己的金融地位得到了扭转——由债务国变为债券国——使对手的财富归为自己（如英国、法国及其他国家）。

世界格局系统由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构成，就如同由各大公司的商业竞争构成一样。甚至目前前者的趋势越来越强。例如，以前的货币系统（例如英镑制）更多的是由高级的私人金融资本管理，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则把货币的生产置于一个政府



性的机构网络控制之下，其中包括了国际组织（FM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甚至受联邦储备系统（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的监管。事实上这种呈上升趋势的国家化运动是可以受到抑制而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自从1968~1973年，欧洲美元使得金融自由流动重新开始，这种相反的发展趋势便开始出现，并且预示着作为自1980年开始的金融化基础的大规模的重新私有化的开始。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忽略这样的事实：这种相反的发展趋势是与美国政治势力的下降紧密连接的，他们在越南的失败使得第三世界国家敢于向美国的地位发起挑战，欧佩克（OPEC）便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又如何能够忽略这样的事实：美国抵制其他国家挑战重新建立其霸主地位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面对海湾战争的成功，原苏联的解体，欧洲人如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无论是在南斯拉夫，前苏联地区还是在索马里，都显示出他们的无所作为）。正依赖于这一优势，尽管在商业竞争上已处于下降趋势，美国仍可以将美元制强加于世界经济系统。

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并非是单一线性的，而是在两个方向上发生作用，在某些阶段是一个方向而在另一些阶段又是另一个方向，例如，在列宁统治的时代，垄断企业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扩张的工具，就像是那些二战以后的美国跨国企业一样。与此相反，在现阶段，即大约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这些企业逐渐摆脱国家权力的控制并且逐渐限制国家干预的有效性。这是否是新的世界化的一个结构性特点，用以稳定自身？或是一现实危机的一个现实特点？

世界组织系统的制度化并非完全是一种新鲜事物。在这里，我同意“系统-世界”学派的一般观点，即强调其中存在历史资本主义这一根本特点（这里，我所指得是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而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理想的资本主义）。从1648年确立

最初规则的维斯特伐利条约（Westphalie），到1815年的维也纳和会，再到1919年的凡尔赛和会（决定建立国联而使得制度化的发展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最后且尤其是1945年联合国的建立—制度化一直稳步的发展。自从1980年以来，这一制度化的发展由于政治的不一致性和尖锐的危机而受阻，我们是否看到一种试图克服这一不一致性的努力的出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G7）是否有这一功能？事实上，就像我在我的危机处理的分析中所提出的一样，功能的紊乱在于其机构工具无法面对挑战。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增长的节奏，我们会发现战后的发展并非一致：1945到1968年的上升阶段，自1971年起的长期危机。而二者之间的1968（重要的政治事件）到1971（美元自由兑换制的取消）的阶段极其重要。在1980年左右，金融化与里根和萨其尔夫人开创的政治转形同时开始。1985至1990年阶段，就像1975（由第三世界提出“世界新秩序”的计划）至1982年（第三世界的第一次金融危机，由墨西哥爆发）的时期标志着万隆会议计划的结束和发展中国家重新崛起所造成的威胁一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我来说，很难具体区分这些历史事件的确切意义；这些事件发生的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其深刻的意义。他们标志着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的结束（1800~1950）？或只是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们对于未来的判断取决于我们通过对危机及危机处理的分析而对于以上问题的回答。

无论这种受到控制的世界化到底是何物，1945~1990年的阶段已经随着积累时代的结束而过去。

在这里，我想尝试运用一些细节，对这个积累时代存在所依赖的三根支柱的被腐蚀直至最终崩塌的过程进行分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认为把重点放在生产系统的特点分析上是十分有用的——生产的世界化（而不是国际化），和由此造成的

新的矛盾：在生产领域，生产已经世界化，而相关的政治和社会管理体制仍然被各国的边界所阻隔。

“不可抑制的经济世界化——推崇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将最终战胜政治力量的抵制”，人们并不同意这种说法，而是说“适应这种趋势”。与此相反，我认为这种经济的乌托邦的发展注定要失败。

因为无法创造适合的条件来建立一种新的生产积累系统，这种势头强劲的世界化趋势使得国家的经济政策变成可一种纯粹的危机处理政策。我建议大家整体的观察一下这些政策：无边界的自由主义，金融的世界化，浮动汇率制，高利率，美国的对外逆差，南方和东方国家的高负债以及私有化——就像是危机处理的一系列连贯的对策一样，向正处于扩张阶段的生产系统投入大量无回报率资金以避免大量金融资本的贬值。这里涉及大规模金融化的一个过程，即处于扩张的A-A过程代替了问题重重的A-P-A过程。

当代的金融化（Financiarisation），因此就成为了积累危机的信号。而它并不是危机的解决方法。

然而，通过它的一般性特点（造成世界经济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危机），金融化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新的空间。然而在它的烟幕背后有着怎样的未来？将会有何种新的经济积累系统被搬上历史舞台？我们现在处于这样一个领域：所有的假设都是可能的，所有的场景都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未来是不定的，而且对于世界重新构成的认识的成分也是如此的脆弱。世界化的未来将是个巨大未知数。

对于这样一个未知的未来，三条道路可供选择（也正在实施）：

第一条道路——也是很时髦的道路——基于混沌理论（Chaos）。毫无疑问，数学函数的应用使我们发现在测量时的微

小差别可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别。这一发现震动了许多人的直觉性思维，因为他们认为开始时细微的差别无法造成发展中的巨大差别。混沌函数公式揭示了许多我们用其他方法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这些发现是否可以同样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然，这些函数可部分的用于对经济和社会现象的分析。但是我仍然以哲学的角度认为社会总体运动的研究是无法用这样一种概念工具来简单完成的。历史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无法被替代的。

第二条道路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学家，尤其是在系统—世界论的思潮中：他们强调循环，或是强调系统的适应性，或是二者都强调。对这些想法我有所保留，我认为应该更重在研究每次历史转型后新生的事物，而抛弃“循环”的概念。事实上，任何在事后看来重要的转型时刻对未来的预测都不会是完全准确的。难道我们可以寄希望让一个 1350 年的威尼斯商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您是否正在建设着资本主义？我觉得，如果说 1990 年（或 1980 年）标志着一个转型的时期的话——这只是我个人的直觉，这一时期之后世界又会如何构成则很难下定论。然而，人们又应该去尝试，因为人的本能——用必要行动去创造未来——的力量实在难于抗拒。人们会为此而甘冒犯错误的危险。

我因此在此提到一种我认为永远也不会“过时”的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对 1945 到 1990 年阶段的分析中我得到这样的结论：过去的分极化形式（工业国家与非工业的边缘国家的对立，在 1800 到 1950 年间占统治地位）已经由于东方和南方国家的工业化而逐渐过时，无论这一工业化的过程是否平等。由于这一质的变化，在 1800 到 1950 年间确定的世界性价值规则也应随之改变。我认为这些改变应该由确立分极化的五种“垄断”所决定（即，在金融，技术，世界资源控制，传媒，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五方面的垄断）。

然而这并不是说建立在这五个垄断基础之上的分极化的世

界的新的结构就一定能够被有效的建立。前苏联地区的重新组合，东亚地区的腾飞（中国处于首要地位），西方世界的停滞发展，欧洲联盟的重组……，所有相关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我无意在这里重新回顾造成战后危机的所有发展阶段，我也不想回顾对于这些发展的不同的阐释。我只想向读者建议这方面的巨匠及其著作，尤其是 Francois Chesnais（资本主义的世界化，Syros, 1994），Gionanni Arrighi（漫长的二十世纪，Verso, 1994），Michel Beaud（八十年代的世界经济，La decouverte 1984），以及 Kostas Vergopoulos 的文章。我十分同意这些文章中的观点，把它们做为参考是十分有效的。这里我也将加入我个人的著作：危机的帝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处理。而相反的观点——即对金融化的支持——也有其巨大的市场。这里我认为惟一值得作为参考的书籍是 Olivier Pastre 的金融的新支柱（la decouverte, 1992），书中用细致的论证提出了一些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认为还应该拜读一下 Michel Aglietta 的相关文章。

如果让我简单回顾一下战后世界新的系统的主要特点的话，我会谈以下几点。

①无法抹杀的相互依存的加深：不只是在生产领域（超越了商品交换），而且还包括更广泛的其他领域，例如服务业。然而如果说这一趋势正在毁坏历史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的基础，即国家的生产系统的连续性的话，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建立，就像 Vergopoulos 所提到的那样，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生产系统。而且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今天的世界化是脆弱的，易受伤害的，并且如果它的发展在各个层面上（国内的和世界的）无法受到有效和一致的控制的话，各种性质的倒退不仅是有可能性的，而且是十分有可能发生的。世界化远远无法形成一种超级的霸权，反而显示出潜在的冲突，尽管它不断的分解和重组着这个

国家权力与企业利益不断冲突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怀疑资本主义是否有能力面对这一挑战。

②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及其与经济环境新的关系的出现：不同形式的分包业务，设备的长期租卖，我们从没有看到过企业的经营战略会如此的丰富。二次大战之后，随着危机和金融化，企业经营战略选择的转化使得已建立的存在于金融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企业发展混合战略经营，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金融性的。这就是我所称之为一般性金融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③这些由以上提及的质的发展所造成的势头强劲的趋势使得无论是在那些最富裕的国家（“不同发展速度”的社会）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各大洲（例如非洲的“四分之一世界化”），都造成了社会的边缘化。

面对这些新的挑战，政府只做出了加大负面效应的反应。随着战后三种市场框架模式的消逝（我曾在我的《经济发展重新启动的条件》一书中分析过，并将其称之为反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枯竭），新的条件得以建立，使得金融资本得以强加其乌托邦式的逻辑——“对世界的管理就如同对市场的管理一样”。就像人们说的一样，世界化打破了多个世纪的社会斗争而形成的国家社会契约，而又没有给它提供一种世界范围内或地区范围内（例如欧盟）的替代物。

正如我本人（可参阅拙著《危机的对策》）与其他人（如彻斯内 Chesnais）不惜大篇幅所阐述的那样，这一不能成其为办法的办法会导致金融的全球化。经济萧条尤其体现在生产体系扩张了，而大量的剩余资本却找不到赢利的渠道，不断地积累。当前政府最大的，也是独有的担忧就是如何替这些金融资本找到出路，从而避免其大量贬值的制度性灾难。我在前面已经建议你们以此为线索，研究现行的全国范围或世界范围内的所有

政策（包括私有化、放松管制、提高利率、浮动汇率、美国式的一贯性对外赤字、第三世界的负债经济等等）中的一致性，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然而另一方面，金融的全球化也会引发螺旋性的衰退。这一体系因其自身运动的特点给予了某些金融借贷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可能性，却忽略了本国经济或世界经济的成本消耗。这一体系的又一个不合理性在于：金融资本向相对稳定的生产资本收取的租金不断提高，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性在区域范围内和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加剧。

那么，各种减少损失的对策是否有效呢？

这些对策中，最主要的或许就是经济区域化了。不管是大势所趋的欧洲一体化建设，还是像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模式，各种媒体已对其大加颂扬。我建议读者还是参阅一下有关的批评性著作。关于欧洲共同体计划，我认为它已进入了一个动荡不定的阶段，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危及发展，这除了德国统一导致力量失衡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正如右派指出的，欧洲共同体计划仍停留在统一大市场的层次，缺乏社会方面的内容，无法在全欧盟范围内制定出协调某一国劳资双方利益的相应措施。出于这一观点，我建议读者阅读有关世界其他地区在市场作用下一体化模式的著作，如《持续发展的条件》。

未来仍充满不定数。

做为我们对全球化问题的结论，同时也为了找到减少未来的不定数的办法，我想有必要对本文开头提出的中心问题再作一下探讨：价值规律问题和资本主义制度经济规律与其政治运行的关系问题。

对价值规律的研究总是在最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或者说是在决定其全球化形式的这一抽象层次上进行的，然而用布拉代尔（BRAUDEL）的话来说，它却是在市场框架内发挥作用

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正是价值规律决定了经济的统治地位，尽管它没有脱离社会规律、政治规律和文化规律而独立存在，但是它的地位从此不可取代。依我之见，价值规律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还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其他各方面。它不仅打造且根植于布拉代尔所说的社会基础，还延伸到社会的上层建筑。不过某一因素的支配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无足轻重。若是如此，世界就会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样，沦为一个简单的大市场，或者是一些公司和贸易场所的集合了。决定财富分配的价格机制也应该与价值规律有所区别，这不仅是因为市场本身存在缺陷，还由于市场机制与公共权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等的相互作用。这一辩证法是那些顽固的经验主义者所不感兴趣的，他们忽视价值的作用，结果视野为迷雾所蒙蔽，看不到他们原本最了解的当前现实。

阿里齐的著作向我们列举了历史上价值生产与财富分配巨大差距的鲜明例子。他通过制度性的剖析解释了为何德国工业的强盛并非英国金融资本之功，早期的意大利和荷兰城市如何敛聚世界的财富，当今美国如何有力地回击日本的经济攻势等问题。在一个关于鞋业生产全球化的研究中，格雷费里和科泽尼维兹指出各地普通的鞋业厂家的生产所得与名牌厂家（左右着商业流通的那些品牌）所攫取的利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这就是说明生产者所创造的价值量与价格、利润和租金所决定的财富之间差距的最好例子！我在本人所倡导的对“财富集中化趋势”的分析中阐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五大方面（技术、金融、收入分配、文化和军备）的垄断使得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只有在财富的进一步集中化后才可能实现。而这五大方面的垄断正是权力的体现：政治权力、社会权力、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惟独没有市场的权力。



为探讨一下未来的几种可能性，我构建了以下这一概念体系。在我看来它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涵。

可能会有两种的极端化的前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大含有多种模式的趋势。自然也会是两种趋势的结合，这在历史现实中最有可能。

最糟糕的前景恐怕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体制适应了略具变革性的波动后便延续下去，或类似的情形。这一趋势的最大特点是，企业或资本从公共权力的干预中解脱出来，并开始利用它的作用。当今跨国公司往往规避了国家法律的约束，就像中世纪商人们在集市的买卖总能逃避当地的封建法规一样。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秩序不能持久，因为它只会带来混乱（正如我的书名所指出的），而且它的效果会是灾难性的，引发的社会反应将会激化得不可调和，最终导致这一制度的终结。

至于论战的基调，我想引用一下阿里齐的原话：如果维持这一秩序会导致几个大陆的边缘化，使人类的绝大多数陷入贫困的境地，那么到底是哪个更有价值呢？是资本主义的规律，还是人民的幸福？

这一长期混乱的情形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少数核心国（北美、欧洲和日本）形成垄断，大多数国家被隔离于繁荣之外，时而对少数国家“大开杀戒”来维持统治秩序，保护富有的利益。但即便是在这一极端的情形下，那些核心国就不会相互分裂斗争吗？某种霸权—或者说是美国霸权，因为我们无法想象除此以外的其他霸权—的长期存在，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想避免核心国内的矛盾，或者是欧洲国家间再起争端的话。因为“人人为自己”的规则不会自己形成协调与合作的局面，只会造成相反的情形。而维护美国的霸权正是里根的梦想。但转眼之间这一切似乎已成往事：正如阿里齐所写的，“一个美妙的时代，可惜太短了。”

这种趋势下一个可能的模式是：西方在一段时期内保持虚假的繁荣，而东亚在这种离奇的全球化—两极化过程之外实现经济的稳步增长。这里所说的东亚或许包括日本，它将会重走老路，更多地依赖其技术优势，并且重视与中国等几个地区工业国的合作。日本也有可能留在西方国家的阵营，因为中国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不愿意加入日本的经济体系中。至于美国以亚太区域性组织的名义将其他国家诸如日本与韩国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计划，依我之见并未超出它一贯的想法，只会起到离间中国与日本关系的作用。不管怎样，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和印度）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究竟会通向何方呢？我们发现如果亚洲留在全球化体系中，价值规律的作用、五大方面的垄断、新的财富集中化等种种现象都将形成。又或者它将隔离于，或者相对性地隔离于这些现象之外。我的意思是说它独立于全球化的进程之外，这一点不无可能。

种种可能性的分析中总是有许多个体的利益被忽略了，这一点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构想的持久性。非洲人、阿拉伯人、穆斯林、还有拉美人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以某种方式有力地显示他们的存在。欧洲人与北美人在历史上也从来不是逆来顺受的，他们不缺乏创新意识与勇敢的精神，在我看来，他们不会满足于目前这种“新中世纪”的状况，特别是大多数的平民阶层正被逐渐地剥夺幸福生活的可能。但若是没有某个左派集团来将他们集结在某一可信且可行的阶段性纲领之下，这种不满与抗争很容易向右转，走向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极端。这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了。

还有一个政治问题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制定阶段性的战略来迎接面临的挑战呢？全球化意味着，如果问题是世界性的，那么它的解决办法也必然是世界性的。但承认这一现实是一回事，宣扬全球化进程的合理性，要求对其无条件的服从，并等

待“戈多”的到来（是世界革命，还是将来某种奇迹般的飞跃就不得而知了）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的观点很简单：全球化的进程是逐步向前的，但根据的是社会政治斗争所决定的多种模式。它既有可能走上正常的轨道，使出现的各种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也有可能走进灾难性的死胡同。政治性战略的特点就是减少各种不确定的可能性，尽管不会太多，来增加将来决策的自由余地。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在确定下一步的战略部署时，是否可以接受现行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甚至是金融全球化的观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建立有活力的乌托邦社会与世界社会主义的远大目标。G. 阿里齐和 O. 帕斯特雷似乎以不同的言辞对此提出了各自的构想。前者强调了“自由化”（指国家作用受到削弱的情况）、世界化甚至金融全球化的回返性。尽管金融全球化依某些人看会导致制度性的危机（阶段性的积累往往耗尽了发展的潜力），但从另一些观点看，这是向另一种财富积累方式过度的必经阶段。后者则着重强调了某种进步性的社会重组的可能性。这种重组不仅可以适应金融全球化之后成型的新体制，甚至还可以推动金融全球化朝着形成新社会契约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一表面上自由主义，实质上社会主义（就其社会进步性的意义来说）的论点值得深思。

帕斯特雷为法国设想了一种新的社会契约，通过它可以规范那些投资机构影响重大的金融活动（那些“家伙”已成为左右国民储蓄、社会保险和养老金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和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国有经济、合资经济的经营活动。这一新的社会契约形式将会是继福特主义调节模式（劳方工会、资方工会与公共权力）之后又一重大的变革。这种新型的社会契约还将给予教育研究特殊的地位，从而保证实现国民经济竞争性的不断提高。

我本人对这一阶段性的设想并不抱任何反对的态度，我不

妨把它称为“新社会主义民主”，它与别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样，把自身做为奋斗的目标，或者做为通向社会主义远大理想的一个阶段。但我想还是有必要在这里分析一下它的实现所需的条件，要知道这些条件还远远没有具备。就拿法国来说——因为这个国家是我们讨论的对象——要实现这一构想就需要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某些变革，而这些变革在当前的一片混乱中实在还看不出任何的端倪。还有，当前我们正寻求加入欧洲一体化建设，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欧洲伙伴们也要经历这一构想所需的那些变革才行。换句话说这种新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欧洲性的，否则将难以实现。这就是我所指的欧洲建设中应有的社会主义内容，而这一点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所不愿意看到的。依我看来，这一矛盾如处理不当将有可能使欧洲建设陷入困境并最终使得寄予它的希望化为泡影。此外，PASTRE的这一构想原则上并不排斥全球化的趋势，甚至还要求加强欧洲与世界体系中其他伙伴的联系（如美国、日本、亚非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等）。这些国家将会接受这一构想中的社会进步性内容，不会白白错过发展的大好机会。这就是我所指的“建设一个多极化世界”，它意味着要对世界市场与金融资本进行重组，使其为生产体系的发展作更多的投资。然而，这一重组是与当前脱缰的金融全球化的一些基本原则相冲突的。依我之见，不管承认与否，金融全球化与资本积累的危机不无联系，甚至可以说是由它所造成的。它本身不可能为危机找到出路，只会加深现有的矛盾。同样地，这一重组意味着要向外围地区的新兴工业国家转让一部分市场份额。然而，当前的原则是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保护现有的垄断，反对改变现状，这就难免会有矛盾产生。最后，这一革新还意味着对货币体系进行重组，这样一来肯定要与当前金融全球化运行的某些原则（浮动汇率、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自由等）发生冲突。帕斯特雷的构想成功所需的，就是这样一系

列的革新。

由于这些革新的实现在当前的世界上一定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所以我想我们目前应该突出强调“金融全球化—危机的治理模式”这一方面，至于如何在社会范围内，地区范围内乃至世界范围内实现朝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转化的问题，则可以从长计议。

这么说来，一种牺牲了神圣的私有财产权的社会制度，一种反对财富集中的全球化才是最人道的选择了。然而，这一构想的实现不会是一日之功，而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以至于有的人简单地把它称为乌托邦。我不同意这一种观点。我相信我们可以制定出若干政治指导路线做为“长征”的第一阶段。我把这一阶段叫做“建设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通过它可以建立更加进步的社会契约来规范市场活动。这是一种“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与系列的传统世界主义理论完全不同。我建议读者做相关的阅读。最终决定历史的，不总是财富积累规律。历史的进程总是在这一规律与它逻辑的反面的斗争中实现的。

## 参考书目

本文由诸多结论压缩而成，读者可从下列书目中找到更详尽的材料：

- 《混沌的王国》l' Empire du chaos; Harmattan, 1992 年。
- 《智力之旅》Itineraire intellectuel; Harmattan, 1993 年。
- 《面对政体挑战的民族》L' ehinie a l' assaut des nations, Harmattan, 1993。
- 《国际化与集合化》Mondialisation et accumulation; Harmattan, 1993。
- 《危机的资本经营》la geston caitaliste de la crise; Harmattan, 1995 年。

## 第五章 世界一体化和 金融化

### 一、关于挑战定义的标准

显然，对于当代社会所面临挑战的主要特征，存在着相当广泛的观点认同，至少围绕在以下四点。

①经济体系自 1970 年初，进入到一个相对萧条的漫长时期（与战后快速增长时期相比而言），我们把本时代称为孔德尔梯也浮周期或别的叫法。我们认同于这样一个主要事实，过去 25 年中，处在生产体系扩张阶段的增长率及投资率要大大低于在此之前 20 年中的各项指标。整个体系处于一种顽固萧条状态的事实，打破了人们所认为的，扩张在前一个阶段得以维持的幻想：西部充分就业及不确定经济增长，南部开发及东部由社会主义促进的经济赶超。

②当代经济体系比之 30 年前已大大世界一体化。依照这样一种观点，那些主要经济角色 - 大型跨国公司 - 有能力发展那些适合她们，并能充分将她们从国家政治监控中释放出来的战

略决策。而这种监控的虚弱性已众所周知，对此，有人遗憾，有人庆幸。

③对于财政方面的忧虑已逐渐排到有关经济增长及生产体系扩张的忧虑之前。从经济及社会发展观点看，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资本的“金融化”为有负面影响的高利贷及食利者行为提供了方便。因而，资本金融化要对持久性萧条及严峻的失业状况负很大责任。因为，它把经济政策封闭在一个通货紧缩的漩涡中。对于其他人而言，这种资产“金融化”是必要的，积极的，因为，它决定了生产体系的重新调整，并为新的扩张阶段做好了准备。

④最后，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来看，社会制度的交替最好是社会关系上的交替，至少也是经济关系上的概念。它是建立在世界体系出口基础上（“断口”）的。当这些基本概念被重新提出来加以议论时，有人为此惋惜，并将失败归因于其在实施方面的错误上（尽管构成这种社会交替的基本原则始终保持着合理性），甚至有人提出一个更为激进的批评，认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其策略已不再适应当今时代的挑战；有人为此庆幸，因为失败加强了这样一种理念：任何脱离资本主义的想法都只是空想。

当前危机的头三个主要特征都已不是新的事物。我们已经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长时期的萧条阶段；金融化加强时期；以及世界一体化。世界一体化被人们理解为，起源国边界以外，有效的经济生活因素脱离了国家的法制束缚；没有什么新的事物。在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今天，这些特点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显示出新的面目。当然，与前三条不同，第四条特征显然是新的。

如果说，对我所描绘出的本时代特点，及已简单叙述过的重大事实，我们能够达成共识；那么，从我们开始分析这些现

象，及他们所展示出（或围绕）的前景起，就一定会存在一些根本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将左派（社会改良主义学派；凯恩斯主义和其他一切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右派（根本理论上赞同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分离出来，她们自身也经受住了左派或右派理论的考验。像通常情况一样，社会思想，被从质上改变社会结构并由此改变其基础表现的社会革命，置于挑战地位；当它重新进行自我规范，并重新考虑自身，在经济规律（具有客观约束性本质的）和社会整体运动间，建立新模式时，受到了限制。

由于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一般思想是经济关系方面的，因而，有这样一种认识，那就是仍然存在着“不可逆转”的经济规律，（当今时尚是使用过时的语言），这些规律支配、决定着社会演变和“发展”以及生产体系的运作；而且，它们还加强了世界范围内国家次体系的相互依存性。这一思想在下文中将进一步得到论证：这些经济事实 - 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它们都被做为几股力量的合力，强加到历史当中 - 因为历史要求遵从经济规律。我们说，国家政策应该 - 或本应该 - 与私人企业的决策相一致，服从于打破了国际界限的企业化逻辑。这就是国际一体化被其预言者所赋予的含义。乐观者认为，最佳选择是政治和社会与 - 或最终与 - 这些规律相一致；而悲观者认为，在强化经济规律客观性时，它们与政治和社会主观性（包括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之间的冲突，会使整个社会陷入绝境，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自我摧毁。

另一种乐观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学家们经常会控制住右派思想。一切社会灾难，要么是拒绝配合的产物（“政策有误”），要么是，以被赶超而告终的暂时性困难。（细流哲学用英文翻译，是对这种被迫乐观主义的最完美的表达方法，他避免了对本体系的批评分析）。

但是经济规律也同样表现出左派性。比如，马克思主义经



济著作的存在。我认为这一点表明，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同别人一起将经济规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同客观现实联系在一起：与其政治—意识形态框架相比，经济规律自治化更适用于从前的体系。左派经济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属于改良主义，这不仅表现在，它为了资本总利润，要求经济服从于资本主义管理调整；还表现在，经济必要手段的限制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它通过改变社会关系，尤其是对财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允许生产力为劳动者阶层服务。在今天，越来越趋向于，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共同分享这一观点“世界一体化不可逆转”。人们关于欧洲建设及无国界自由主义的争论，很明显又回到了这些基本问题上。

这一社会思想的快速飞跃同样使人们明白，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为什么答案（怎么做？）是不一样的：服从改革调整，还是拒绝，革命式的（沿历史方向）或是被动式的（主张历史在背后起作用）。

本书的主旨并非大规模地探讨社会思想，在此就不作过多的讨论了。对我而言，我赞同左派观点，我既不认为，资本主义将成为历史最后一个阶段；也不认为，它可以超越其矛盾特殊性（我将尽力明确其本质）。因而，我建议读者读一些在此领域内享有权威的著作。我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作品来做到这点的一但同时我也在读其他人的书，因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并非惟一正确，我甚至不会在此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我会严肃地理解这些思想—它们对我具有决定意义—并非完全记载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有的属于马克思主义提问法以外的观点。在此我特别想提到，卡尔保兰尼和布兰德尔与世界经济体系潮流间的关系。

## 二、马克思，保兰尼，布兰德尔及 资本主义本质的问题

我将开始讨论一个在上文已提到过的问题，并重新分析世界经济领域内的关系。在这里我会简而言之，因为关于这一主题我在第三章中将有详细阐述。所以我只提出一些对我们下一步讨论非常必要的观点。

①资本主义是与以往模式相反的一种体系，它的特殊性明确存在于，经济所要求的统治地位。价值规律不仅决定经济生活，而且决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一种商业束缚）。

以我之见，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上质的转变，导致在资本主义之前，不可能向后设想对现代历史更有效的规律。而且所存在的历史断代，阻碍了这种思想的普及。上层建筑曾经决定过物质基础，从此以后将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②资本主义只有在19世纪拥有了机器工业以后，才具备了完整的形式，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价值规律得以实施的必要基础。因此，这场工业革命前的三个世纪构成了一个过渡时期，人们称之为重商主义阶段。

③价值规律是其抽象概念上的最高等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包括三方面的一个封闭市场：生产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的抽象概念（建立在片面封闭市场基础上，由前面两点转化而来）。我主要使用我所提出的方法论，来分辨价值规律概念，及世界一体化价值规律之间的区别。只有第二种概念解释出，为什么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是不平衡的。而我们所议论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平衡性，是从1800年开始的。那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一种完美形式；从那时起，她具有了一系列的历史形态，开始是工业化中心与非

工业化地区间的不平衡，接下去是建立在中心“五大垄断”基础上的不平衡对比形式（正在形成过程中）。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不平衡，既非大都会与殖民地之间对比的同义语，更非列宁主义所定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由中心垄断政体决定）

④与资本主义历史相关的问题，重商主义转变的繁荣时期（1500~1800年）。以我之见，从1800年起开始的扩张阶段应该被加以讨论。这种方法论式的评论不仅讨论了“长周期”，以及同时可能出现的霸权及竞争的交替，还讨论了本体系逐步扩张所涉及的，国家及地区间不平等的形势和内容。（比我为国际价值规律的不平等采用的措辞更为广泛）为此，我建议加深对积累阶段系统特征的认识，同时将重点放在每一阶段的特殊性上，避免过快的普及化及重复化。这种方法要求人们将讨论建立在事实上，包括由布兰德尔（见后面）提出的，在不同层次间互动的分析，即建立经济和政治的矛盾统一体（或者说，在拒绝资本主义或其他经济观点时，假设经济根据其自身规律独自运作，并要求政治与之相适应，或者“反映”它）。世界一体化价值规律概念已经区别于一般性价值规律，它表现出对资本主义全面的理解，世界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国内市场的完整性相反）包含政治（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大都市还是殖民地；都由它们与社会的必然联系所决定）与经济两方面。做为每一段积累时期，人们应该自我树立目标，以确定其在地方范围内（国家）或全球领域内（世界）的调整方式。先是对扩张进行分析，然后对连续积累阶段完整分析，对调整方式和积累阶段新条件进行分析，都将有利于我们建立起完整的竞争机制（经济竞争，政治霸权），及可能出现的霸权主义（我不敢确定这种说法，因为它的含义太广泛了）；并理解，全球资本主义为什么且如何不停地进行着历史的建立，摧毁和再建立。对我而言，它所做的一切就是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不是在历史前对历史

规律的探索。显而易见，方法论排斥过快的普及化，这表现在它对“周期”连续交替（包括“霸权周期”）的规律性的讨论，人们只能通过夸大现实革命的原动力来达到这点。

⑤幸运的是，在“世界体系”共同名义下汇集起来的思想潮流，并没有提出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理论，因为人们会嘲笑或完全抛弃这种理论。一方面，它们把重点放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实施的相互依存原则上，（相对于将世界体系看做一个，各个国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帮助的，组成体的主要观点），另一方面，把重点放在资本主义的总特征上（相对于经济占主导，政治处于从属地位的主要思想）。接受这一方法论的两个基础并不表现为，在任何方式下都会赞同这一周期循环理论。我对此所做的批评（更确切些应该是这些批评），经常触及世界经济思潮的命脉，在上文中已被讨论过，这里就不再重提。

布兰德尔对我们所分析的“历史资本主义”扩张方法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正如我们知道的，布兰德尔将社会现实定义为三个层面：（1）最基层是将“物质生活”编入日常生活的基础建设整体，尤其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对工作和生活安排；（2）中间层为“市场”，也就是结构整体，包括被社会分工所要求的商品交换；（3）最高层是政权，即“反市场”，全球及地方政治领域内的强大掠夺者们在此活动着。

形式的简单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布兰德尔拒绝承认一个普遍的思想规律“资本主义=市场”；对布兰德尔来说，“市场经济”（分工及交换）一定出现在资本主义之前，因为只有当政权明确建立起来时，资本主义才开始出现，政权的历史造就了资本主义历史。

概念的工具是什么？运用这些概念工具，我们能够明确定义出每一阶段结构的本质，及他们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的辩证方法。严格的分工已经明确了三个层面每一层的特殊性。

这里就不再作描述。人们认为，社会学家负责基础层面的研究，经济学家负责探讨中间层面问题，而政治学家及历史学家负责找寻最高层面的规律。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在布兰德尔之前，所有的社会大思想家都提出要打破这种人工划分。

在资本主义之前，世界上处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建立在形而上学理论基础上的意识形态，通常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见“欧洲中心主义”）他们同时具有解释历史及自然的作用（是否要通过创造性的空想），及在社会各个层面建立必要行为准则的要求，从家庭管理到对政权及经济交换的要求。当代宗教主义者除了力图建立起这一规范外，没有做过别的事情。

我认为这一页也最终被资本主义的胜利所翻过，用经济主义规律代替形而上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三种层面的分离，经济自治和经济统制。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我找到了将1500年看做此体系质的飞跃的原因。启蒙思想表达了他们对世界新的观点，并建立了此后自治“经济科学”之基础。但是启蒙思想在经济领域内并没有被表现出来，它违背了经济现状，并提出了建立在政权基础上的科学。

这种启蒙思想不会被所有的社会思潮所接受，这些思潮甚至，直至今天都在为主导思想提供基础。对商品约束理论（拒绝将资本主义看做历史终结）加以研究（及揭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议建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字表达出它对违背经济，及上文提到的三种层面的忧虑。

这种观察使我们将“资本论”的每一本著作对位于这种理论建设。第一本书主要谈论其基础—商品约束—但是它并未将此建立在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之外。相反，它将此建立在资本剥削劳动关系的核心（资本对自然的破坏，这是马克思的读者们所不了解的一面，且至今大部分人对此一无所知）。第二本书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本体系经济关系的分析，即提高到更高的

抽象水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状况（价值规律）。生产劳动资本的组成物质因素，及允许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消费因素的两个部门，其生产平衡的原动力构成了资本论二的主要内容。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停顿在此。在这种经济以外，我们将建立在启蒙思想上的古典经济称为“纯粹经济”——与另一种新古典经济的“纯粹经济”相对而言，之后——在马克思对它的理论做出判断之前——马克思提出将分析提到更高的水平，正如布兰德尔是通过对政权与世界体系关系的分析来定义它的。马克思的著作没有完成，正如一切人类作品，都是不完整的。我把对这些论题的观察归纳为四点。

①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于发现资本主义剥削根源的特殊忧虑，导致马克思将交换体系，（产品，也包括销售和劳动力）与通过自给自足满足人们需要的体系相分离。很明显，交换体系存在于家庭组织体系之外。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并非极度不感兴趣社会建设的基础层面，也许因为我们平时太容易谈论起它。如果没有读过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就最好不要读资本论第一卷，在这些著作中很直接地探讨了家庭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无论我们通过恩格斯能够从时代提炼出怎样的结论（在“家庭起源”中，私人财产与国家财产的起源相连），这种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得到了更为重要的成果。因此我要说，不仅我们正在讨论的基础层面的历史物质基础被建立；我还要说，对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只给出了仍然片面和值得讨论的结果。因此，在已经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潜藏限度以前，仍然需要在这—领域大力发展。

②马克思并没有忽视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然而他并未对此进行系统化的阐述，而只是“匆匆带过”，在资本论（在资本扩张的基础上，对其破坏的暗示和参照都是不可缺少的）和马克

思主义者的著作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如同受到生态学挑战一样，直至今天，这种通过思潮而得到发展的分析关系仍然显得微不足道。但也应该认识到，事实上，历史马克思主义大大削弱了这种特殊问题论。

③以我之见，布兰德尔在整体建设中所定义的有关政权与高级层面合并的问题，构成了迄今为止最鲜为人知的领域。对此，我已经做过评述（见“欧洲中心主义”）。然而，有关这个主题的重要理论仍然存在，这是不容忽视的，它们即非马克思及恩格斯的理论（写在他们的政治著作中），也非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尤其在列宁，布咯若尼及其他人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更非布兰德尔的理论（关于重商主义转变学说）。无论如何，以我之见，直至今日，它的一些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这是一些我称之为与政权特有规律相关的问题。甚至当涉及资本主义近现代史（重商主义转变为完全资本主义时），相对于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它仍是一个极少被人议论的领域。当然，对于这一主题还存在着一些大的观点。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常出自于相关政治要求和霸权性的假设（经济关系所必要的对应物），对此，我将不作讨论。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其相反，要求政治反映经济状况。在垄断阶段和帝国主义阶段被金融资产控制的政权及经济状况的论题也处于这一范围之内。当然，我们还观察了不同国家特殊性的不同存在方式—比如说，黑福鼎分析的德国方式，和启发了和斌森的英国方式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并没有阻碍过渡的发展（列宁对此不会陌生）。另外一些观点涉及到更加特殊的政权关系—“大金融家集团”—重商主义时代的产物。布兰德尔的著作以及那些使他受到启发的书籍（尤其是日奥瓦尼阿热尼的最后一本著作，“漫长的二十世纪”）同样在这一领域提供了具有理论重要性的提议。因为，这对我们在此讨论的世

界体系本质的主题至关重要，所以我要重新回到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权及资本主义“领土”规模关系的争论上来。但是，对于那些被提出的过于普遍化的提议，我保持不信任态度—例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调，只是对过去简单的加总；或者是启发布兰德尔和阿热尼的，资本主义霸权非领土主义深入特性的理论—因为我认为所列举的政治及经济方面的事实仍然不太准确。

④马克思及其后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最大的弱点在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的关系。现在，这项弱点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主题，并组成了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最强的现实挑战。所以，这就成为最主要的政治问题。关于这一主题我认为马克思本人，尤其是历史马克思主义者们，将世界一体化想象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扩张的同义词。这个观点只是部分地被列宁所修正，它的论调—革命由农村开始，然后迅速包围中心—被证明是错误的。城市与农村的反差从来没有被看做是挑战所赋予的理论基础，因此，这种反差只能是混乱的—或是处于变化中的—比如大都市和殖民地的反差。这一历史资本主义的弱点并不会导致悲惨的结果，最差也不会像俄国革命所面临的僵局。无论如何，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左派政治潮流—社会民主党，及普遍资本主义思想—要为这一重大失误共同负责。因此，我得到一个结论，历史资本主义，及左派党面对世界一体化的挑战，大部分装备很差，这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正如我们所见，世界一体化是现代社会所面临挑战的中心。

一些延长了马克思主义分析工具的重要的贡献，可用来纠正历史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表现出的不足。

在这些贡献中，排名第一者是卡尔保兰尼（“重大改革”1944），她是那些为数较少的，严肃考虑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的自



愿者中的一员。保兰尼的理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建立在抛弃市场可成为自动调节者的基础上，然而在资本主义辉煌的今天，她受到了攻击。保兰尼指出，生产力，自然以及货币的“商品化”，只能产生混沌和难以忍受的社会关系。正因为这个原因，它未能使人接受。我在此不再谈论，因为我已在“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管理”一书中提到这点。

被保兰尼所思考的三个论题，也出现在马克思的劳动约束论中，这里我就不再回顾。关于本质问题，保兰尼阐述了马克思著作中未系统讨论过的理论（当然，在历史马克思主义著作里就更少提及），关于货币问题，资本论三中已定立了有关信贷，危机，国际贸易的长期发展目标；通过这些分析，马克思提出了货币与政权关系的问题论和对货币偶像崇拜主义的思考。

对最后一个问题，马克思研究得非常深入。他指出货币循环是如何自我“解放”的，从过程表面来看是由生产决定，与生产循环  $A-P-A'$  相反，在  $A-P-A'$  循环中，货币资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停滞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货币——高利贷者——食利者  $A-A'$  循环中，对最有价值的生产性工作的剥削，通过这一循环表现了货币偶像崇拜主义的最高形式，我认为我们将有机会在这点上多探讨一下，主要用来分析当代危机的实质及其管理方法。

关于货币与政权的关系，马克思同样提供了一套概念理论，以用来弄清货币—购买力代表—是怎样变成暂时权力代表的，货币不再被阐述为一种任意的商品。正如控制我们当今时代的理论，普遍经济主义学说提到的那样（上述的货币主义流派，自由主义等这样的学派都包括在内）。因而我试图提出一个货币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它将把重点放在国家政权对货币或信贷需要的管理上，政权在这里扮演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角色，它反对市场冲突，并在这一领域内阐述了，20世纪竞争调节过程中管

理的功能、20世纪垄断调节、封底斯特主义及其世界范围内巨大的调整（见“知识路线”）。

保兰尼提供给我们20世纪末的自由主义空想，以及它们所引发的最终灾难—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它将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中具有破坏性机制的国有政策同世界大氛围联系在一起，她还为我们提供出可用来理解战后增长的奇迹，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性妥协，资本与生产强加于货币的限制，在国有阶层由国家政权及在国际阶层通过布日特伍德机构进行的货币调整等一系列理论的方法，从我这方面，我已经完成了一部战后的著作，在这一范围包括了世界体系的三个等级（社会民主化历史妥协，苏维埃主义，布德恩的资本国有计划）。这个读本中有许多理论归功于保兰尼提出的方法，然而这个国有级别以及世界体系级别的战后模式的成功同样也包含许多限制，比如说它在这一范畴中没有做任何可以用来限制自然商品化危害的措施，尽管保兰尼已对此敲过警钟。因此，这决非偶然，如果说问题像迟来的炸弹一样会在时代尾声爆发，那么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战后的这段扩张阶段今天已经瓦解，同时崩溃的还有建立于其上的三个层面。因而自由空想主义力量的回归并非幻想，但是仅靠它自身无法定义资本主义扩张的新阶段，而只是我们所谈到的对危机的管理问题。不幸的是，正如我所说的，左派和历史马克思主义还未做好准备就重新提出了挑战。而且战后，教条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已经剥夺了我们真正理解机械主义悖论和正在议论的三种模式（民主社会主义、苏维埃主义、民族主义第三世界国家）限制的权力；同时还在这一领域中树立起了一种过于简单的，并被操纵来进行严肃分析的意识形态学说。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布兰德尔身上，我们可以根据所称作的马克思主义来估量其贡献。可以非常肯定的是，布兰德尔的伟

大著作是令人满意的，我知道很少的著作能够像“物质生活”方面的著作那样令人快乐，大都是对社会建设基础层面的描述，无论如何，布兰德尔的概括不能确定物质生活体系，它要求社会组织的更高级别；可能因为担心无法向马克思主义让步，布兰德尔忽视了再生产及约束关系的概念。不考虑布兰德尔本人情况，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著作带有重商主义时代，即完整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固定下来以前的时代印记。

对中等层面特点的分析—交换的分析—以我之见，同样归因于对重商主义改革的理解—对此，布兰德尔贡献出了他的作品—比对工业资本主义分析得多，同交换体系分析得同样多。我坚持认为这个分析对于历史的发展是不够的，这不仅仅因为交换领域自1800年起，一直到工业革命时期都具有了一种鲜为人知的影响（以前的交易只涉及将生产及生产力区分开）。这也是因为，从此以后，它们将遵从工业资本的统治，并对商品资本具有从属关系。因此，如果布兰德尔忽视价值规律的话，这决非偶然。一个最不具有说服力的证明是，在她之后许多人都坚持这一理论（阿日尼本人在他最后一本著作中既无视普遍价值规律，又无视世界价值规律）。问题不在这里，据我所知，如果工业革命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那样迅速，如果它曾经被“内部因素”影响，那么重商主义阶段城市与农村的反差将是变化的动力。（这些争论有它自身的价值及相应的益处）我可以从中得到两个主要结果：第一个是与完整资本主义（1800年以后）相适应的城市与农村反差体系，从本质上说，它与重商主义的改革体系不同；第二点在于，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以一种“世界像一个市场”的传统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待它，将1800年以后的中间层面看成“交换体系”，都会使分析变得简单。

布兰德尔对资本主义来源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重点放在了现实第三个层面：“反市场”（政权）。没有明智的人会忽

略政权和政治的存在性，但是“世界像一个市场”的观点表明，与现实历史所告知我们的存在概念，截然不同的政治概念。我引用了玛若思的理论，最纯粹的经济学家，对将世界建成一个市场的观点（见“知识路线”），所进行的严肃考虑。玛若思也指出市场规律只能在私人产业被废止时，国家在此基础上，才可系统拍卖可使用资本，像能得到最佳结果的自动调节力量一样被强制于其上的。“无资产者的资本主义”的前景组成了经济约束的最高形式，曾在苏维埃历史过程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最不宜胜任的策略指南。世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景中，也进入各种规模的世界市场，同时还废除了国家政权为他们建立的，用来统治完整市场的世界政权。当然，这种观点以及这个计划不仅是一种完美的空想主义，而且完全忽视现实及约束理论。马克思，布兰德尔都没有以这种方式构思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回来讨论布兰德尔，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政权成立的清晰解释，它不是市场偶然的产物。布兰德尔认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在集中政权下爆发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是意大利，17世纪的联合省，1688年在英国建成了一系列成功的模式，正是这一变革标明了资本主义的开端并确定了它，而非在很早以前商品交换时产生的。（见“知识路线”）实际上我认为在这种政权分散特性下的，欧洲封建形式的特殊性表现为一种集权政治（比如说在中国），并被农村与城市的反差所决定。在这种反差中，我还要指出，与其他一系列的改革失败相反，欧洲在向资本主义快速转变中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当时欧洲的集中政权实际上有利于后来资本主义的建立。意大利城市和联合省首先被大资本家的政权所掌握，之后是重商主义政权（在英国，尤其是法国）。因此，资本主义形成及成功并非市场扩张的结果，而是在欧洲以屈从方式，与农村形式相适应的特殊内部因素，及走市场扩张路线的革命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从这种意义上说，重商主义转变（1500~1800年）是必然的，之后是完整资本主义转变。在此，我还要加入世界体系潮流的观点，从1500年起，资本主义史被形容为现代历史。这并不表示我们不再承认为现代工业改革开端的1800年的重要性。

### 三、历史上世界一体化的赌注： 帝国、霸权、金融化

在前一个部分中，可供使用的成套概念工具将帮助我们搞清一个中心问题——世界一体化是什么？其赌注是什么？在此基础上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或者从这个主题上所获得的观点至少帮我们确定其中的一部分疑虑（当然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实际上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世界一体化经常在社会科学中被使用在一些不同寻常的句中：世界生产体系组成的直接进展，世界体系在争夺全球霸权或地方霸权时，所起到的政治影响，世界化的文化影响等。因此，涉及处在问题中的世界一体化具有限制的本质，它的稳定性（或非稳定性理论），它的持续进步理论，它所可能建立的阶段，都将根据所考虑到的概念定义而改变调整。它是一个希望中的政策，是理智上正在实施的政策，而非被其自身所强加的事实，它允许大企业的策略逃离政府的政策限制。然而，事实表明这些私人企业无法建成一个保证新秩序稳定的紧密结合的整体。相反，它们制造出混乱并揭示出这种被讨论的世界一体化的脆弱性。

在其最广泛的词义里，世界一体化参照于世界不同地区之间关系的存在，以及参照于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相互交叉的影响，在这个词义中，我自己提出一个描绘“旧世界体系”的提纲，它是集权时代的体系——从公元前500年或公元前300

年一直到公元 1500 年——将这些持续了 2000 年的三个主要集权中心（中国、印度、中东）与非集权地区（欧洲、非洲、东南亚、朝鲜、日本）建立联系，同时定义了与资本主义以往相适应的城市及农村的特殊概念。（见资本论第 1 章）由此，我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首先，旧体系并非本质上不平等，但其有利于“赶超”（在世界地位的落后）。欧洲在短暂的历史时期，走上与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新中心地位相对的外围地位（通过从非导理斯特主义向君主专制政体的转变过程），从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独一无二的）。

阿若那通过对明朝时代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掌握对海域的控制权，却刻意避免）的分析指出，旧的体系不具备不平等特性。当时，中国要远远比欧洲先进，它没有什么要向欧洲引进的，因而也就不去考虑控制通向西方的水路。因此，它让欧洲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接下去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通向东方的水路上，建立了统治权（为了他们自己），这些都帮助他们弥补自己的落后。自征服美洲并将之培育成它们自身的新型殖民地以后，欧洲就开始发展重商主义体系，该体系遵从资本积累处于统治地位的经济逻辑，是一种根本上的新类型，新型重新主义世界体系建立在它逐渐摧毁的旧体系之上，同时还在重新组织商业贸易，以利于正在建设之中的欧洲中心的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显然，1500 年体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在上文中提到，以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重商主义时代（1500～1800 年）是以一个资本主义转变时期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让我们给它定义出一个完整的形式，那就要从现代工业建成时期，从工业资本向商品资本强加资本积累概念时开始。当然它也正是如此做的。这是因为被重商主义推行的世界一体化，被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转变成内部因素，以与欧洲状况相适应，它与集权方式的霸权不同。以同样一种方式，1800 年爆发出第二次重

大历史转机，与专制世界体系不同的是，重商主义是建立在新型不平等基础上的。

到1800年，在完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范畴内（工业化），这一建设终于具有了完整的外形。1800年，世界各主要地区发展水平的区别仍然不太显著，正像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样。然而在1800~1950年间，在新兴资本主义不平等范围内，巨大的区别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反差也成为工业国和未进入工业革命的国家之间差别的同义词，以至到了从外表上无法克服的程度。但是，在一切特殊性以外，世界范畴内的积累原则——我认为在全球体系范围内提出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很必要的一应该通过恰当的活力产生不平等性，我将之归因于它在双重规模市场上运营的事实（企图进入全球范围的产品市场及资本市场，）；它是从与历史资本主义国有化建设相适应的，做为价值规律基础的三重规模市场转化而来（此外还包括劳动力市场）。

我不再对此重复。在下一个部分中，我将着手讨论二次大战后与世界一体化及与现时代前景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解释与“现代”世界一体化相关的问题（重商主义或工业化）；与周期、霸权和资本主义扩张相连的领土主义，及与资本“金融化”有关的问题。

我将用足够多的事实表述我的观点且不在“周期”问题上再做文章。在历史上，存在着重大转折日（对我而言是1500年和1800年），在这两次重大转折日之间显然还存在着一些可用来辨别特殊小阶段的日期（举例如1880年和1920年，1945或1950年，1980或1990年，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断代方法）。但这不代表我在任何情况下都赞同长周期理论，而且不用在经过每一个大历史阶段的同时，将其定位于“循环”内，并提出相应的历史哲学。这只代表一种上升趋势：在质的转变过程中又向前迈出了一步，至于后面的影射——举例说在前一个重商主义

时代，在工业资本主义下是新兴的事物（超生产所固有的趋向以及通过其所表现出的经济危机）或是在以往时代在资本主义制度（市场霸权和经济主义）下为新兴的事物（由政权经济关系的其他组织方面的规律所要求的）——对我而言经常显示出一种超乎现实历史的意外变动。我更加相信，应该将分析的目标集中在“积累阶段的”同一性上，这样做一方面遵从了每一阶段的经济的特殊性（避免将商品关系同适应工业资本主义的关系相混淆），另一方面将我们正在讨论的经济状况同政治状况（政权运行方式，霸权主义的社会障碍等）建立了联系。我们将重点讨论这一关系。

我将不再重点讨论霸权问题和于此相关的霸权理论（意大利城市、荷兰、大不列颠、美国），我只是谨慎地将重点放在分析这些理论的方法论上。

在历史上，霸权主义对我而言是一种例外非必然的规律，意大利或荷兰的霸权，曾经是我们现今讨论的社会典范，在我的印象中，这个称呼意义广泛，在那个时代，它只是对一些国家进入当代体系（地方或一部分是世界的）的描绘。在工业革命以前我未做过描述的英国革命，借助于新工业技术垄断的特殊关系而发生（从19世纪下旬开始遭受衰落），包括伦敦金融权威影响（一直延续到1930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可能是独一无二值得这一称号的国家；以及被剥削的殖民地（印度）；和在此时代之前或之后的移民殖民地（然而并非都像未来的美国，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控制而得以保证其地位），然而，尽管这种霸权主义具有惊人的特性，它也具有许多的缺陷，它只能行使在美洲大陆，中国、日本和奥托曼帝国。美国由于缺乏军事霸权（除了海军领域）——尽管海军军备数量在欧洲强国之前（德国、法国、俄国）——因而行动上受到限制。像政治上的霸权一样，军事霸权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也有限定



(其他国家为美国的军备数量之多而叹息)。因此，无法避免具有竞争性的新帝国主义的升起（德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霸权主义的模式启发了其竞争者们，尤其是在其殖民地问题上（只有法国、荷兰、比利时，由于势单力薄未能刮分到土地），另外一些是不能如此做的（德国），或是拥有可双向选择权的（将美国陆地扩张与俄国的扩张相比而言）。

无论如何，在两个决定性领域内——工业竞争和军事实力——大不列颠很快被它的竞争者们落在了后面。然而，它仍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保持着遥遥领先的金融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霸主地位起源于不同力量因素的结合上。在这里，工业巨大的进步在短短时间里产生了巨大的成果，（1945年的世界状况），并且很快席卷了欧洲和日本。与此相反，大不列颠的金融优势一直延续到其工业竞争相对衰落之后。如果美国不与“反殖民主义”的传统断交（他们对于殖民占领倾向较弱），那是因为他的绝对军事力量，在一段时间内（1945~1990年），无法与过去的军事强国相比，受到了在这一领域内另一个超级强国的限制，今天这一超级强国已经四分五裂；而且也由于美国今天使用的是英语，这种它在19世纪以前，未使用过的语言。

我们有时称为“领土主义”的理论，即倾向于被惟一政治中心所操纵的理论，它与复杂的资本主义扩张相连，我们依然要寻找一种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政治与经济关系方面更加普遍的方式。在领土主义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观点对我而言是无效的。

第一条在资本主义中一个实质上“忽略领土”的体系，无论这种资本主义定义是多么简单明了，它总是代表了许多来自于政权范畴（或大或小）的外部关系，且对“内部”效果都很重要，到了一种在以往时代所从来看不到的程度，它无法再掩

藏其骗人本质。如果我们忽视其本质，现存资本主义在现时代，会以一种无法领会到领土主义本质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再生产与其政治管理之间的关系。然而意大利城的光辉与其国界大小是不能成正比的，联合省也不过是一个小国家；经常存在这样一些规模不同的现代国家，其中那些小国的国际地位并不比大国弱；一些微型国家（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巴哈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新加坡）都在这种国际分配中找到了自己适当的位置，美国与俄国是两个没有外部殖民地的陆地国家（前苏联国家都是多民族无殖民地国家），但与此相反，大不列颠在世界中所占份额，不能不计算其殖民帝国，包括 1880 到 1960 年间的法国。（在此之后，法国选择通过欧洲经济建设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不通过其对新殖民主义的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呢？

所以情况的不同——空间与时间上的一禁止简单地列出中心/外围 = 大都市/殖民地的方程式，但不幸的是，这个等式已众所周知，由于郝柏森—黑福鼎—列宁关于当代帝国主义的极端简单化的论断而早已众人皆晓了。

今天，这一方程式已成为一切特殊性的摧毁剂——但是，它对我而言也是最重要的，不负责任地说，人们已将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卡利法拉，奥斯曼帝国，中国，奥斯托—匈牙利，俄罗斯帝国，英帝国和法帝国的概念相混淆了。因为他们不仅内部结构不同，甚至进入世界一体化的方式也不同，在历史上，压制已不是新现象，我们可以例举出来的有种族压制，人种压制、文化压制、民族压制，但是资本主义剥削和中心与外围现象，以及它所出现的殖民形式，都是其在当代进入世界一体化特殊形式的特殊现象。俄罗斯帝国（后来的苏维埃）曾是一座人民监狱，它不像英国那样曾经是一个殖民帝国，在苏维埃帝国中，经济转变是从俄“中心”向亚洲“外围”扩散的，这与

英帝国当年的状况相反。(见斯曼“向民族进攻的人种”)

我们正在讨论的领土资本主义的关系，探讨的是资本主义内部政权问题。在这里，仍是简单化的论题，政权最终为资本主义的政权。甚至它揭示出，对于认识其本质很有用的真正精髓的理论，而这对于理解情况的特殊性帮助并不大。在这里，我又重述上文曾经提到的布兰德尔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三个层面的描述。资本主义不是“市场”但“市场+非市场”即政治影响。这种“高财政”的权力（事实上是重商主义阶段，重商主义一手工艺及金融化的一个综合体）是最初真正资本主义国家的组成基础：例如意大利城，联合省。在这里，阿若尼很有必要地强调了这一事实：没有任何政权能够如此靠近，由商业行政会议所控制的国家极端形式。它发生在一些大的重商主义国家内——首先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创造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国家，自我集中的经济建设（一定是广为人知的），以及在积累领域及政治管理领域的巧合。这种形式在德国再次建立，包括在其他地方，因为它真实地回答了本时代资本主义扩张的要求。尽管有的国家有殖民地（英国、法国）而有的国家没有（德国），但这些基本要求至少对全球竞争性的经济建设的结果是相同的。这种模式是以真正的意识形态为目标，建立起从产生到现代化发展这段时间的方程式。要想不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资本权力”的社会霸权理论和被承认的社会联盟（与贵族，农民，之后是资本与生产之间的妥协），就想领会其历史含义，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马克思为了他那个时代，在非常具体地做着这一工作，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其中包括格若希——也为此尽了一份力。

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扩张也加入到这段历史中，也和这段扩张一起被看做在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和社会霸权的延伸部分。举例说，英国棉工业扩张及印度棉工业推

毁的事实，英国工业特殊化及美国农业重要性，移民自治领地大好前途，一些工业部门和法国农业部门及殖民地市场的衰落等（在马赛尔的著作中被加以强调）。因而我们明白了，殖民地并非资本扩张的“必然”要求，而只是在这场扩张中某些社会霸权的要求。

然而自 1880 年起对于殖民扩张的倾向普遍化了。在这一时期殖民帝国已大大继承了 1800 年以前的重商主义体系，印度，印度支那等，这并非像我们在一些肤浅快速的分析中所提到的那样，是内部积累的必然要求。这是一场在新兴的卖方控制市场中激烈竞争的产物。甚至明显地，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资本主义懂得从殖民主义中牟取利润。根据积累本身的观点来看，它时而积极时而消极，时而加强资本掠夺时而推迟落后生产地区的改进。葡萄牙和荷兰是这种负面影响的典型；但对于法国及英国来说，它们在最初的时间里对印度进行了充分剥削，这种负面影响在今后世界一体化竞争的改革中再次出现。其他成功或失败的因素一是在科技革命中的国家统治之外——像对金融化进程的控制，我已提到过此点，并在下文中还将提到。

重商主义转变中的领土主义只能在同样的条件下，用同样方法来分析。此外，我们还要领会 1500 年到 1800 年重商主义的资本霸权，（商品—金融）及 1800 年以后的工业资本霸权（工业—金融）。在这里，我不再对这个领域进一步思考，我已经很满意所提出的一些与主题想关的用重商主义“金融化”的特殊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问题。

第二点，枯燥无味——然而有利的。在资本主义中（无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工业），并未发现什么新的观点，它对与古代和现代相关期限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以及在政权集中体制下，对政治经济统治关系的破坏，资本主义关系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等做出了分析。我在其他地方也已经提到过，它禁止以“穿越

历史”的方式阐述政治管理领域与经济生活再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问题（积累的概念并非是资本主义时代前的产物）。

在集中政权下，经济生活在空间上被分化。当商品贸易中的长距离贸易，对社会行使重要影响时；尽管它在原始外国模式下的经济再生产空间保持着分解状态，（欧洲中世纪早期，萨哈拉非洲）并且处于介乎于这两种极端的中间状态（如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中世纪末的欧洲、印度）；然而，在政治领域与此相反，越来越趋向于在集中政体下更加广泛的发展。（例如中国模式）我们称之为的“金融化”（现代资本主义）是在生产资本上，在同样由马克思提出的  $A-A'$  直接生产控制  $A-P-A'$  生产过程中，被资本—金钱及金融体系所肯定的一种过程。

肯定的是，像其他现象一样，这一现象频繁地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重复着，以至于阿若尼不再将之看成“超阶段”（郝柏森，黑福鼎和列宁的“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论题）。而是看成一个回返现象，所要知道的是，回返是否是有规律的一以循环的形式—以及它是否在除去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金融化特殊性的同时，有能力将重点放在这一回返形式上。

我很愿意将重点放在这些特殊性上，如马克思分析的  $A-P-A'$  生产过程是与工业资本主义相适应的；P 代表生产购买力及形式上服从资本主义的剥削，具体表现为恰当的私人工业生产方式。在重商主义转变下，主要的积累过程是  $A-E-A'$  形式；在这一过程中，E 表示对商品交换的控制—产品买卖。当然交换的商品应该被生产出来，但是它们是通过农民或手工业者的生产途径产生，在这里明确指，通过真正非形式上的服从商品资本而被控制（马克思给出过两种形式）。我认为这种质的区别赋予了金融化以不同的涵义。

在他最著名的一本书中，阿若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周期”的动人画卷，它导致那些从竞争意义上说属于霸权的，

被我们认为是不同时期体系的中心（意大利城：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热纳；联合省）向金融化发展并最终走向衰落。无论如何，每一次讨论中，竞争的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竞争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一种生产水平的较量。举例说，佛罗伦萨的纺织品手工业及制造业，联合省的航海制造业。但是它的统治形式——与重商主义本质相协调——是一种商业化优势。它是许多复杂因素的产物：路线的了解及掌握，交款系统的效率，避免交通费用的汇票，交通方式的优越性，供给价等。在这最后一点，沃勒斯藤提出对美国矿产的开发打破了旧有的商业关系。在旧体系下，欧洲人本能够提出超过一切竞争者的最好价格。通过这种方式，重商主义者有效地摧毁了旧世界体系（本质非不平等）以便于建立起以不平等为基础的重商主义世界体系，同时创造出，本质上不平等的完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需的条件。

一部分重商主义的金融化确立于适当的生产体系的形成，即这一阶段资本扩张的基础。举例，阿若尼在这里提出了热纳金融爆炸的典型例子，其建立在对美洲征服与开发的基础上，热纳，成为西班牙君主专制政权的金融中心，毫无疑问通过参与这次革命，它比一个简单的商业城市获得了多得多的利润。以同样的方式，佛罗伦萨从手工业及商业城市的地位，转变为正在建设中的，欧洲绝对政权的金融中心，它被金融化了。联合省，原本是交通及商业中心，在欧洲和世界大部分地区金融化之后，便轮到它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而建成可用来使用的资产——货币，同时，它们自身也被大大丰富了。

但是，像往常一样，金融化只能通过损害别人而丰富其自身；生产进步不允许偏离这种无意义的游戏，A-A'循环，在这种意义上，是加深高利贷——食利者体系的利益收入不公平化的因素；如果这种丰富化不在某些领域建立生产领域扩大的基

础，它就会瓦解。因为，这种生产领域恰恰建在金融化之外，并且在这一级别上，还包括在这一重要领域内，政治统治效率的实施、领土主义与新生产的联系、在怀疑旧金融化过程中已经进入衰落时，生产阶段扩大的基础历史性的成倍增长。一方面，它是与美国开发相关的基础（植物及矿物的生产，尤其是蔗糖），另一方面，它是导致绝对专制领域建立的基础，（大手工业制造业的基础，工业的始祖）。在这种情况下所能取得的最好的成绩是政权上的成果，它同时在政治上统治他们的“国有”空间、殖民地，（美国，然后是印度和印度支那）并在商业方面摘取生产利润的成果。但是，在这一领域内，过早的金融化优势已经转变为缺陷。尤其如果政治平稳，（由一个适当的社会霸权产生，包括我们在世界一体化机械主义方面所列举一些内部因素）或是军事力量缺乏时。如此一来西班牙一拥有美洲一却不能再保留这一殖民利润；联合省也已达到其金融财富的顶端，也同样由于无法在其利益基础上建立重商主义体系而面临瓦解；它们不得不从殖民地撤退—印度支那一已经如我们所知，这与欧洲地位的衰弱相连。然而，同时而来的两个成功，首先是英国的重大成功，在那个还没有金融化的时代，是坚持到最晚的殖民帝国。（到18世纪占领印度后，才成为重要的殖民帝国）其次法国，生产方面重商主义的进步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并创造了条件。

阿若尼精妙具体的分析为我们指出，金融化在领土主义之前的发展。荷兰的金融化未能建立一个刺激本国经济发展的有效跳板，尽管它在同盟中扮演着金融中心的角色。这一联盟消除了中间体系并创立了现代化国际体系（我们可以追溯到1684年迈斯特法利约定）。荷兰从未能够统治过这个它所贡献创立的体系，它是在英法胁迫下这样做的。创建重商主义时，同时还会伴随有经济国有化（柯尔柏主义，航海约定），殖民奴隶制及

移民殖民地的发展。这些国家应有足够的领土空间，金融食利国难道总是脆弱的人工财富的最终受害者，从而被其他更具生产力、更积极、更有创造力的经济中心所打败？我们将在今后找到问题的答案。

从其表面看，金融化历史没有重复。新工业世界体系具有工业化中心与外围的不平等关系，它是在19世纪建立的，起初处于英国统治下，与科技首创精神，商业控制权，殖民剥削，以及世界金融新体系相连。在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英国霸权主义，实际上将跨国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同帝国领土扩张相连。从1880年面对其两大竞争对手，美国与法国，英国很快丧失了其相对的科技优势，但它直到1945年都在金融领域保持其优势。大不列颠，从19世纪末起开始金融化，依然“富足”但其工业力已相对衰落，它甚至做出了选择“在欧洲建设以外及新的世界分割方式以外生存”，我怀疑这种选择是否正确。

面对这种金融化的平稳，生产领域正在逐步扩大和加深，尤其是美国和德国，但这种进步导致的结果并不相同。阿若尼在这里指出德国的失败。他谈到改革，并以十分可信的方式将分析重点放在，直到今天都未能找到的失败原因上。尽管工业生产力的进步率从1870年到1914年间三倍于英国，然而在每单位资本的收入方面，德国的赶超速度却是缓慢且见效不显著的。这证实了阿若尼和布兰德的结论，资本主义在市场上是不可缺少的（或是市场背后的生产），从政权垄断中抽取的利润——金融政权是其中之一——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就如同我们今后所看到的，它依然存在弱点。美国成功地替代了英国。直到1945年，与在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份额相比，美国都无法获得金融或其他方面的优势。它被其农业或工业生产方面的成果推到一种无法正确认识本时代其他国家的程度。美国有着丰



富的自然资源，享有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移民人数，起初，它建立了生产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之后又建立了其世界霸权的基础。在这里，阿若尼恰当地强调了这一事实，大的现代化公司—多民族化的未来一起初是（总保持为）一个巨大的封闭式美洲公司。从建设方式看—其扩张程度与俄罗斯的扩张程度都是惊人的。俄帝国之后的苏联都在世界体系的一定空间下建立起一种广阔集权的空间；以我之见，在美国的对照下，它的失败不能归因于这种选择；从内部原因看，是因为俄帝国反应的迟钝，苏维埃的本质及其所受到的限制—以及从 1880 到 1980 年一个世纪的起初是俄国与德国，之后是俄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今后仍会是俄国与德国）。

世界体系的广泛金融化的出现是从上世纪 1880 年开始的，这是一个明确的阶段。1873 到 1896 年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相对萧条时期，与资本集中化大趋势相连，它从竞争形式上打乱了至今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体系，而以一种新的卖主控制市场的形式出现。郝柏森，黑福鼎，列宁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提出这种改革的重要性，使我们与他们一起在 1880 年看到一个转折时期。经济萧条（1873~1896 年）打击了旧有的工业中心（大不列颠，法国，比利时），尽管在一些新工业中心的工业生产增长仍在继续（德、美）。像今天一样，经济危机首先在三个盟国（北美，欧洲，再晚些的日本）发生。其次是东亚（中国，韩国及东南亚）。那些旧的中心让位于不确定的新世界金融中心，（尤其是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奥托曼帝国，拉丁美洲通过借债的方式，部分通过他们的殖民地发展生产，在此它们已受到了限制）。无论这些新的金融中心如何不确定，在 1970 年期间它们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可以相信它们已改变了工业国家建立的世界版图（见奥图克瑞），尽管显示出很弱的能力范围和很短暂的时期。从 1980 年起，中心化进程开始了（但，是以一种无

法摆脱的长期萧条的速度)，我们同样注意到在东亚所产生的同步的突飞猛进，它们很少依靠于外国投资（当然后者在技术革命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由此懂得 19 世纪末的金融化具有各个国家不同的形式，对于英国、法国，它拥有一种国际性金融资本主义的形式（若斯世德所定义的类型）。它是面对面地自治，仿佛郝柏森所要使人注意到的那样。无论如何，这种自治只是相对的；因为这种金融资本的积累及对外的投资主要来源于殖民地。布卡若和列宁将这种“食利者金融”理论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新主观经济科学作品阅览的必要。与此相反，在德国，金融资本确定在，持续发展的工业方面，因此，黑福鼎使我们看到了这种金融化—工业上的联合有利于像一个单一封闭公司那样统治一个国家—我们可称之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是德国联合公司，就像我们在此之后所称作的日本联合公司一样。资本主义下，这种卖方占统治地位的状态导致了一些列宁称之为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冲突（以不减弱殖民帝国的力量）。随后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这一事实，这是因为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不能支持这种冲突，因此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至少在欧洲）更注重建立规范，他称这种帝国主义时代为“霸权”时期。历史只是部分地证实了他的预言：从 1917 到 1975 年（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写的，邦德恩纪元的结束），革命在半殖民地国家及俄国（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发生，但在欧洲却未发生。革命面向东方，在其他殖民地国家，以一种激进的形式（中国）或缓和的形式（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进行着。帝国主义—在这种形式下—存留下来并以新的形式发展下去。

因为相对萧条时期（1873~1896 年的大危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始，在两次战争期间延续着，因而成为普遍金融化时期。在这里，我知道这并非是地理局部化的结果（如意大

利城和联合省)；而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类似于1980年起所出现的现象，现在仍然与生产体系扩张的萧条阶段相连。但在这里我还要强调在上文提到过的A-A'与A-P-A'的两种生产过程。在第一阶段总是与危机相连，即生产力相对萧条阶段，经常带来不好的结果。因为它是以一种迅速且具有破坏性的方式加快不平等，并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政治斗争重置于讨论地位。

然而，金融化究竟是“必要”阶段吗？我知道，它对于生产体系新扩张阶段条件的再生产，是一段必要时期，这是我们已重复过无数次的说法：结构调整”必须经过金融化阶段。但我不赞同这一观点。相反，我认为金融化是危机的一种管理方式，并非其超越的准备形式。1880年到1945年的欧洲金融化并未能帮助其走出危机；在美国，处于这种具有破坏性的金融化爆炸时刻，因而产生出这种新型工业化进步的力量。今天，我们仍要看到一种类似矛盾的发展吗？在美国，日本，欧洲之后，带动起拉美、非洲、中东同时进入一种萧条和金融化时期；尽管，东亚经济离此还有一定距离，但它也有可能成为下一次生产体系扩张的中心。对此，我将在下文讨论这一假设。

最后，为了总结本章，以免重复，我想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在工业化和重商主义阶段，区分金融化与生产体系这一相互矛盾事实的质的不同。在重商主义阶段，贸易为原动力，它的扩张建立在生产扩张的基础条件上；而在工业化阶段，这种因果关系正好相反—尽管会使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不满—正是生产扩张带动了交易扩张。在重商主义阶段，只要有可能（只要生产扩张继续），从商业中提取的利润就应当再用来投资于商业中；而当无法再维持时，就应将利润投资于金融领域（伴随着萧条阶段）。在下一个阶段，工业利润被再投资于工业，尽管这种经营丧失了其存在的理由（赢利性），并且伴随着萧条，金融衰落被强化了。因而，与“金融周期”相比，我更愿意在此谈

论各个时期，特定不同的积累阶段。

## 参考书目

本章内容直接参考第一，三，四章论述的内容。

同时参看：

—The empire of the chaos, 《混乱的帝国》, L' Harmattan 1991, 尤其是其中的一，二两章。

—Intellectual itinerary, 《理智的道路》, L' Harmattan 1994, 尤其是其中的第7条（苏维埃体制的批判 la critique du sovietisme）和第8条（调解理论 la theorie de la regulation）。

—The capitalist management of crisis, 《资本主义的危机处理》, L' Harmattan 1995, 尤其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危机的世界管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第三部分（重新发展的条件）。

—Mondialisation and Accumulation, 《世界化和积累》, S.Amin, L' Harmattan 1993, 尤其是引言和结尾。

—The Eurocentrism, 《欧洲中心主义》, S.Amin, Economica - Anthropos, 1988。

—The ethnic group challenging the nations, 《挑战国家的种族》, S.Amin, L' Harmattan 1994。

这项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是与一些相关作品作者的讨论，他们对于世界化和它所造成的挑战的分析在我看来十分重要，尤其是：

—《漫长的二十世纪》 The Long XXth Century, Giovanni Arrighi, Verso 1994。

—《金融的世界化》, The mondialisation of the capital, Francois Chesnais, Syros 1994。

—《八十年代的世界经济》, The world economy in the 80s,

Michel Beaud, *La découverte* 1989。

—《金融的新支柱》，*The new pillars of the finance*, Olivier Pastre, *La découverte* 1992。

另外，还有牵扯到世界系统学派的许多作者（相关的参考书目在一，三章），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的研究（相关的参考书目在资本主义的危机处理一书中）及 Kostas Vergopoulos 和 Michel Aglitta 的相关文章（发表于 *Marx - Actuel* 和 *Futur Antérieur* 中）。

我同样列出：

—《经济历史的神话和悖论》，*Mythes and Paradoxes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y*, Paul Bairoch, *la Découverte* 1994.

—《劳动的新的国际分工》，Otto Kreye, Folker Frobel, Jurgen Henrichs, Cambridge U. Press 1980.

—《商品链和鞋产业》，Gary Grefferi, Miguel Korzeniewiez, N.G. Martin. 世界经济的半周边状态, Greenwood Press.

—《殖民帝国和法国资本主义》，Jacques Marseille, Albin Michel 1984.

关于 Marx, Braudel 和 Karl Polanyi (大变形,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的参考在这里就无需进一步解释。

## 第六章 面临挑战的欧洲

二战后是西欧历史上的一段黄金时期。在几个十年之中，西欧国家为了赶上——正如人们所说的——直到此时仍是二次大战惟一获利者的美国，尽力消除着自1913年以来累积起来的差距。处于这个把民主欧洲做为普遍常识的新时代之中，先辈遗留的民族间的仇恨也该消失了吧。在这个前景中，欧共体渐进的建设似乎已很有效地完成了它的职能。它的成果也无可争议是肯定的。然后“危机”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高增长率减缓下来，持续上升的生活水平也丧失了信用，而失业，在消失了三十年之后又突然出现了，且数目庞大而持久。在这个欧盟加紧东扩，并为取得的成就所迷惑的时刻，它是否明白自己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它又是置身于什么样的条件下呢？

### 1. 战后的选择与欧共体的建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的人民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孕育出了各种各样的恐惧，由幻觉造就或产生的恐惧。

欧洲被分成了两半。虽说在想象之中每一半都有威胁另一半的可能，但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军事侵略的危险。

战后是一个和平的时期，也是个不得不和平的时期。这个

和平并不像通常甚至直到今天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美国核保护伞以及两大强国之间的平衡——互相制约而成——产生的。因为这种军事制衡很晚——在 1970 年——才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在欧洲复兴结束近二十年之后或者说在随后而来的欧洲奇迹开始走下坡路（当时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事实上，美国军事保护几乎有些被滥用了。

如果苏维埃政权意图入侵西欧，那么它早该有所举动。但它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自 1918 年以来它也从未从它那“核心国”的传统的防御行动中走出来过。而斯大林，他显然不是一个伟大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但却也没有疯（像希特勒那样），他只希望有一个“防御的前线”——这的确是一个已过时了的军事战略。

美国这方面只是想要一个渐进的可能的“回升”，并不希望有军事进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同样危险。他们欲称霸世界的想法——他们满脑子都是这个念头——不再采取像希特勒那样疯狂而罪恶的方式！我们也看到——并不令人惊讶——苏联在 1945 年到 1947 年间克制自己不去支持希腊共和国，而华盛顿在 1956 年也不愿插手匈牙利事件。从莫斯科的监管之下解放出来的惟一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分别于 1948 年和 1960 年独立完成了这项运动，没有得到西方的支持，后者甚至没有流露出一点同情的迹象。

但即使没有战争的危险，也许存在“革命”的危险；至少人们认为在那两个意见分歧的阵营之间存在着这种危险，最少在法国和意大利有这个可能。无疑又是幻觉，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但假若复兴停滞不前，谁也不可能知道人们会有何反应。也许，仍旧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反法西斯精神所鼓动，同时对两次大战期间的改革仅保留着一个令人不快的记忆，人们会因为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东方那胜利的一炮而从此相信社会主

义建设吗？不仅我对此表示怀疑，而且即使他们走了这一步，即保守的地方力量和美军已置身于既成事实面前并接受了它（我们知道根据他们的秘密协议，这些力量不会接受它，而且会以政变来回应共产主义的胜利），莫斯科也会被这个过于丰盛的礼物所困扰。因为这将冒重新置疑它自己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的风险。何况，我不认为这些有点荒谬的假设更值得我们注意。复兴没有理由不快速而有效的进行。而且，美国意识到了挑战，也通过马歇尔计划对欧洲施以援助。

另一种忧虑，我们在今天已开始忘掉它在当时的重要性了。这种忧虑在战争刚刚结束时曾占据了整个欧洲的观念：对德国工业和军事力量复苏的恐惧。斯大林设置了他的防线来面对它，英国选择了追随美国并与之结成永久的无条件的联盟。法国的强权地位刚刚恢复，它对这个潜在的威胁特别敏感。该如何避开这一危险？人们已放弃摧毁德国，这一刻是在预料之中的。戴高乐认为做为下级联盟是莫大的侮辱，因此他对于保护人美国怀着复杂的感情。相反若与莫斯科联盟就有加强共产主义地位的危险。于是，一个新的念头诞生了，就是以吸收其参与欧洲建设来中立德国。这个主意令人担心民主在莱茵河以东地区深入人心。它也同样面临另一种担忧，那就是要开放推行美国霸权所需要的市场。为了防止欧洲重新趋向于两战期间的那种若说不是自给自足也至少是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道路，马歇尔计划因而确定了支持欧洲内部交流的目标，这是复兴的欧洲无边界开放的前奏。这个选择的确是半个世纪之后东欧所做的选择相反，因为到那时西方列强及其授意下建成的组织的干涉便以摧毁在经济互助会（Comecon）中心建立的相互依赖为目标，这是对东部复兴的危害。

欧共体方案是在这种氛围中诞生的，我们应该想到这一点，以便于理解其今后的发展。



做为一小段历史，我们知道，欧洲方案于 1951 年在欧洲煤钢联营的创建中第一次表达了它的意向，让·莫奈将这些德国基础工业吸收到欧洲建设中来，以此来答复国内的忧虑（对鲁尔军工业联合的复出的忧虑）。与此相反，同时期的另一个想通过将德军溶入欧洲军事力量来使之中立的计划（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建立）却于 1954 年以失败告终。重组的德军直到今天仍受到三方面的限制，这是事实：(i) 德国不能加入北约，(ii) 不能拥有核武装，(iii) 无组建支配权（这在今天受到强烈指责），这一点限制了它对边界以外地区的干涉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德国的军事问题依然是令人忧虑的，可能正是出于同样的忧虑戴高乐才会草率对待欧洲原子能联营（1957 年成立），在这一领域内他宁愿投身于对（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支持和使法国进入核俱乐部的活动中。

小段历史总是会发展成大事件。经济机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功——即使这只是暂时的（由于钢铁和煤炭失去了它们在过去的经济体系中曾起到的火车头的作用）——与该方案的政治部分的失败，加上戴高乐在法国掌权，为从罗马条约（1957 年）开始直到今天的欧洲建设指明了经济一体化优先的道路。而与此同时，通往政治权力的方向，即使没有被完全遗忘，也落后了许多。

这种不平衡今天成为了欧洲面临的挑战的核心。我们可以依靠加强政治机构的建设来达到平衡吗？我们愿意吗？这是人们所希望的吗？是否有可能，在不要这种建设的情况下来巩固经济领域取得的成果呢？我们将提出如此多的疑问。

欧洲经济建设本身暗含着决定性的选择，这是由这些选择在更长时期内的影响决定的。这个建设仅仅包括一个加强自由贸易的向本身也在尽最大努力开放的世界体系开放的区域吗？或者我们将之设计成一个有能力以自身力量抵御外来影响一既

然这些影响被认为是负面的（这个概念不一定是一极端主义的一“欧洲堡垒”的概念）的机构？或者说建成一个与美国及日本互为补充的有竞争力的欧洲？这个潜在于每一阶段和每一个重大决定之中的选择，并不是做得很清楚，也不可能清楚，这是因为考虑到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并不仅仅是一些成员国对另一些反对，也同样遍布于各国内部。

尽管如此，即使一正像事实本身一政治建设部分仍处于初级试验阶段，尚没有能力对有关经济一体化所做的决定起很强的影响，经济抉择也潜在地取决于与之协调的政治决定。这里的争执很清楚是在于未来是一个政治一体化的欧洲（暗含着一种超越国家的权力，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还是一个几乎不再考虑多国政治相协调的“各民族的欧洲”一重新使用戴高乐主义者的用语，这也同样是大不列颠持久的观点。而这里同样的一欧洲权力或欧洲各国权力的协调一是为了什么？在一个与北约，与坚固的北大西洋整体的未来并存的前景之中？或是在一个独立的竞争者的前景中？没有指名道姓的必要，这个竞争者很可能成为欧洲的新帝国主义。

通过取消或延迟在政治前景方案中的决定，欧洲事实上选择了只在建设共同市场（潜在的，但不是惟一的，尽管名字看起来如此）这一领域前进，这一选择就处于受最少攻击的路线上，这条路线也就是最小共同点路线。我认为，这从它长期的影响上来看，是一种右倾的选择。

我并不是由此说明这是欧洲右派（保守的和自由的）的选择而反对左派（社会主义的）。因为对欧洲方案的赞同或对于它的迟疑在两派之中都有。完全或近乎完全的反对现在是极少数的—但有扩大的危险。从前并不是一直如此的。一些新加入的成员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很长时期内都怀着迟疑的态度。欧洲观念对于法西斯主义极右派（他们这样想但不敢说出来）

而言是奇怪的。共产主义党派原则上反对这个“商人的欧洲”的方案，然后还是加入进来，但若说归附则当然没有商量的余地。右派整体上总是汇集起各种不同的经济利益。现代化竞争激烈的大都市里的每一个环节（工业，工业化农业，金融）几乎永远偏爱开放的市场。其他工业分支，常常面临衰退的危机，它们显然需要依靠国家尽可能的保护。右派因此总有些分歧，甚至某些在布鲁塞尔讨论的具体问题还导致了分裂。左派也是一样，即使我们假设左派对于各种老板的利益没有那么敏感（并不绝对如此），他们对劳动者的利益也还是敏感的，而劳动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在少数。市场扩大的具体实施方式应该是一个趋于高处的一致化，即以“滴入式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使得能在不利的环境中有利于工资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吗？还是相反的，一种趋于低处的一致化，即通过加剧劳动者之间竞争——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一来达成呢？这些观点总是在这几个方面产生分歧，并显然随着行动的领域及有关决定的实施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另外，理论上的认知也从来不曾缺少过，无论是右派（总抱有民族主义观念，而对于东方共产主义又极端仇视）还是左派（原则上支持国际化前景，但也不乏民族主义观念）。

所以我在此想说的是，受最少攻击路线方案的推进使单一市场开放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在社会及政治领导的领域欧洲总是迟疑着不敢触及现有的国家机构。我们在以后的成果总结考核中将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市场的单一开放自然地增强了资本，并因此使得它在与劳动的对立关系中提高了地位。若要保持两者间的平衡，只有同时采取市场管理措施，这种措施必须在扩大了的市场范围（欧洲）内至少有条件使从前只在狭小市场内起作用的资本/劳动关系发挥作用。

## 2. 欧共体的总结

如今，欧共体在经济（同时也是社会的）发展方面的成果无疑是积极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何会这样。一位教条主义的新自由论的经济学家会简单地认为这是通过开放市场以持续刺激增长的结果，并且这种开放，通过滴入式效应（trickle down）的作用，总是有利于所有人（包括劳动者和企业家）。我认为有两个自由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一个是市场—扩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依我看是扩张开放了市场，而不是相反），另一个是收入分配的效果（我觉得只有在新自由主义的想象之中才存在什么滴入式效应）。有关这个理论问题我在别处已作了解释，这里就不再重述了。

这个积极的成果因此是来自其他因素。欧洲国家战后所经历的这种强势增长的真正动力是社会资本/劳动的协调，这是反法西斯胜利的产物，由此产生了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较有利于劳动者的关系。这个在欧洲普及的福利国家制度建立在被称之为“福特主义模式”的牢固基础之上，是战后飞速发展的前提。市场的开放在这个环境中当然不仅是可能易行的，同时也加强了这种模式扩展的潜力。相反若在开放的假设（已成为一种流派）中没有这个福利国家构成的内在动力的话，结果就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相反：生产减缩（这正是如今强加于非洲、阿拉伯、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带来的后果）。但我们说到的这个福利国家是国家性质的，意思是说它是通过国家政府政策支持资本/劳动的“社会合同”来发挥作用的，而正是这种合同反映出了它的特点（主要内容是保证国家范围内的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

政府国家政策的有效性在这里也同样是市场开放最终并未加重而是减弱了偏向发达国家的的不平等的原因。这里最明显的

例子就是意大利了，它靠自己非同寻常的增长速度攀上了欧洲的阶梯。这是有赖于欧共体的作用吗？当然，欧共体对这次成功出力不少，这不仅表现在它向北意打开了欧洲巨大的市场，也表现在它对南意现代化努力的支持。然而在这个领域，这种贡献是次要的，主要的努力是来自于意大利政府内部的重新分配。西班牙，在加入欧共体之前，也实现了增长率的赶超，这说明了在这个归功于欧共体的成功中国家政策决定的重要性（这里主要是福利国家政策和福特主义的政策）。在缺少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和强大的政府政策的支持的情况下，市场开放自身总会产生一种单极化的效果，而且无法消除不平等。

除了欧洲自1950~1980年的三十年间所经历的特殊增长之外，欧共体还取得了几个令人瞩目的成就。

主要的一个，在我看来，是共同农业政策。通过分离集体农业价格（固定高于国际市场的干预价格，以保证农业开发者的收入与城市收入相等，并且通过征收进口税保护农业，使进口农产品价格保持与集体价格一致），欧共体给自己创造的这个工具，使它的农业有了惊人的发展，以至于欧洲不仅从此保证了自给自足，还成为了一个农业出口大国。这个成功也带来了问题，因为尽管出口商享受与进口税对等的出口补贴的优惠条件，超量生产还是使无法卖出的库存积压起来。在取得了这次成功之后，欧共体从此便要考虑——如果需要的话——如何逐步降低干预价格。可叹的是，欧洲虽在此实行了最基本的分离原则，却对第三世界国家否认它们拥有这样做的权力！

欧洲货币系统的成立是为了保护欧共体免受自1972年以来美元反常波动的影响，它的成功从70年代末开始带来了明显有利的结果。然而这次成功的真实原因仍是个有必要争论的话题。不幸的是这个论题被正在流行却荒谬的货币主义理论回避了开去。这次成功是取决于体系本身的原则呢，还是取决于启发了

在主要成员国都相同的总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政策的环境呢？我个人偏向于第二种解释，体系自身也是脆弱的，我们本应从1992年以来相继发生的危机中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在这一领域，欧洲并没有选择在农业方面所采取的分离政策。资本流动的国际自由化——继美国之后欧洲也赞同了这个原则——加上80年代增长的停滞，减弱了欧洲货币集体保护的效果，也间接地削弱了这种保护的相对稳定。这种脆弱在一定时期内，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迫使各成员国采取不同的货币和经济政策。而且，依我看，惟一可以防止这种变化——这变化将大幅度减弱“大市场”的影响及一体化的前途——的方法同样也是分离政策，即在欧共体范围内（不然就是在各国范围内），采用管理资本转移的方式以减少金融投机带来的破坏性后果。

欧洲地中海地区（意大利和西班牙）与北欧——法国占据了中间位置而英国则面临着历史的衰退——之间发展（及生活水平）的差距在二战前后是很大的，现在这个差距明显缩小了，这应归功于欧洲的建设吗？我已经说过这些成功都应归功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各自有效的国家政策，而不仅仅是靠市场扩张带来的机会。至于欧共体采取的有关的特殊政策（对贫困地区、国家的补贴），只不过扮演了一个补充的角色而已。正如我们所知，这些补贴对爱尔兰、葡萄牙、希腊、南意和东德的帮助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至少对南意和东德来说，它们经济复兴的成功或失败更多的是依赖于意大利及德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和政治策略。而且在希腊来说，补贴的作用也不能完全肯定是积极的。这些补贴或许反而以自己的方式使这个国家走入了绝境。这可能是因为它过早加入了欧共体，还没有来得及拥有足够的竞争能力而因此被挤到了边缘地位（像旅游业）。这个问题，从更一般的意义上看即是外围资本主义地区加入世界市场所带来的破坏性的影响，这在今后也可能成为急于加入欧共

体的东欧国家的问题。权威的理论总抱有这样的幻想，加入那些以发达地区为中心建立的组织总比置身其外要好，他们总天真地以为——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依赖于一个发达的中心总能得到些利益”——然而这个谎言却总无情地被历史戳穿（海地不正是依靠了美国吗？）。如果说存在着带动的效果，那么也同样存在着破坏性的影响——而这是那些分离政策的教条主义的反对者在原则上总不肯承认的。

另外，若仔细观察在 1950~1980 年间欧洲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大体上各国之间的差异有所减少，但在各国内部地区间的不平等却往往被扩大了。欧共体当然不用对这种变化负责，因为这是资本扩张的必然产物，原本也只有更加果断的国家政策才能制止这种后果。

尽管欧共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单一市场实际上并未完全形成。能源和交通仍远远偏离共同体的原则，而只是属于国家范畴的特有体系。然而共同体已经步上了单一市场一体化的道路，采用的方法是放松调节和私有化。这些选择在我看来是不利的。因为对以自身性质（占统治地位的国有化的动机正在于此）导致的卖方控制市场（或甚至垄断）的部门来说，这些方法使私人垄断代替了国家垄断，因而无法保证私人自有的规则在此能带来与整个欧洲范围内最优发展的需要相协调的结果。相反的，恐怕短期利益的原则在这里还会加强发展中的不平等。惟一可能替代的办法原本可以是国家共同体的计划性的合作。但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上的偏见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本寻求多方投资的需要的顺从导致了这些不幸的决定。

依我看，更严重的问题是欧洲还未发展共同工业政策这个事实。各个国家也许有的时候做了些工作，但它们自身也有放弃的趋势，这是为了与这个时代反国家的自由主义气氛相适应。在研究—发展领域，所有人如今都认定欧洲落后于美国和日本。

而且为掩饰国家不足的共同体方案也深受这两个国家的扩张及影响的限制。

因此我们将看到，尽管欧共体的总结是积极的，欧洲还没有真正走上一条能够在自由贸易区（或单一市场）的建设之外，确实完善经济一体化的道路。真正的一体化意味着一个欧洲生产体系逐渐取代过去的国家生产体系，我们将看到这种进步所代表的质的飞跃暗含着对刚刚提出的政治问题的解决。

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要提防给共同体内部交换的增长施加那些自鸣得意的言论。的确，对不同成员国来说，共同体内部贸易在1960年处于25%到40%之间（这个数字与1913年前和1939年前没什么区别），如今的百分比则上升到了50%到60%之间。但即使由此证明了共同体从此以后稳定的偏好，光有这个进步，也不能成为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同义语。

我们将由对共同体预算的阐述中总结出对这个经济成果的批评，这个阐述很好地概括了它的性质，影响及局限性。

共同体预算尽管并非被忽视，但也十分有限：只占了成员国预算总额的2.4%。

它的来源有关税（18%）——就像所有关税同盟一样——农业进口税（3%）——正由于共同农业政策（PAC）的成功而下降——增值税（57%）和成员国按国内生产总值一定比例缴纳的费用（27%）。对保证所谓正常竞争条件的担心导致了欧共体追求税和谐的努力。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金融学说——认为只有间接税对价格的形成起作用——相适应，使增值税——价格税构成的主要部分——相对和谐，采取下限为15%的税率（但根据不同国家在15%~25%之间变动）是合适的。相反的，这种学说认为所得税就不必要如此。我不认为这种学说很牢固，依我看来它具有相对性。因为收入分配结构（这是受所得税影响的）是相对价格向量的决定因素之一，它也由此作用于竞争条件。一个



强大的经济一体化要求这种税制的协调。但这在欧洲观念中还远没有被人们接受。

在运用方面，共同体预算用于对 PAC 的支持（50%），对地方的帮助（30%），对第三世界的援助（5%）和研究—发展方面（4%）。我们会注意到由于 PAC 的成功和欧洲在出口多余农产品时遇到的困难，用于支持农业出口的部分有减少的趋势—几年前达到 80% 而如今只有 50%。相反用于支持贫困地区的费用由于德国的统一而突然上升（许多欧洲国家在观念上有时很难承认德国不是惟一承担了这项杰出的政治决定的成本的国家，但这个决定加强了它在共同体中的地位）。对比之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就少得可怜了（人口数是欧洲外围地区的十到二十倍，而受到的帮助却只有上述地区的六分之一！）。由这少量的金额上来看，这更像是一种施舍而非国际团结。无论如何这种援助也没有达到成为欧非地区间建设工具的最低界限。这一事实显露出一个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的真相：不管《欧洲经济共同体—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洛美协定》（C.E.E—A.C.P.）的条文如何规定，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政治观点是有关于欧洲与阿拉伯世界、撒哈拉非洲及普遍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甚至不能肯定成员国—或某些成员国—对这些关系及其暗含的世界范围内的地方化问题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 3. 欧洲：一个有限的经济建设

欧共体成果的总结很好地反映了欧洲建设的主要特点。直到现在这个建设还几乎只限制在建立一个开放的贸易空间上，甚至还称不上是一体化道路上的经济空间。直到现在所有前进的意图都碰到了缺乏欧洲政治概念导致的阻碍。所有的欧洲人都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普遍地为此而悲叹。正如我们看到的，政治建设工具有所创立，但人们还远没有认识到该使之

如何发挥作用。然而政治观念及其对社会前景计划的必要补充的缺乏反过来也会影响已建成的公共经济基础。这使得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及其组成国家如何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定位自身的方案（一个或多个）。

因为欧洲建设的未来仍是完全不确定的。它可能沿着深化发展政治和社会水平的主题的方向前进，但它也可能就此停滞不前，被挤入边缘地带，甚至倒退，失去了原先获得的影响。欧洲还未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

于是每一次欧洲方案遇到对国家至高权提出质疑的危险时，我们总感觉它已达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这个界限还未被越过。我在此举几个例子。

①研究一发展大致上隶属于国家责任范围内，而国家责任向共同体权力的转移却受到严格限制，起不到决定性的影响。难道因为研究一发展与潜在的军事力量的发展联系②紧密—正如原子能联营的例子一样—就将它排除在外了吗？

②公共品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在共同体范围内达到开放的竞争。各国以不同的有时还是迂回的手段避免在这些领域内触及它们在此归入至高权的国家偏好问题。

③贸易权力—特别是企业的贸易权—仍是国家各自的事务。那些有关联合的方案—几乎是“欧洲的”（而不是德国的，英国的或法国的）多民族融合的显然的需要—无法超出纯修辞的言论或学院的研究之外。

④电影电视生产以“文化特殊”的名义被排除在贸易竞争领域之外。法国比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敏感于美国文化侵袭的危险，它走到了这个斗争的最前线并在此指出了一在我看来是正确的—文化独立和政治独立之间的紧密联系。

共同体不是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雏形。从提出了至高权这个问题以来，它退出，任凭欧洲国家

共同或分散地继续这场战斗（或撤出战斗）。

但在有关共同体未来的问题上一向肯定是多民族或超民族方向发展的国家制度——很难分辨出国家经济和一体化经济的关系是由世界目前的发展（而不是由单单一个欧洲的发展）所打破。

到现在为止，除了在国家权力定义的空间范围内，还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现代（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形成历史是一个自动中央集中化经济空间的建设的历史。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生产体系和一个国家政治体系（在某些情况下是多民族的）的建设历史。这种协调提供了较迟进入现代化或独立的国家试图模仿的“模式”。表面的例外正证实了规律。殖民帝国是等级分明的，围绕着中心大都市组织起来；即使今天美国和加拿大构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一体化空间，这也是由这两大强国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加拿大事实上接受了作为美国外省的身份。那些“霸权”，不管是地区的（像美国在拉丁美洲或欧洲在非洲）还是世界性的（像 19 世纪的大不列颠或 1945 年以后的美国），在一个一体化经济空间里并不见效，差得很远；这霸权不过组织起体系中各个组成地区的等级制度。

有些人认为，既然这种一体化经济空间与国家之间的一致性正趋于过时，那么我们将在未来经历多个经济一体化空间而不用将它们组成一个单一国家，或者以某个各国都接受的强国为“领导”（为了避免霸权这个字眼）组成一个国家群体。欧洲也许会提供目前这种发展趋势的例证。我们于是说它像经济实体般融合（至少追求这个目标是被希望的，可能的），既不用组成一个国家共同体，也不用接受某一个成员国的领导（这个领导当然只能是德国）。另一些人则看到，这种一体化经济空间与国家间的协调仍在继续加强并因此，或者欧洲继续它的国家共同体，或者接受“德国的欧洲”，或者分裂。

两种学派都承认世界一体化的加深将彻底摧毁国家生产体系，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建设——地区化子空间可能组成这个体系的一个阶段并成为其构成因素——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而且应该以政治的和社会的手段来管理这种演变，这也是人们所希望的。反对这个运动即是缅怀已结束的过去，在拒绝这个注定要失败的策略所暗含的所有戏剧性的结果的同时也拒绝了进步。同时也拒绝了“德国的欧洲”，这事实上是接受了世界一体化在一个全球扩张和美国霸权的框架内进行。这个未来世界就是由既弱又分散的权力（我们几乎不敢再称之为国家）组成的体系，服从于无处不在的市场的需要，也就是服从于全球化生产体系各个环节的自身的特殊的规律。这个世界的宪兵将会是——也只能是——美国，即是绝对的军事权力，惟一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即使这个国家和这个军事权力愿意举着一面庞大的世界政治组织（联合国）的旗帜行事。对某些人来说，这种前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全球发展中合乎愿望的一种进步，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发展，也包括社会方面（它为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显然不是如此。就我而言这是个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幻想。

于是我们回到无法回避的欧洲问题上来。从哪里说起？我想我们可以从一个有着以下特点的“确实存在”的欧洲谈起。

①它并没有组成一个一体化经济空间，而只是近似地建立了一个优先大市场；并不存在欧洲生产体系，也没有“欧洲的”生产实体和“欧洲多国公司”。各国生产体系的侵蚀——这是不容置疑的——在这些条件下产生了，并非是为了优先重组欧洲，而是要与全球化生产体系各环节相适应。英国在这个方向的选择是清楚的。英国金融业——过去遗留下来的最光辉的残迹（正是伦敦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让大不列颠坚持下去，尽管已趋于衰退），更偏好世界一体化的需要，而不是一个可能的欧洲

金融建设的需要。英国工业也做了个类似的选择，日本汽车工业在大不列颠岛上安营扎寨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但我们要认为大不列颠是个例外那就错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实际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②它并不是建立在随便一个什么共同体社会方案上的。要相信这个严肃的判断是经过事实验证的，在我看来，只需要看看所谓的“社会规模”在共同体规章之中只占据了怎样小的一个边缘地位。在此我并非轻视某些原则的重要性，这些原则为所有（或几乎所有）欧洲社会的主要观念所接受，并因此而被共同体再次肯定。男女待遇平等的问题就属于发展的新的产物，就像生态问题一样——从一般原则意义上说。但除了这些以外，共同体所持有的一致观点就少得可怜了：工作条件，工会权力等等在主要成员国内已经是老问题了。但既没有社会所有权方面的主要问题（一个超越了关于私有权/公有权的有限度讨论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工作前途及其社会地位的问题（除了那些有关劳动者“协商”的空泛的无聊话之外）出现在共同体的决定日程之内。而且也肯定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日程之内。因为自从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这曾经是在半个世纪内占统治地位的庞大的社会方案——用尽了全部潜力以来，欧洲社会就再也没有过一个能引导它们前进的社会方案了。这种缺乏并不仅仅是古典欧洲右翼对现行事务的管理的产物，但这些右派却因为这种缺乏更容易进入政治舞台。因为他们过去在接替当时的左派管理福利国家时总显得较为拘束。这种缺乏在今天也同样关系到欧洲左派。而仅仅靠政治生活管理中民主实践方面的共同观点是弥补不了这个空缺的。若我们只指望着它，那么这个观念同样的受到侵蚀的危险。

③在对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问题是上，它没有组成一个有着共同看法（或者甚至更严格地说，任何一个共同看法）

的整体。这种观念的缺乏不仅与经济领域有关，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说，欧洲人（国家、党派、观点）并没有在全球一体化或一个实在的优惠的共同体一体化（这将暗示着在这一范围内一定量的“分离”；而“分离”这个词，正如我们所知已经被排除在外）之间做出选择。这也同样关系到问题的政治部分。欧洲人愿意与东欧及原苏联合并吗？或者说把它们“拉丁美洲化”？在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它们打算从殖民或半殖民中走出来了吗？面对“发展中”的远离欧洲的亚洲（不管我们对其意义，影响和“发展”的质量如何赞赏——我对此的看法是严肃的），欧洲人除了忧虑之外还有其他感情吗？我们听到有关所有欧洲国家对所有亚洲国家（日本，中国和“四小龙”）的贸易逆差让人无法接受的话重复了多少次？而相反与其他地区的贸易不平衡却是一完全可以接受的？欧洲人观念——除了那些无用的，与现有的四处抛锚的小利益的经营相联系的概念——的匮乏带来的主要后果是任凭美国掌握“世界概念”的垄断和经营这一概念的方法（军事的）。

以上所提到一切显然都逃不过欧洲人的眼睛，他们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他们甚至也想出了一些垦荒和应付未来的工具。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似乎想给予自己面临的挑战的答复，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

一般的欧洲公民都完全了解对他们来说市议会、议会和政府代表着什么。但在共同体机构组成的迷宫之中他们却根本摸不着头脑。可是只有从分析这些机构是什么和做什么入手我们才能在争论挑战的性质及应付它的手段时有所前进吧。

“委员会”并不是一堆由“专家政治论者”经营的部门的拼凑体——就像别处一样。它也不是一个政府（超国家的），因为委员们并不像在各部门间（农业，工业，金融等）分配任务那样对某一个特定领域负责，而是专门负责某一委托于共同体的

任务。它同样不是政府的雏形，因为任何一个涉及行使最高权力的领域（警察，军队，外交，司法等）的责任都不会委托给共同体。我们甚至知道这种缺陷会演变得多么危险，因为例如一个“欧洲极”（Europol）为了仅服从于警察间的合作显然将远离公众的视线……这也是为什么委员会的主席并不像总理那样，有着制定总政策并为此协调下属各部长活动的责任。

于是定义政策及权力的委托与组织的任务就在委员会之外由理事会来完成。我们应该说是许多理事会，也就是说有关国家的部长会议。我们经常注意到这种组织结构松散，意见分歧。例如财政部门做出的一个决定与农业部门的决定起了冲突。在国家范围内，类似这样的不一致可以通过部长会议和总理的作用来避免，但在这里却不能做到。

议会是其中之一吗？或至少是真正的欧洲议会的雏形？在这方面事情还远没有定。对预算（这在实践中是由理事会事先决定的）和对委员的挑选的许可仍停留在形式上，责任架空。另外，欧洲代表由全体欧洲人（必然在多民族范围内）选举产生的观念在欧洲大陆的政治文化意识中尚未成熟。

因此共同体机构制度最终成了执行一个不知名的国家间政府的政策的部门制度。然而这个政府无法在最基本的问题上采取清晰的前景战略，这不就是因为欧洲各国政府随意变换代表国家的多数派，但在欧洲范围内却无法使这些掌权的多数派—左派或右派—碰巧一致吗？但更重要的是在各个成员国内没有一个相同的占绝对优势的观点。在欧洲建设的未来是没有“德国概念”或“法国概念”或“英国概念”之分的一即使某一时刻每个国家的政府在日程决议问题上各持己见。也不存在左派右派之间对比鲜明的意见分歧。普通的不同观点，有时也会有根本分歧，但只存在于每个国家左派或右派的中心。涉及欧洲前途的观点对分析家和欧洲政治家来说成了错综复杂的谜。这

对现阶段方案的运行既无好处也无坏处，因为欧洲机构仅仅负有完美定义下的执行的责任。

#### 4. 危机和东扩：新的挑战

欧洲如今面临着新的双重的挑战：(i) 危机，(ii) 向东欧扩张。然而在西欧——主要由发展程度相对接近的国家组成——的有限范围内，在由于建立在福利国家有效方案的运行基础上而使经济增长较为容易的时期内，市场的开放——被做为共同体建设的几乎惟一的纲领——并没有带来太严重的问题，开放导致的这儿那儿的困难也从来不外乎是局部的或是无关紧要的困难，因此用不着太大的代价就能克服，但是在今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大量的顽固的，若社会劳动的基本概念不能更新则也可能是持久的失业，加上共同体扩张（逐渐地）涉及的整个欧陆范围内各国发展水平的极不平衡，就构成了挑战，现行的市场开放对这些挑战而言根本无效且成为了令人怀疑的把戏。

欧洲因此而面临三种问题，要迫使它做出客观上的显然困难的选择。

①对欧洲政治建设最终观点的选择不可能被无限制延迟，或甚至被回避。不用太过简化我们就能在以下字句中定义这个选择：我们是否愿意最终达到一种超国家的政治权力（在“欧洲的”行话中我们一般用“联邦的”这个字眼来描述这个选择）？或者我们只想设计一个“多民族的欧洲”（有时也被称为“同盟的”）——就是说一个由保留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家组成的欧洲。对这个选择的支持者们认为它可与一个完善和加强单一市场的经济一体化相容。就我看来，我对第二种选择的现实性表示更大的怀疑，因为我不认为一个前进的经济一体化在没有一个共同政治权力的建设的情况下是可能的。若没有政治建设，欧洲方案的经济部分将难以在单一市场上有更大的进展，而在



这一领域取得的成果也会显得脆弱而容易反复。

不管在哪种情况下，即使在最“欧洲化”的假设中，忽视由历史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民族的牢固感情都将是虚幻的和危险的。因此需要表现出高超的想像力，以创造出一种可以调和这种感情和一个可能的共同“欧洲”的恰当而有效的形式。任何一种由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历史经验提供的模式——联邦的或同盟的一都不能适用于这个特殊的崭新的挑战。

无论做了什么选择，一种“多速度”的建设仍可能无法避免。在“联邦制”假设中这是很显然的。但即使是在不考虑国家最高行政权力一体化的“同盟制”中，“单一经济体系”也不可能强加于所有的欧洲社会——尤其是当共同体向东扩张时——更不可能“快速”地强加。除非用最小共同点来定义这个经济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就只是一个开放的大市场而已了。因此无论如何都要求一个不同速度的进步。就是说我将在此重复我在上一段中表述过的观点：以将经济一体化做为欧共同体惟一“核心”为方向而没有共同的政治权力，那么想超越共同市场的意图在一定时候是注定要失败的。

②欧洲大陆也许想在未来的世界上构成一个整体区域（用它的“欧洲化”？），但它还远没有达到可以称霸的地步。这不仅仅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可能抹杀现实的国家所组成（对许多人来说，用削平这些差别来使之一般化并不是合乎愿望的），也由于其构成的党派发展水平和结构是有差别的，不平衡的。

要划出某些地区“中心”界限并不困难，因为尽管这些地区属于不同国家，但它们有着很多的共同特点，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但这一界限之外，在四个基本方向上（西南，西北，南部和东部），那些社会在今天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挑战，就有着不同的性质。

一种有效的方案——是严格的经济方面的一囊括“中心”及

其外围地区，建立在对这种不一致带来的问题不加理会的基础之上。即使是一个严格的共同市场也不一定是所有人所期望的。在我看来，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若不采取系统性的适当的限制措施，同意东欧其他国家的加入将会加重由市场规律作用自然引起的扭曲。显然更不必说在经济方案向更大的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的情况下了。

③我觉得最令人担心的并不是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尚未被欧洲人看到（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些），而是——在我看来——所主张的解决方法一开始就把方案带入了绝境。

正如我们所知，建立了新的“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回避了欧洲所面临的主要的政治方面的挑战。于是在逃避了困难之后，它不只是将欧洲建设搁在了一边，而且将之带入了我所认为的死地。我们知道，这个条约给共同体的发展优先提供了创造单一货币的条件，换句话说这个选择是继续经济一体化方案而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单一货币），但联盟的政治前景却仍然没有确定。

做出这个选择的理由大家都知道：保证单一市场的运行，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的稳定，要求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因此需要单一货币来限制）。我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因为它在两个方面是不足的，如下。

（1）只有超越共同货币政策之上，所有成员国实施的经济、社会政策都相同的情况下，这三个目标才能同时实现。我想说的是，要让这一体系运行，就需要使成员国的政策（有关税制，公共支出等）是相同的，生产体系各环节的策略（各分支，各部门企业集团等）也要一致，同时社会各组织的战略（特别是工会组织）也要相同，等等。

（2）很难——在危机时期更不可能——形成一种能同时保证“内部开放”和“外部开放”（资本流通市场）的欧洲政策。这

需要做出选择。若优先保证内部开放就意味着要采取壁垒政策以保护自己不受外部影响。但分离的概念又一次被放弃。

这个不幸的选择在我看来是正在流行的货币主义理论的产物，没有别的原因。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实体——国家或共同体——都能实行一种“货币中性管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认为这个纯理论的概念并不是真实的可持续的历史存在。这种管理表面上只存在于某些缺乏社会方案的社会顺从于市场单方面规律的时刻。但历史证明，这种时刻通常是由混乱转向有社会方案定义的新的社会秩序的时刻。在这时，货币重新恢复其本来性质，不是一件商品——就像流行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的那样——而是一种集体意愿发挥作用的工具。

因此欧洲选择了求助于一种“神效药”，以从摆脱它所面临的困难的政治选择。然而德国的联邦银行及追随其后的其他一些中央银行所追求的“中性货币政策”并不一定是持久的。只有负责经营的保守力量执意以自己的方式管理危机，即采取螺旋型下降的价格（这总是扩大危机的范围），这种政策才能被继续。但是我们打赌这个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已经出现了一会使之寿命比预期的更短。1996年创立欧元的计划已被延迟到了1999年。它也许会被无限期搁置。

##### 5. 暴风雨中的欧盟；真正的挑战：贸易空间还是政治一体化

由于不幸地给予了公共货币的创立以优先权而身陷死地，欧洲建设已经进入了暴风雨的区域。这个选择面临着最保守的力量，他们执着于一种没有出路的管理危机的方式。社会上对这种管理的致命后果的抗议声——已经很高昂了——将毫无疑问地扩大。这个将欧洲方案与极端新自由主义政策联系在一起的选择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快速地颠覆普遍的思想并使之向反对

欧洲观念的方向发展。那些仍然相当脆弱的，原本有利于逐渐贯彻这种观念的成果，也会迅速被腐蚀掉。

这是灾难性的剧情发展。性格乐观的人会说，欧洲历史上也曾有过其他这样的灾难，也总是能战胜挑战。的确，这块大陆上的社会决不曾因自己的历史而脸红，也总是能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但它们因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总是沾满血腥的，就像民主对法西斯的斗争。

欧洲并没有受到外来的威胁。从1945年到1990年都没有，即使某些政治力量曾煽动一股对于苏联及“共产主义”的恐慌，但那是极其虚幻的。认为今天它可能受到南部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伊斯兰理论为基础的——的威胁的言论也近乎可笑。那些可能在南部的这里或那里掌权的不幸选择的受害者只会存在于它们自己的民族和人民之中，因为这使它们更加落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显得更加弱小。

欧洲只受到来自内部的威胁。对西欧来说，这种威胁似乎还没有达到戏剧性的紧张感。传统上著名的归类于“民族冲突”——或共同体冲突——的争端（爱尔兰，西班牙，比利时构成了这些冲突的主要舞台），并不是注定要加深和无法解决的。我们有些难以想象这些过去曾反对地区强权（大不列颠、德国、法国）的冲突会再次产生并由此形成新的欧洲内战。在东部则相反，这个戏剧性的门槛已被跨越。为“由战时生产转向平时生产”而强加于东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荒谬性造成了社会和经济的灾难，甚至从而动摇了对民主成果（看起来似乎是后天的纯环境性的）的信任。地方政治力量无疑要对那些将国家陷入了螺旋倒退中的动摇地区的强烈的危机负首要的责任。但西欧国家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它们向火里浇了水还是油呢？事实上直到今天它们选择的还是后者吧，即使不是有意的（对所有国家）。为支持这股由新自由主义的混乱产生的不可避免的

离心趋势，西方外交家火上浇油，他们鼓动那些陷入绝境的政治家们找寻一种新的基础，这种基础——“种族的”基础——能建立他们权力的合法性。显然他们并没有像南斯拉夫或苏联那样炸掉历史建筑，也肯定没有发动流血冲突。显然最先的那些混乱的“选举”除了带来一些不安之外没有更严重的后果。欧洲并未选择帮助这些想靠耐心取胜的力量——这种耐心常常能缓和第一反应的激烈性。我在此指出德国似乎曾在破坏性的干预中扮演了火车头的角色。它单方面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一个月以后共同体认可了这项决定。这可能就是暗示着存在某种运行的方案（德国的？或欧洲的？）：把东欧拉丁美洲化的方案。

在短期内，这种拆除国家间壁垒和瓦解社会的方案，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像管理一个市场那样管理世界”的乌托邦的观念：尽可能地反散权力，剥夺国家一切有效的国家权力，面对一个无处不在的“市场”。

然而自从铁幕不再存在以来，在半个欧洲内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另一半。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负面的例证总是比正面的要来得强烈。随着西欧危机的深化，东欧的新法西斯主义促使了西欧法西斯的复生。但在这个危险——非常幸运地仍停留在边缘地区——之外，这种混乱也促使了国家民族主义的复苏。即使欧洲国家在整体上提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证据，这种寻求国家或民族主义的意图仍将加强。我们也许会回到——并不是情愿的——19世纪的欧洲，那个“国家冲突”与“阶级斗争”占据前台的欧洲。

欧洲建设的厄运并不比阿拉伯联盟、泛非主义的胜利或拉美一体化的更多。离心的趋势在欧洲存在并起着作用（包括西欧）。对每个欧洲国家来说存在着大陆联盟以外的其他可能的选择。

英国长期以来更关注与英联邦的联系——那是它帝国主义霸权的遗产——而不是欧洲的一体化。从1945年开始它就做了一个以后也从未放弃的选择：把联盟的优先权无条件给予美国。到了现在，这个选择已经能够与对欧洲的归顺取得妥协。但在未来，如果欧美竞争尖锐化了，那又该如何呢？或者若欧洲分裂了呢？若德国统治了欧洲呢？

在1945年到1946年间，法国曾考虑在“合作主义”的框架下重建它的帝国（联合独立国家——或从严格意义上说注定要独立的国家）。殖民主义者的力量去除了这个计划中的潜在的革新意图，使殖民关系一直维持到法国资本主义内部关系的转变——变得不利于衰退的殖民者的旧的利益而有利于因有效的现代化政策而活跃的部门——使法国在欧洲一体化的方向栽了跟头。法国如今没有其他可能的选择了。这也是它弱小的一个原因，因为欧洲的主要强国——德国——有更大的操作余地。

德国自1871年以来，已发展了它自身的计划——“Drang Nach Ostern”（向东扩展），它有否放弃这计划呢？当然，德国像英国和法国一样已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第二帝国（俾斯麦）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希特勒的令人憎恶的第三帝国就更显然不是了。因为意识到了这个成果是最根本的，德国的民主力量相信，为了恢复民主，“欧洲的德国”应该比“德国的欧洲”更好。不管怎样，第四帝国已经存在了，它对南斯拉夫的干预，对“苏台德山脉问题”的令人担忧地重提以及很多其他迹象都表明了这一点。可能吗？一个民主的第四帝国？为什么不呢。英法帝国主义也曾经很好地发展，并没有重新置疑其大城市中的民主。一个民主的第三帝国可能还会重拾“向东扩展”的目标，同时令这种扩展看上去不会使东欧的人民难以容忍：一种靠经济手段发挥作用的地区性霸权，就像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做的那样（美国同样是个民主国家，霸权并没有毁掉这一

点)。于是德国拥有的操作余地就很大：它继续自己的东扩计划，并不与欧洲方案冲突，它的搭档（首先是法国）被迫承认它的创举。这显然就是在“美国的世界”中的“德国的欧洲”，因为德国不会再犯眼高手低的错误（这曾经是希特勒的致命伤）。

共同体其他国家可能的选择，在目前来说，因它们未来的影响而比较的不确定。但看上去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及斯堪的纳夫地区国家似乎没什么太大困难就能接受“德国的欧洲”，特别是如果德国在没有放弃民主的情况下施行它的战略。

俄罗斯和前苏联那些即将（或已经）成为它的或其他人的（德国瞄准波罗地海沿岸和乌克兰）垂涎目标的国家可能无限期地置身事外吗？这里，在仍然是短期内的“东扩”计划中，德国首先考虑的只是一个有限的扩张，目标是奥地利（已经因此并入了它的空间）、捷克共和国（正趋于买办化）、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

为总结这一灾难性的蓝图，我要说，在我看来，似乎要被迫重现一个19世纪的欧洲——要么是一个英法俄联盟以限制德国野心，要么是一个新的德俄瓜分，最终将使法国孤立。

幸运的是，这张灾难性的草图并不是惟一可以想象到的前景，同样存在在一张进步的蓝图，尽管成功的条件很苛刻。

欧洲方案不能满足于单单一个“多民族空间中的民主管理”。这个最小共同点即使只是保护既得成果——无论是共同体的（经济方面）还是仅仅民主方面的——也是根本不够和无能为力的。危机一并不是“衰退”，而是社会的结构性的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可能会严重腐蚀欧洲民主传统本身的合法化。

欧洲方案只有做出一个真正的在现时问题的高度上的社会方案，才能找到应付它所面临的挑战的方法（欧洲该如何发展？

如何调和欧洲发展与全球化？如何调和欧洲的国家与超国家权力的关系？）我在此总结性地列举一下做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方案所要包含的各个方面。

①一个社会方案首先是一种社会观念，一种对社会关系所持的观念。这不可能只是暗含在背后，由生产体系的再生产所产生。它应该在社会关系本身的领域内被阐述出来，这些关系是作用于生产体系基础上的阶级关系的一部分（做为核心部分），但又超越了在现实中各个领域展开的社会关系（比如男女关系）。我们可以用“社会合同”来形容这种阐述的过程。我没看出其中有什么坏处。何况我们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历史，其发展创造了欧洲（和美国）的奇迹：以三方合做为前提的国家对资本/劳动的历史性的妥协，国家则——不可避免地——成了商议的场所和实施有关妥协方案的工具。问题并不在于“复制”这一模式——它早已在全球化运动和欧洲本身的建设中完全过时了。无论如何社会合同的出现应早于而不是晚于在它的框架和基础上开展的经济战略。传统的经济学家很难接受这种排序。他们总是认为——经济学的束缚迫使他们这么想——经济决定一切。在定义方案的社会关系之上贴上“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标签也没有用。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概念毫无意义，或已失去了其历史意义。这些意义仍牢牢地保持着。只不过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过渡暗含着各种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因素的有冲突的并存（市场，利润，劳动等级……）（公平，民主不是资本扩张的自然产物，而是人民反对单方面资本积累的斗争的结果）。

②除了调节生产体系再生产条件的“社会合同”之外，一个社会方案，在适应现时要求的高度上还暗含着一种对我们的技术文明未来的看法。未来劳动问题被提出。在工人——福特时代的大众——之后，有知识的劳动者——公民——有趋势在未来的



生产体系中组成一个新的“大众”，而这个生产体系是建立在信息和自动化技术及其造成的各生产环节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至今为止仍遵循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规律的形式——之上的（经济学家天真地这么表达，因为发现“技术因素”是生产量的最主要和最终的决定因素）。这样的劳动者会不会用“公民收入”这个称呼来代替工资呢？同样也不用说生态问题的挑战的提出——无法包括在短期内建立的传统的成本计算中——也在新的领域中带来了经济决定组织方面的问题。也不用说德国的“参加管理”或“共同管理”远没有对这些文明挑战做出答复。所有制的未来及在那些新形式——我们应向这方面发展——之上的未来在各个方面呼唤着社会思想和行动。

③是否应该想到民族团结赖以建立的历史概念自身也遇到了“超国家”问题的挑战（当然是在欧洲建设之中，但在别处也是一样）？在这个框架下如何重新看待困难、特点及其世界性呢？

④直接从政治方面来看，欧洲方案面临着欧美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到今天为止一直受到北约这个军事同盟的限制。这个同盟所要防范的竞争对手既然已经消失，北约的继续存在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完全捏造出来的新的对手（伊斯兰，亚洲各国？）一试图通过仓促地建立一种“文化冲突”的理论来证实其存在，而除了早已相信这一点的人之外没有人会被它说服——吗？即使这个竞争对手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危险？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北约竟成了世界民主化的工具，它的矛头指向“文明化任务”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以不自觉的大笑来回答它。当我们用并不天真的双眼看到了今天那所谓的军事干涉（为了科威特的民主而发起的海湾战争！）的时候，就更可以发笑了。事实上，北约是资本主义管理下的经济方面引起的混乱的政治管理的必不可少的武器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只要欧洲不能克服危机，就只能接受美国军事霸权的侮辱。因此，让这个全球霸权永久持续下去的这个选择绝大部分地毁掉了欧美新的经济竞争带来的影响，也大部分地毁灭了欧洲的“独立”梦。

⑤应该想到，欧洲方案与欧陆东半部拉丁美洲化的计划有着直接的冲突。我已经试着解释了后者为何及如何毁掉了前者。

⑥最后，欧洲方案能忽略南部发展并只听从那些被第三世界“边缘化”的表象所迷惑的经济学家们的空话吗？即使是在获得全球自然资源对“西方”而言已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的时候？的确，这种获取可以用一种新的全球帝国主义来衡量。除了这种全球殖民主义可能有必要成为维持所谓的美国竞争霸权的最佳手段之外，我们想得到有一天它会可行的吗？相反的，在一种有利于各自发展的互相依赖——敏感地减少着市场带来的全球化固有的极化的影响——之中，如何看待那些大的地区（欧洲，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世界）与大陆上的强国（美国，中国，印度）之间必要的联结呢？我在其他地方发展了有关这些问题的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

总之，如果我们承认在此提到的六个论点组成的观点自然属于左派思想、运动及进步的传统，那么欧洲就将是左派的，或者不是。

## 参考书目

有关欧共体发展的材料本身就足以构成一家图书馆。一个出色的综合分析由有：

罗伯特·杜尔蒙 Robert Toulemon, 《欧洲建设》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袖珍本, 参考 1994.

同样有：

Louis Cartou 《欧洲共同体》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Précis Dalloz.

Laurent Cohen - Tanugi, 《危险中的欧洲》 L' Europe en danger, Fayard 1992.

Yves Doutrianx 《欧盟条约》 Le traite sur l' Union européenne, Armand Colin 1992.

Pierre Gerbet 《欧洲建设》 La construction de l' Eutope, Imprimerie nationale, 1982.

## 第七章 后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模式

中国已经连续 15 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年增长率为 10%——这样的增长率出现在拥有 12 亿人口的国家里，无疑会打破世界所有的基本平衡。而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尾随其后的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饱受长期停滞之苦，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相继陷入衰退，振兴无望。

一般认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为什么中国能迅速取得辉煌成就，东欧和前苏联的资本主义演变就是如此痛苦和毫无建树呢？为什么当代中国的发展结构与我们观察到的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发展结构如此迥异呢？

对这些问题可以做出各种性质不同、角度相异的回答，与执政力量施行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的有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辗转与经济政策发生关系的有之。事实上，世界体系本身就是一分为二的。整个美洲大陆、欧洲（从大西洋到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崴）、非洲和西亚属于西半球，西半球的国家二十五年来一直处于不同程度的危机之中。东半球则相反，所有的东亚国家——日本、中国、韩国以及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平安无事。当危机在这个范围扩大了西半球日益加剧时，东亚国家进入

一个强劲发展阶段。发展的势头似乎还能继续，也许日本是个例外，它好像也陷入危机。我们自然想知道，这种对比与东欧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变化之间的对比之间有没有关系？

我先回答第一部分的问题，这些问题同对前苏联和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各自的政治、经济概念的比较有关。

这种比较可以简单明了地概括如下：东欧国家（以及前苏联的共和国）没有实施转变的构想，也没有一个社会模式。当然，它们有意识形态，一种通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是没有要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的计划，无论这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则有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我绝不认为那是社会主义模式，我将其称为国家社会资本主义模式。中国坚持社会主义的左派试图对当权派的这一模式进行调整，将其归入一个长期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

我用国家一词意欲说明该模式建立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上，即向世界体系融入的过程从来就不是和平的，而是动荡的和不断发生冲突的。中国的领导阶层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普遍认同这个观念。中国人可以对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发表的讲话嗤之以鼻，而在东欧国家，领导者和政治家里不乏戈氏的推崇者。戈氏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各国加入这种扩张的结果之间有着天然的聚合关系。与之相反，中国将美国视为对手，一个随着中国的强大会越来越强硬的对手。在这方面我还要提一下萨缪尔·亨廷顿那篇著名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它为美国采取越来越公开反华的政策进行辩解，其思想内容完全是为中央情报局服务的，中国之所以对美国产生威胁，不是因为它实行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断强大的大国。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这里不涉及过多的细节，我只想说明一点，它的经济增长率即便需要打上一个折扣（特别在

农业领域，追求短期效应的现象比较普遍），还是相当令人吃惊的。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高速增长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主要是由出口拉动。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出口的增长率是11.5%，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9.7%。在世界银行做为“因优先发展出口而取得成功”的榜样的国家中，出口的增长率基本上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

中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其他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特征。同第三世界国家平均通货膨胀率（从处于衰退中的贫穷国家平均每年的14.9%到中等收入国家的73%，经常被世行援引为例）相比，中国的通胀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外债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相比也是非常之低。债务中的服务部分与出口收入之比1980年超过4.6%，1990年达到9.8%；而同一时期印度的数据分别是9.1%和26.4%，其他的穷国是11.4%和27.4%，中等收入国家是26.1%和23.1%。

这些宏观数字无疑显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对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提供有力的支持，但还不足以做出“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判断，还不能据此对历史局限性和发展前景进行讨论。

回过来看中国与苏联的比较。这里面肯定有共同点，因为它们都是在第三国际（布尔什维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有不同之处，这是由两个共产主义国家和两种革命的发展历史条件决定的。

在俄罗斯，从1917起，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展生产力的条件和方式一直是辩论的中心问题。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一个以农民为主导的落后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社会内涵，以及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改变，现代化建设成功或失败的本身反倒不那么重要了。1930年之后最终形成的道路——建立在某种形式的集体化基础之上，打破了工农之间的联

盟——不仅使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彻底破灭（实行专制，这是将一个梦想成为资产阶级的阶层进行重组的基础），而且可能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不幸的选择是以工运为中心的、同农民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意识形态由资本主义西欧工人阶级（以及第三国际）的历史一脉相传，先是得到列宁的认可（尽管他曾通过与在1917年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革命派结盟来试图纠正选择这种意识形态的不良后果），接着又被斯大林全盘采纳。

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同俄罗斯共产党一样，初创时期的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工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共产主义运动早期还非常薄弱。这两个知识分子的政党都能够发动并且深刻地影响工人阶级。不同的是，俄罗斯共产党1917年之前没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1930年后在中国农村发生的战乱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此后的中国革命，从1949年至今尽管也是几经波折，但同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相比，“工农联盟”问题解决得还算比较成功。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内部交流关系从来没有出现俄罗斯历史上的那种极度恶化。

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将两种革命区别开来。俄罗斯革命完全清除了资产阶级，中国则非如此。抗日战争使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之后赢得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国内抵抗力量的强烈好感。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之所以能结成广泛同盟，正是由这一因素决定的。

在这些历史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国家和社会的现代社会模式。此处的国家是褒义词，因为它不仅牵涉到实际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态度（即反帝国主义的），同时促使政权在社会责任的基础之上构筑其合法性。这里我用的是社会责任而不是社会主义责任，我感觉社会主义必须要引起生

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剧烈变革，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而社会则意味着必须在真正社会的团结的基础之上考虑发展问题，通过一些可以称为“社会正义”（就业、社会服务、收入的重新分配等）的具有系统性的政策实现发展。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国家社会模式有些类似于西方的民主社会模式。

这就解释了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市场不大的原因。这里没有人会愚蠢到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一个有趣的悖论：在资产阶级相对强大的地方（如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反倒比在资产阶级相对较弱的地方（如东欧）更难以为人接受！但我认为这种悖论只是一个表象，只需将意识形态/阶级和社会实际利益逐一列举即可解释这里的区别了。同样，自由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的东亚（资产阶级相对较强）也只是被接受一半，在资产阶级最为脆弱的第三世界其他地区却被全盘接受。

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点。总的说来，它不仅是第三国际而且是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特别是历史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1914年之前）的遗产。我多次提到，恩格斯曾对这些工人运动思想提出批评，认为它们更多地是为实现一种“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提供精神动力，而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生产技术中立思想，党的“先进”性和国家、党、阶级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等其他一些思想是这种共同遗产的主要内容。苏联从未置疑。毛泽东则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提出自己的疑问，特别是在以下两个关键问题上：技术的中立和资产阶级做为重组堡垒的专制政党。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其原因可能是未能发现和组建能够执行他的政策、替代“青年”这个较为模糊的阶层的社会代理人。

毛后的中国相对毛的社会主义目标来说，尽管有所退步，还坚守一个国家和社会模式，对“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抱太多幻想。



因此，说（如世界银行和主流媒体）中国 1980 年之后能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放弃社会主义，从而步出“毛泽东时代的停滞”，这不仅是将事情武断地简单化，而且是蒙住眼睛，不愿获悉取得“成就”的真正原因。如果没有奉行毛泽东思想的 30 年间打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基础，很难想像会有近 15 年的飞速发展。要强调的，就是在原来基础上的加速发展。在 1957 年到 1975 年间，中国就已经取得 5.3% 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都低于 2%），从这段时间就已取得轻工业 11.2% 和重工业 8.3% 的创记录增长率，已经建成一整套收入分配的社会体系，远远优于（即公平）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此外，正因为印度没有从类似的重建工作中受益，尽管它比中国更资本主义化，更加向世界体系开放，但从效率上看，在社会公正或独立性等各个方面都要逊色，将来也是如此。

邓小平时代的中国虽然已决意“重新融入世界体系”，但对著名的休克疗法仍断然拒绝，这种疗法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彻底私有化、无限制的自由市场和不加控制的对外开放。东欧那些出自前特权阶层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全部成为休克疗法的信徒，结果正如大家如见，东欧进入了一个现在也未见有复苏迹象的衰退期。

中国式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公有制的一种权力下放。国家在 1981 年还是绝对主角（所有制关系：国家 78%，集体 21%，私有份额可以忽略），到 1990 年国家持有的份额缩减到 54.5%，减少的部分主要流入集体所有制（省、市、工会性质的组织和合作社：35.7%），而非个体所有制，其份额不超过 5.4%。

为追求合理性（从来没有合理过），中国实行一种市场竞争的原则（企业自由定价）和计划原则（强制定价或国家机构干预市场）混合的价格体系。“苏联式”体系在 1978 年还处于统治地位（中国的体系从不像苏联那样极端，一直非常注意市场

的供需情况),从1990年起,约有一半的消费类工农业产品采用自由定价的原则(但在设备和原材料市场上自由定价的产品只占到36%)。

中国当然也有“暴发户”,有时(并不总是)他们是靠从事具有竞争力的经济活动以及从经济效率角度很难做出判断的新的不平等中(如外资私营企业的干部和其他行业干部工资的差距)致富,但仍然有一种多层次的广泛的结构来保证收入在12亿人口中进行规模庞大的再分配,在其他任何一种经济模式中找不到类似的结构。结果非常明显:尽管国家底子很薄又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却没有出现“新的赤贫户”,总之,与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绝不相同,无论其经济有无增长,与东欧的情况也没有相似之处。

此外,中国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会威胁到国家统一。不仅意识到,而且借助于仍然相当强大的中央集权力量(国家预算绝对不容忽视),采取许多旨在加强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依赖关系的政策。上海地区正在逐步落实类似的政策,将包括四川在内的整个中部地区纳入它的经济发展圈。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以“出口为导向”。这些政策至少起到了一些作用,即使是最穷的省份,它的经济增长率也接近或者要高于人口增长率。当然,同最发达地区高达20%或25%的增长率相比,这些省份的成绩还是微不足道的。

第三个“积极特征(长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处于政府的合理控制之下。事实上在中国,绝对不是随便谁想进口什么就进口什么。美国人指责中国“在关贸总协定规则上弄虚作假”时,他们也没拿出真凭实据。需要澄清的显然是在无法正式判定相关规则的公正性时尽可能回避的作法是否正确。

我还要加上第四点,同以上三个“积极特征(长处)”对立

的一个“消极特征（短处）”：统治阶层似乎坚信，只要政党国家按照现在的样子正常运行，就能达到根据这三个积极特征确定的目标，不需要大众阶层的自发参与。我认为，苏联的历史已经清楚地显示，这里恰恰是一个巨大的错觉。

似乎已经找到足够的论据再回来讨论我们开始的问题：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其社会性质如何？（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某个阶段的），它是如何与地区 and 世界经济衔接的？

确实有一个中国统治阶级的模式。考虑到上面提到的三个积极特征和一个消极特征，我试着称其为国家社会模式。那么，它有哪些冲突之处，它的问题何在，它成功或者失败的可能性有多大，它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分析中国的问题时，一种传统的方法是借助“地区冲突”。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地区与生产方式（进而是当地的统治阶层）对应起来：“封建和官僚主义的”北方，“民族资本主义”的上海，“买办式”的广东。我们谈论的中国模式就是三种成分在保持政党国家官僚主义主导地位前提下的融合。民族资产阶级能否通过勾结逐利的腐败官僚达到进入国家机器甚至将国家据为己有的地步？对大众阶层自发参与的排斥能否使这种向更十足的资本主义的演变更加顺畅？

甚至可以设想一个让人更不愉快的演变结果。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如果进一步加剧，不正是为国家爆发冲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曾经发生过，绝不能忘记这一点）创造条件吗。设想一个以广东—香港—台湾为中心，向太平洋和海外华人开放的南方，历史决定了它的买办性质。这个地区会同以上海—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优势互补或者相互竞争吗？西北的一些省份遭到冷落，西藏和新疆实现“独立”——这一将中国解体的计划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美国和日本已经在政治时间表里做

出安排，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中国（哪怕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逐渐强大起来的预期。

一个统一的中国和一个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东亚乃至在世界经济中显然具有不同的地位，中国或者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或者它的各个省份自行其事，地区经济发展势头虽然迅猛，但远不足以在全球范围内抗衡美国的霸权主义。

还可以设想一种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发展更为有利的演变。中国政权不认为他们的模式是“资本主义的”（尽管它是民族的），而是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里重要的不是对有关主体的客观性（他们是否诚实等等）进行深入调查，也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定义发表一番溯源求本或形而上的宏论。

这里我想提出不同以往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对中国正在展开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给予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将辩论引到关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漫长过渡”的挑战的讨论上来。

无视在中国展开的各种激烈的斗争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对于外国观察者来说，最显著的事实可能都与“资产阶级的上升”有关：丑闻、暴富、贪污、与外国资本的勾结以及道德与文化的堕落等等。国际媒体则从另一种角度，将有利于政治民主的事件予以充分报道，就像我们在西方听到的那样（人权和多党制）。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民众是否真的愿意提出这种形式的权利要求，中国的资产阶级对民主似乎并没有特别要为民主奋斗（整个资本主义东亚都是如此），各种不同的社会权益才是民众谈论和行动的中心，他们有时也会关注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景。我认为，这些方面真正发生的事实才是最根本的。

但我们不能局限于此，我的意思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讨论必须和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前途的讨论联系起来。第三

国际以自己的方式定义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挑战，并以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加以回应。历史证明，这样建设社会主义至少从本质上是含糊不清的；而且是完全是可逆的。因此我建议重新就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漫长过渡（以世纪为单位的）进行讨论，重新定义其期限。我认为，不应将这段漫长的历史视作不同社会制度并列（地理上）的时期，而应看做以各种社会内部的以及各种制度之间的冲突为特征的，一部分制度从资本主义逻辑中寻求合理性，另一部分则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他社会合理性标准。有点类似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在开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资本主义内部孕育发展。以这种观念审视以中国为代表的“市场的社会主义”（用词上可以有各种选择）模式，会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 参考书目

本文的统计资料取自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1983年和1991年）；国家统计局，1991年，第33页、55页和79页；P.Li“价格改革”（北京周报 *Beijing Review*，1992年第18期，总第35期，第17页）；Nolan和Dong的《中国经济》*The Chinese Economy*，哥伦比亚政治出版社，第143页。

我在这里提出的分析方法（1994年11月撰写）与Lin Chun（《定位中国》（*Situating China*），UNAM出版社，墨西哥，1994年）的分析方法都是各自独立思考的结果，在某些中心论点上有所契合。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过：

我曾经批评过的论文“文化的冲突”（“朝向自由理论” *Towards a theory of liberation*，*Al Ahram* 周刊，第253期，1995年

12月，开罗），参见第十一章。

我的有关苏维埃根源和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阐述（知识分子的道路 *Itineraire intellectuel*, Harmattan 出版社，巴黎，1993年，第161页到第182页）。

关于东亚未来的几种猜想（参见第五章）。

同时参考：

Franc ois Lemoine 《中国的新经济》 *la nouvelle economie chinoise*, Repères, La Découverte 出版社，1994年。

Diana Hochraich 《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La Chine de la revolution a la Reforme*, Syros 出版社，1995年。

## 第八章 世界体系中的俄罗斯： 地理还是历史？

做为区分资本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甚至是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体系的双层崩溃，促使人们向我们以前能够提出的理论质疑。关于这套理论，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斗争领域中提到的很多，在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中也提到很多

分析问题的这两个思路—第一个是历史思路，第二个是地理思路—在被运用的时候通常是彼此孤立的。

历史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当今世界惟一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尤其是在前苏联，这样的观点压倒一切其他的观点。自列宁始，一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已逐渐形成。我将其论点概述如下：（1）资本主义终将会被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斗争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翻；（2）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某些国家、俄罗斯、随后是中国开始，随后是另外一些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会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薄弱环节；（3）尽管有些国家发展落后，但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可能实现；（4）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将在两种国家体系的斗争中表现出来，有些资本主义

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另外一些仍然是（暂时的）资本主义。

这种分析方法中，历史思路享有特权，他支配着组成现代世界（以及做为薄弱环节国家）不同社会形态的政治和社会的特殊性，他使能进行社会地位和作用分析的地理思路附属于他。但是，历史的倒转，推翻了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并把它带到了资本主义，对过渡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提出质疑。

受建立在经济世界和体制思想潮流的基础上的基本原则的影响，在现代历史运动分析中，地理分析法有另外一方面的重要性。在世界体系中发生的事情支配组成这个体系的各个政党的演变。俄帝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扮演的角色可由世界体系的演变解释。并且世界体系演变的理论也可解释苏维埃体系的倒塌。和历史马克思主义的极端主义者对历史的理解就只知道阶级斗争一样，可能对一个世界体系极端的解释也存在着，而这样的解释几乎被世界体系所消灭。而且他也不能改善由体系演变引起的进程。

我在这里同样指出把欧亚的特殊性与其在世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比世界体系这个概念的提出早几十年。在20年代，俄国历史学家（Troubetskoi）和其他人已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这种建议被苏维埃官方的守旧人士埋没，在近几十年才又得以复苏

在这里，我要为这两种分析方法的一个综合概括辩护。当然恰切的说辩护只适应俄国—苏维埃的情况，另一方面，很笼统说，也捍卫这个在我看来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补充充实的观点。（参照第三章）。

在公元1000~1500年间形成的世界体系明显的由三块走在前列的社会组成（中国、印度、中东），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地以极快的发展速度出现了世界的第四极：欧洲。不过，确切地说，在1000年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边缘地区，开创资本主义的



本质上的质的变化发生了。在欧洲和东亚之间，有欧亚海洋，它在当时全球体系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四极的交接情况。我称当时为旧世界体系（前资本主义或者是依附体系，如果大家接受我所作的关于社会体系的定义的话）。

对我来说如果不同时回答以下两个相关的问题，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①社会面临的矛盾斗争最终会成为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斗争的动力。

②这些动力的铰接表现在旧世界体系的演变中，并且在各方面都有表现。特别是在改变组成旧世界体系的不同地区的作用方面。

注意站在全球的角度上，联系各地区的现实情况来看问题，首先要知道亚洲的两大板块（中国和印度），在它们严重地落后于历史之前，聚集了旧世界绝大部分的文明人口。

另外，我们也对这两个板块的持续发展而感到震惊。它们在公元前两个世纪大约有 5 亿人口，在 1800 年它们的人口分别达到 33 亿和 20 亿，在 1850 年又分别达到了 45 亿和 30 亿。应把这令人惊异的人口增长与中东自希腊时期便停滞的人口增长相比较。中东的人口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它的最大值 5 亿，以后又逐年衰退，在工业大革命和欧洲入侵前夕保持在 3.5 亿（同样，我们也可记起，例如埃及在法老时代古代某一阶段人口达到 1 亿~1.4 亿，在 1800 年它的人口却仍不足 2 亿。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也是这样）。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尽管欧洲很自信，但它仍对进入甚至征服这个很大的东方世界而深感力不从心。直到很晚的 18 世纪，中国王朝仍是欧洲治国的最好的榜样，它的社会得到了最好的治理，是最文明的，它的技术精湛，效率极高。直到 19 世纪末，人们才敢攻击其权威性。相反地，比较薄弱的印度早已

被征服，印度殖民地在 19 世纪大不列颠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3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马可·波罗的东游，然后是在三个世纪内一直在吸收欧洲能量的美洲的征服，遥远东方的吸引力就是欧洲创造的主要宝藏。欧亚大陆的作用就定格在这个前景中。

中东被我定义为希腊时代的继承地区（希腊是五种文化的缩影：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腓尼基、希腊—阿纳托利、伊朗，）它构成了先进文明的第三极。

世界三极之间贸易的强度自然支配着旧世界的发展动力。“丝绸之路”穿越欧亚南大陆、中亚、自里海到位于哈萨克大草原、天山和蒙古南面的中国。（参考第一章）。

然而，中东这一极的萧条以贸易的日益衰退而告终。（萧条的原因不属于此研究范畴），这次演变至少将产生两大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自十字军东征后加强了自信的欧洲，不仅要征服富饶的地区，而且还要征服到达其感兴趣的亚洲地区要通过的国家和绕过的国家。第二个就是，中国和印度不会对积极地与衰落的中东建立关系而感兴趣，对欧洲就更不感兴趣，于是，主动性就集中在欧洲手中，欧亚大陆和海岸海洋就会是欧洲人到达亚洲的两大信道。

就像我们说过的一样，欧洲直到 1000 年时还处于世界的边缘，就像今天的非洲一样，它组成了一个附属领地，在这个领地中，人民并没有真正的固定下来，也没有组成一个附属国家形式的社会。但是旧体系中的这个贫穷的周边地区很快就会突然脱离这种特殊结构，这种结构将封建附属国形式（权力分散）与罗马基督教在欧洲的普及联系在了一起。在自 19 世纪起资本世界和工业世界中心形成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分辨出相继的那些时期，这些时期决定了在这个体系的快速原动力中欧亚角色的转换。

十字军东征（公元 1100～1250 年）是这次快速演变的开始。从此以后，欧洲尽力想打碎中东的垄断，而中东就是欧洲与东亚发展关系的必经（或昂贵）的信道。此外，这种垄断被拜占庭东正基督教和阿拉伯一波斯的伊斯兰哈里发共同享有和分割。十字军东征指向了这两个对手，并不是像我们经常所说的只指向不信基督教的伊斯兰教徒。但最终欧洲人被驱逐出了这片土地，它们将被迫努力绕过这个障碍。

十字军东征是加速了中东的衰落，把更多的利益从中国转移到了西方。实际上，十字军东征方便了中东“土耳其化”。也就是权力向土库曼军事部落的转移，并由此准备同时摧毁自 1450～1500 年被拜奥斯曼帝国取代了的拜占庭和哈里发。

另外，十字军东征给意大利城市带来了财富，给了他们在地中海的航海垄断权，同时，十字军东征准备在研究绕过中东的方法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在这里很有趣的是，两个海洋的门户都是被意大利人打开的：马可·波罗穿越了俄罗斯—蒙古欧亚大陆，两个世纪以后，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又打开了大西洋信道。

欧亚大陆此时进入了历史，准确地说是在公元 1250～1500 年间。也就是在我们讨论的历史的第二阶段进程中。欧亚大陆进入历史使老“丝绸之路”边缘化，丝绸之路曾通过中亚南部，把中东与中国和印度联结在一起，这得利于欧洲—中国之间的一种直接的联系。在稍北一点，通过让日斯·冈（Gengis khan）帝国的欧亚大陆联结，（更准确是马可·波罗路线）。欧亚大陆的介入使森林的俄罗斯和大草原的土耳其—蒙古展开了争夺欧亚大陆控制权的百年战争。莫斯科国家的建立。它从蒙古奴役下解脱出来获得自由，然后穿过西伯利亚地区快速的扩张，用军事征服了南部大草原，一直到黑海、里海、咸海和高加索山脉。最后是中非南部本身，这些构成了它奇迹般增长的阶梯。

欧亚大陆在这段历史中获得了与极像中国的欧洲国家构成完全不同的特殊特性。而并不是像我们经常说的那样，它应该变成（或仍是）“半亚洲的”（这是一个带有明显贬义的表达方式）。事实上，它远离了中国模式，因而不能称为“半亚洲。但是，它又没有组成一个一致的，人口稠密的国家，能像欧洲那样，先一步一步组成了专制王朝，后来又变成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模式。尽管自1700年以来，圣彼得堡政权想模仿欧洲的专制主义，但对像海洋一样广阔的领土的控制减轻了这些特征。在俄国，俄罗斯人与大草原土耳其—蒙古人民之间的关系仍不是他们同欧洲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海外殖民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前者（俄）不能开发生产力，后者（蒙）像欧洲人一样，在殖民中维系这种关系；俄罗斯政权控制着被这些国家或那些国家支配的空间。这种特殊性以它自己的方式在苏联长期存在。在苏联，俄罗斯控制其政治和文化，但它不能在经济上开发别的国家资源（相反地，大量价值都由俄罗斯流到了中亚）。它应该推广媒体来混淆这字面上一致、实质上却非常不同、很肤浅、很“帝国”的体系。（参考第五章）

然而，欧亚大陆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公元1250~1550年担任起欧洲通向中国大道的的作用。另外，在一个欧洲仍没有足够强吸收能力的阶段，它不能帮助欧亚大陆实现其过境信道功能的时候，海运贸易应迟一些再开展。自从1500年起大西洋—印度洋航道已代替了陆运信道。但代替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代替。在欧洲人已发现了美洲并征服了美洲，使它成为了其资本主义的周边国家。这是欧洲大陆逃脱了的，不能强加于欧亚大陆的命运。由此，欧洲人同时懂得了以一种与俄国扩张形式不同的方式殖民亚洲（使之成为非世界殖民的边缘国家）然后是非洲和中东。

自1500到1900年甚至更早些，海上信道再一次使欧亚大

陆边缘化。不过俄国已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展示了其光辉的各个方面，来回答这个挑战。我们将发现，确切地说在 1517 年菲罗波（philopheus）修道士声明莫斯科就是第三个罗马。这个观察发现在海路开通不久，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给俄罗斯一个交替观点，让俄罗斯在历史中扮演独裁的角色。有的人，比如说贝尔迪阿乌（Ber diaev）发现苏维埃共产主义在整个人类进程中延续了这种俄国角色。

于是，俄罗斯自此对自身和向西方开放进行了自省。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它自身的结构建立了一个模式，这样一个模式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周边化是对立的。这里，两个方面服从一个惟一的政权。在世界上除了自 1950 年以来的中国，再也没有其他的这样的政权。人们不会忘记把俄罗斯联邦所取得的平庸的结果与美国所取得的辉煌的业绩去做一个比较。这里有一个基本属实的对于这事实的一个解释：美国建立过程中没有封建遗留的东西，这里它的一个优势，（我强调这样一个论点：新大不列颠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边缘），但是，应该加上的一点是：美国在美洲大陆感到很孤独，它已脱离了欧洲政策兴衰的影响，而且，它只有一个对手墨西哥，而墨西哥又很弱，只能做为美国的猎物，事实上，美国也占有了它大部分的土地。相反地，俄罗斯却未能摆脱欧洲的争斗，不得不面对西欧和中欧的竞争，被拿破仑的军队征服，忍受克里米亚战争的耻辱，然后又在 1914 年和 1941 年再次被两度征服。

另外，俄罗斯历史和欧洲历史不断地相互干涉其中有一部分是俄罗斯选择的结果，也是后来苏维埃的选择结果，它们选择不再封闭于欧亚大陆，而是尽可能停留或变为和欧洲一样现代。这是圣彼得堡帝国的选择。（圣彼得堡帝国的象征是有两只头的鹰，其中一个头朝着西方），但这同样是苏联的选择，苏联也把自己的意识嵌入了欧洲工人运动传统中。它所宣扬的欧亚

大陆意识形态曾一直被俄帝国运用，尽管俄帝国已选择了官方的西方化。这种思想意识的完全回溯便是其嵌入欧洲工人运动的明显的结果。

在我看来，俄国革命根本就没有带来一个附带症状，而且一旦苏维埃已经结束，这个症状也就很少在历史的进程中有所反射。我看不出有其他的可令人信服的关于这次革命解释，即使既考虑历史（由资本主义引出的新矛盾）又考虑地理（俄罗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也是徒劳。

因为资本主义向全人类，也向这些先进国家的人民和周边落后国家的人民提出新的挑战。基于这个基本点，我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资本主义不能无止境地相互追赶，在这个意义上，长期的积累及其导致的指数增长导致了人类某种程序的死亡。

资本主义它被一种更文明，更先进，更必需的形式超过，其自身通过长期资本积累允许的人类活动的水平的大提高为这次超越做了准备。（这是一个历史上的题外话）。伴随资本主义的文化和道德成熟也为这次超越作了准备。

苏联在1917年提出的问题不是矫揉造作的，也不是它们欲望的产品，也不是因为其国家的环境，这是一个对全人类提出的问题。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询问的问题应是以下这些：（1）为什么超越资本主义的要求在俄罗斯需要这么努力来表现出来，继而中国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心则没有这样；（2）为什么苏联利用不可逆转、进步主义的转换手段都没有实现这个转换的需求？

在我就第一问题的回答中，世界地理体系无疑占有决定性地位。而且我认为列宁所说的“薄弱环节”是第一次试图朝这个方向解释的，而毛泽东则将它普遍应用于新民主改革部队的

革命理论中去。这种解释涉及一种考虑到由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拓展而产生的中心化，尽管这种中心化不是以绝对形式出现，这一点如今可以看到。这里我发现俄罗斯这个相信开创世界革命的国家不属于周边。它具有自动集中于一个中心的特征，但是被延迟了，这可以用来解释它所遭遇的社会冲突的暴力。我也发现了第二大革命——即中国的革命，一是发生在惟一一个没有能真正地完全地周边化的大国中，好比拉美，非洲，中东，印度和东南亚，而中国从来被殖民。相对于大家熟知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一个“半殖民半封建”国家——我要以我认为更正确的形式代替它——一个“四分之三臣服四分之一殖民”的国家，而其他周边地区则是“四分之一臣服（或者可以说是封建的）四分之三殖民”！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出手于向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就我看来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从资本主义地理角度来说都是不确切的，它产生于对地理中心化，中心/周边的低估，这是由于没有理解，并不是因为特殊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扩张的“自然”倾向在当时表现为使世界同一化），而是这一扩张本身内在的产物。因此这一理论没有看到，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这一非常不平等的发展中做为牺牲品的人民的反抗会一直存在。此外，这一理论也来自于这样的假设，即新产生的世界（社会主义）不是在用世界（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而是在另一边，在已经和资本主义决裂的国家里发生。我认为和资本主义在从封建主义中脱离出来之前是在封建主义内部发展的一样，资本主义世界到社会主义世界的“长期过渡”也是由所有社会的内部冲突决定的，也即与复制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力量与（反组织化的）倾向和力量间的冲突，其中后者源自另一类理论，即社会主义。尽管这里不是用来阐发这些“长期过渡”新理论的论坛，但我还是必须提到它们，因

为我认为这是苏联失败的原因之一。

现在通过提出问题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问题有可能可以使不仅关涉俄罗斯的未来而且有关世界体系的讨论变得明朗。

苏联的失败并不会将俄罗斯带回到 19 世纪，也不会——如我们有时认为的那样——回到圣彼得堡莫斯科牧场时期。因为不管是对俄罗斯还是对其他国家，历史的倒退都是无意义的。所以与其做这样肤浅的判断，我反而倾向通过分析现状以及它和过去比反映的新情况来展望未来。

如何走出资本主义，向前再迈进一步，是俄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中心问题。如果我们认同在此提出的长时间过渡时期的理论，那么由今天所有人面对的挑战所构成的现时的阶段应是一个多极世界，这个多极世界使得它的不同地区有一个最大限度的反体制力量的发展。对于俄国和欧亚大陆（前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来说，这不是意味着虚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重建一个有能力超越以前的新国家。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所有其他国家也一样。要知道俄国或中国是否有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做到这一点，或者别的国家是否会更容易的做到，这已经是超过这一研究限度的另一系列问题了。

## 参考书目

1. Etiemble, 《中国的欧洲》 (*L' Europe chinoise*) Gallimard 出版社, 1988 年。

2. 在 Anatoly Liberman 和 N.S.Trubetzkoy 的《热日斯·冈的遗产和有关俄罗斯身份的其他文章》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 and Other Essays on Russia's Identity*) (由 A.Liberman, U.of Michigan Press 和 Ann Arbor 出版, 1993 年) 中, 我们可以找到很好的有关俄罗斯历史上的争论的参考资料。



3. N. S. Trubetzkoy, 《书信笔记》 (*letters and notes, mouton*), La Haye 出版社, 1975 年。

4. W. Bartjold. 《中亚土耳其历史》, (*L' histoire des Turcs d' Asie centrale*), Maisonneuve 出版社, 巴黎, 1947 年。

5. B. Vadimirtsov, 《蒙古社会体制, 游牧封建制度》 (*le regime des Mongols, le feodalisme nomade*), Maisonneuve 出版社, 巴黎, 1948 年。

## 第九章 阿拉伯世界的 新买办化

适宜于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也适宜于阿拉伯国家的宏观经济多数应作谨慎的整理，因为有很多统计只是大概的，有时明确，有时让人迷惑。然而这样的资料表明一般的演变。这种演变有时通过亲眼所见及其他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去对照比较。在最近 25 年；这种现象在阿拉伯所有国家都出现了，除了那些全部经济几乎都简化为石油的开发和利息的开支的阿拉伯国家（海湾地区国家和利比亚）。

阿拉伯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与东亚和东南亚的相比很一般（约为东亚和东南亚的一半）。但很明显地，它表明一次平行的发展：1973 年至 1984 年的一百年之间的石油业的虚假繁荣之后，出现了后一百年难以根除的经济停滞。70 年代埃及，叙利亚和约旦所创的最高增长率（埃及 8%，叙利亚和约旦为 10%）已经让位于以后百年的低增长率（埃及 5%。叙利亚自 1990 年起像已经在爬坡，其增长率为 3%）或者是暴跌以至于抵消了以前几年的增长。（约旦的增长率最低谷已达到每年—12%）。黎巴嫩自 1975 年受国内战争困扰，今天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是国家的重建。至于伊拉克，尽管受第一次海湾战争

(占据了整个 80 年代) 影响, 当然是在第二次海湾战争崩溃之前。它已经实现了一个可能比其他国家高的增长率 (约计 8%), 在突尼斯, 增长率逐年下降, 1970~1974 年为 9%, 1985~1989 年变为 3% (这个增长率在最近几年可能有所改善)。在阿尔及利亚, 1985 年已经下降的增长率 (一年 5%) 已经渐渐的下降为负数, 国家已经深陷于政治危机中不能自拔。只有摩洛哥逃离了一般趋势, 保持 5% 的增长率。至于阿拉伯周边的国家 (毛里塔尼亚, 苏丹, 索马里, 也门), 这些国家面临着社会分解的威胁 (在索马里和苏丹已成为事实), 当然这已不再是经济分析的范畴。

很明显地, 一些主要的政治事件可以解释为某些倾向回溯问题 (与约旦与伊拉克有关的海湾战争, 阿尔及利亚的危机, 利比亚的封锁), 但是, 普遍的运动已在马斯累克 (Mashrek) 地区的国家展开。这些国家主要依靠海湾地区的国家及利比亚的石油利息, 这些石油的利息由移民的 (埃及的, 叙利亚的和巴勒斯坦—约旦的) 手工品的交换和政府资金的流动重新分配成了几部分。

石油所起的作用在摩洛哥和突尼斯已不再重要。这两个国家增长率的低下导致了以出口为目的的代加工工业化模式的快速衰竭。这种工业化形式由国家当权者选择。在摩洛哥, 这种衰竭现象稍轻一点。

面对现实, 一帆风顺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讨论已很难站的住脚。有利于自由主义胜利的选择, 即向外国资本开放 (在阿拉伯语中为 “Zafifak”), 私有化, 使公共金融恢复秩序以及称为结构调整的计划范围内的货币贬值, 都没能刺激增长。相反地, 这些政策使得局势更加困难。——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些所谓的自由选择的以社会 and 政策的灾难性后果。总体上, 在最近一段时期和民族主义运动飞速发展时期内的增长率已经占

优势，甚至是在很大范围内占优势。如果这些相关的阿拉伯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时期，并在自身粉碎或崩溃之前达到了一个有利的增长率，那么这就应该像我们已经说过的，主要归于 1973 年至 1984 年的石油利息。

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因一个通症而痛苦：投资的低效。因为，面对很低的或灾难性的增长率，投资努力始终是很重要的，准确地说，有时甚至会借助石油利息升至例外，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总是在 24~28% 之间，在阿尔及利亚，它的最高点达到了 39%，在石油飞跃发展的年代，它甚至突破了其最高限 30%，所以，只要有强有力的投资，有时候东亚和东南亚经济持续发展也没什么令人羡慕的。但是阿拉伯国家投资的功效让人吃惊的弱，资本边际系数在马格里布 (Maghreb) 地区的国家停在 12，在马斯累克 (Mashrek) 地区国家内是 5 (与亚洲国家的平均率 2~4 相比较) 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另外，明显的，一旦增长崩溃，而投资力度能维持住的话，边缘系数就会升到一个无可置疑的高度，在 1985~1989 五年间，马格里布国家的边缘系数为 26 和马斯累克国家的为 9。又一次，自由主义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起更加公正和有效的投资选择。由于在民族主义飞速发展的先前一段时期内的资本边际系数稍好一点 (在 4~8 之间，而不是 5~12 之间)，我们应该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比国家主义浪费了更多的稀有资源。然而这儿也没什么好惊奇的：收益分配中日益扩大的不公平性和社会服务的毁坏已经不止一次的证明这种负面的经济效用，尽管它们并不是总是或立即以像在阿尔及利亚一样灾难性的社会危机而告终。

根源检测和经济金融形式——与经济萧条相关的亏损或增长——允许更好的认识浪费的机制。

由借款额和在对外公共支持名义下的捐赠、移民转移和外国直接投资组成的国外净资金，扣除债务外币积累和负本流失，

对 1970~1990 年之间的阿拉伯国家的平均水平很重要，这部分占马斯累克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 16%（投资的 3/2），占马格里布国家国内生产 5%，（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平均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有意义）。

以这个观点看来，马斯累克的三个国家（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创造了相似的历史：它们都很大程度地受益于石油业（以公共转移和移民资金为由），石油业在飞跃发展的那个百年中赚取了国内生产总值 20% 的国外净资金，伊拉克在这段时期内得到的金额是不可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得到的国外净资金在数量上很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很大。但是这笔资金与其说用来实现经济增长，还不如说是承担了海湾战争的费用。在马格里布地区，相反地，形势仍然可以与现实形成对照：长期以来阿尔及利亚（依靠于石油资源，拥有沉重的负债，在变为以债务服务为名义下的资本净出口者之前，）就是一个国内资本的净债主，相反地，突尼斯和摩洛哥是国外净资金的不可忽视的受益者，国外净资金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2%（约为它们投资的 50%）。这笔资金通过移民向欧洲的转移得以保持，所以与石油利息的起伏变动无关。

普通方式下，如果我们定义了不能引来移民转移的有期投资，也就是说像公共的和私人的投资，在扣除债务服务、利润的转移和资本的流失后，人们可以从中观察到所有相关阿拉伯国家在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两个 10 年中都被逐渐损坏了。对于马斯累克国家来说，资本平衡差额占 70 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 6%，但在 80 年代后半期当债务服务采取悲剧性措施、石油国家投资已减少的情况下，资本平衡差额已变为负值。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也有同样的运动，因此，它们在石油飞跃发展的年代从更少的外部投资（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3%）中得到了更少的利益。在阿尔及利亚，意外的大转变更具有悲剧

性，这个国家不久以前还是外援的供应者，如今已经不能支持其外债的沉重负担。

又一次，事实证明自由主义论述的承诺都是谎言，而根据自由主义的论述，开放方便了我们需要的外部投资的进入。但外部投资进入的很少，而且甚至是有害的：有数以百万计的外国直接投资就有数以十亿计的债务负担。高吹号角的西方国外支持除了在耗费极大的情况下的美国军事信贷之外，并不十分具体。公共支持一般都在阿拉伯内部进行并主要依靠石油利息。相反地，自由主义为巨额外债在极短时间内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突尼斯 80 亿美元，约旦 90 亿美元，叙利亚 170 亿，摩洛哥 210 亿，阿尔及利亚 280 亿，埃及 410 亿，（1991 年数字）。这些债务在 1970 年占用了阿尔及利亚出口额的 70%，埃及出口额的 155%，而在 1985 年，它占用了阿尔及利亚出口额的 130%，和摩洛哥出口额的 400%。而由国家主义者在内部飞跃发展阶段实施的投资战略，从没有导致如此繁重的外部负债。

如果我们计算自由主义导致的经济投资环境的损坏，资本大量流失就显得更加严重。在 1970~1980 年的 15 年间，资本流失平均情况是：摩洛哥国内生产总值的 2.4%，约旦国内生产总值的 3.2%，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 5.1%。这些百分比在 1985~1989 年五年间全部有所提升，变的引人注目：分别为 2.5%；1.4%，2.7%，4.9% 和 6.3%。只有在埃及，资本流失的百分比是稳定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投资的 1/3），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比例。

于是萧条时期的经济平衡越来越得助于一些薄弱的和无发展前途的投资的实现，像旅游投资和移民转移。这些投资对于马格里布地区来说已经很古老：马格里布向欧洲的移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百年飞跃发展时期大量增加。现在据 1985~1989 年 5 年间的平均统计已达到：摩洛哥国内生产总值的

8.3%，突尼斯的4.9%，阿尔及利亚的1.4%（1970~1974年，比例为4.4%，转移的崩溃是因为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危机）。相反地，马斯累克地区一直到石油业飞跃发展的时期移民都都很有限（一般转向海湾地区），移民转移的投资只占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1.2%，叙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0.8，但是在约旦，在1970~1974年已占到3.0%。如今，它们的比例分别为埃及10%，叙利亚3%，约旦14%（第二次海湾战争前）。

从以上对阿拉伯国家最近25年经济发展分析中，我们应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那就是它们积极的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努力很失败。在国家主义飞跃发展的前期，人们就准备这种参与：如开始进行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这种建设建立在社会改革上（土地改革和教育进步等），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性，扩大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通过社会各界的团结和参与现代化社会的方案而得到保障。国家的积极干预——在这方面，国家化已有国家积极干预的先见——已经通过“协商的相互依存的赶超”方案建立了一些基本的功能，并形成了预见的，不可逆转的形势。

当然，规划本身也难以解除自身内部严重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应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并要以当时最快的速度清除这些矛盾存在的可能性。据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规划在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规划。体系的民众主义政治管理方法，组织和创造权无视民众阶层的非政治化，关于右派（封建的和自由的）之间的划分标准以及右派左派（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划分标准的思想和文化的论战的停止，（这论战自19世纪Nahda开始在百年之间持续展开）。总的来说，社会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缺少都是这个方案的历史局限性的表现。

另外，做为在每个阿拉伯国家范围内的规划，阿拉伯民族

主义只应该逐步相信，在肥沃的土耳其帝国内的阿拉伯中央集权的思想根源已经很古老了。中央集权的观点——将解决很多问题——从未成功地成为必要，即使是在像马格里布这样的地区或者是肥沃的土耳其帝国，因为它仍然以一个联合体的无民主原则为基础。这个联合体由战利品组成，以一个省为基地，以一个享有特殊威信的政治人物为中心。在这种逻辑推理下，征服自由具有了合理性，在一个阿拉伯民族内的这样的要求和希望是有效的。而这样一个阿拉伯民族只能等待解放者把存在强加于它。

应该说明的是，这种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的必然结果已经一步步地被占住地位的国外力量西方强国所制止。阿拉伯民族运动与苏维埃联盟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这种敌对原因，相反地，这种关系恰恰是这种敌对的回答。西方敌对的明显的原因是现代化和统一了的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坐落在欧洲南侧，在世界体系中已变为值得注意的伙伴。以色列已在军备方面实现现代化，具有了持久的侵略性，在颠覆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尽管在今天，这一页已被翻了过去，自由的讨论要求开放的新政策快点来临，并结束过去的积习，以便使经济开始健康的明显的发展。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正相反，这些政策打断了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打碎了阿拉伯世界，加剧了阿拉伯内部的争斗。最终使阿拉伯地区陷入了无法复苏的毁灭性的社会灾难中。

阿拉伯国家的重新买办化是美国及在其他的欧洲战略的最明显的目标，重新买办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战略各个方面。这个战略将阿拉伯地区打碎为三个分开的附属区域，这三个区域地是处在了特殊的买办化必然结果之下。

海湾石油地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阿曼）已完全处于美国军事控制的切割之下，已丧失所有的基本自主权，包括政治的和金融的。她们从此就从阿拉伯国家分割了出去。

马格里布国家放弃了一次与欧洲协调关系的协商机会，这些国家单纯而简单的加入欧盟当然已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此我们只能讲一下这个范围极广的主题，尽管一个论述应在此处或彼处，此时或彼时发展为一个适时“地中海主题”的问题，多多少少做为欧盟的补充。我们知道5+5格式（马格里布联盟的五个国家，毛里塔尼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以及欧盟的五个地中海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希腊。但这个公式在谈论基本的经济特权关系以及它们与欧盟条款的兼容性时变成了一纸空文。于是，条款便成了一个等待中的条款，另外，与地区有关的问题远得不到解决：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利比亚的未来始终处于美国的封锁中，以及西部撒哈拉的问题。

阿拉伯马斯累克是美国—以色列方案的主题，美国—以色列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又称为中东方案，问题在于创造一种与三部分相联系的完全经济：领土被监管，其未来设想为像无领土的和班图斯坦（Bantoustan）一样的以色列，以后会归并于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与约旦，方案主要是要为以色列开拓经济扩张的空间保护以色列出口，控制在世界市场上更强势国家的外部竞争。我们于此可以看出，以色列在这个方案中是一次经济的失败，已无望为其手工产品赢得合理竞争力，与由世界商业组织和世界银行鼓吹的开放世界和多面主义原则相矛盾的是，方案有了一个例外，是在减轻以色列的社会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精神指引下，有关被监管土地的未来和以色列阿拉伯和平的马德里和奥斯陆条约以单方面的方式制定，与和巴勒斯坦国家和难民加国权的联合国的解决方案相悖。

然而，原则仍在条约中被反复提及。在此实施的政策只想巩固班图斯坦的地位，班图斯坦在被军事强制监管土地逐步建成。军事强制力量努力在这些土地上摧毁生产活动（掠夺农业水利资源，征调土地，摧毁村庄为了以色列金库的利益，对经济活动征收附加税，摧毁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福利等）。通过这些方式，监管的强制力量限制阿拉伯劳动人口大量变为日常的移民工作者，使得以色列手工业经济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市场。在政策计划下，方案并未想到一个主权巴勒斯坦国家的复苏。于是便控制了其海关政策，国库和货币政策。方案也没有认识到巴勒斯坦移民的回国权利问题。尽管这项权利在联合国法案中已被列出。

尽管就像我们所说的一样，但此方案仍是脆弱的。只要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还未被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斗争就不会中断。另外，方案大大削弱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地区中的作用，对埃及当局无限定接受这一方案不置一词。各媒体鼓吹形式上的和平应该开辟出一个繁荣的世纪，它本身就全是鼓惑人心的。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那么她必以相关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活动的后退而告终。方案使阿拉伯国家更深地陷入它们的“第四世界化”。由这一方面引起的幻觉将不能经得起事实的论证。

美国为阿拉伯国家制定的方案并没有回答像伊拉克前途这样重要的问题。伊拉克正处于华盛顿强制封锁下的摧毁性的经济停滞中。因为有华盛顿，所以欧洲不敢对其进行分割。美国方案也未回答土耳其和伊朗所处地位和所扮角色的问题。同时，方案对完全边缘化的四分之一阿拉伯国家（毛里塔尼亚、苏丹、索马里和也门）更无丝毫涉及。

以自由主义为名义提出的这个方案从未设定一个目标让阿拉伯世界走出困境。问题并不在于自危机上建立一个稳定的新

的世界秩序，而在于对危机管理的短视政策。另外，1973～1984年石油飞跃发展的奢华年代的繁荣建立在消费的幻觉上，而生产基础在当时情况下并没有得到加强。当然，这幻觉建立了决定性的政策功能，在当时这给了“安非塔尔”（“infitarh”）一个表面上的公正性，并引入了很多观点。然而，就像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样，幻觉在第二天便不会存在，美国强行制定强制条约来严格减少石油利息，把海湾国家置于其军事强制保护国状态，把其在金融市场上的财产交给第三者保管，强加给利比亚毁灭性的经济封锁。危机管理政策导致的经济衰退让全体阿拉伯国家与附属撒哈拉的非洲边缘及几个亚洲国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一样，成为世界一体化的局外人，也就是说他们被排斥在了世界体系之外。

## 参考书目

为了超越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空泛的思考，有必要进一步观察诸如各国家的经济体制与全球体系如何连接、权力与社会斗争的内部逻辑性以及外界干预之间如何连接等问题。有关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马格里布地区、埃及、苏丹和勒旺（Levant）地区（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以及海湾国家的“第三世界——达喀尔论坛”的系列作品正在出版中，它们给了人们可从这种分析方法中得出的启示的令人信服的声音。

文中所用的所有资料都取自世界银行，尤其是伊萨克·蒂万（Ishal Diwan）和里恩·斯桂尔（Lgr Sqliyle）的名为《中东和北非的经济发展与合作》（Econolwie Deveoppement and coop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一书（1993年11月）为了维护当前正在实施、政策）尽管这些数字给人一种有意掩饰的印象——对读懂得这些数字的人来说——但印象就是我们用几

张纸来总结出的：灾难的印象。

关于危机短视管理的主题，我们在此已反映在我的新作品《危机的资本主义管理》（LA gestion capitaliste de la crise）中。（由 L' Harmatlan 出版，1995 年）

这项研究并没有直接指向买办化经济方面。建立在一方面政治，阿拉伯政治，文化方面和伊斯兰方面的联系是以下几个作者，尤其是（用法语）的主题：

——S.Amin《世界体系中的地中海》La Mediterranee dans le systeme mondial，在 S.Amin 和 F Yachir 的同名书中，La Decouverte，1988 年。

——S.Amin “前言”（preface），在 Michel Capron（ed.）的《欧洲面对南部》（L' europe face au Sud）中，L' Harmattan 出版社，1991 年。

——S.Amin，〈地中海和海湾地区的地理政治〉（La geopolitique de la region Mediterranee - Golfe），在 S.Amin 的《地中海地区的战略赌注》（les enjeux strategiques en Miditerranee），L' Harmattan 出版社，1992 年。

——S.Amin，《前言》（Presentation）在 F.Caraffeddine 的《阿拉伯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Culture et ideologie dans le monde arabe），L' Harmattan 出版社，1994 年。

——S.Amin，《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政治》（Etat et Politique dans le monde arabe），在 P.G.Casanova（ed.）的〈第三世界的国家和政治〉（Etat et Politique dans le tiers monde），L' Harmattan 出版社，1994 年。

## 第十章 非洲经济灾难的根源

根据战后四百年的发展而得出的总结结果对比是如此鲜明，以至于我们想放弃第三世界的共同形象的表述，这种表述想描述出已成为这四百年发展政策主题的这些国家的整体情况。人们今天不是毫无原因的拿新工业化了的、有竞争力的第三世界去和边缘化的、包括整个非洲在内的第四世界相对照，人们毫无争议的注意到，第一组国家并没有受到当代资本主义普遍的经济危机的困扰，特别是在东亚，出现了较高的增长率。然而，第二组国家，由于受经济危机打击，显得难以应付其面临的挑战。

自1948~1950年开始在战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展开的发展政策目标尽管在理论讨论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但在主要方面非常酷似。（在非洲，发展政策目标开展是在1960年，这是其组成国家进入解放阶段的日子）。

那就是到处实施国家主义规划，这个规划确定目标是要通过工业化进入国家现代化和实现富强。我们能毫无困难地理解这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知道，在1945年，在亚洲所有国家（日本除外）、非洲（包括南非）——尽管有在些许细微差别——和拉美都很缺少可称之为工业的东西（除矿产发掘外），因为其人口组成乡村化，并且工业受陈旧的制度（美洲大庄园的寡头政

治，在东伊斯兰被保护下的专制统治，中国等，)或殖民(非洲、印度、东南亚)的制约。因此，通过所有大规模的不同的民族解放运动，它们确定了相同的发展自由目标，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以及经济工业化目标。

说它们在实施这些目标之前没做一些尝试的话就错了。当然，多样性像国家的数目一样多，试着把它们归为一类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因此成为作用标准选择的，或者是思想偏好的，至少是人们有的想法或甚至人们已经实施的想法，不太确定的经验的运行，及其可能性和国内外条件的限制的受害者。

相反地，在强调共同目标一致性的同时，我要大家在关于这个分类的问题上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且看一下自今天开始的历史并重读一下历史，看它将引向何处。工业化首先要求建造一个内部的机器并避免阻挡构建的竞争的破坏。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首先从长处开始分析：我们拥有原材料，这些原材料来自农业(棉花、食品、木材等)或矿业，来自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有的已是被认知并开发出来，有的还未被认知，这些材料可用做生产能量，建筑材料，钢铁，主要化学产品，就像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内部市场，这个市场由日常消费的手制品(纺织，室内家具，餐具器械等)的进口支撑了下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利用这些潜质去做西方国家在它们的时间内所做的事情：工业革命。革命的形式随环境不同也有所不同——国内市场的发育程度，资源的可利用度等——或者根据理论上或思想上的主题，给予消费业、轻工业的快速生产优先权或者给予那些以后能争取到第一的产品优先权(如使苏维埃体制合理化的工业化工业论题的提出)。无论怎样，最终目标是一致的。

这些所有在当代专家政治论者的共同语言中表达的长处，

使得人们在很大范围内做出了类似的选择。工业化必需的技术只能进口，但引进国外资本并接受之并不是必需的。这个问题要靠我们所有的协商权力来解决。于是，金融资本应该依次被引进或被借入。这里还应该对国外私有财产、由国家节省下来的公共金融，以及国外捐赠和信贷的价值和方式的评估进行调整。

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进口必须由传统产品，如农业或矿业产品的出口来抵消。任何一个发展战略都没有一下子就走向出口，也就是说这主要是由世界市场的突破口的目标决定的。今天世界银行提出的条款在当时是一纸空文，这个条款认为一些国家取得成功是因为其对出口开放，而另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其又是回转向了国内市场。这个条款既没有被当地权威认可，而且世界银行自身（或其他在这项政策面前犹豫不决的国家）也没有对其付诸实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国内市场，其次才是拿出口做为一种必须的方法来扶持进口。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很有有效的。在战后经济普遍增长阶段，对各类可能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像能源，原材料，矿产或特殊农业产品。交换率不断波动，但基本上并没有因为出口份额加大的毁坏作用而消除。矿产资源或者是特殊农业相比之下的好处是一方面，另外，世界市场的扩展为出口更多的手工业品到更好的市场上打开了信道，在手工业生产的某个阶段，这主要针对那些没有拥有更多自然资源的国家而言。战后经济飞跃发展的后期，富裕地区的增加证明了在一个实际的时代这个估量的实现，当时所有发展政策的一项——国内市场的建设——并不是工业化战略被进口代替的象征。像我们以前很多次说过的那样，国内市场建设是为了对抗一个并不存在的出口战略。工业自身在代替内部进口，同时开放了自己的市场。

在不断扩大的最终消费需求上总要加上中间产品，有时是

一些简单装置产品，这些产品是我们能预见的当地产品的简单加工产品，最后是由基础建设和日常公共支出消费引起的产品。

做为工业化分支的现代化并不仅限于这些东西。城市化，运输和交通的基础建设，教育和社会福利当然都是工业化的目标，这些目标同样也是为了一个正确的结局，为了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像我们在国家主义讨论中所说的那样变成现代化。

当然，同样的，在当时，像我们今天一样，经常做的在国家干预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对比并不流行。当时，国家干预总是不好的，因为它在本质上与我们预想的市场自发性存在矛盾，个人利益与市场自发性相联系。因此，这种对比不但没有做，而且没有人注意。相反地，在国家干预过程中，在位当权者都拥有的理性意识看到了市场建设和现代化的这个基本要素。激进的左派在它自己的思想纲领下向往社会主义，他们把国家主义的扩张与驱除私人资本结合了起来。但是国家主义的右派没有确定这样的目标。但国家干预主义倾向并不弱，个人利益的建设要求强有力的国家干涉主义。今天占统治地位的言论的废话在当时并无回音。

所以，如今阅读这段如同是世界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历史的愿望膨胀了。它将或多或少的定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的几个功能，并为下一步创造条件。在这一步中，人们如今注意到了市场开放和国内的竞争。我并没有建议向这种愿望屈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并不能自发地创造经济发展模式，而是把经济发展的模式强加于它们。经济发展是当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结果。我建议重视资本主义自发和实施倾向以及活跃上升政治力量的长期观点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体系始终由确立这种社会管理特征的短期金融计划引导，当然，这种斗争并不总是激进的。资本主义在利益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但这只是调整而已，并没有涉及运动的根源问题。



于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建议重新审视，战后这段时期，尤其是1955~1975这两个十年间，这段意识形态发展的时期，或者是万隆的民族资产阶级主题时期（对照在这段时期召开的万隆会议）。在这个范围内，在世界资本主义统治力量与活跃万隆“发展主义”主题的力量之间的争斗和以前一样，已面对取代资本主义或扶持资本主义的选择。运动的激进的一方重返第一个主题，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实时利益展开争斗，主要就是实现民族化和开除外国资产。相反地，温和一方接受利益调整，甚至提供更深调整配合的可能性。在国际范围内，这种不同很容易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之间的东西之争。

我们在这领域内可以同时发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支配事件和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抵抗特征。

非洲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持有这个现代派的观点，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资产阶级。这观点只能通过资产阶级提出才能得以实施，但这种情况在解放时期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勉强存在的，30年后，这种情况也只存在于雏形的国家内，而且以一种最有利的假想的形式存在。相反地，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很好的存在，并组成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中坚力量。这种思想是“无资本家资本主义”的递送人，这个称呼是我个人提出的，初看上去很让人费解。具有现代化构想的资本主义呼吁重建适宜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社会关系、薪水关系，公司管理，城市化，阶梯教育，国家公民意识。毋庸置疑的，其他价值如：政治民主等，被认为是演变的资本主义特征，是严重的错误。但我们可由其选择的原始发展要求为其开罪。地区的所有国家，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却选择了单一政党形式，以及闹剧选举，党的领导者—建设者等。在政策上没有资本家，国家和专家政治论者因为缺少资产阶级已想要代替之。但是同样的，有时资产阶级的有所显露的措施也遭受质疑。事实上，它把短

期利益转到了长期利益之上。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激进派中，怀疑变成了排除象征。这个激进派别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其方案是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于是它们重新拾起苏维埃主义的论断。这同样把它带到了“无资本家资本主义”主题中，这个主题的目标就是赶上发达西方世界。

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分成两派，一派是称作社会主义的激进派，另一派是温和派，这种率直而又明确的区分贯穿于统一了其他运动表现的运动中。对抗建立在一个由复杂原因组成的整体之上，把一部分当成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阶层上进行运动。——农民、城市居民、中产阶级，受惠阶级——另一部分仍根据其组织和政治形式传统（共产党、宗主国，工会，教会），非洲两大主要的殖民强国英国和法国的仓促退却在60年代构想出了反殖民的主题加强了当时的这种对抗。像我们知道的非洲在60年代被分为两大块的卡萨布兰卡集团，在纳斯（Asterisms），阿尔及利亚FLN及N' Krumahiswe旗帜下重新组合，蒙罗维亚集团由忠实的戴高乐主义的学生和自由主义英格兰象牙海岸和肯尼亚学生组成。当时属于刚果的卢曼也（Lumumba）与第一集团友好，但国内运动的重要力量对第二集团更有好感。比利时政权的拖延要对发生在刚果本土的争斗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比利时政府直到最后一刻都不同意法国和大不列颠分析的教训。在里奥波德城（Leopoldville），后来在斯坦林城（Stanley Ville）成立的脆弱的卢曼巴政权的导致的结果是：由布鲁塞尔和南非支持，温和派选择脱离卡坦戈（ckafanga）和卡萨（kasai）分离。在星奥波德城建立，开始处于卡萨乌布（kasavubu）和莫布杜（Mobutu）阴影之下，与斯共本（Tschombe）和卡隆基（kalonii）国王和解，和其主人决定了的联合国玩弄着和解的纸牌游戏。于是，刚果的例子将激发一

项新政策的出台。首先要使各个角落实现文明，并把他们接进激进派和温和派的阵营。天才的国王埃依·色拉斯（Haile Selassie）早已明白，巩固莫罗维亚集团和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解的时候来临了。准确的说是1963年，非洲联合组织在阿蒂斯·阿伯达成立。

接近为非洲万隆主题的铺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形式上所有国家都重新联合，借此成为“无序”运动的成员，尽管它们都处在西方强国的怀抱中或处在西方强国直接的军事保护之下。但是，一句话，它们有进行操作的能力，在开始并没面对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计划。这个事实解释了自从“非洲社会主义”（加纳，几内亚，马里，）被创造出之后，受同样灵感启发下的激进派的后代可以在非洲不断地继承下来了（刚果——布拉柴维尔，贝宁，坦桑尼亚等），并使人们认识到组成国的脆弱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壓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莫布杜为民族主义的荒谬留了一个空间，若从其他方面来看，它这样做是很难理解的。

不管万隆纪元的共同目的是什么，是发展思想体系，是“无资本家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民族规划，其运作的状态，与超级大国冲突关系的变化，结果是，他的目标仍然不会与其他国家集团有所不同。

对结果的评价很明显的是为了确定“发展”而选择的标准的作用，是一个内容总是很宽泛的一种思想观念。

如果我们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标准，也就是说民族建设，那么，整个结果都要进行讨论。原因在于尽管在先前时候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护了国家的进入，在体系周边进行的世界一体化却使社会分裂。然而民族运动的意识无视这个矛盾，仍禁锢在赶超落后的历史的资产阶级观念中，而且要通过世界分工来完成这“赶超”。无疑根据早期资本主义早期殖民主义社会的特殊

性，这种分裂或多或少具有其悲剧性。在非洲，人工的殖民分割并没有尊重人民的历史，尽管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级已作了努力，由资本主义周边化引起的分裂在人种学上得以延续。当危机突然来临，突然之间摧毁了本来可以使新国家的种族混合政策的投资成为可能的剩余物资的增长，领导阶级本身也出现分裂。各分支已经完全丧失了建立在“发展”实现基础上的公正性，它们通常会与人种学试图联合创造新的基础。相反地，如果我们保留社会主义标准，结果就更具有可比性。当然社会主义在此应倾听激进的民众主义思想意识所担忧的东西。这涉及一个进步主义观点，强调社会最大的稳定性，削减收入的不公正性，某种类似城市充分就业的东西，这可以说是一个福利国家在贫穷国家的版本。以这个观点来看，一个国家的成就，举例来说，如坦桑尼亚同扎伊尔、象牙海岸或肯尼亚的成就，一起提供了一份激动人心的契约，这份契约中存在的最极端的不公平自三十年来一直不停地遭到指责，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是这样，在以后经济萧条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这个和资本扩张必然结果相一致的标准就是在世界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标准。而资本扩张逻辑从思想意识上来说与发展逻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这个观点看来，结果就是极端的对比并突然之间用亚洲主要国家的集团和拉美主要国家的集团去对抗非洲所有的国家。亚洲和拉美国家已成为有能力的工业出口国，而非洲仍处于初级产品出口阶段。亚洲和拉美组成了新的第三世界（在我的分析中，即是明天的城市外围），一直被我们称作“第四世界”的非洲，就像我们说过的一样，被指定在资本世界化的新阶段上被边缘化。

要解释整个非洲的失败、需求分析内部特殊环境和世界资本扩张的必然结果之间所有复杂的相互影响。因为这些相互影响通常被忽略，通行的解释不论是由“国际经济”经济学家提

出的，还是由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提出的，都是很表面化的。

研究“国际经济”的经济专家们强调这样一些现象：它们孤立在整个世界体系之外，像政治层的腐败，经济基础的薄弱，农业生产力低下，至今还停留在牲畜牵引的年代，种族分散等等，他们给出这些分析，毫不容情的认定并鼓励只有更广泛地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才有出路。非洲应需要“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它应该通过有系统地发展商业农业来打破农村自给自足的枷锁等等。这关系到一个简短的推理，因为他们撇开应该进行的改革范畴内的整体体系不谈，他们无视在一个农业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将产生大量的剩余人口，而这些人口，在一个技术型国家内，也不能像在19世纪欧洲的情况一样被工业吸收为劳动力。历史是不会重复的。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重点强调另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并不是不真实，像为实现经济起飞而进行投资的能力取决于原材料的价格，而原材料的价格已被有步骤的毁坏这是一个事实。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也是很有道理的指出，西方强国无限制的政策，甚至是军事干预，一直对进步的社会改变力量采取敌视态度，总是来援助过时的反动的力量。但是这些论点并没有从本质上联系内部斗争的必然结果，就这样把“外部”放在了“民族”的对立面。

我认为对非洲失败的分析应考虑殖民的责任和由领导阶层与新殖民主义联合执行的殖民方案的延续的责任。并且要关注帝国主义的全球地理战略。

世界分工产生了工业中心国家和未工业化的周边国家之间不公平的对比。世界分工可以追溯到19世纪在欧洲进行的工业革命。它要求未工业化的周边国家通过出口他们占优势的产品来参与世界商业。（而这些产品的优势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他们劳动的生产力上），这样，原则对非洲是有利

的，从殖民起到上世纪末，同样也对亚洲和拉美的周边国家有利。从这个观点看，亚非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什么区别。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欧洲列强开始攻击他们在柏林会议（1885年）瓜分的非洲大陆。问题在于一次“错误”的计算（关于这点，历史将在以后显示出其荒谬性）。根据这个分析，非洲不是为欧洲的富强贡献力量，相反地，它成了殖民列强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能做到的强国来说，很简单，这涉及获得非洲大陆上丰富自然资源的优先购买权。

一旦被征服，就要好好重视相关的非洲。从这点同时引出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非洲大陆的各个不同的地区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自然资源？）和非洲社会早期历史的必然结果两个问题。

在这次分析的范围內，我觉得我们可以理解殖民的三种形式分别是什么：在热带产品的世界市场中混杂了一小部分农民的贸易经济。这种经济使小部分农民处于垄断市场的强制条约中，允许人们把农民的工资报酬降到最低，并浪费土地；南非矿储经济，这种经济主要围绕矿产的采掘构建、廉价的手工制品来维持，这些手工制品由来自矿藏不足地区的移民来制作，以确保传统的农村自给自足的状态得以持续；特许公司致力经营的掠夺经济，特许公司对从别处采掘的产品征收不对等的什一税。在这种经济中，当地社会环境不允许“贸易”的产生。矿藏丰富也不能解释是在供养大量手工制品的矿藏结构。刚果的协议矿床实质上属于第三种形式。但是，比利时殖民地的法规允许殖民发展而且殖民地发展被其发起人和获利者称为辉煌的比利时资本和国外资本联合，比利时殖民地来源于其国王私有财产，这个欧洲小国的开放比其他大国的开放更惹人注目。它的经济与卡坦戈（Katanga）丰富的矿产资源相配合。

尽管有这样的表面现象，这种嵌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方

式对非洲人民来说仍像是一场灾难。实际上，殖民地的开发应对直到如今还压在非洲大陆命运上的两大薄弱环节负责任。

首先，殖民地的开发使农业革命发生延误了一个世纪。在这里，剩余物资可以说是农民劳动和大自然馈赠的财富的提取物，大自然的财富中没有现代化的投资（既没有机器，也没有肥料）没有明确的工作报酬（在传统的自给自足范围内生产），甚至没有资源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维护的掠夺（可耕土地和森林资源的浪费），在实施了掠夺经济的地区，由这种开发方式所造成的经济倒退是最大的。然而，这种摧毁性的效果已通过一个比其他国家更早熟的工业雏形的创造补偿了刚果—比利时。这里，我参考在二战以后建立在坎斯阿扎（Kinshasa）的进口调换工业，我们通过比利时在国外竞争情形下实行开放政策解释这工业，当比利时开放门户之时，法国和英国应处于互相关保护时期。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比利时的这种工业形式只是一个脆弱的雏形而已，而不是工业革命的开始。

同时，自然财富的这种开发方式在当时世界不平等分工的范围内使用，排除所有当地资产阶级的形成。相反地，每次当地资产阶级开始形成，殖民列强都急于扼杀这种萌芽。

民族解放运动和做为殖民遗产国家的脆弱都根源于这种殖民地的培育，而不是前期早期殖民地的非洲的产物。前期早期殖民地在剧痛中消失，而世界资本主义的思想，想以展开其习惯性的种族主义论证来从中找到其公正性。

有关独立非洲的，腐败地政治化资产阶级，经济观念缺失，农村公社结构的顽固的批评忽视了当代非洲特征已在 1880～1960 年建立起来了。

这样，新殖民主义长期保留这些特征就不足为奇了。那些应该为独立非洲负责的政治团体没有必要人工的成立实施部门，甚至是在那些已经接受新殖民主义选择的团体也没有必要。他

们脆弱性就是周边资本主义的脆弱性，这并不妨碍宗主国负大部分责任。因为，尽管殖民社会很脆弱，当解放运动已经产生潜在的能领导解放运动走得更远的杰出人物时，所有的力量都会集合起来扼杀这样的使非洲走出常规的机会。

这种失败所采取的形式完全由著名的洛美协议限定，洛美协议曾经连接着，而且现在也继续连接着附属撒哈拉非洲和欧共体的欧洲。这个协议实际上维护了旧的分工，把非洲置于原材料的生产者这个位置上。而正在这段时期，即万隆时期（1955~1975），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已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协议让非洲在进行历史性转变决定性的时期丧失了三十几年的时间。当然，非洲领导阶层应在谁导致大陆经济衰退的问题上负起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当他们违背人民的意愿列身于新殖民主义阵营的时候，他们也由此造就了非洲的脆弱。

所以，非洲领导阶层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勾结最终决定性的导致了非洲的失败。这样，我们可以在勾结的过程中，找到所有战后（1945~1990）帝国主义战略实施的措施，特别是其对全南非实施的地理战略措施，扎伊尔已经为帝国主义地理战略付出了代价。卡坦戈（今沙巴地区）的所有地区，位于非洲南部的赞比亚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为冷战时期的美国阵营组成了一块统一的战略区域。因为这些地区矿藏丰富（稀有矿藏和南非金矿），也因为其地区化，控制着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通。当时苏联曾经试图通过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其中在安格拉，莫桑比克海峡，赞比亚和南非的激进派结成联盟来破坏对手的地位。

西方列强也响应苏联，像他们支持安格拉萨维比（Sawimbi）政权（一直到今天），莫桑比克海峡的勒那莫（Penance）政权，在南非达成妥协联盟一样，毫无条件地支持扎伊尔的莫布杜（moboutou）政体，马拉威的班达政体，肯尼亚的肯尼亚达



(kenyatta) 政权，后来又支持木瓦 (moi) 的政体，虽然这些政权的腐败已是众所周知、而且是极端的反民主。这不利于明确的民主解决方法。

同时，华盛顿的地理战略因素给莫布杜操作的权力，这权力如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并且被华盛顿体系所利用。这项权利有时会通过事实上并不妨碍帝国主义的基本利益的民族主义（扎伊尔主义）政策的采纳，贯穿于其公正性的民族主义的讨论之中。

这是一些相似的地理战略措施，这些措施表现了西方列强对北非大陆和中亚也就是阿拉伯资产阶级的敌对情绪。在这里，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在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坐落在当时苏联南部大陆的地理位置。这些措施同样应该为阿拉伯地区的衰落负一部分责任。在相反的意义，这些地理战略措施限制了西方帝国主义支持，至少是容许东亚资产阶级的产生，这至少部分的解释了这个地区在战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胜利”。

但是今天，这一页已被翻了过去。反苏维埃地理战略的担心忧虑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整个周边地区的新买办化时刻已经来临，他结束了万隆纪元的幻影。这新买办化仍然在那些经过万隆规划的展开而变的与事实甚至是不公平的结果不同的地区进行。

世界资本单极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在其中，资本扩张必然结果希望非洲第四世界能暂时边缘化。同样，在我看来，与单极化新形式有关的争论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就已有争论重新开展。这争论由先前体制的腐败引发，战后（1945～1990年）这争论声日高，所以在此，我建议读者回过头去阅读本作品的第四章。

占统治地位的利益的必然结果并不是对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持续恶化的回答。这种物质和精神条件的持续恶化的环境包含了

体系中大多数周边国家的人口。他所希望的结构调整或只是适用宜于有利于中央资本的世界扩张要求的周边的单方面的调整。于是，我们需要连接世界各大地区的相互的调整配合。这些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所以调整配合要建立在调整全球相互依存性的集体协商基础上。全球相互依存性把他们置于重视单极化所遗留的不公正性的地区和民族战略的要求之下。

第三世界国家仍能有这样的错觉，即他们实施的结构调整能让他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因为这些国家有某种协商的能力，对于第四世界的国家而言，这种结构调整只能使他们退化至贫困化和更严重的边缘化。已成为问题的调整事实上并不能以经济的新增长而告终，相反地会导致投资的减少，摧毁他们稀有的工业，而且不能为农业革命的开始创造有利条件。农业产量的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尽管在理论上，潮湿的热带农业是有巨大潜力）导致人口向城市迁移。但这些人口并不能给工业发展带来资金，自由成果在教育领域，健康和行政领域的腐蚀是不可避免的。调整的惟一目标即公共金融的平衡以及外部环境的平衡变成了幻觉；这个目标在它引起的革命螺旋中从未实现过。

与这具有统治地位的必然结果相适应的调整过程仍然创造了使调整长久进行的政治环境。在最幸运的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加强了买办资本家的地位，这些买办资本家在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中受益匪浅。但是，如果第四世界的国家勉强做到了这点，他们却创造出了对民众恰如其分的回答的结果很不利的条件。于是，这些退化导致了自然隐藏的国家分裂因素的爆发，导致了种族地区或非种族地区的分裂。这些因素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分裂以及国家公正性的丧失引发的。非洲已有几例这种悲惨的例子：在乍得，索马里，利比里亚，卢旺达以及布隆迪。其他国家也可能离进入这种形式的退化不

远了。被这些国家强调的边缘化并不能威胁到世界秩序，只能以这些国家民众的苦难而告终。

社会交替仍然存在，尽管其实现交替条件的过程是困难的。交替条件的实现首先要求在相关国家的基层，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的民族战线。但交替同样要求在世界体系范围内我所描述的这些演变能有一个开始。这些演变的方向是建设一个多极世界，以便减轻受压迫的状态，这种压迫状态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人民民主更迭道路上的沉重负担。

## 参考书目

1.S.Amin,《种族对国家的冲击》L' Ethnie a l' assaut des nations, L' Harmattan, Paris 1993.

2.Cf Benard Founou - Tchougoua,《非洲撒哈拉沙漠：世界一体化危机中的1/4部分》Afrique subsaharienne: la quart mondialisation en crise, in S.Amin et all,《世界一体化与积累》Mondialisation et accumulation, L' Hrmattan, Paris 1993.Voir egalement, dans cet ouvrage, PP 10~19.

3.S.Amin,《发展的不平衡性》Le developpement inegal, Minuit, Paris 1973, pp 178 ~ 296.S.Amin et C.Coquery Vidrovitch,《1880年~1968年刚果经济史》Histoire economique du Congo 1880 ~ 1968, Anthropos, Paris 1969.

4.S.Amin,《西非的停滞不前》L' Afrique de l' Ouest bloquee, Minuit, Paris 1971.S.Amin,《带内加尔的实业界》Le monde des affaires senegalais, Minuit, Paris 1969.

5.S.Amin,《理性的历程》Itineraire intellectuel, L' Harmattaan, Paris 1991, chap (《1955年~1990年第三世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衰退》deploiement et erosion du projet nation bourgeois dans le tiers~monde 1955~1990) .

6. 《世界一体化和积累》Mondialisation et Accumulation , op cit , chap.IV (《全球体系内的 南非或民主斗争的赌注》l' Afrique du Sud au sein du systeme global ou les enjeux de al lutte pour le democratisation) .

7. Faycal Yashir, 《非洲的赌资》Enjeux miniers en Afreique, Karthala, Paris 1987.

## 第十一章 获得自由的战略

### 1. 资本主义的三大基本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从最初便存在矛盾，而这些矛盾从来没能被克服。相反地，它们还随着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取得的成功而逐渐深化。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即它适应甚至有悖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各种不同社会调节手段的能力，使它能够克服矛盾爆发时带来的危机。然而这些为应付危机采取的不彻底的办法却加重了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

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中有三点有悖于大多数人的基本社会利益。

第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追求利益而不可避免的使工人沦为附属物，和工人们要求掌握自己命运之间的矛盾。通过斗争，工人和人民使资本主义在两个方面适应了他们自己的社会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和资本主义相冲突的。即在经济利益增长的同时使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报酬也随之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也同样。在民主的原则方面，获得他们本来没有的权力。民主改革派对付挑战的答案（他们本不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天然产物，而恰恰与其相违背）不但没有最终解决问题，反而使矛盾更加

激化。从此人民不仅仅要求更好的物质条件及对人权的尊重，他们还希望成为社会的主人，也就是从经济的枷锁中自我解放出来。然而没有这样的经济枷锁，资本主义便不能继续运转。资本主义的标准和参照，做为经济的合理性，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其实都只有一点，即使社会成为经济的奴役（根据马克思对奴役的定义）。

资本主义的第二内在矛盾在于其所谓合理的短期经济利益（一般不能预测到 15 到 30 年之后）与全球未来的整体发展。矛盾本身做为历史体系的特点决定了它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任何办法都解决不了，尤其是生产力发展后（同时具有破坏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取得进步的同时，是矛盾的程度超出了以往任何时候。

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内在矛盾在于不断升级的贫富差距。中央是富人，周围是穷人。这种极端化并不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宣称的那样只在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而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交换、资本全球化和国内劳动市场分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重商主义而确立起来的极端化系统化地摧毁了以前的自由形式，取而代之为一种为资本积累服务的等级划分。极端化从中心工业化开始而在 19 世纪大规模的发展起来。随着处在边缘的穷人们进入工业革命，它会不会消失呢？实际上“五极化”的模式确定的新的资本主义等级（对技术、金融体系、自然资源、大众传媒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控制），给全球化的价值规律一种加强的偏振力。这第三个矛盾引起了危及资本主义扩张的最强烈的政治反应。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社会革命都首先是世界资本主义极端化的受害者——人民的运动。

## 2. 历史没有尽头

原则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学说肯定不知道资本主义的特有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只有对资本主义本身提出质疑。承认这些矛盾将使资本主义失去扩展的可能性，因为这将意味着承认它的历史特性。然而所有当权的意识形态都必然提出一些有关历史性的标准，来接收泛历史的道德价值观。

这种泛历史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会以惊人的幼稚方式出现，比如就像弗朗西·富库雅玛，可笑地写道：“我们已经达到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尽头”，“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他自己却根本没有看到。自称黑格尔派的弗朗西毫无根据的人文人类社会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 3. 超越资本主义如何？

资本主义必须被超越。缺少这一点，它就会破坏并终结人类和地球而成为历史的终点。资本主义与先前的那些经历了几千年才耗尽自己的历史潜力的制度相反，它最终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短暂阶段。在这个阶段期间，积累的基本任务会被完成，从而为建立一个更加合理，以真正的全球化的人文主义为基础的后来的社会秩序做准备。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实际上很早就耗尽了它的积极的历史潜力，不再是社会进步为开辟自己的道路而使用的工具，即使这一点是“无意识”的。正相反的是，它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不再被定义为资本扩张无意识的产物，而是以与资本扩张的实际产物相对照的固定标准来定义（这些实际产物是：经济的混乱，生态的破坏，世界的集中）。

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从一开始就相互对比的阶段组成的

原因。在其中的一些阶段中，它的扩张作为一种单方面的力量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另一些阶段中，反制度的力量的干涉又加强了一些破坏力更弱的扩张方式。

19世纪由于经历了工业革命的不平等发展，无产阶级化和殖民扩张，最能说明资本主义的扩张。但是，尽管有人大肆赞扬资本的光荣，这种制度实际存在的巨大矛盾并没有使人类历史结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光辉时代”，而是导致了一战，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殖民地人民的起义。在一战后重新建立与苏俄完全脱离的自由主义经济加重了混乱局面，导致了法西斯的幻想和罪恶。从1945年法西斯破产以后，由于与苏维埃主义，社会民主派以及民族解放运动三者的妥协，资本主义才开始了一个文明的发展阶段。所有这些妥协，即使由俄国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妥协，都不能与资本主义完全决裂；但是它们使人们在尊重资本的片面的必然结果的同时又要考虑到由于我们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的第一和第三矛盾的暴发所产生的运动的影响。这些妥协的必要结果表现出来的时候，确实减轻了经济混乱和过于集中的破坏效果。然而，由于被自己的成功侵蚀，这种侵蚀即使部分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必然结果也随着它们为之所辩护的制度的崩溃而消失了，重新回归自由主义经济看起来再一次成为历史的尽头，这一点仅仅是戏剧的一幕幕更替的悲惨重复吗？这个回归难道没有一个时期内，制造了意识形态的空虚，扩大了政治的混乱，为进一步的过度集中创造了条件吗？

人民做为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必然会起来反抗。他们已经开始了。但他们所要发展的与资本相对照的逻辑是什么呢？他们会使资本主义与自己达成什么妥协呢？或者，我们可以大胆设想一下，他们会以什么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呢？

由于不能对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挑战做出新的回答，在以



前的历史阶段中曾经聚集了人民运动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国家建设）现今已经失去了它们的可信性。人们已经看到了它们的替代品：或者是民主这一主题，或者是文化独特性尤其是宗教独特性这一主题。民主这一主题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共同体（如种族）相联系，这些共同体被“区别的权利”和生态主义解释，从而得到承认。

#### 4. 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主义的绝境

各种文化的区别不仅是真实和巨大的，而且是基本的，这些区别永远存在并且是稳定不变的。这不是什么新观点。正相反，它正是各国人民和各个时期常见的共同偏见的基础。例如，所有的宗教都以此将自己定义为历史的尽头和最终的解决方法。历史和社会思考的进步，世界性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的建设在我们这个时期都是通过与固定的文化主义的偏见的系统斗争而实现的。现在要涉及的问题并不是要再次说明这种世界观被人类历史证明为错误的，而是要明白为什么这种荒谬的观点在今天具有如何强的说服力以及它在政治上的成功会导致何种结果。

这里提出的问题不要求直接的简单回答（对于这些问题，一个文化理论可以提供概念性的分析工具）。因为这些问题是针对这些社会的总体上的和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上的运转的。它们首先确定社会生活的文化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

文化特殊性的理论总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些理论是建立在“文化的区别总是有决定作用的，而文化的类似总是偶然的”这一偏见的基础上，并以此为基础事先决定了它们的内容。这样所察觉到的区别社会表现出思想的平淡。例如，Huntington认为，这些区别是基础的，因为它们涉及一些确定“人类与上帝自然，权力的关系”的领域。这是多此一举，是在将文化局限于宗教，假定宗教发展了相互之间区别很大又适应自己的特

殊概念。但是历史证明这些概念的曲伸范围以人们平常想象的要大，它们建立了一些意识形态体系，这些体系写入了，根据独立于它们的外部条件而不同或类似的历史发展之中。一些蹩脚的文化主义者（有不蹩脚的么？）以同一个儒学思想解释了中国在以前的落后和现在它的不断加快的发展。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10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不仅比同一时期的基督教统治的欧洲更加灿烂而且更有进步潜力。是什么改变了并能够解释它们地位的颠倒？是宗教，是另一件东西，还是这两者同时？这些现实中的东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哪些充当了火车头的角色？对于这些问题，文化主义都是视而不见的，即使在Huntington这样最有学问的思想中。文化就是文化，它们是特殊不同的。

但是这里涉及的是什么文化？是那些由宗教思想语言民族类似的经济地区、政治体系定义的文化吗？Huntington很明显是选择了“宗教”做为他所定义的“七个集团”的基础：西方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穆斯林，儒教徒（尽管这里涉及的不是一个地区！）日本人，印度教徒，佛教徒和东正教徒。

Huntington很明显对那些分割现今世界的文化思想感兴趣。大概就是为此他才需要将本人与其他的儒家弟子分开，将东正教徒与西方人分开，并无视非洲人（而非洲人，不管他们是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泛灵论者，总有自己的特点）甚至拉美人。人们永远不会停止批评这糟糕透顶的区分工作的荒谬和这种错误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

之所以有这一切，是为了得出这七个集团中除了西方人之外的六个集团对西方价值观一无所知的惊人结论。在这些价值观中，我们总是可以找到这类定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概念。但是，在不属于西方的日本，在拉丁美洲，在南非哈拉非洲，市场的运转就比在西方差吗？即使在西方，市场和民主不也都是新事物吗？中世纪的基督教被这些所谓的西方价值观承认过吗？

意识形态，特别是宗教，固然是重要的东西。但是这样说无非是平庸之举。将它们的功能置于特定历史时代中而来分析，有助于在这个背景下，发现这些有关功能的相似点，在这个背景下的附属的文化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们从内部被现代资本主义深刻改变。我得出了以下结论：这种资本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这种统治使古代的附属文化变得空虚。凡是在资本主义具有了发达的中心形式的地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在实际上完全替代了古代文化，其中包括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和日本的文化。相反，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的统治并没有成功地大大改变地方古代文化并将它们变为自己的工具。这种区别并不是由这些附属文化的多种特点所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这种即集中对扩展的扩展方式造成的，资本主义在其世界范围的扩张中使它的全球化目的与实际在物质现实中产生的过度集中这两者的矛盾显露出来。资本主义所援引的价值观，在失去自己的内容后，在受难人民眼中成为一些谎言，或者是西方特有的价值观。这种矛盾很明显是长期存在的，但是每次世界化加深的时候就会使它的暴力显露出来。这样，资本主义制度就通过它的实用性特点，发现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际上，如果大家都接受彼此的不同，受压迫者停止要求民主和个人主义。自由和平等为以这些价值来代替资本主义的价值观，这些就足够了。这样，受压迫者就认可自己的附属地位，从而使得资本主义在扩张中加深集中程度而又不遇到巨大障碍。

帝国主义和文化主义总是融洽的。帝国主义以一种肯定的高傲态度表明，西方是历史的最高阶段，它的管理经济、社会的方式是固定的不可超越的，实际中可以发现的矛盾被宣布为想象中的，被宣布是由于抵制资本主义而造成的。对于其他的所有民族来说，选择是很简单的，接受西方价值观或者把自己

关闭在自己的文化特征之内，如果第一种选择不可能，不被接受，那么，文化冲突就会成为主要矛盾，因为西方社会已经从内部得到了调和。但是在这一冲突中有人捣鬼。西方一定会胜利，而其他人总是会失败。正是因此，这些失败者对于文化冲突的选择不仅被容忍，甚至得到鼓励，这种选择只会威胁到受难的民族。

做为对“历史最高阶段”和“文化冲突”这些神话般观点的修饰，批评分析希望给出真正的挑战定义：资本主义经历了自己不可能克服的矛盾，它仅仅是历史的一个阶段；它所提倡的价值观在它们的形成形式中，避开了与它自己的局限和矛盾有关的问题。西方的自满的观点并不能回答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因为他们对这些挑战全然不知。但是他们关于文化冲突的观点避开了这些挑战，这一点特别是因为这一说法将冲突从真正的战场上脱离出来，将这些战场留给对手，而自己却在文化的想象中躲藏起来。如果在世界经济的等级中，这一体制的规则将伊斯兰社会限制于买办市场之中，那么伊斯兰在地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又有什么呢？如同昨日的法西斯主义一样，今天的文化主义是靠谎言来运转的：因为文化主义实际上是解决危机的方法。我们朝前看就会回答被这两种对称的观点所避开的问题：如何真正解决经济混乱，资源浪费、过度集中这些问题，如何创造条件以便于世界价值超越资本主义给它们的形式而得到发展，同时，对于文化遗产的批评今天变得很重要。如果欧洲人民事先没有批评自己的过去和宗教，欧洲的现代化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如果不是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的过去和儒家思想的批判，现代化进程可能也会开始。当然，文化遗产可以在后来被融入新文化中。但是这需要通过对其的过去的革命性批判将它大大改变。相反，在伊斯兰世界中对于过去的任何批判的拒绝导致了处于这个文化下的国家在国际等级中地位的下降。

### 5. 从危机中走出还是治理危机？

在分析了一种情况下然后再注意考虑一下它有可能引发的进展，这一点是很正常的。为此，最常用的方法是调查处于这个领域的活动力量，为它们设想一些与它们的特点相一致的目标，然后，从它们其中之一干涉并发起运动着手，关注运动的发展以及各个力量的反映。这种方法允许我们解释在开始前前提下包含的内容，这必然是有用的。但是在关于有关集团的身份鉴定方面，这种方法的自由度过大，结果使我们很难预测某些变化，而这些变化通过冲突的展开，改变各种力量对比，它们的目标和最终结果。

与这种方法相比，我更加喜欢一种表面上并没有如此严格，但是更能吸取历史教训和上面讲的方法给出的直觉综合的方法。这里是要在三段连续的时间上展开分析：（1）对现阶段特殊结构和情况中统治力量的战略目标的鉴定，对于为达到这些目标而使用的方法的鉴定；（2）对不同的人民力量和这些统治战略的受害者的分析，对于他们关于挑战的看法，他们的干涉，他们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他们喜欢或排除的联盟结晶的分析；（3）最后，以此着手，就什么是有效的人民战略。它们应该在每步给自己确定的目标，以及它们应使用的方法展开一个辩论。

在这里，我想给读者介绍一下我在别处做的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的是关于战后体制的，有的是关于这一体制的腐蚀，崩溃和由它引起的混乱的。以这种精神，我认为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各国政权所采用的政策，这些政策并不是做为资本主义扩张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仅仅是做为短期内治理危机的方法的，不管是从它们的经济方面还是从某些政治方面来说。

两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扩张基础的妥协逐渐腐蚀，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本在摆脱一切束缚后，

试图确立一种与它的金融利益决定一切这一逻辑相一致的管理世界的“乌托邦”。这第一个结论推动我去鉴定统治力量的两个新的战略目标：加深经济的世界化，摧毁各国家、民族、人民的政治抵抗能力。“将世界做为一个市场管理导致政治力量的最大分散，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权力的摧毁，对于低于民族的共同体有利的民族的崩溃，对于超民族意识形态团结有利的民族的衰弱。对于这种管理，理想的境界是只剩一个国家还称得上国家——美国成为惟一世界宪兵——而所有其他国家只限于一天天地管理经济的简单任务。欧洲建设计划正是在这种精神下设计的。这一计划被设计为对于市场的共同管理，仅此为止，然而，在欧盟边界以外，最大的分散一贯是被追求的。为了消灭人民使用民主和权利的能力”，“民主”和“人民权利”这些字眼被大量使用，而人民正是长期在此名义下被操纵。对于特点和区别的赞颂，为了低民族或超民族目标的意识形态动员，在对无力的社会团体有利的同时，使斗争转移到种族纯净和宗教专制的战场上来。

在这个逻辑和这些战略目标的背景下，文化冲突成为可能，甚至是为人期盼的。我认为，Huntington 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认识。因为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负责为美国的政治战略辩解的国务人员。正如同以前他曾写出一些文章以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名义来为美国给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支持来辩解一样，现在，他又写文章为将突出集中于“文化不相容”上来治理危机的方法进行辩解。这里涉及的纯属通过强加一个冲突战场来保证“西方”胜利的战略，这一点我早已指出了！

## 6. 世界上不同地区面临挑战：潜力的不平衡

所以，在回到“世界化”——即当今各当权者给我们建议

的“市场世界化”——这一话题的同时，我已经强调了它的极端的脆弱（参考《世界化与积累》）。显然，我的这个观点和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论断是截然相反的。根据现在的论断，“人们没有其他选择而应该适应市场的世界化，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这一占统治地位的主要论断促使媒体来为其提供一些表面上符合情理，而实际上站不住脚的论据。它似乎使人们觉得一个世界化的生产体系已经建立，并应该抛弃所有的有效的国家政策；似乎这个体系已经或者正在各个领域实现，并且由信息化所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的分散将会代替不必要的大规模的生产要素的迁移（尤其是劳动者的迁移）；似乎市场上的竞争不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体现为资本利益集团的冲突；似乎这个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一个过时的观念）的世界和加强民主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因为民主是反对模糊意义上的国家的），并且这个没有国家的世界对那些在旧的国家体系中总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小国是十分有利的。

所有这些论据都禁不住思考与推敲。即使对于世界化政策的无限制的支持使得国家生产体系不再有效，也不存在一个世界化的生产体系。因为在市场上发生冲突的利益需要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而在世界体系中，强国（美国、日本、德国）并不排除自己使用国家力量的可能性。市场的世界化并不是各个领域内市场的融合，而人们想象的最为有益的就业机会的创造并没有被当做问题来关注，并且不会为减少失业大军提供任何光明的前景。一些小国希望通过和一些大国的联合来使自己的物质条件水平和那些大国齐头并进。这里举捷克为例，它即将和德国联合。但是它不仅未能和德国齐头并进（海地并没有因其融入北美区而获益），而且其政治影响也完全消失（捷克的将来是否会像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一样而完全的日耳曼化呢？）当然，买办的行为总是支持统治力量的观点的。在西方的民主危

机不正是国家权力消失的后果吗？而人民正依赖政府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新的中世纪由相互独立的团体组成，其见识不能超越关闭它们的围墙，没有国家（却有许多警察），不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又怎能促进民主的进步？

为了驳斥这一纯粹理想化的论断，我提出一个我认为极为现实的世界化体系（参考《世界化与积累》）。

在我的分析中，我建议将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水平与可劳动人口中就业人口的比率（即与生产体系的各部门中非就业者的比率）相结合的同时，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三类（核心的、正在融合的及边缘的）。第一类是那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美国，加拿大，西欧及中欧，还有日本）（参考第四章）。第二类是那些东欧国家，前苏联，东亚（中国，韩国）和东南亚，拉丁美洲国家（除加勒比海国家和中美洲国家外）以及印度的一部分。而印度构成了和第三类国家的结合点，即非洲、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

在同一个分析中，我又建议突出东西一同一世界体系下的两类国家——在面对当前危机的分歧。在西方，传统的核心国家（北美和欧洲）和被联合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非洲国家，中东，东欧及前苏联）在处理危机时采取了一致的政策，都属于新自由主义一派。这些政策使得那些核心国家处于长期的停滞并导致那些被联合的国家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在东方，亚洲拒绝响应没有国家的理想市场的政策，从而实现了增长。不但没有经历危机，而且使这个地区经历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

当我们把这两种分类方式放在一起时，我们发现世界化并不是一个的挑战，而是一些挑战，他们根据地区的变化而极端不同。这就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的题目选择了复数。因为当人们谈起世界化的一个挑战时，人们很容易的完全陷入到不实际的，



极其理论化的理想大市场的争论中去。

另外，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在本书第四、五、六、七、八、九、十章中，当我在考虑欧洲或亚洲，中国或俄罗斯，阿拉伯世界或非洲的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变化的可能性时，我分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选择。所以，我们可以回到对各地区的分析中，并对它们进行对比。

在所有的正在融合的国家中一即在生产上（除了原材料的生产）有竞争力的国家中，东亚凭借其积极与活力躲过了那个普遍的危机。做为资本加速积累的地区，以其自己为核心（从两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以自己为核心，并且东亚地区内部的贸易占各国对外贸易的60%）。尽管很开放，东亚不易收到外界压力的攻击。

东亚并没有像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所建议的那样，在立足地区之前，首先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竞争性的地位。它首先同时加强国民基础，地区内的相互依赖性，以及有步骤的对外开放。散居各地的华人所构成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支柱，凭借着这些，中国使得东亚的经济围绕着中国而不是日本而发展，并给与东亚一个比较光明的前景。东亚这个强盛的地区，比人们想象的要脆弱，因此它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而只有把赌注压在中国的崛起上，并要和美国协调一致。

对于拉丁美洲来说，尽管已经获得了一个有竞争性的工业化水平，却依然处在美国和其自身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限制之中。虽然它在地区内的融合已确实取得了进步——因为它对外贸易的22%来自于地区内，但是它却被停滞和危机所深深困扰。所以，对于这块大陆，其选择是：拉丁美洲是要把它的中心放在尽可能独立于美国的融合上，还是像墨西哥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一样，接受美国的控制？而这第二种选择，所谓的“自由

融合”，一定是当前领导阶层的选择。

根据它特定的影响以及它自身的地理位置，印度受益于它的独立自主性。这使得印度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其不可忽略的增长并不断加强它的竞争力。然而，它却被其社会体制所限制；基于此，很难对其将来的情况做出一个建立在对其力量关系的现实评价基础上的结论（革命，崛起，进步……）。

东欧苏维埃体系倒塌以及前苏联的解体显得太突然，并且依然显得离我们很近，以至于在世界体系内这个地区的力量关系还没有重新形成。在这一大动荡的恢复过程中，这个地区进入了一个衰退和混乱的阶段，以至于我们能够想象出所有可能的结果，并且不知道那些领导阶层以及人民是否能够挖掘出他们的竞争潜力。

非洲，阿拉伯世界及伊斯兰世界依旧处于旧的劳动分配的领域。由于缺少矿物和农产品，但拥有大量的石油矿藏，这些国家依旧不能确定他们自己的融入世界体系的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一直是北方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人，欧盟通过联合协定强加意志于非洲（洛美协定）如同美国的“围绕以色列的中东建设”计划。这些地区由于有史以来的落后，没有获得在世界市场上的真正的竞争力，所以缺少对于地区性建设的构思，从而不能取得如同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进步。与此同时，我也分析了由于没有经济上的竞争（即缺少对融入世界体系的长期策略的选择）和没有政治上的动荡（即缺少对国家体制管理的选择）使得冲突转变为宗教和种族间的争斗。

所以，从不同地区的各种可能性中，我们能够从“地区化”的观念中来确定可选择的字眼。地区化是分离的一种恰当的方式，适合于已融合国家（第二类国家）的变化。或者说地区化是迈向世界化自由前景的一个中间层次。词语的选择带来了另一种原则性的选择：是实现围绕特定中心国家的地区化（美

国—拉丁美洲，欧盟—东欧—非洲—阿拉伯世界，日本—东南亚）还是实现完全独立于这些中心国家的地区化？在此，我请读者去阅读我的有关不同地区化形式的选择的分析（参考《第三世界中的地区化》）。一条中心线将会引导我们想象出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十五地区组成，这十五个地区分别以一个霸权国家为中心或至少是以一个地区决定性国家为中心（比如非洲南部以南非为中心，中东以色列或以埃及—以色列为中心，中亚以俄罗斯或土耳其或伊朗为中心，南联体以巴西为中心，东欧以德国为中心，东南亚以中国为中心），而他们自己和北方中心紧密联系。这条极有可能引导中期变化的中心线同样可以适用于以北方激烈竞争为特点的全球体系。它同样也体现了加强新的中心融合的优势，这种融合也是国家计划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如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或将要达到的目的（如俄罗斯或者存在更严重问题的阿拉伯世界和非洲）。

对于可预见未来的最现实的预测符合这种逻辑。如果假设资本主义能够未经历任何颠覆而度过这次危机，那么我们很容易想象到资本主义的又一个建立在第二类国家的资本加速积累基础上的新的扩张阶段。这个资本的积累将会促进第一类和第二类国家的交往的增加。所以我们可能又回到十九世纪时的以横向增长（地区性的增长）为特点和以比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快的世界贸易的增长为特点的典型模式中去。人们会指出这个模式将和统治二十世纪的模式形成对比。而二十世纪的模式以世界相互依赖的中断为特点（社会主义体制的分离，在万隆会议上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对外关系的加强）一些中心国家以自己为核心，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纵向发展和北北的交往，却损害了南北对话。

显然，应该明确新的横向的增长是否允许新的中心有像十九世纪时那样的融合，或者以前从垄断中获利的中心国家是否

不会形成一个我在第四章所描述的“极”。同样需要明确的是第二类国家的加速增长是否能够减少失业大军；或者在不能减少的情况下，这个增长是否会导致质疑资本主义积累的社会运动。人民对于有关历史的介入显然不能被忽略。不容置疑，它不仅关系到第二类国家，同样也关系到第一类国家（文化和思想方面更领先的国家）的人民以及第三类不希望被遗忘在边缘的国家的人民。

### 7. 由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长期过程

为了定义人民斗争的一种战略，我们首先要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它在特定阶段，即我们所处的这一阶段所采取的形式。这一战略本质上讲是为了反对经济的分化，资源的浪费和世界的分极化。为了在地方，国家，地区和世界的不同层面上展开斗争，必须保证行动的一致性，也就是有时候我们所总结的“世界范围的思考，地区范围的行动”（“think global, act local”）。为了在现实的目标（行动的及时有效性）和长远的预期（由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性的分析而得出的最终解放的目标）之间找到平衡，我们就必须摆脱“改革”（通过系统内部的定义，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和“革命”（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系统的出路和世界的出路，只要后者仍旧建立在资本主义的规则之上）之间抽象的形式上的对立。对这一平衡的追求可以帮助我们重点放在对我们称之为“激进的改革”的追求上，而这种改革可以在不打破旧有系统的逻辑的前提下改变原有系统的范围，超越其内部范畴。

这一研究的目标并不是具体定义这些关于解放的战略，因为这些战略只对那些具体的国家和具体的发展中阶段有意义。我只是想为针对这些战略的争论反思提供一个范围。在这里，我只是提出关于人们所面对的几个主要挑战的一些结论：

①来自“市场”的挑战：这里即不牵扯到完全放弃所谓市场经济的所有形式而代之以中央集权的和官僚的计划经济体制（毕竟，它没有任何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也不是使社会生产完全受制于市场（就像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建议的和以此命名的政策一样）。这里所牵扯的是明确其目标和方法（法律的，行政的，组织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以便明确市场范围使之服务于社会生产以保证社会的进步（充分就业，最大限度的平等，等等）。在这一范围内，不同形式的实体——无论私人的还是公共的，国家的还是合营的——都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占主导地位。

②“经济—世界”的挑战：这里所牵扯的是摆脱错误的争论——接受融入世界系统并且努力改善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或者是完全摆脱这种争论——为的是代之以对世界化给现代国家所带来的无法回避的，现实的制约与限制的有用的讨论。换句话说，即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回旋余地来改变内与外的关系，拒绝一味地适应外来限制，而努力使世界来适应各国的发展需要。我称之为“分离”（Déconnexion）的概念具体的定义了这些激进改革这一主要行动方面。

③来自“民主”的挑战：这里即不牵扯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称之为自由主义）的形式中观察历史的主题，也不牵扯到代之以民粹主义的实践。Yves Bévot 恰当的观察到：司法权与社会权的分离应被摒弃。当这两种权力重新融为一体时，它们就可以表达社会通过教育权，工作权，健康权和退休权等一系列的特殊权力来保证的“生存权”（“人不但生来自由平等，而具有生存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由与平等之间不相矛盾，它们之间的对立恰恰既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是民粹主义及斯大林主义关于“社会权力”的基础。在现实危及的处理中，资本往往以个人主义的名义建议取消这些权利而保持形式

上的民主。因此我们应该提出一种进步主义的概念来详细的规范市场法则。

④“民族和文化多元”化带来的挑战：并不是要建立一个同一的集体或者所谓要绝对地执行权利（国家、民族或宗教集体），也不是要否认多元化在这些方面要求民主权利尊重特殊和不同的存在。在尽可能大的政治空间中认同的集体共存并相互联系是解放战略的目标。

我们可以看到，大众的力量能够而且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发动的自治的空间和在此框架中能够进行的激进改革的自由度都依靠一些具体的条件，如当地的（买办集团可能的孤立程度，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反动思想的传输），地区的（成功地重建反抗全球化的南方阵线），以及世界的（成功地孤立霸权国美国 and 它的主要盟国）。应该由人民战争来逐渐扩大这些空间。

实施政治行动战略要很严肃地对待在此提出地四个挑战，这将直接导致重新开始关于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争论。

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只承认巴黎公社的经验，所以他确实从中吸取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因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直线进化论观点，这样的资本主义至少由可能开发劳动力的条件一致，甚至为世界革命做准备。列宁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要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的理论遭到该理论的批评。历史条件的限制（俄国以外革命发展的滞后）逐渐形成这样一种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建设要在从资本主义链条中解放出来的国家中建设，在此框架中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了这一观点，并且通过革命要在资本主义周边进行的论断（革命分为不间断的阶段）以及对苏维埃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名正言顺和“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加强了。

通常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是从 20 世纪的历史

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理论主要基于以下两点。

①要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间的绝对反差，完全彻底地放弃认为新社会的因素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的想法。

②紧接着的观念，就是认为世界范围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要采取“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目前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的形式，尽管战争是在共处和和平竞争的范围内进行。

苏联的解体，中国放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取而代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所谓不可改变的特点的理论提出了置疑。

相对于这些被历史抛弃的理论，想提出四个补充的论断，由此关于世界范围内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争论能够从新开始。

(1) 资本主义不能够长期存在。它是在三个脆弱危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 劳动的桎梏，使潜在的对繁荣的民主和人道的向往成为泡影。

(3) 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带来的极端化，使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不能够享受少数人享有的高生活水平。

(4) 由于资本积累的要求，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不考虑生态环境和地球的持续发展。

资本的不断积累及随之而来的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只会把人类带向灭亡。因此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资本积累使人类革新的方式大大增加了（这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同时人类的心智、文化也大大地丰富了，这一切都使超越成为可能

资本主义使文明世界化了，尽管用的是一种不太公平，让人难以接受的方式。社会主义要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更高级的文明也必须世界化，同时还要纠正资本主义体制中不平等的

方面。因此应该把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建立看做一个长期的历史过渡。

社会主义推翻了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所以是一种真正的全新的文明，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技术、生产组织、生活观念上毫无二致，只是简单地把它们集中起来再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来消灭社会中的不平等。因此它的建设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像苏联和中国那样在短短的几年内便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中萌芽且经过长期的发展才破壳而出并最终取代了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否在某些方面也要走同样的道路呢？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这一取代只有经过各国社会内部反复的斗争才能实现了。斗争的一方会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力量，而另一方则是反资本主义的、反现行制度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心声，是它们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未来。

## 参考书目

本章的批评参考了以下作者的著作：

弗朗西斯·富库亚玛 (Francis Fukuyama), 《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 第 3~18 页,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Washington.

萨谬尔·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 《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sation ?),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Washington.

本文所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在以下的著作中有更加



详细的阐述：

关于文化与文化地带问题：《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e），第一章，Economica 出版社，1988 年。

关于民主与地区冲突：《混乱帝国》（L' empire du chaos）第四章（民主的挑战），第五章（地区冲突：加剧还是缓和？），L' Hamatan 出版社，1991 年。

关于民族与种族问题：《种族对国家的挑战》（Ethnie à l' assut des Nations），L' Hamatan 出版社，1994 年。

关于美国战略政策与前景：Samir Amin 等，《地中海地区的战略利益》（Les enjeux strtgiques en Méditerranée），第一部分：《地区地缘政治》第 11~112 页，L' Hamatan 出版社，1992 年。

关于环境的挑战：《经济学的考虑能解决环境问题吗？》（Can Environment be sujet to Economic calculation），世界发展报告第四期第二十卷第 523~530 页，华盛顿，1992 年。

关于战后第三世界的总结，各地区的状况，新全球化的特点和地区化的不同选择：S Amin，《非洲与第三世界发展的破灭》（La faillite du développement en Afrique et dans le Tiers - monde），L' Hamatan 出版社，1989 年。

S Amin 等，《全球化与资本积累》（Mondialisation et Accumulation）特别是第 17、38 至 42、345 至 353、355、357 至 365 页，L' Hamatan 出版社，1989 年。

## 结论 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回顾

首先我要肯定一个极为平凡而又显而易见的事实，来开始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讨论：下面将要阐述的关于这一转变的设想依赖于我们现有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对于资本主义以及它的对立面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面是由什么决定的，大家还远未达成一致意见；我们将通过下文理解这一点。在这里我当然只谈论历史上要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左派内部，甚至只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由此，很显然，关于超越资本主义的战略设想——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设想，布尔什维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设想，不管怎样曾经是、而且可能现在仍然是重要历史力量的第三世界人民反帝运动激进派的设想——互相之间差别极大。

除了这第一点，我还观察到另一个同样明显的事实：历史并没有证明这些关于转变的不同论断的有效性，反而对它们加以全盘否定。“福利国家”所受的侵蚀，苏维埃体系的崩溃，中国毛泽东主义的放弃，第三世界重新出现的买办都表明了这一点。另外，历史总是在前进，资本主义也在发展和变化。因此考虑到资本主义可能发生的显著的质的变化，比如新的“全球化”，我们不能先验地认为无需再重新审视关于资本主义的定义。

### 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实存在的世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三大基本矛盾

在今天看来，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由三大基本矛盾决定并显示其特征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只考虑超越它们。后面我们会看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历史潮流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里提出的观点，这将为理解、评价和讨论不同历史潮流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发展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做准备。

这三大基本矛盾可简洁地表述如下：

①一种主要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确定了劳动者异化的特殊地位和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的地位。

②史无前例的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③无力制止威胁人类未来的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经济学家的异化：

第一个基本特征不会让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感到拘束，不管他属于哪一流派，因为这一特征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尽管大家能在这一原则上达成一致，一到明确什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什么是价值和价值规律，什么是阶级冲突和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什么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之间的关系时，即使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更不用说所有的反资本主义左派了。

我将回顾一下在所讨论领域内据我看来完全正确的主要表述，做为例子来说明上面观察到的事实。

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工业革命”开始才得以完善，那时开创了雇佣劳动的所有制变成了自身也是劳动产物（工厂）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并和以前支配着自然生产资料（土地）的获取的所有制形式大大分离。处于这一生产力发展史上质的

飞跃之前的时期（大约在1800年左右）可以被事后看做是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时期（被称为重商主义阶段）。

②这一完善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价值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所必需的环境，社会似乎因此通过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市场组织起来。而这些市场又构成一个普遍而融合的三维市场（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

③这里描述的市场似乎是各自独立运行的。它们所产生的活力似乎也要遵循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像自然规律一样在社会中起作用。这些“经济规律”变成了一些客观力量。这一新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资本主义形式得到完善以后，才有了支配社会再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决定了适应当代世界的经济学家的异化（我将之与资本主义之前的朝贡性阶级社会的形而上学的异化作对比）。我提出这一特点，并认为价值规律不仅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再生产，同时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④劳动者的异化也存在于这一环境下，仿佛是调节着“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学家的异化所要求的表现。劳动力的出售者也必须在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客观规律中生活。

⑤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管理及做为各种社会力量表达方式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环境中存在。资本主义是一个将政治与经济分离的制度，后者以自动的方式独立运行。这一分离也是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以前的朝贡制度的特点是各权力机构的合并和经济屈从于政治。我曾提出这一变化，并说在朝贡模式中是“权力支配财富”，而相反在资本主义模式中是“财富支配权力”。经济学家的异化（及劳动的异化）对形而上学的异化的代替（观念的支配地位使权力得以再生）正与这一颠倒相适应。经济决策机构与政治决策机构的分离也是现代政治制度包括资产阶级民主形成的条件。

仅仅这一简短介绍便很容易显示出关于这一主要问题的分歧——什么是资本主义？我所提出的概念注重那一将资本主义与其以前的社会制度形成对比的质的决裂，而另外存在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它从对所有社会共有的决策机构的普遍定义出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国家，阶级及政治机构，关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从而用同一种方法分析所有社会中机构的衔接的运行（如经济基础以相同方式支配着整个历史，它总是由客观规律操纵，上层建筑总是反应经济基础再生产的要求等等）。这种观点也试图减轻我的介绍中经济学家的异化（及劳动的异化）的概念所占的重要性。

我不认为一个负责颁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证书的教廷有什么用处（相反，我从中看到了危险），所以我不会在马克思学的领域中讨论这些不同论断。因此我只观察到这一事实（后面我会试图解释）：和我的分成五点的简短介绍相当不同的一些观念曾经在、并且如今仍然在反资本主义左派中广泛地占着主要地位，这些左派不仅包括第三国际的主要马克思主义潮流（无疑有苏维埃潮流，但不包括毛泽东主义所体现的、或至少希望体现的苏维埃），更有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和外围国家反帝民众主义的激进派——也就是说“反资本主义”的另外两股主要力量，它们的一部分或者至少它们的目标是这样宣称的。

然而现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做为奋斗目标提出的高级无阶级社会可以成为或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定义。这些概念反过来对为实现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给奋斗目标所起的名字的话——而实施的转变策略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后面我们会看到我所称的将社会主义简化为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庸俗观念，正是我在此所批评的关于奋斗目标观点的表现。我们也会看到真正的历史中提出的所有转变策略（伯恩斯坦之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渐进主义”，社

会民主主义革命派及再晚一些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世界革命，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主义的分步不间断革命，主张工人自治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铁托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后毛泽东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世界不久以前提出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超越它们深层次的分歧，存在着一些如果不去探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概念的根源就无法发现的共同因素。

#### 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

如果现在谈及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我们将看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更明显的分歧。在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即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差距从未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巨大。如果说在1800年，对于大部分走出发展的初始阶段的社会来说，它们之间的人均物质生产比例很少超过1:2的话，这个比例今天可以达到1:50或更多。另外，在古代长期的主要趋势仍然是“追赶”（因此接近1000年时仍处于野蛮时期的欧洲在1000年到1500年之间赶上了亚洲），而现在这股趋势却正相反，自从资本主义以来一直面临着不断恶化。这是个很显然的矛盾，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言论强调现代化所奠定的世界化及全球化将给落后社会提供加速发展的可能。

面对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社会思想却仍然令人惊讶地缺乏说服力。在社会思想中有两股平行却又完全矛盾的主要论述，这似乎丝毫没有使其陷入尴尬。一方面它继续宣称资本主义全球化给全世界提供了发展机会（这就是传统经济论述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它必须解释一个奇怪的事实，即这些机会从未真正地得以利用（因为差距总是越来越大）。因此它求助于一个完全缺乏经济理论的说法，其论点主要是所谓的不同文化、宗教甚至种族（即“ethnies”；以前都用“races”这个词，后来大家知道由于滥用而将它抛弃了）固有的特殊性。

相反，反资本主义思潮本可以将这一伴随资本主义扩张而来的日益扩大的世界性两极分化变为自己的资本，从中获利。为做到这一点，他们本应该明确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两极分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并就这一关系提出一个理论。总的来说，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或者说他们以为自己这么做了，但其方式和论据有待商榷。

幸而社会思潮如科学一样总是不完善的；历史唯物主义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则。面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引起了一些不同论断，其中有些论断强调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普遍规律，相反另一些则强调要求采取不同路线的特殊性。使这些差异成为可能的原因是不同决策机构的衔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有待完善：我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个严密的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它在权力理论和文化理论领域却没有拿出同样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因此第一类人将机构的运作连接起来，使之产生一个普遍的历史（一般分成五个阶段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是它的一个讽刺性的表达方式），另一些人这样做则是为了解释落后、停滞和可能的绝境（如亚洲生产模式理论），但两者都一心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核心。我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将在三个阶段（集体阶段，朝贡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形成的演变理论化，来超越这两个欧洲中心学派之间的冲突。

因此，当讨论这个同样的问题——即一个引起机构衔接的问题时，不应为看到出现如此多的分歧而感到惊讶。这里，在我看来，至少可以说主要趋势总是低估了现象的重要性。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追溯一下启蒙时期的哲学思想、现代（资本主义）理性主义意识形态的构成、工人运动和社会

主义运动的构成、包括马克思主义。这段历史强烈地表现出肯定的乐观主义，它应该走向理性、进步和胜利，也就是落后者对它的追赶——即两极分化的反面。资本主义思想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就停滞在此。它的经济主张在“发展经济理论”中朴实地表达出来，这一理论假设如果在经济领域做出正确选择的话，其余，即政治和文化，将自然地与其保持一致（或能与其保持一致）。

但马克思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也同意这一乐观的看法。他不是肯定来自潘多拉魔盒的价值规律变成了打破过去形成的阻力的一股不可违背的力量吗？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甚至是宗教都无法抵制它同时产生的毁灭性效果（它取消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将所有的大众阶级简单地变成劳动力的出售者）和进步性效果（个人生产力的解放）。因此，发展的不平等、两极分化、日益扩大的差距只是暂时的意外；主要趋势早晚会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中成为必然，并在世界范围内创造出一个惟一融合的社会，这一社会建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这样惟一的社会矛盾之上。因此资本主义将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超越自己做准备。所以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历史将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决策机构屈从于它经济发展的单方面要求的历史。这不就是维护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者今天所持的言论吗？

如果说马克思的读者肯定会觉得这里所描绘的情形很可笑的话，至少在我看来这正是历史马克思主义、第二第三国际要让人接受的情形。考虑到顽固的事实——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人们对此作了一些修改，但并没有对基本理论提出质疑，这个基本理论认为资本积累规律应该以将其废除而告终。这些大的修改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由列宁提出的，他将帝国主义理论系统化，把两极分化归因于自1800年左右开始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发生的一些近期的变化。



对这一信条的质疑以及另一种相反的假设对它的替代（是否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而不是抵抗资本主义的产物？）完全是一个近期的现象。这一假设成为我五十年代以来所有研究的引线，它同时也是被称为拉美依附学派以及世界经济学派的研究的引线。我想各人的贡献、共同观点以及分歧都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关注，这里就不再重提。但对于我们讨论的主题，重要的是认识到此处只涉及知识分子的理论立场，这些知识分子在提供意识形态的骨架时并没有能控制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尽管片言只语在苏维埃左派批判的政治言论中或激进的民族解放言论中偶尔得以运用。这一关系涉及超出我们此处范围的主题。

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对两极分化问题暗含的回答对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要用一个不同以往的全新的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来代替这些过时的（或失败的）设想，我认为必须明确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理论的核心。下面我只谈谈自己在这些领域所得出的一些想法，而不再回顾它们的历史和它们与上面提及的派别所持理论的关系史。

因此我认为两极分化甚至可以说是由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价值规律的运行产生的。这一肯定含有对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与资本主义之前的制度对立的经济学的统治地位的承认。这就是我前面在分辨定义资本主义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时所表述的统治地位。历史马克思主义也承认了这一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它至少从中得出一个与历史不符的结论（一致的趋势应战胜两极分化的趋势）或者，当它接受这一事实时，又用一个同经济学的统治地位相反的假设——用政治或文化的胜利抵抗去解释它。因此历史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在哪里呢？

我曾用历史马克思主义对价值规律的普遍抽象形式与其全球化的具体形式的混淆来解释这一错误。前者将资本主义定义

为一种生产方式，后者则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相联系的具体形式（我所称的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前者引起市场各方面的融合，后者则导致驱逐劳动力的世界市场的不完整性。由此历史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扩张等同起来，而我所提出的概念却能很好地将两者区分。我们很容易地证明只有世界化的价值规律的运行才产生两极分化，即考虑这一事实：两极分化是自从资本主义形式得到完善后其内在的特征（而不是其最新阶段——帝国主义变化的产物），两极分化可以由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而不是对资本主义政治或文化方面的抵抗来解释。世界化的价值规律甚至可以在解释事实方面走得更远，因为它非常完整地阐述了外围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性：无法融入生产体系（与其向中心国家自动集中的特征相反）、依赖性、陈旧的生产形式的再生、对资本积累思想的变形与屈从（与中心国家中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的破坏相反）、外围国家现代政治制度的“不适应”（法制国家制度，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因此它阐述了一些政治文化方面的抵抗力量，这些力量决非过去的残余，而相反是面对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挑战做出的反应。

可是，正如我所说的，这里所阐述的想法只是想法，现实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无视于这些观点。因此，在“转变”过程中，错误的理论和实践的调整并没有终止。理论提出，资本主义通过自身的扩张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条件做准备。或至少，如果革命的号角吹响时，并不是所有民族都发展到与最发达地区同样的水平，革命将首先在发达的中心国家展开，并带动外围国家。另外，革命也使这些国家以比在资本主义时期更快的节奏赶上别国。也就是说，中心革命是次优情况，最优情况是世界革命。列宁不是在革命于最薄弱环节（俄国）爆发后等待着一场欧洲革命的到来并希望从中获得援助吗？同样，很显然

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观点对革命运动的主要看法并没有不同，它认为中心国家的资本积累应最终引起社会主义，并带动外围国家。可是在现实中，对资本主义秩序的质疑并不是根据理论方案进行的：革命从外围国家开始，并只限于外围国家。于是有人顺应事实作了调整，并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将这一修改合理化。这一理论从列宁主义开始，通过毛泽东的分步不间断革命理论的形成得以发展（这一理论很明显来源于托洛茨基的继续革命理论，甚至一部分来自于列宁）。我们甚至曾相信能够通过融合起源于民族解放革命、采用非资本主义道路或其他形式的国家来扩大这一社会转变形式的有效范围。

#### **对自然资源的破坏：**

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对社会生产的自然基础的破坏，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征的经济衡量正是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谈到这一点，我极想引用马克思的话（《资本论》卷1第十五章第十节的最后一句，第182页。为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约瑟夫·罗伊译，经马克思审阅）：“资本主义生产只有通过同时耗尽财富产生的两大源泉——土地和劳动者，才能获得技术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

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写于1863年！——它会使现代的环境主义者认为自己只是重新发现了从未读过的马克思的成果。本应很明显的事实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被重新发现，我当然为此感到庆幸。

因此马克思已经发现了资本主义前从未有过的物质生产的不可思议的增长，而增长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对自然财富破坏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其实是以社会的未来为代价。考虑到这一消极因素，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二十年前就提出修改PIB及其增长的计算方式。很显然他的意见没有引起重视。我也两次讨论过这一问题，并对经济的衡量方式提出了根本的

批评，这一计量以一个极短的时间概念为基础，缺乏合理性。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即所说的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从人类长期利益、人类社会内涵以及劳动剥削和驱逐参与社会生产的边缘阶层引起的社会效果来看是不合理的。

但此处的这些想法也从未被系统的社会意识所接纳。因为确实西方的工人运动、东方的“苏维埃政权”、南半球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信仰无限的“生产力发展”。今天，促使大家去估量“经济增长”造成的巨大破坏的绿色运动仍然否认这一因果关系，可能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市场合理性概念的质疑引起了它的恐惧。

重新提出对地球自然资源的重视迫使我们去构造另一套经济计量体系，而不再是以短期为基础的资本利润率的计算方式，新的计量体系将引起另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和文化文明。我们必须知道从长期利益出发来衡量经济，就像农民为了后代的利益努力维持甚至改进他们的土地资本。很显然如果一开始世界银行的专家就做出这一决定，人类就不会现在还未走出这一困境。土地的改善、横穿大陆的铁路建设、任何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新想法都不会在“现金流量”这一词汇中找到合理的解释，这个用语在哈佛如社会科学的最后一声尖叫一般被大张旗鼓地传授着。可是，很显然，人类的行动从来只限于自己的科学知识范围内。因此我们无法断言主动的选择从保护环境和未来发展的自然条件来看一直是有效的。远非如此。另外，资本主义将这一个新的制度性的要素——短期计量放在首位，这正是我们所讨论的自然条件的破坏的有效保证。

#### 其他一些矛盾……

现代社会当然不只是由这里所述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的，在我看来，它们只是不同于以前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引发的主要新特点。但是现代社会也继承了一些以往社会的特征。其中有些对于理解、批判和超越我们的时代也是同样重要的，这

里我尤其想到了家长制。实际上在我看来，很显然，在我们的时代，不可能再不考虑家长制的影响而对比如说权力问题做任何严肃的思考。

后面我们将看到，如果社会运动仍然被禁锢在狭小的范围内，不能对我们社会的主要特征做根本批判的话，它不可能设想出被称为社会主义或其他名字的“创造性的乌托邦”。我将论述由于反制度——即反资本主义力量（这些力量实际上至今仍在历史舞台上占主导地位，并将一些重大变化强加于世界及资本主义本身）仍被束缚，它们一直只是将社会主义设想成一种“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相似物。

## 2. 历史没有尽头；资本主义应该被超越，如果缺乏……

因此资本主义扩张不确定的继续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体现该运动的残酷无情的指数性经济增长如癌症一般，最终必然走向死亡。

在此期间，这一扩张的继续必定使人类变得日益野蛮，因为它一方面以经济学家的异化为基础，另一方面又以两极分化为基础。

其中第一个特征剥夺了社会对自己未来的最小程度的控制，因为一切决定都由“市场的规律性”做出。这必定破坏社会生活的意义。很自然地，民主政治将完全失去效率，它的危机会减弱自身得以发挥和丰富的可能性，并且人们将重新迷信宗教基础理论、邪教及各种“集体的”——即“本能的”形式所宣扬的神秘不可知论，以此来回应这一对决定权的放弃。第二个特征在建设一个越来越类似于普遍的种族隔离的世界中得以体现。

因此，如罗萨·卢森堡所说的，抉择就在于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社会”。如果资本主义没有被超越，因而成为历史的最后

一页，那么人类历史将以一种集体自杀或不自觉的自我毁灭而结束。

资本主义还未处于倒退时期，如果乐观地假设人类理性将制止它自我毁灭的进程，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将只是一段插曲，“资本积累”时期是一种双重积累：它是物质手段（科学知识，有效技术，生产资料和行动工具）的积累，这些物质手段使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保障着一个能令人接受的“生活水平”；同时又是超越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智力和精神手段（知识和通讯工具，个人自由，民主）的积累。当然这里讨论的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仍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可以超越我们所说的贫困和疾病等，但仍然是有限的。它并没有消除死亡、烦恼、决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人类一直有着多面性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社会动物、个体生命，但同时又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当然这些与物质进步紧密相连、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物质进步的智力与精神手段一直是矛盾的。知识永远既可以用来行善又可以作恶，个人和社会行使的自由既是权利又是义务。

但是让我们保持乐观，相信理性会取得胜利。于是关于这一抉择（社会主义）的政治的、具体的定义问题，以及为达到目的所需的有效战略问题便摆在了面前。

### 3. 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世界革命，解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待重新讨论的社会主义及其转变的三种设想

马克思并没有积极地定义无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的特征。他的分析是为了揭露隐蔽在直接的表象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反向推出共产主义的特征，但仅此而已。他同样也没有提出转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策略。其实原则上说，他思想中的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产物，

而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外部导致的形式。所以惟一要关注的只是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策略。

至少历史很快就借巴黎公社真实而具体的经验对社会主义问题首次做出了回答。马克思不可能忽略这一历史插曲。完全相反，他立刻就对此作了思考，从中得出几个引人注目的结论。其中涉及无产阶级国家的概念，它的民主专政以及它的衰退。俄国革命前夕，列宁在最终明白不可能将他们的结论付诸实践之前，于《国家与革命》中也吸取了这些教训。事实——残酷的现实将迫使他朝相反方向发展。

不管怎样巴黎公社的失败毕竟将第二国际中形成的欧洲工人运动引上了另一条道路。在第二国际中存在着两条对立的阵线：一方面以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而闻名，在社会民主主义中获得胜利；另一方面即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将在第二国际中壮大，并在第三国际中重生，但其历史条件已与1914年以前的革命者所想象的完全不同。

大家都了解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这里就不再重复。今天我觉得观察这一观点的重要之处在于，演变目标——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以前实际上是“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设想。此外，这一表述方式也曾第一次被恩格斯用来形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总体计划。与想像力丰富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正好相反，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想象出任何新事物。前者却对我们时代的文明中的一切提出质疑：工作、家庭、两性关系、权力；后者几乎保存了资本主义的一切，从它对生产力的膜拜到为了满足无限的胃口而采取的手段：组织与纪律、等级、社会分工。他们甚至沿着这同一方向做得更好，减少了私有制所导致的浪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几乎只满足于以国家所有代替资本家所有。另外关于垄断呢？只要将其国有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飞跃。这就是被形容为“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观点的大

致内容。

但是这一模式将不仅仅获得温和渐进派的支持，它也支配着革命主义者的观点。列宁不也喜欢垄断所实行的（如德国的邮电业）集权（官僚主义）管理吗？因此这一模式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市场的社会主义”，这种形式下企业属于国家、集体或合作社，或多或少地自由买卖生产要素（包括劳动）以及他们的产品；另一种是“国家社会主义”，这种形式下同样属于国家或合作社所有的企业遵循极端集中的计划指令。两者存在着现实的差别，但这一差别并不能抹去它们的共同之处。

重新回到发展观点上，我无心诋毁社会民主主义无论从各民众阶层的当前利益，还是从超越资本主义的长远目标来说已实现的重大成就。二战以后在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确立并切实地得到普及的“福利国家”，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历史性妥协——在上述国家所面临的条件和经济形势下，这一妥协使人们获得了那时的资本主义实践中仍未知的社会权利；它同时也开始承认资本主义严谨的赢利性之外的其他社会思想的合理性。

无论如何，社会民主主义取得的突出进步既不是它自身组织力量发展的惟一产物（如它的政治机构所宣称的），也不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和客观需要的惟一产物（如一些经济性读物有时所说的），而至少一部分是社会力量均衡的产物，这一均衡倾向于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得益于法西斯主义的失败和苏联的胜利，即得益于转变的另一个观点——革命道路观点在二战后树立的威望。

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引导着去考虑革命道路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另一侧面，以及为达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策略。这一观点在第二国际时就存在于被容忍的少数派中，但一直力量薄弱。既然他们的观点与别人的“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又怎么会强大呢？当一切都显示出我们能温和渐进地



达到同一目的时，为什么还要特意走暴力的道路呢？回顾一下前面所说的，我还认为讨论中的世界革命实际上成了中心国家——“文明化”了的欧洲（德，法，英，奥匈，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带动落后的外围国家（及殖民地）的革命。

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处于少数派的通过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将在欧洲大陆的边缘俄国得到肯定。但是这里，自从1905年以来，出现了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模糊性和多元化：争取资本主义民主的革命、起义农民领导的要求根本的土地改革的革命、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这一多元化丝毫没有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反而加强了它的力量。甚至即使这里的社会主义观点受半知识分子半工人的少数派的限制，也超越了平庸而又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所有制改进之后的资本主义秩序。一些美妙的旧乌托邦色彩在此融入了受欧洲工人传统（近期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启发的正统著作中。所以起初社会主义设想并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式。在1917年12月，这一设想突然成为历史的可能。但它成为现实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既不是“可以燎原之火”，也不是很快让发达国家跟上的“链条上最薄弱环节”的第一次爆发。它不知道当时自己表现着另一种反资本主义力量，即资本主义制度外围国家的人民拒绝屈从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力量。

于是我们从世界革命走向单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实面前只能如此。要指责斯大林的当然不是他做了这一选择。当时不存在别的选择。理论告诉我们：要么世界革命，要么什么都没有。如果俄国人相信了时机还未成熟的世界革命，那么他们所能做的只有自杀了。所以他应受到的指责完全在别的方面。首先是滞留或又回到社会民主的现实主义所局限的框架内，而不是去思索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以外的道路。因此1917年乌托邦主义者受到第二国际本应在别的情况下承认的现实主义者的

排斥。这一变化支配了所有其他变化：主要任务变成了“追赶”，也就是加快积累的节奏。社会主义的总体计划被提交上来，哪怕它因此而失去了主要意义。国家控制之下被组成合作社的农民的开垦也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积累”提供资金。这一曾为革命胜利做出贡献的工农联盟的决裂开始了以无产阶级为名义的独裁，解放了管制之下的官僚主义，这样将有利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选择（“专制的”计划）。

因此讨论应该针对这些选择的本质及其理由。我们能有别的做法吗？“更快地”走向民主的共产主义，甚至是国家的消亡等？还是“更慢地”前进，并像新经济政策时那样延长与资本主义的妥协？甚至是走“不同的”路，即在某些方面加快步子，而另一些方面则慢一点。

一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选择从未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造成问题。一开始它就组织起来在中国进行革命；它并不等待日本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帮助它获得胜利，摆脱落后。因而它没有经历初期伴随着俄国革命的踌躇时期。相反，毛泽东主义一上来就宣传在一个落后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通过“分步不间断革命”的方式，引导根本的资本主义改革（如土地改革），但在无产阶级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与俄国革命一样，成为财产国家化和农村合作组织的同义词。即使这些转变在中国做得更好——或者说没有苏联那么差（这是我的观点），它们与“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方案下的转变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所以是毛泽东主义提出了走与苏联不同的道路是否必要和可能的问题，他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是在“建设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毛泽东主义希望“走另一条道路”，在一些方面放慢步伐，另一些方面则加快速度。在积累的速度上放慢，以便不打破工农联盟。别的方面加快是因为这一要求开辟了对

“技术中性”信条的批判道路，这一信条对“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胜利至关重要。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是选择“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上以及政治权力的组织（毛泽东许诺了却未做到的）上则走得更快。

然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以及试图开创另一条道路的毛泽东主义的尝试最终都失败了。此处我不再回顾社会主义腐蚀过程的原因和阶段，苏联模式的崩溃以及1980年毛泽东计划放弃的原因。

今天重要的是从中得出主要教训：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不可逆转的，国家干预——曾被我称作苏联生产模式——或者说“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并不是“稳定”的模式，而是毫无秩序充满冲突的过渡，它要么渐进缓慢地向社会主义演变（后面我们将重新审视这一有利演变进行的必要条件），要么到达纯粹而简单的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前苏联和东欧的情况）。

这些失败并不是惟一的，社会主义的其他设想也没有得到历史更好的对待。对苏联模式忠实程度不一的模仿（如越南和古巴）或远近不同的模仿（如非洲与亚洲的社会主义），甚至在莫斯科的秩序被颠覆以前就被消灭了（除了上面提到的前两个国家的一部分）。但似乎永远地扎根于社会意识与现实中的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相反受到苏联模式崩溃的冲击。这正是迄今为止不无成功的新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将西方的时钟拨慢的时机。一些同样严重和普遍的失败无疑对社会主义思想也提出了质疑，这是如乌托邦词义本身一样，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吗？人类注定要在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的尽头”走向自我毁灭？后面我们将讨论这一重要问题。

但同时，苏联的崩溃和毛泽东主义的放弃给社会主义转变设想的另一面划上了决定性的句号。转变曾经意味着体现于两大国家集团的两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竞争——充满冲突

的或通过“和平共处”得以调解的竞争，这两大集团 1948 年以后被捷达诺夫称为两大阵营。这一页过去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今天的世界上，什么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 4. 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问题

社会主义只有在提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文明，也就是说在消除前面提到的现代社会的根本矛盾时，才有其自身的意义。极其精练地说，社会主义应以这样一种文明为基础：（1）摆脱经济学家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2）摆脱家长制；（3）控制与自然的关系；（4）发展民主，超越政治管理与经济管理的分离而强加的限制；（5）在不再产生两极分化，而相反将其结束的基础和范围内实现全球化。

如果这就是目标的话，我立刻就能从中得出关于目前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的决定性结论。这些策略应该能迎接各民族所面对的主要挑战中的四个挑战。我在本书的第十一章中提到了这些主要挑战。

那些认真对待上述必须迎接的挑战的策略行动，我们认为它们属于超越资本主义界限的一种代表着质的领先的文明。

我不再重复社会主义设想的基本意识形态问题，因为我想这在前面已阐述得很多了，它提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我想是马克思主义）以及一些历史性尝试努力去超越资本主义。我只强调必要的整体分析。这能将民主、政治经济分离的消除、对经长期深思熟虑所作决定的把握以及全球化的要求融为统一的整体。

这涉及到具有普遍使命的一种意识形态和文化。读者可能在这里又发现了他已经了解的我对“文化主义”的敌视，这一“文化主义”的含义正是强烈的多样性使得各国必须走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抛弃共同的发展前景。我否决所有这些以当今流

行的种族主义和宗教多样性为基础的号召，在我看来它们完全是反动的。因为它们相对于资本主义朝着共同方向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倒退。此外，它所强加的全球化也不只是技术、贸易、地球各国军事上的相互依赖的全球化。它也是文化的全球化。这就是我将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定位为资本主义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历史地说是欧洲的，天主教的文化）的原因。

如果说这一资本主义全球化无疑代表着通过两极分化表现出来的一些很强的消极因素，那么它也代表了一些已经存在的积极因素（个人与社会的解放），尽管这些方面仍只是雏形，尚未得到完善，或被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逻辑体系的要求所扭曲了。两极分化的消极影响不只是涉及经济方面（富人与穷人的强烈反差），同样也存在于政治民主与不可能的民主化之间的反差，以及西方的傲慢和资本主义文化与其明显表现（欧洲的，基督教的）之间的混淆这两者的反差。

这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消极方面不可能通过重新回到古代和回到，用我的话来说，朝贡性社会的不同意识形态中来消灭。而只能通过在建设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文化中迅速前进来达到目标。

我想，并没有必要明确这一点：社会主义设想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去异求同。这一趋势是资本主义普遍主义的趋势——所有人的可口可乐，同时伴随着种族和宗教的仇恨。而不是由所有民族的贡献形成、并以此为基础的普遍的社会主义，这些民族的自身特点将成为社会主义共同设想的一份财富。

从他们普遍文化的观点出发，再重新看看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尝试，我不认为它们的贡献是无足轻重或滑稽可笑的。远非如此。西方社会主义民主所建设的社会可不是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中最可憎的一个。相反，它是其中最先进的，最给人好感的，最有人性的，尽管这只是从其内部看得出的判断，而忽

视了在外部——外围国家看来，它经常与纯粹而简单的帝国主义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表现出一些可憎的特征的话，从外部看，它们也曾是反法西斯斗争及外围国家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最慷慨的支持者。他们的军队所作的贡献也是不可忽略的，而不只局限于物质经济的发展。铁托主义的南斯拉夫改变了它各组成民族的敌对态度，中国人远比印度人生活得更好，俄罗斯的原始资本主义不仅在给广大人民提供的物质条件方面更严酷，而且也缺乏民主保障，第三世界新买办制度在好多方面比它们以前的民众主义制度更糟糕。这些例子举不胜举。

这些事实表明无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设想——市场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形式或国家干预形式——不是一个微不足道而荒唐的产物。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更进步产物的终结者。我们的时代总的来说，不大喜欢法国大革命，更不喜欢其高潮雅各宾主义。今天的反动时尚是对集体特征性的膜拜和对普遍主义的仇恨。可是雅各宾主义代表着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权力而建立的简单要求的前哨。它是当时人民的愿望（尽管是乌托邦式的）和启蒙运动时期前卫的思维的混合表现，它创造出一个公民共和国的想法（而不是如未来的历史在19世纪的法国以及整个欧洲所出现的纳税人投票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或根本没有投票的波拿巴或君主所实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发现自由经济（今天流行的“市场经济”）是民主的敌人。无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是这一不完善而脆弱的超越资本主义思想的迟到表述。一种可以认为已经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批判所超越的表述。它通过现实的力量引入做为合理性的整体组织者的国家的有力干预。这一干预在我们这样一个来自四面八方的反政府的反对派进攻的时代并不流行。我们马上将之与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在法国从未被遗忘的科尔贝尔；采用黑格尔学说

的普鲁士政府的俾斯麦；沙皇君主专制的继承者苏联；中国皇帝的继承者毛泽东等——归为一类。但是我们能提出以什么代替公民政府呢？以民族，宗教集体与无政府市场经济的混合物，也就是说以讨论中的各团体相互仇恨形成的纯粹而简单的弱肉强食。需要提醒一下，这一提议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是反动的乌托邦，因为它反对普遍主义，而它所接受并提倡的资本主义却要求确立全球化。

所以，如果相对于资本主义野蛮的全球化，另一选择是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主义全球化，那么达到目标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因为这涉及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对这里所分析和批判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设想，所能指责的就是它将任务简单地降低为几个改革——尽管这些改革很重要，主要是私有制的废除。俄国革命在 20 年代寻求自己的道路后，以结束新经济政策，1930 年决定进行集体化，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而告终。6 年以后，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设完成。1949 年人民军队进入北京，1952 年土地改革开始，随后立即是集体化，1957 年中国也宣布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今天我要说的是，一种新的文明不可能在 5 年或 10 年内完成，这一点本应该很明显。

在我们要谈的长期转变中，必须确立必要的战略阶段。在此，又会发现过去的一些经验在新的前景的照耀下又会有了用武之地。持续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的一些提议可以构成这些战略阶段的组成部分。在什么条件之下呢？我们来讨论一下。

### 5. 对于一个新的转变设想的初步提议

由前面的研究，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直接表述如下：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如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得到发展那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理论，在我们看清其实质和抛弃它之前，应

将其相对化。

由于重商主义的三个世纪（1500～1800年）代表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漫长阶段，并且两种制度在其间充满冲突地共存着，我们也将经历一个漫长的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两种制度——支配资本积累的制度和起源于与之不相容的社会需求的制度——将在冲突中共存。

我承认，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首先将在短时间内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以一个相对同质的经济制度为基础，将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融入一个社会制度，逐渐将所有矛盾减少为他们中惟一的主要矛盾，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此外，这也是为在相对短的历史时期内人类共同向无阶级的新社会过渡作准备。也就是说马克思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成被一道中国长城——即我们所称的社会主义革命，隔开的两大制度；二者互不相容，不可能共存于同一社会，哪怕是在冲突中共存。当然这一观点并不排斥在一定时期内两大社会集团在冲突中共存，一方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则已是社会主义社会。条件是这一时期很短，因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世界性的社会主义。

我所作的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分析推倒了这道中国长城。相反，它着重于两大制度——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在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中有效地发挥着作用，这里的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义词。更不是区别抽象与具体、现实制度与理想模式的普通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义词，前者总是比后者更复杂。两者含义的不同应更深地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这是由于“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真正存在而导致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只有在反资本主义力量使它能克服其内在矛盾的情况下才会运行。第二，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不断产



生反对两极分化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而造成的，因为其自身扩张的结果产生了两极分化。

关于资本主义与反资本主义之间冲突的第一个方面，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活力，我很早以前就得出结论，认为扩大再生产只有在真实工资与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而推崇资本的至高无上的资本主义法则却不希望如此。因此资本主义面临陷入经常性停滞的威胁，这一威胁将把资本主义变成不可能存在的制度。要想解决这一荒唐的矛盾，要么通过经济逻辑体系之外的事件（关于这一点，我列举了伴随着每一个资本主义的巨大飞跃阶段的事件：革命战争与帝国战争，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统一，殖民，连续的科技革命等），要么通过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也包括其他生产者，如农民）利用这一武器强制要求提高工资。这在垄断和自我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伴着福利政府的历史性妥协达到顶峰，今天，这一联系积累法则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法则的辩证法却陷入了危机，其原因在于侵蚀国家资本主义自我集中特征的全球化和劳动阶层在普遍的政治平衡中地位的减弱。因此资本积累自身也陷入了危机。

两大体系的冲突的第二个方面是第一个基本矛盾的必然产物。在它与被剥削阶级进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受到威胁的国家资本主义将外部扩张做为摆脱手段，因此产生了引起两极分化的全球化。在这一扩张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将仍处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制度中的国家引上自己的道路，并由此将这些落后地区外围化，从而弥补它在更发达的中心国家遭受的损失。因而这一扩张创造了一个不同质的世界。这种性质混杂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继承的，而是它创造的，或者说为服务于自身利益而不断重新创造的。马克思在贫困化方面提出的积累规律在发达的中心国家已经减弱甚至消灭，而现在又在世界制度中

重新出现。但从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而言，积累规律不再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起作用，而是影响着所有中心和外围国家。很显然，这一两极分化——贫困化，既是无法接受的，也未被其受害者接受。正如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斗争表现它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外围国家的人民也通过斗争（民族解放或社会主义革命）表现着他们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关于这一理论观点，我建议重新读一下资本主义历史，如在某些连续的阶段中，时而资本主义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世界化的大发展，时而周边国家反资本主义的抗争迫使资本主义倒退。我曾提出，做为第一种情况的典型，可以读一下十九世纪的历史，做为第二种情况的典型，可以读一下二十世纪——1917至1990年的历史。

在现在的发展阶段所能提出的问题是：既然资本主义有这种根据自身发展所产生的力量的要求进行自我调整的非凡能力，为什么它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呢？一开始，在中心国家，工人工资获得了与生产率增长同步的连续增长，然后这一增长停止了，继之而来的是将外围国家引入世界资本主义扩张的阶段，之后是对工资增长的完全抛弃，倒退至两极分化。如果尽量延长这一系列阶段的活力，可能世界最终将在发展水平逐渐统一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趋向同质。

对于这个问题，我之所以认为资本主义不能用这种方式回应挑战，是因为直到现在它还没有这样做。实际上，两极分化并没有在拒绝两极分化的反资本主义力量的作用下逐渐减缓，而相反迅速发展。现代社会的“劳动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换种说法，资本主义只有在它的三个主要基本矛盾逐渐减轻时，才有可能继续发展——暂且不说从它的第三个矛盾（对自然资源的破坏）看是否有这种可能性。然而这三个基本矛盾都在不断恶化。因此资本主义注定将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和一触即发。

无法忍受和一触即发并不意味着它将被根本的答案——会做为一种自然力量得以确立的社会主义——所超越。所以在此我将重述自己 20 年前所提出的关于历史上各种制度超越的活力问题。我曾就这一主题写过：革命抑或衰落？从革命中我领会到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它不排斥根本的进化形式），在这一进程中，关于转变目标的一个清晰的意识通过引导斗争反对旧事物的社会力量表现出来。比如，从欧洲的旧制度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转变。相反，由于缺乏决定有关新社会的设想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志的干预，转变只是在迷雾中摸索着前进，这往往引起我所称的衰落，比如原始社会向欧洲封建社会过渡，后者是在衰落的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开辟道路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资本主义的超越将通过提出另一个社会设想（社会主义）的清晰的行动手段来实现，还是无数各不相同、各有特点的局部斗争的偶然结果？这些斗争不一定必然是互补性的，而相反往往是充满冲突的。原则上说，衰退的道路从来没有被排除。可是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考虑到现代制度的巨大破坏力量——与过去所经历的破坏是无法相比的，这一道路很可能以自我毁灭，即我所称的集体自杀而告终。

因此，惟有像格拉姆斯所要求的那样，保持意志上的乐观。这意味着奋起斗争，为那些不满和拒绝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让人无法忍受后果的社会运动，提供清晰的意识和适当的策略。我不敢在此狂妄地提出这一“行动计划”（当然是世界性的），我只是满足于提出一些关于这一主题的初步思考，来抛砖引玉。

我们所穿越的普遍混乱时期不会长久。如管理超市一样的对世界性的社会的管理设想的荒唐性在于：在最短时间内，这一设想已经产生了最大程度的灾难，并将各个国家关入让人无

法忍受的停滞与倒退的死胡同。新自由主义者狂妄自大的言论受到沉重打击。在东方一些国家，那些前共产党由选民投票重新掌权；在法国，1995年12月民众的强烈抗议宣告着全欧洲观点的一个可能的大转变，这是西方第一次敢于立场鲜明地抛弃所有新自由主义言论的根本理论的行为；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巴西，墨西哥，韩国，菲律宾，南非），一些反资本主义的人民和民主运动已开始占上风，甚至可能已蓬勃发展。但同时，民众运动的各个方面都不断受到幻想性的和犯罪性的回应行为的威胁。新保守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顽固坚持、种族主义狂热的失控、做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退却的沙文主义、宗教基本理论主义者的偏离，这些对现存权力的不合理性的回应也是今天的事实。我们正走向左右派之间暴力的对峙。新左派会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许多国家取得胜利，但条件是它必须凝聚在适当的策略周围，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上保持最大的透明度。后面我将研究一下不同形势下这一凝聚实现的条件。

对于普遍的外围国家，几年前我就提出了一个“阶段”的概念，我将之称为“人民民主国家联盟”阶段。这里我不再重复这一概念的细节，而只是回顾一下其中四大基本特征。首先是反买办的社会经济政策的重新确定，这些政策从他们的目标与世界资本主义扩张中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之间的冲突来说是民族性的。第二是社会力量性质的统一，这些社会力量在这些政策的实施上有着共同利益，同时又有着使它们对立的利益冲突（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是民主组织建设，它能够解决这些人民内部冲突并引导大家共同反对内外主要敌人。第四是通过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斗争加强内部阵线，这将可能强制全球体系自我调整来适应这些要求（即这一体系所作行为的反面，该体系只是根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要求作单方面的调整）。

我认为已经不只是存在向这一方面发展的雏形，它们已经

超越了精神讨论而成为物质力量。巴西的工党、墨西哥 PRI 的反对党——民主反对党和新萨帕塔主义运动、韩国菲律宾及其他地方的群众行动民主力量、南非的 ANC - PC - COSATU 阵营（尽管政府依附于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和该国民主党所宣扬的自由主义观点），已经创造了一个团结一致的左派运动取得了一席之地之势。

我也曾提出在这一意图支配下去分析中国新政策的前景。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后毛泽东主义“民族和人民”的选择的积极特征（三大“积极特征”：对外关系的控制，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加强地区间互补），但同时也关注它的弱点（第四个很大的消极特征：民主观念的缺乏，对第三国际的党国观念的持续继承）。这些矛盾导致不同的发展可能，或许会在将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追赶”目标中，加强计划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或许对手（日美联盟）的战略取得胜利，使中国解体；或许社会主义成功地和被正式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确立。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一形式是不确定的（对我此处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设想来说），它仍是“漫长的转变”中的一个积极的战略性阶段。

中心国家的形势表现出一些很明显的特征，并且这些特征在欧洲、北美和日本各不相同。

其中一个较大的特征很可能是左派政党的衰退（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和社会运动新形式迅猛发展（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有团体运动——种族的或其他的，及宗教的复兴）的共同产物。其中一些运动最终凝聚成议会中的政党，如欧洲一些国家的绿党。但我并不就此认为它们在角逐中代表着新的力量（前面我就指出过绿党的腼腆性，它拒绝从根本上指责资本主义。其他运动也可能支持右派的进攻。但有些运动——首先是女权运动——有着无可争议的长足发展，

因为它们都原则上将矛头指向社会中最反动的特征之一。一些有材料依据的辩论将有利观点与“运动”作对比，将有关运动与更具政治性更有包容性的组织形式作对比。我们也重新提到1968年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代表着一个转折点（我认为很有理由），它赋予反对劳动异化的斗争一个更深的层次，以后这一斗争一直具有这一特点。

我认为这里所讨论的观点主要是为了了解西方公民社会中代表左派的所有力量——政党、工会、运动——是否能产生一个决定恰当的战略阶段所必不可少的新的团体计划。对于欧洲来说，其轴心是由欧洲计划构成的，围绕这一轴心，所需的积极意义上的演变或者成功或者失败。欧洲的左派大部分将仍受右派的“欧洲共同市场”观点的禁锢，还是能产生一个融合渐进的社会政治政策？形势显然与美国不同，在美国通过共和党 and 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对立而确立的两极政治似乎还没有开始走下坡路。它也与日本不同，日本事实上很保守的一党政治似乎还未开创任何别种选择的道路，尽管它受着一些衰退迹象的影响。

任何情况下，即使在这里所提出的新左派凝聚起来这样一个最有利的假设下，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它们所能成功地促进的行动只是强迫资本主义做一些调整，当然这些调整也改变着资本主义，但仍保持了它的本质——因此，这些行动不可能推翻其日益严重的矛盾的发展——或只是推翻其趋势。从这一点，可以说资本主义制度开始朝着社会主义方向摇摆，一个质的决裂将在向社会主义的漫长转变中产生。

## 主题精品图书推荐

### 全球社会学（全球化译丛）

[英] 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 著

大 32 开 定价：38.00 元

2001 年 9 月出版

ISBN 7-80149-562-4/D

罗宾·科恩 保罗·肯尼迪 英国人，是社会学的资深教授，曾经任教于非洲，加拿大，加勒比地区，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和成人教育学院。他们曾经在许多国家进行讲学和基础研究，并且无论他们在哪里从事社会研究，都有一个强烈的使社会学成为对大学生变得有趣和可以理解的学科的责任感。罗宾·科恩是 Warwick 大学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研究中心的社会学教授和高级研究人员，保罗·肯尼迪博士是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社会学的高级讲师。

本书以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手段，从社会学的发展和全球社会学的渊源谈起，以“现代性”为逻辑起点，以全球化及其在世界社会的演进为主线，通过对全球社会中的职业界、民族国家、跨国公司、人口迁移、消费文化、媒体与传播、城市生活、社会运动等现象的全景考察，为我们勾勒出了当代全球社会的总体图式和景象。同时，他们还就全球社会中的不平等、不平衡发展、全球控制的失误、性别的挑战、绿色运动、共同体与归属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为我们全面、正确地认识全球社会的性质及特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读者对象：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大中专学生，对全球化问题感兴趣的  
研究人员，以及广大普通读者

### 全球化道德重建（全球化译丛）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 著  
大 32 开 定价：19.80 元  
2001 年 2 月出版  
ISBN 7-80149-428-8 / D

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联邦德国前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西方著名政治家。

本书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带来的影响，指出了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和转变思想文化观念的必要性和途径。本书的特点在于作者从政治家的角度出发第一次在全球化背景下把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其观点比一般理论著作明了、深刻。本书出版后受到西方媒体与读者的关注，相信本书内容对中国读者也会有很大的启发。

读者对象：经济界人士、党政干部、经济类师生

###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全球化译丛）

[英] 戴维·赫尔德 等著  
大 32 开 定价：38.00 元  
2001 年 4 月出版  
ISBN 7-80050-429-6 / D

戴维·赫尔德，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  
安东尼·麦克格鲁，英国南汉普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戴维·戈尔德布莱特，英国开放大学社会科学讲师



乔纳森·佩拉顿，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经济学讲师

本书是读者了解“全球化”的最佳入门之作，对全球化进程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移民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描述和比较分析，为读者勾画出一幅全面立体的图画。作者独创一种分析模式，并将之应用于美、英、德、法、日、瑞典等6个国家，这种研究方法避免了理论的枯燥，有利于读者更清楚地认识全球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书在“亚马逊”网上被列为五星级著作，并成为许多学校相关课程的必备参考书目。

读者对象：经济界人士、经济类大专院校师生